

癮

作者：斯蒂芬·史密斯

译者：王家湘

作者出生于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四岁时辍学，染上毒癮，二十五年后始成功戒毒。现从事房屋出租和房地产买卖。本书是他的一部自传作品。

一个天真单纯的少年十四岁便染上毒癮，沉湎于安非他明二十五个春秋，其间流落街头，九死一生，经历了非人的肉体折磨和灵魂挣扎……但却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讲述了他自己这个触目惊心、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

引言 一个向吸毒之路前进的少年

第01章 第一次犯罪 第02章 第一次吸毒

第03章 绅士乔治 第04章 性尝试、鞭答和一屁股屎

第05章 爱情与破碎的心 第06章 艾伦

第07章 一船毒品 第08章 疯狂岁月

第09章 马耳他伤逝 第10章 月台布道

第11章 离开卡米拉 第12章 爸爸再见

第13章 独自在家 第14章 通向财富和精神病的总计划

第15章 吸毒的蚂蚁和女人的亢奋 第16章 克拉拉

第17章 三个亢奋迷糊的强盗 第18章 偏执妄想狂

第19章 光着身子和醉鬼们共眠 第20章 废旧品商店的兰娜

第21章 闪电光中上帝的脸 第22章 两个迷失的孩子上了一条下沉着的船

第23章 恐怖演出主场开始 第24章 别了特莎

第25章 滑入黑暗 第26章 和流浪汉共进圣诞节正餐

第27章 流浪岁月 第28章 凤凰戒毒所

第29章 活死人 第30章 康复、希望、故态复萌

第31章 穷途末路 第32章 爱发出了拯救我的呼唤

第33章 仙境圣诞 第34章 小杀手大打击

第35章 赴霍利黑德的恐怖之旅 第36章 曲折而漫长的路

第37章 从死亡中归来 第38章 从此幸福

与无家可归者共度1996年圣诞节

我在十四岁时服用安非他明成癮，二十五年中发展到每天服用一百片。毒品使我过着犯罪和精神错乱的怪诞生活。随着因吸毒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从一个拥有多处豪宅和骏马的花花公子沦落到在救世军济贫所中栖身，最后孤身流落街头，与贫民窟中的酒鬼为伍。这一切为什么会在我身上发生？看着今天的儿童，我心想，他们中有些人会不会在几年后也坐上类似的疯狂过山车冲向地狱。为什么有些少年注定要过我曾经经历过的。具有恐怖电影的一切特征的生活？他们和别的正常的少年之间有什么区别？也许在我的故事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是战后在伦敦一个令人厌倦的、叫做温奇默山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长大的，那里生活平淡无奇。每一条街上都是一排又一排的一侧和其他的房屋相连的住宅，看上去全是，个样子。

妈妈和爸爸在公共汽车上相遇后马上陷入了热恋。他们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爸爸是犹太

人，公然反抗他思想正统的父母，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信奉基督教的妈妈结了婚。他们举行了两次婚礼，第一次是在基督教堂里，妈妈的亲友参加，第二次是在第二天，在犹太教堂里，爸爸的犹太亲友参加。两家都没有参加、甚至都不知道另一方的庆祝活动。为了在犹太教堂结婚，我妈妈不得不改信犹太教。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已三十四岁。我有个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名字叫安妮特，是个有黑色卷发的漂亮小姑娘，刚刚开始上学。我的父亲在一九四五年开了一家裁缝店，生意很快发展起来。战争结束了，回国的士兵都拿着政府发的服装配给票买套服。爸爸那时赚了很多钱，我们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有钱的人。那些日子还用食品配给簿，可是我们家餐桌上总有大量的黑市食品。我们是那条街上第一家买汽车的，每年夏天全家人都挤在车子里开到法国南部去。在那儿的两个星期，父亲没日没夜在赌场赌博，把我们整天留在海滩上。

我母亲是个非常迷人的女子，苗条的身材，金发碧眼，长得像玛丽莲·梦露。她在贫困中长大，因此父亲新来的财富给了她很大的乐趣。她喜欢装腔作势，爱穿着奇装异服受人赞赏，特别是受到她的工人阶级的姐妹们的赞赏。

父亲是个英俊的男人。他黑头发向后梳，留中分头，我记得他总是身穿套服，就连在家也是如此。他整天烟不离嘴，一根接一根。爸爸变得非常胖，但是因为个子高，显得很威严，倒有几分马龙·白兰度后期的样子。他把我们的房子扩建了，加了一个车房、两间卧室和一间配备齐全的大厨房，想把我们的的一例和别人家的房屋相连的小房子变成一所小型华宅。一堵高高的砖墙把我们屋后的花园围了起来，前院则完全铺上了水泥，和邻居家的花园完全不一样。别人家花园里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四周种着玫瑰和茉莉。我们的花园没有花，也就没有了四季，水泥和野草看上去永远是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花园一样，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也与众不同，跟那条街上的人格格不入。

爸爸从来不打我们，但在我们家一切他说了算，母亲永远得保证他的有三道主菜的晚餐做好了等着他。作为夫妻，我的父母彼此似乎从未表示出多少爱意来，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笔交易，妈妈做饭，爸爸为这奢华的生活方式提供金钱。随着财富的增加，爸爸变成了一个自己无法克制的赌徒，但母亲却是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到豪华俱乐部的环境中去，在那里她和其他赌徒的妻子们交际、一起进餐。我姐姐和我在物质上从来没有缺过任何东西，但是在爱和感情这方面我们一无所有。我不记得父母在我们入睡前给我们读过任何故事，也不记得他们和我们一起玩耍过。他们根本就不在家呆着，而总是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把我们留给一连串住在我们的保姆照顾。星期三是他们惟一在家的晚上，那是定好在我们家打牌的一晚。为此专门摆出一张绿色台面呢的桌子，还有为来打牌的客人预备的昂贵糕点。我们小孩子是不许碰这些糕点的，更不用说吃上一块了。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刚来了一个新保姆，名字叫维奥莱特。她是个矮胖粗壮的女人，大约六十岁，头发灰白，戴着厚厚的眼镜。维奥莱特非常想要孩子，可是从来没有生养过，于是便把所有深压在心中的爱一股脑儿地倾注在了我的身上。然而她却从未把这份爱扩大到我姐姐头上，姐姐是个任性的小姑娘，不肯受新来的保姆摆布。

我成了维奥莱特的宠儿。她整天和我说话，和我一起玩耍，总叫我是“她的斯蒂芬”。她对安妮特很凶，常常骂她，因此，姐姐开始恨保姆，外带恨她那惯坏了的小弟弟，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变得在感情上依赖维奥莱特，在她休息的日子我会不停地哭，要她答应早回来，或者根本取消周末的休息。对我来说，维奥莱特就相当于妈妈。

我四岁左右时，维奥莱特开始每晚给我读罗宾汉的故事。一段时间以后，不听这故事我就睡不着觉。这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整个迷住了我，在我的坚持之下，后来的四年中她每晚都读这个故事。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模仿了他劫富的行为。我和罗宾汉之间的惟一区别是，我为自己留下了比例高得多的经营管理费用。

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双胞胎弟弟出生了，我说服了妈妈，按维奥莱特教我的那首诗《两只小鸟儿》里小鸟的名字，给他们取名叫彼得和保罗。此后的两年里，妈妈尽全力照看这对双胞胎，我就完全由维奥莱特来管了。两个小弟弟两岁时，妈妈的精神崩溃第一次发作。从那时起，她就成了医院的常客。

我八岁那年，妈妈在一次精神崩溃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突然没有事先通知就把维奥莱特给解雇了。妈妈嫉妒我对维奥莱特的依恋。她走后来了一个法国保姆，我很讨厌她。不用说，在学校正学法文的安妮特喜欢这新来的姑娘，可是对于我，她只是一个从法国来的陌生女人。晚上没有人给我读故事，我独自一人，总是哭着入睡，而且开始尿床。这样一直持续到十二岁。

有时候晚上我上床后，楼上的灯光会突然熄灭，然后出现一个妖怪，举着火把照我的脸。

这不是梦。是真的。当灯又亮起来的时候，妖怪就消失了。我永远也忘不掉它的脸。

大约这个时候，我开始反复做两个同样的噩梦。我梦见我的卧室和房子脱开了，往天上飘去。为了让我镇静下来，楼梯头上的灯通夜不熄，我卧室门也一直开着。我的梦简直和真事一样，以致我把一条绳子的一头系在自己的床上，把另一头沿楼梯往下，拴在楼梯最底下的栏杆上。在第二个噩梦中，两个一模一样的维奥莱特争抢我的爱，俩人都说“我是你真正的维奥莱特”，我受尽折磨。为了解决这可怕的局面，我不得不用家里的切肉刀向那个假维奥莱特刺去。当我把刀刺进那个我认为是使维奥莱特的人的时候，鲜血直喷而出，我总是尖叫着醒来。

我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玩具和其他能到手的東西，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当住在对门的埃里克·谢泼德到我家来玩的时候，我就把他的玩具扔到我们家花园后面的公墓里去，心里想，你有一个和你一起踢足球的爸爸，你用不着这些玩具。我警告埃里克，只要他敢去捡回玩具，死人就会抓住他。他回家去以后，我便翻过那堵大墙，把他的牛仔枪之类的玩具加到我的秘密收藏品之中。所有来我家玩的孩子都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我记得有一次我用一只玻璃杯捉住了苍蝇，然后一个个把它们翅膀烧掉，当它们无助地四处乱爬的时候，我得到了一种强烈的权力感。当家里的猫生了小猫以后，我把小猫和猫妈妈分开并且藏了起来，心想如果我不能有妈妈，小猫为什么该有妈妈？

有一天，我在母亲卧室里翻一个抽屉时发现了一个面具，吓了我一跳。这就是那个妖怪的脸。我把它剪成了碎片，扔到我们屋后公墓的死人那里。妖怪和他的火把后来再也没有来吓唬过我。

那以后不久，我在附近发现了一家废弃的托儿所，里面有几个破温室和一座木头棚子。棚子里面有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门锁着，钥匙生了锈。对我和我那由三个比我小的男孩组成的帮伙，这可是个绝好的司令部。我把他们三个人当作驯服的奴隶对待，以给我业已摇摇欲坠的自信心打气。我们策划童年那些胡作非为的举动时，样子就像（公正的威廉）故事里的人物，脸上脏兮兮的，穿着灰色的短裤和针织套头上衣。有一天，灾难突然从天而降。我姐姐安妮特和她的两个大朋友站在外面冲我们咯咯直笑。我简直丧气极了。霸道的家伙又一次摧毁了我的世界。我气极了，又不愿让她得到木棚子，便密谋报复。我用在废弃的汽油罐里找到的油在整个托儿所的场地里放了一把火。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我跑回家里，从自己卧室窗子里看着这场熊熊大火。当火舌蹿上天空、人群聚集起来看救火队用了好几个小时救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骄傲。第二天我在灰烬中行走时，发现了我那个消失了的帝国的那把生锈的钥匙。好吧，现在谁也得不到那个木棚子了！我心满意足地寻思着那场大火标志着我的一个终身习惯的开始：在每一次犯罪之后，“烧毁一切，埋葬灰烬”，以保证永远隐瞒我的过去，只剩下上帝和我自己充当见证。

我从来都不喜欢上学。课堂使我厌烦，我反抗纪律约束。我偷书，把它们带回家藏在床底下，对自己说维奥莱特总有一天会回来读这些书给我听的。到十一岁我不得参加强制性的小学毕业考试时为止，我每门课在班上总都是最末一名。小学毕业时的这场考试把学生分为接受普通中学教育和现代中学教育两类。医生和证券经纪人靠右站，工厂工人和体力劳动者靠左站。在只剩下六个月的时候，父亲意识到我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次考试，便突然开始行动起来。让他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去上后一种学校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花钱雇了一个家庭教师，每晚给我上课，以保证我考好。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我从老末到名列前茅，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达到了只收最高分学生的埃德蒙顿中学的录取标准。

我姐姐安妮特刚从这所学校毕业，她一直是女生的主席和曲棍球队的队长。自然啦，她考试成绩简直辉煌得该死，步她的后尘可是件很难的事。从一开始我就讨厌那校服，特别是那顶蓝黄色相间的帽子。同时，别的男生都穿长裤，可我还穿着短裤，这也使我感到和别人不一样，非常不自然。我求父亲给我买长裤，可是他坚持要我先把短裤穿坏了再说。

开始的时候，我很为自己小学毕业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是很快就回复到了惯常的全班最末的位置。在全校六百个学生中只有两个犹太人。一个小男孩，有着一个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名字——利维，和一只上帝所提供过的最大的鼻子。另一个就是我。我是在犹太教堂里认识利维的，但在学校里我像躲避瘟疫般躲着他。起初，没有人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也希望能保持这种状况。因为在埃德蒙顿反犹情绪很是猖獗，从有关取笑犹太人的玩笑中就能感觉得到。那里的孩子和希特勒之间的推一区别就是他们没有真动手企图用毒气杀死我。每次父亲经站自我因为犹太教的假日而请假的时候，我都假造家长说我生病的假条来掩盖实情。但是有一天，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们发现了这事，老师在全班面前问了我最怕的问题：“你是犹太人吗？”“不，其实不真是，”我答道，“只是有那么点儿意思。”从同班同学的反应来看，你准会以为我得了麻风病。那天的游戏时间里，我感到像个被抛弃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孤

立过。别的孩子全都在谈论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一向拿来开玩笑的卑鄙的犹太小孩中的一个。因为谁也不愿意挨着犹太人坐。我被独自放在了前排。

我推一擅长的是长跑。我幻想打破罗杰·班尼斯特一九五四年所创的一英里四分钟的记录。大多数的游戏时间我都在练习，这样就可以省得和别的孩子在一起，被他们取笑。我从跑道直接跑到教室，气喘吁吁地去上课，老师们气得要命。

我在家庭中得不到任何感情上的支持。八岁的双胞胎弟弟仅代表了两个拖着鼻涕的讨厌鬼，而十八岁的安妮特总和成年的男朋友出去。这时我已经快十三岁了，觉得一天比一天迷们，直到出现了一个奇迹。我在希伯来主日学校遇见了雷蒙德，一个比我大九个月的犹太男孩。对我来说，雷变得十分珍贵。他块头比我大，各方面都比我成熟。每天放学以后，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公园去，或者到当地新开的有自动电唱机的咖啡厅去。香自己有电唱机，我们常常听他的密纹唱片，其中一张是一个美国青年歌手唱的《你只不过是一只猎狗》。埃尔维斯已经在英国出了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立刻就对埃尔维斯着了迷，他和盖伊·米切尔及其他那些我爸爸妈妈喜欢的、哼唱伤感歌曲的平淡无味的歌手完全不同。有趣的是，雷蒙德和埃尔维斯几乎融合成了一个人。他们两个我都敬慕。我们每月一次去犹太青年俱乐部的时候，雷像埃尔维斯那样梳个大背头。我们与穿着裙子、涂着发胶的姑娘和着比尔·海利唱的（摇滚个昼夜不停）跳舞。在看到雷穿上他的最新全套行头，蓝色羊皮鞋、紧身长裤的一个星期以后，我也穿着同样的裤子出现了。他是个摇摆舞的超级好手，从来不缺姑娘，并且用自己极赋扭力的微笑迷住了她们大家。作为他心甘情愿的副手，我学得极快，不久便与他并驾齐驱了。

雷开始每个星期六都和一个女孩子约会，并且开始吹嘘他的收获。他们第一次约会后，他告诉我他怎样把手放在她的察头衫上摸了她的奶头。第二个星期他的手到了她胸罩里面。第三个星期他的手往下到了她的裤衩，到了第四个星期她把他的那家伙拿了出来——我急不可耐地等着所第五个星期的消息。在性的方面我是大大地落在他的后激。我甚至都还没有吻过女孩子，就更别说摸了。

一天在公园里时，雷蒙德向我解释了性生活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父亲刚对他讲了。我专注地听着，心里却在想，他妈的我爸为什么不给我讲这些？雷以具体示范如何使那家伙勃起并流出白东西来——当着我的面手淫——结束了他的这一课。那晚我开始依样试行，可是我吓坏了，没有进行下去。

在我们相识的十四个月里，我们变得难分难离，两个少年一同长大起来。我甚至和他及他的父母一起到伯恩茅斯的海边去玩过一个星期。在那以后我吻了第一个女孩，事后我对雷说，我真不明白摸奶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是觉得软呼呼的而已。他大笑，说：“你很快会喜欢的。”

有一天我们尾随着两个回家的姑娘，在她们家门外和她们瞎闹着玩，整个把时间给忘了。我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改变我整个生活的两件灾难性事件中的第一件。

雷蒙德的父亲在儿子什么时间回家这一点上一向十分严格，那个致命的晚上他大发脾气。我们不多不少晚了三十分钟，可是他那样子就好像我们犯了大罪，当场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把他的决定通知他们：六个月里禁止我们见面。对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六个月简直就像是无期徒刑。我根本不明白我们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一路哭着骑车回家。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意识到再也没有雷蒙德了，伤心得要命。我又一次孤单一人。

由于雷的爸爸对我干了这样的事，我恨透了他。此后的二十年里我周期性地在半夜给他打电话，就为了不让他好好睡觉。那个星期一晚上一别，我和雷蒙德三十五年间再也没有见面。当我们在这漫长的岁月后再见，他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去世时，我高兴得用最好的香槟酒庆祝了一番。

那禁止我们见面的致命的六个月把我带到了远离雷蒙德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

我是一个受到了极大伤害的十四岁少年，而就在这时，第二天在学校里第二个打击又落在了我的头上。一直就有报告说放在学生们口袋里的钱常常不见了，在那天早上集合的时候，当着全校的面我被指责偷了钱。虽然我明知自己是无辜的，但我却摆脱不了那压倒一切的羞辱感。我实在是受不了，再也无法面对上学一事。我在父母面前装作一切如旧，但每天都往公园里跑。好几次我逃学被发现后又送回学校，但我就是不肯上学，一有机会就逃跑。此后我再也没有上学。

雷蒙德的父亲禁止我和我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朋友见面，从而毁掉了我的世界。他的行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通向犯罪和吸毒的离奇生活之门。

一九五八年初，我开始大胆地进入到多暴力的地区去，正是在那里我遇见了布赖恩。他比我大两岁，那年十六。他是个高个子，在街面上混的路数比雷蒙德要精得多。他总是穿一件皮夹克，搽着头油的棕色头发朝后梳成鸭屁股式，是个典型的五十年代无赖青年。他哥哥哈利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摩托帮里的一员，弟兄俩都有很多零花钱。布赖恩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少年，总爱笑，在公园里把自己的糖果和廉价香烟拿来和别的孩子分享。好像人人都认识他。我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野，开始把布赖恩作为同等的人来对待。我正在很快长大，实在快得该死。晚上我们全都穿着紧身裤、羊皮靴子和皮夹克，一副小马龙·白兰度的样子，聚在摩托车手咖啡厅里消磨时光。那年二月里，咖啡厅里许多男孩子都戴着黑色臂箍。全国的人都被慕尼黑飞机失事事件惊呆了，很多“巴斯比的孩子”，曼彻斯特联合足球队队员都遇难了。

一天晚上，当我们俩一起外出时，布赖恩被一个凶恶的坏蛋打了一顿。他勇敢地反抗，可最后还是给打得鼻青脸肿。那坏蛋走了以后，“勇敢”得甚至不敢卷入争论的我对布赖恩说：“别担心，我们会报复那个杂种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坏蛋发现我独自一人，就开始找茬。他把我推倒在地，开始跟我。我不但没有像布赖恩那样反抗，反而捂着脸躺在地上讨饶。那家伙是个有想曲红发的胖子，他生起气来，站在我身边尖叫道：“起来干一仗，你这个大软蛋！”可是我吓得根本不敢动。有人路过打断了他的踢打，那坏小子逃走了，剩下我自己躺在地上哭。最后我终于爬起来回家去了，被接得够战，更加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羞愧。

那晚，我平生第一次拿了家里酒柜里的一瓶酒自个地喝了起来，好“镇静神经”。酒使我立刻变了，从一个害怕打架的、胆小的、十四岁的懦夫变成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凶猛的老虎。再痛饮几杯后我变成了个小恶魔，跳上自行车骑到那坏小子家门口。他家住在那条巴罗威尔绿地的地方，是最乱的地区。那斜坡上的排排房屋又小又破，看上去和我家所在的那条街上的房子很是不同，它们很宽敞，一侧与别人家的屋子连着。站在他家被垃圾包围着的前院里，我能听见什么地方正开足音量放着朗尼·唐尼根的唱片（我老爹是个垃圾工）。我使劲砰砰地猛敲他家的前门，歇斯底里地大叫，当着他母亲和几个哥哥的面勇敢地面对这个折磨过我的人。我扯着嗓门喊道：“我要打架！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这该死的房子给烧了！”我吵得四邻都到大门口来看是谁在向这臭名昭著的沙利文兄弟挑战。那个红头发的坏小子和他的哥哥们站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他们的那位头上还卷着卷发器的母亲大声叫邻居去通知警察。我还在那几声嘶力竭地威胁时当地的警察来了，他们努力平息事端，让那个坏小子为打肿了我的确向我道歉。我终于心满意足地骑车离开了，一面回头向人群喊道：“下回小心点！”那晚我简直觉得自己是阿尔·卡彭特。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感到一阵恐慌，头天晚上喝醉后发出的威胁使自己十分害怕。我吓得决定到坏小子家去道歉，走到半路碰见了他和他的哥哥们。我做好发生最坏的事的准备，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三个人都对我微笑，并尊敬地和我握手。后来我遇见了布赖恩，他已经听说了我去威胁沙利文兄弟的事。我立时就成了英雄。但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啊！这一事件给了我改变一生的致命教训。我从酒瓶里找到了勇气，而味道不同的酒永远都能够搞得到。借助于一点化学物质的帮助，我战胜了自己的克制和无能感，找到了足够的勇气去唬住那坏小子和地的家人。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使我可悲地失去了自信，而酒把它还给了我。

酒精改变了我的性格。在我和布赖恩的关系中我成了领头的，现在布赖恩总是以敬慕的眼光看待我。酒使我想逃避伦敦北部那单调无聊的生活，遁入侠决罗宾仪式生活的幻想世界中。我开始厌倦像别的孩子那样在公园里打发时间的生活。一次我想干点什么，便对布赖恩说：“走，我0]留的是士兵头，我们不是胆小鬼。可参军的是埃尔维斯，不是我们！”不久我就建议我们出去抢劫。我们可以像拦路的强盗那样转着车猛扑过去抢走妇女的提包。那晚，我们俩从当地的火车站尾随一位老太太到了一条僻静的街上。我灌了一肚子酒，发出信号后，我们骑车从两面抄她时我抢走了她的提包。我们猛骑着车逃跑时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当她的尖叫声逐渐消失在远处时，我突然意识到布赖恩不见了，丢下我独自骑着自行车逃跑了。我紧抓着手把，骑到附近一片田野里，把提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发现有二十个英镑，这在那时候可是很多钱了。我把钱塞进口袋里，把提包塞到小溪的水底藏了起来。一丝不苟地、小心谨慎地处理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将会在此后的许多年中成为我的病态职业的标志。为保险起见我一直戴着手套，直到回到卧室感到安全时才脱了下来。后来在每一次抢劫的前后各一个星期我总要戴着手套。

我为什么要这样干？父母对我的漠然和失去雷蒙德后，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求救的呼唤呢？

我是不是在想，就是受惩罚也比孤独和被忽视强？

第二天我主动要给布赖恩在抢劫中他应得的那十英镑，可是他拒绝了，说他不能继续干下去，而且也害怕被人捉住。“难道你父母没有红葡萄酒吗？”我厌恶地问道。我们分手了，他祝我好运。他看上去轻松了许多。他要和哥哥骑摩托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看第一支从奥尔德马斯顿来的“禁止核弹”的游行队伍到达那里。

只剩我一个人继续干下去。在后来的许多星期里，我成功地为阔人减轻了他们多余的钱造成的负担。当我父母的酒开始减少时，我便找大个子男孩去替我买酒来藏在自己的床底下。随着酒喝得越来越多，我的表现愈加勇敢，抢劫也愈加胆大。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看见一个妇女夹在两个男人之间沿一条繁忙的大街走着。试图抢劫她当然是自取灭亡，但在喝下车把手上瓶子里最后的一点酒以后，我骑车上了人行道，就像约翰·韦恩般插到了他们中间。那女人拼命抓着她们的提包，我拖着她走了一截之后她才松开了手。这时三个人全都大喊着追我，我想离开大路，惊慌失措地拐上了第一条向左的路，发现这是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有三个大人在后面穷追不舍，很快我就被抓住了。就一个十四岁的人而言，我和两个大块头之间开展的搏斗是够英勇的，但他们很快就制服了我，把我握在那儿，同时那女人去叫警察。我吓呆了。啊，上帝，我心里在想，我干了些什么呀？

当那两个男人扼住我的时候，那个女人拾起提包大声问道：“你愿意有人抢你母亲的提包吗？”一群穿着睡衣的人走出来打听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结果发现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两个成年人打架。最后警察来了，可我整个吓糊涂了，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开往警察局去的路上，有个圆脸的警察和我一起坐在警车的后排座上。那时候抢提包的事还不多见，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的许多罪行都早已报告到了警察局。这时，每个警官都想来看看这个终于被抓住了的年轻的拦路强盗。拘留室门口不断有人伸进头来看上一眼。讯问我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在我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以后，脸上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那是一条和大多数产生青少年罪犯的多暴力地区正好相反的体面的街道。

一个小时之内我的父母就来到了警察局。父亲十分吃惊，开始询问我，但我只是默默地迎着他的眼光。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哭了起来。只是在禁止我跟他们回家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严重。父母离开后，我被带到一个囚室去过夜。警察局的警察在听世界杯足球赛的广播，巴西5：2战胜了瑞典。十七岁的贝利进了球。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囚室里黑乎乎的，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想念维奥莱特，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从囚室被带到法庭上，看到三个法官坐在一幅女王的巨大画像前。他们裁决我在押四周，以准备获得进一步的报告。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样子粗野的少年一起被一辆上锁的警车带走了。大的那个似乎是个老资格了，他问司机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圣尼古拉斯少年收容所”里。“那里面可有些难对付的家伙，”他指着掉了的门牙说，“这是我上次在那里时的事。”那天天气很好，车子驶过乡村，我沉默地坐在车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围着安全网的巨大建筑物的大门外，那里有个系着红色工作裙的胖女人来接我们。“这些就是今天的少年罪犯吗？”她开玩笑地问警车司机。“我们这儿有个抢提包的小家伙，”他答道，“觉着自己是个罗宾汉呢！”我下车时她对我怪笑着，揪着我的领子：“好吧，欢迎你罗宾。我是使女玛丽安！”

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一间大餐厅里，大约有五十个男孩在那里吃香肠和土豆泥，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伦敦东区口音很重的人喊道：“看，巴里回来了。你好吗，老小子？”这是和那个缺牙的男孩打招呼呢。聚集在这里的穿着帆布制服、全都比我大得多的少年都是成长中的明天的罪犯。比起他们来，雷蒙德和布赖恩简直像儿童车里的婴儿。那晚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大宿舍里各自的铺位前，关灯时女看守大声说：“统统听着，不许手淫，马上睡觉。”

第二天早饭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落在少年犯罪世界的深渊里了。我被派和另外俩人在厨房干活。他们在争论谁的父亲是更出名的匪徒，突然其中一个拿起他正洗着的刀子捅进了另一个的胳膊。我看着挨捅的那个踉跄着走出厨房，留下了一道血迹，整个吓呆了。那个较大的男孩立刻一把抓住了我，把血迹斑斑的刀子对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如果敢告发他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快跑！”他恶狠狠地嘶嘶说道。我奔出厨房，跑进宿舍躲到了我的床底下。后来询问我时，我说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上厕所。和那些大孩子在一起，我明白自己不是罗宾汉，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跟屁虫！

随后的三个星期像场噩梦，非常可怕。我的父母每个星期来看我，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显得离这个凶暴的少年世界是这样遥远。其中一群仿效他们的英雄、几周前刚从切姆斯福德监狱逃跑的阿尔弗莱德·海因兹，正在策划越狱。在我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变得勇敢了一些，开始按我能够想象的模仿电影（监狱摇滚）中的埃尔维斯。一天晚上的娱乐时间里，我想打台球，但是一个已经玩了很久的苏格兰男孩不肯离开球桌，我生气之下和他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他用台球杆打我，把我的嘴唇打了个大口子。我吃惊得忘了还手，这件事在我一两天后脸上包着绷带上法庭时起了有利于我的作用。

在申诉中，父亲没法说服了地方法官们我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监禁。他想着有个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的病儿子要比有个在监狱里的健康儿子强。于是我当场被判去当弗莱思·巴尼特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在当时，这似乎比在少年犯监狱里蹲三年要好，但从以后在精神病院中出现的情况来看，蹲监狱要好得多，可能会使我免去吸毒这个无期徒刑。

我被放进一辆加锁的小客车里送到那家精神病院，只是在警察离开后我才完全意识到这不是少年拘留所。现在包围我的不是少年罪犯，而是穿着晨衣四处晃悠的怪人。

弗莱思·巴尼特是巨大的哥特式综合建筑群，坐落在大面积的场地之上。它有着欧洲最长的走廊，病房都是上锁的，病人只有进了棺材才能从里面出来。许多病人从世纪之初起就一直住在里面，进来时才十几岁，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镇静剂的药力之下。后来揭发出来，医院里求得家属同意在病人身上进行过大脑手术实验。当别的十四岁的少年在上学、一些不服管的或许在蹲监狱的时候，我却和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人一起被锁在了疯人院里。我并没有抑郁症，也没有自杀倾向和厌食病，只是一个因偷窃被抓的孩子。我能够对付监狱生活，但这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使我毛骨悚然。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单元叫哈利威克病房，里面尽是怪人，整天被锁在一间大公共休息室里。这间长约六十英尺的房间有俯瞰院子的大窗户，偶尔会有从别的病房逃出来的转了向的病人从窗前溜达而过。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圆桌和许多椅子，黑白相间的方地板革铺的地看上去像个巨型象棋盘。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另外一个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复同样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在草地上行个屈膝礼后再爬回来。“其死掉”个子不高，二十几岁，总穿着医院的层衣。他拒绝穿鞋袜，绿色的贝雷帽一直拉到盖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人。她体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两个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托的奶头撑着绷得紧紧的尼龙套头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烟，用吸剩的烟头点燃新的一根烟。烟灰总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过房间去把又一个燃着的烟头扔进垃圾桶时，烟灰便从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时候裤子出溜下来，露出屁股沟来。她常常会和“真死掉”撞个满怀，对他大嚷：“滚蛋！”而他总是说：“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对此她会咆哮着说：“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开着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上靠。她手里总抓着几包香烟，如果新来的病人问她要烟，她的回答永远是“滚蛋！”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

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罗杰。他大约四十岁，头已经全秃了。警察发现他凌晨两点时在大街上乱转，被带进来时穿着一身邮递员的制服。他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除了医生或者护士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整天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儿。他一看见他0J就会跳起身来，一个劲地对他们说他不是邮递员，他的名字也不是罗杰。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多琳，一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有着金黄色的长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黄色紧身套头衫，连胸罩上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就能顺着裙子看见她穿的白色裤子。当她张开两腿时我能看见她的阴毛。她的金发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说话，但是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不愿做定在下星期的脑前叶切除手术。她非常害怕这个脑手术，大喊：“我不愿意把我的脑袋给切开！”

除了些耶稣会员、俄国特务和一个整天洗手的男孩外，还有另一个常客，我管他叫钱串子先生。他是个有钱的纽扣制造商。我认为他住院是为了逃避对他的诈骗指控。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穿着昂贵的套服和锃亮的皮鞋，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医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数时

间都在看专门给他送来的报纸。偶尔他也和多琳说话，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企图挑逗她。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不论谁问他要烟都给。他唯一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护士递给了他一封信以后。

我们全都整天坐在那个房间里，天天如此，望着墙上大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们听卢森堡电台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汤米·斯蒂尔的音乐，他们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样的音乐。只有吃饭和送药车来到时才打破这单调的局面。这样过了两星期，正当我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某个纽沃姆大夫要开始给我治疗了。

第二天晚上八点，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后，纽沃姆大夫才来叫我。以前我在病房里见过他。他是个英俊的、身材修长的澳大利亚人，肤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浓密的黑发每一细都整整齐齐。他总是穿浅蓝色的套服，系鲜亮的黄领带。他微笑着向我介绍了自己，让我跟他沿一条安静的长走廊走去，把我领进了一间治疗室，从里面锁上了门。这个房间四壁空空，只在当中放了一张高睡榻，上方吊着一盏灯，像一间手术室，让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着睡榻让我躺下。他从小黑箱子里拿出了注射器，给我打了一针。我马上就觉得晕乎乎的，好像飘了起来。房间仿佛变得越来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来越小。纽沃姆大夫态度和蔼地问我为什么要抢提包。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松。我记不得他提出的别的问题了，但我确实记得他说：“你会喜欢这个的。”一面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和我口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还没明白过来就达到了性高潮。他告诉我不要有负罪感，而要享受其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顾问医生巴尔金大夫那里去申诉。但是，唉，他自己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仅仅对我说别让自己胡乱想象。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求他们让我离开这里，但是我是法院命令进这个疯人院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尽管我一再恳求，这种情况仍继续着。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上打针后的这种晕乎乎的感觉，加上纽沃姆大夫总是注意不让我有负罪感，性高潮也变得其乐无穷了。

这个大夫如何能够厚颜无耻地干出后来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他设法安排让我到伦敦中区去和他相会，并在他位于肯辛顿的公寓中过了一夜。到他给我车钱让我到伦敦西区去时，我早已不再抗议，非常激动地坐上拥挤的地铁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

在电影院门外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咧着嘴微笑着等我的，是纽沃姆大夫和他治疗抢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带我进了附近一家小酒店，虽然我还不到年龄，他们还是把酒卖给了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递给我一粒小小的黄色药丸，说：“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开心！”又说：“这会让你感觉更好。”

我听话地吞下了药丸，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入右旋安非他明造成的昏暗世界的开始。这是一种强效安非他明毒品，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成了支配我生活的最强大的力量。

我坐在小酒店里，开始感觉越来越好。对于任何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能在夜里到皮卡迪利圆形广场来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这个药片把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到半小时我就充满了难以控制的激动，在酒店里跑来跑去，和陌生人聊天，仿佛从来就认识他们似的。这种引起幻觉的毒品开始生效时，我变得激动、饶舌、外向。我们离开了酒店，穿过红灯区，那里闪烁的霓虹灯似乎越来越亮，好像专门是为我而点燃的。我的脑袋像一座喷发的火山。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得没治了！我想唱歌。我们从街上的妓女身边经过时，她们都向我们微笑，招手要我们走进她们灯光幽暗的大门里去。我们看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外面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久就走到楼下看她们脱衣服去了。当我抬起头来穿过烟雾，第一次看到一个全裸的女人时，我的心开始怦怦狂跳，阴茎变得硬邦邦的。在麻醉品造成的晕乎乎的感觉中没有了任何约束，我走进厕所的小间，一面想着那裸体姑娘，一面……这种工作时间以外的治疗毫无疑问产生了效果！小间外面的大间里，大夫正带着他脸上通常挂着的巨大的笑容在等着我。

我们离开了地下室里的裸体姑娘，步行到附近的一家西班牙餐馆。餐馆里人满为患，但是在钢琴附近为我们预留了一张桌子。我坐在那儿听着音乐的时候脑袋里昏昏然的。毒品的力量进入我的血管后，我不断感到新的快感从体内喷发出来。每一口大虾伴着开胃品，每一口牛排和草莓都是充满了狂喜地被咽入腹中。当我飘飘然走出大门，坐进出租车在开往纽沃姆的肯辛顿公寓的路上时，咖啡杯里漂着的奶油仍在我的脑子里浮动。

次日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张巨大的床上，脑袋深陷在一个大枕头中。浆熨过的浅蓝色床单上没有一道皱折，就好像是什么魔力把我放在了上面。我全身赤裸，感到动弹不得。出了什么事？我能够记得进了出租车，但是后来的事就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过了好几个钟头，毫无道理地感到很悲哀，心想不知昨晚那奇妙的感觉跑到哪儿去

了。为什么我感到如此厌倦？我没有生病的感觉，头也不痛，就是感到情绪非常低。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向四周环顾。这个巨大房间的高高的天花板整个是一面大镜子。东西像在博物馆中一样放得整整齐齐。到处挂着镶在华丽的金像框里的裸体少年的大相片，仿佛置身于一个色情画廊之中。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排放得一丝不苟的皮面精装书籍放满了书架。厚重的蓝色窗帘半拉开着，让中午的阳光照在这华丽的场面上。床的两侧放着做成裸体男人雕像形的巨型金色室灯。我开始慢慢清醒过来，但感到情绪越来越低。这不是酒后的微醒。一阵无边的绝望毫无理由地包围着我。我向来都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从来没有经受过像那天上午所感到的那种样子的孤独和绝望。

我无精打采地下了床，穿过房间去打开两扇门中小的一扇门时，两只脚陷进了厚厚的蓝地毯中。小门通向巨大的洗澡间，浴缸大得足能容下十个人。金色的水龙头是裸体男人的形状，水从他们的阴茎中流出。每一面墙都是一面大镜子，四角有金色的灯，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埃及法老的宫殿之中。我打开了浴室里的一个大柜子，发现里面是一排排装有药丸的小瓶子，全都以等距离的间隔放置着。那么多的不同形状和颜色的药丸，就像一个药用糖果店，里面备有改变人的神志的糖果！我伸出手想去拿一些，这时纽沃姆大夫突然出现在镜子里，站在我身后，身上一丝不挂。“给你，拿着，”他说道，一面递给我又一粒和头一天晚上一样的黄药丸。

“你很快就会觉得好一些的。”我吞下药丸，踏进他已经放好水的温暖的满是泡沫的浴缸里。我仍觉得难受，一点精神也没有。这时一只正好能架在浴缸上的玻璃托盘出现了，上面的早餐简直是供帝王享用的，有煮鸡蛋，切成长条、涂着厚厚一层黄油的烤面包片，放在一只大蓝杯子里的滚烫的咖啡。我开始吃了起来，把烤面包片扔进浴缸里。我们这位大夫赤裸着坐在浴缸旁的一只高椅子上大笑起来：“那是喂鱼的！”不一会儿他咯咯笑着，几乎跳着舞离开了洗澡间。

突然我开始感到不再郁闷，而是激动非常，完全清醒过来。我脑袋里面的快乐开关又打开了。头天晚上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我满怀欢乐地从浴缸中一跃而出，把最后一点咖啡也碰洒了。我刚吃完了第一顿药物早餐——面包片抹毒品。纽沃姆大夫重又出现，像往常一样穿一身蓝，他穿紧身衣服显得非常英俊。“‘快点，亲爱的，今天穿我的衣服吧，’”他提议这。听见他称我“亲爱的”，我非常吃惊，但是觉得很舒服，什么都没有关系。很快我穿上了一身蓝衣服，加上自己的黑头发，看上去整个是用纽沃姆克隆出来的。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位于大理石拱形楼牌附近一个高级街区内的纽沃姆的公寓，穿过马路到海德公园，在公园的树木之间跳舞。花春上去很棒，人们看上去很棒，一切看上去都很棒。我觉得比前一个晚上还要快活。我们到一家昂贵的大饭店去吃午饭；在那儿，穿得像企鹅的侍者为我们服务。我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在毒品麻醉力的影响下，兴奋得注意力无法集中在食物上。午饭后我们坐出租车到海德公园中央的蛇形湖，租了一条船划。那天有风，湖上很拥挤。大夫操桨，我们的小船像只神奇的天鹅在水上漂行。我们轻轻驶过鸭群，驶到桥下，抬头看着人们的笑脸，好像他们在把幸福扔到我们身上。

但是突然一种感觉开始了，起初很慢。一片看不见的阴云莫名其妙地笼罩住我，我开始觉得心情不好。我希望这会很快过去，心里想，我刚刚还觉得幸福得发狂，怎么可能觉得心情不好呢？我毕竟仍在同样的湖上、同样的船中呀！但是悲伤并没有离去。一切都开始显得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要离开这条愚蠢的船，脱去这些可笑的蓝衣服。桥上的人在嘲笑我们。我想要摆脱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浅蓝色的妖魔。梦正在变成一场恐怖电影。纽沃姆大夫意识到麻醉剂在我身上的作用正在消失。便很快还了船，坐出租车把我带回他的公寓。我在那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在另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医院的路上，我感到越来越糟。到医院后我被带回病房，大个子爱尔兰男护士给我用了镇静剂，很快我就睡着了。

次日早上我怀着在大夫的大床上所感到的同样悲伤的心清醒来。我干脆拒绝起床，最后护士不得不强制着给我穿上衣服。当我要找纽沃姆大夫时，他们告诉我他中午以后才上班。整个上午我像个还魂尸般等在休息室里，跟谁也不说话。我和那个一月前来到这里的饶舌的小赫伯特完全判若两人。后来当我看见大夫的汽车开进来停下时，我一跳而起，马上就觉得好多了。我的反映使自己非常吃惊。我为什么这么需要他？我是同性恋吗？我爱上这个男人了吗？很快我就明白了，我需要的不是这个大夫，而是在他那个黑色小箱子里的兴奋剂毒品。我年方十四，就已经服用安非他明上了瘾，已经是痛君子了。我从开着的窗子里爬出去，一直跑到纽沃姆大夫面前，这显然令他很难堪。他意识到我的状况，答应和巴尔金大夫一起查过房后立刻就见我。我被带回了公共休息室，坐下来等他，和病友们同样忧愁和绝望。多琳呆在一个角落里，头上包满了绷带，像包着印度人的包头布，金发垂在外面。她做过了脑手术，现在一动不动地坐着。

在过了似乎无尽期的一段时间后，我在纽沃姆大夫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从黑箱子里拿出了又一粒黄药丸。“请给我两颗吧！”我请求道，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今晚吃过茶点后我见你。”我用双臂拥抱住他，当我贴紧他身子蹭动时，能够隔着他的裤子感觉到他在兴奋起来。我把这个同性恋男人掌握在手心里了。他达到性高潮后拉上了裤子的拉链，他看上去有点惊慌，把另一粒药丸给了我。“别今天把两粒都吃掉，”他说，“留一粒明天我不值班的时候吃。”既然我靠出卖肉体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便立即走进厕所把两粒都吞了下去。

回到公共休息室后，我充满了活力，一刻也停不下来，和所有那帮古怪家伙聊个没完。药效发作后，在我大脑中越来越快地放映出一场快乐电影。然而别的那些怪人却仍是那副死气沉沉的老样子。我想，他们也需要得到和我一样的治疗。

那晚，在纽沃姆大夫的治疗室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早些时候那两粒药丸的效力，加上他给我打的那一针，使得我更加不顾一切地想得到更多的兴奋剂。我把大夫拉到睡榻上躺下，拉开了他裤子的拉链。我把他搞得兴奋得神魂颠倒后突然来了个广告插播。再给两粒药丸我才继续。在他递给我药丸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惊慌失措地提起裤子，匆匆地离开了房间，把我反锁在里面。我低头往地上看时，看见天堂正瞪眼望着我。满是药丸的黑箱子没上锁。我拿了两瓶塞在袜子下面，然后躺在了睡榻上。很快他回到治疗室，一心想着被打断了的性活动。我们在大理石地板上接着干完了好事。“星期五见，”我们离开房间时他说道。“去你妈的吧，”我心里想，一面走回卧室去。罗杰没在屋里，我数了数药丸，一共有六十粒。我欣喜若狂，体内的兴奋剂仍在振奋着我，但有了自己能支配的储备起来的快乐，我的感觉更加好了。

那晚，和每一个晚上一样，那个爱尔兰男护士推着嘎吱作响的推车送来盛满安眠糖浆的小蛋杯。推车的嘎吱声引起下列两种反应。如果病人喜欢那昏昏欲睡的感觉，他们就会像围着蜜罐子的蜜蜂一样乱哄哄地转来转去，要不就会像吓得要死的老鼠一样躲起来。在我吃药的时候，他总是大喊：“张开嘴！”检查我是不是把药都咽了下去。回到卧室后，我等待着困倦的感觉像平常一样到来，但是没有，大剂量的有旋安非他明压倒了药性温和的镇静剂，使我毫无睡意。我在床上一直躺到三点钟，最后放弃了睡觉的念头，把偷来的药吃了四粒。一小时后我进入了难以控制的亢奋。我第一次经受到超大剂量毒品给你的那种可卡因式的高速度奔流的感觉。那感觉比十四年前从母亲的子宫里滑出还要好。与这个相比，和纽沃姆在一起度过的上个周末显得就像送葬的队伍。罗杰睡得正香，因此我努力控制以排山倒海之势涌上身来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永无止境的性高潮。我简直就像在俄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环绕世界飞行。过了一阵子，我实在无法再保持沉默，便叫醒了罗杰，给了他一粒药丸。他听着我在他耳边轻声述说我全部十四年的智慧结晶。

大约一个小时后黎明到来之际，我和罗杰又各服了四粒药丸，很快就丧失了理智。在我们的床旁讨论中，我们作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今天我们要说出真情。听到送药车的声音时，我们穿着睡衣、手拉手地来到走廊上。罗杰戴着他那顶邮递员的帽子。他走到那爱尔兰护士面前，骄傲地宣布说：“我叫罗杰，我是刘易舍姆城的邮递员。”整个病房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然后所有的护士都开始鼓起掌来。

早饭时我已不再是独自一人呆在我那狂喜之岛上了。由于承认了自己是罗杰，罗杰感到高兴得多，成了我的助手。我环顾室内，注意到了其他的人，一个个都是脑死的僵尸！他们白天的醒睡糖浆被残酷地稀释了！一股压倒一切的爱涌上心头，我决定每个人都必须得到这种治疗。一边去吧，纽沃姆大夫，你这个浅蓝色的同性恋。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可信赖的病人，他们允许我外出到当地的商店去。那天，我买了几大瓶可乐，还有香烟和巧克力。然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这是厕所里的小隔间，我在那里调制了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我把大约二十粒右旋安非他明历碎后混在可乐中，助手则在门外站岗。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休息室里，到了治疗的时间啦！所有这些和我一起分享了我抢提包病的痛苦的可怜虫将要分享点别的东西了！

胖胖得到了两杯这种稍微有点发苦的饮料。罗杰用了一整包香烟来贿赂她把饮料喝光。我那忧伤的画家阿艾伦正口渴，他喝了至少五杯。大约半小时后他平生第一次抽开了烟，抽烟的当地烧着了胡子。后来我们让他吃巧克力以免着火。我看了看四周，大叫道：“罗杰，给‘真死掉’可乐喝！擒住那杂种！往他嘴里灌！”罗杰设法让他喝下了好几杯。我又吞下了四粒药丸。毕竟我比别人病更重，我有抢浅蓝色提包的问题。所有的病人，包括间谍和耶稣会会员，全都给治好了。整个房间活了起来。突然我意识到我把可怜的多琳给拉下了，她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上原来有一部分脑子的地方成了一个洞。我说服她喝下了最后的半瓶可乐。

胖胖这时离开了她的椅子，正在抓她所有的香烟分给大家。“真死掉”仍旧想死，不过对此已经感到快乐多了。他正和胖胖说话，胖胖教他抽烟。罗杰走到他们身后，开始捏胖胖的奶头。就连多琳都好多了。尽管包着绷带，她看上会仍很漂亮，很性感。我伸手到她帮子里面去摸她，她很喜欢，身子随着我的动作起伏。罗杰正在地板上，压在胖胖的身上，胖胖在干着她早已忘了怎么干的事，为此她甚至停止了吸烟。“真死掉”突然跳起身来，爬出窗子，跑得没了影子。有人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我们全都疯了似地在房间里乱跑，合着（围着精神病钟不停地摇滚）的曲子跳舞。

突然门打开了，几个护士冲了进来。

在一片涉嫌审查的阴云下我离开了弗莱恩·巴尼特医院，以后再也没有见到纽沃姆大夫。当局要把这事压下去，便允许我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偶尔我需要向监督官汇报，但他松懈得很，说什么他都接受。尽管看上去难以置信，事实上现在是我的家庭医生定期给我开安非他明，因为那时候医疗界对于安非他明的危险性仍然并不在意。我的父母已经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只要我时不时回家，警察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满足了。

毒品带来的亢奋使我如高飞的风筝，很快就回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下，在街头游荡，寻找有刺激的活动。正是在那里杰克·默里看上了我。杰克是个尽人皆知的同性恋，在布威克街开了个“不在现场俱乐部”。通过他，在十四岁的年纪，我深陷到了同性恋俱乐部的活动中。在这些喝酒的俱乐部里我遇到了许多有钱的同性恋者，他们大把大把地往年轻的伴侣身上花钱。毒品也总是能够得到。整个一九五九年我的生活变成了一轮永无休止的放荡夜。

到了一九六〇年初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自命不凡的小花花公子，和刚刚退伍的埃尔维斯一样，我也准备好要大干一场。一天晚上我离开一家同性恋专用俱乐部，正在倾盆大雨中等出租车时，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机走下车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的主人一起在附近的梅费尔大饭店喝上一杯。我鬼使神差地上了车，坐在后座上。我们到达饭店门外时，司机摘下帽子，大笑起来。这时我认出了这个人，以前在各个俱乐部里常常见他盯着我看。“傻孩子，”他说，“永远不要接受陌生人让你搭车。你可能会遇上不对头的家伙。”“我相信自己的运气。”我傲然说道。“进来喝点什么吧。”他语音高雅，自我介绍叫乔治。我们在梅费尔大饭店里坐下对饮，很快我就被这个高个子瘦削男人迷住了，他卷曲的棕色头发像刘海般垂在前额上。看酒品单时他戴上了金边眼镜，这使他看上去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他的着装完美无缺，风度极其优雅，以至于我觉得英国女王会随时来和我们一起喝一杯。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独自一个人在外面，问我住在哪里，但是我不肯告诉他。他显得有点太关心了，像个家长似的。

已经很晚了。乔治不听着他的怀表，喝过几杯以后，他邀请我和他在他的旅馆里过夜。

“你自己睡一张床，”他保证道，“不是在追求性。他把我带到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私人旅馆里，他的小房间在最高一层上。那晚，使我惊奇的是，他把床让给我睡，自己睡在地板上。他真是一位绅士。他根本没有碰我，只是吻了吻我的额头，说：“你真漂亮极了。”他的房间里塞满了家具，像是一个逝去的高贵家庭中的最后所有物。

我开始经常拜访乔治，看着他天天读赛马的报纸。他研究十几本详细描述每一匹赛马的书籍，常常和各种人在电话上讨论某匹马是怎样训练的。他下天文数字般的赌注，能赢两千英镑，价值是今天这个数字的二十倍。我当时对乔治具体在干什么一无所知，以为他也许是贵族出身名测卖掉了他的乡间宅邸。

一天，他带我乘他的罗尔斯·罗伊斯兜风，一直开出到事登以外。我记得经过了我叔叔在艾奇维尔附近的房子。我们先是绕着一处看上去很像一座乡间大庄园的地方开了一圈，后来乔治把我带到附近一家饭馆。他给我点了吃的，交给我付账的钱后就离开了，说是很快就回来。真奇怪，我想道，把我带到这么老远的地方就为了吃顿饭。我的脑袋一如往常因用了毒品而晕乎乎的。我开始感到无聊，便付了账到外面闲逛起来。这时他出现了，几乎是把我拽进了汽车。前座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他似乎很不高兴我在场。我能够感到出了点什么事情，便一声不响，直到下车。

星期天我没有见到乔治，但是当我星期一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端着一杯香槟酒躺在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报纸摊得满屋子，大标题是：“索菲姬·罗兰 在埃尔斯特里遭抢劫”。电视开着，正在那时我听见评论员说，这极抢劫案是一个顶级行家里手所为，一个

“当代莱弗上”的杰作。画面上播出了抢劫案发生的谷仓和周围的场地。我惊得目瞪口呆。那正是星期六乔治和我开车巡回的地方。我正在看着那个罪犯！对着我咧嘴而笑的是个一流的珠宝贼，当今第一号，‘绅士乔治’。“这是你！”我脱口说道。他只是大笑着说：“不是我。拿出证明来，我的漂亮的小伙子。这堆东西是从别的地方偷的。”说完他下了床，捧起珠宝首饰，吻了吻我的额头，说：“让我们庆祝庆祝。”我们花许多钱吃了一顿饭，但是我紧张得无法好好拿刀叉，一心只想回到家里父母的身边。星期二那天，我读到悬赏两万英镑捉拿贼人，感到非常震惊。我真的害怕了，料想警察随时会上门来逮捕我。我害怕到了这种程度，甚至考虑主动回学校去念书。我一整天没有出门，晚上又更多地看了电视上关于索菲娅·罗兰一案的消息。我父亲开玩笑地说：“希望不是你。”我的心怦怦直跳。负责调查这案子的侦探叫埃里克·谢汝德，和仍旧住在街对面的我童年时的朋友同名。我觉得怪有趣的，心里想，哈哈，他没有能从死人那里找回他的玩具来，因此我怀疑他的同名是否能够找到那些珠宝。

有药丸给我打气，我在第二天跟乔治到埃普瑟姆赛马场去看德比马赛入他在一匹赛马身上下了一笔巨大的赌注，那马名叫安杰斯，听起来有点像安格雷——“发怒”。当这匹马输给了圣帕迪的莱斯特·皮戈待时，乔治的样子就应了这个名字。和乔治在一起的整个经历就像一场梦，而在我体内作怪的毒品使一切变得更加虚幻。后来的几天里，乔治告诉了我他的一切。尽管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但他痛恨有钱的上层阶级。他曾就读于一所第一流的公立学校，在那里和一个叫阿利斯泰尔的同性恋少年很要好，阿利斯泰尔带他出入于伦敦的同性恋社会。阿利斯泰尔经常吹嘘地提到一个贵族，说那人替他付他伦敦公寓的房租，每星期日到那里去找他进行性活动。这个神秘的绅士已经结了婚，但是暗中喜欢和年轻男人在一起。阿利斯泰尔给了乔治一把钥匙，一个星期日下午，乔治再也按捺不住他的好奇心，决定暗暗对朋友侦察一番。他悄悄打开前门走进了公寓，听见从卧室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他通过虚掩着的门的门缝看见阿利斯泰尔和那个神秘人物一起在床上。突然乔治震惊得呆住了。那男人是他的父亲。

乔治此后再也没有理过父亲。他到了国外，在军队里服役多年，回国后专门抢劫他鄙视的阔佬们。

乔治赌到了可怕得不像话的程度，只是由于他的偷窃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大约在索菲娅·罗兰的盗窃案两个月以后，一天晚上他吻着我的额头说道：“到了你该学学这一行诀窍的时候了。”乔治爱上了我，但是从来没有过肉体行为。

乔治是个顶刮刮的职业大盗，做案前总是早就策划好每一个细节，偷什么人、什么时候偷、偷什么东西。他研究上流社会的杂志，好发现谁将参加什么活动，甚至似乎都知道人们会带什么首饰。他干的所有的活儿里都灌注着大量细致入微的研究，为了即将到来的活儿，他给我买了一双像外科医生用的那种贴手的白手套。

我们第一次去的地方是伊顿广场边上的一套楼顶公寓。我怕得要命，为了增加勇气，服了比平时用量更大的毒品。这可和抢提包不是一个档次的事情。我们来到一排公寓楼前，上到了顶层的一套公寓。乔治有钥匙，我们一进去就反锁上了门。过厅里留着一个包，里面有铁钩、绳索等东西。包上别着一张条子，乔治读后微笑着放进了衣袋里。然后我们从气窗爬到平平的房顶上，爬着穿过整片房顶。“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乔治指着黑黑的简陋小巷对面大约二十英尺开外的一座楼房说。这时我在毒品和恐惧的双重作用下正处于恍恍惚惚梦境般的状态之中。两次尝试后乔治终于把绳钩钩在了对面，很快就弄好了一个滑车装置。“嘘，轻一点。”当一对说笑着的男女从下面小巷中一所房子里出来的时候，乔治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道。现在该我过去了。我吓呆了。他把我套好控在绳索上，说了声：“抓紧，小天使。”便把我推了出去。

我在五层楼的高度像人猿泰山一样滑到了对面公寓的阳台上。接着又运过来了一包工具，跟着是满面笑容的乔治，他拉动着什么，使整个滑车装置移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好像鸟一样飞了过来。这时乔治把一种稀糊糊的黑色液体涂在一小块玻璃窗上，蒙上纸，没出声响地打碎了玻璃。还没等我弄明白，他已经把我推进了窗子。毒品的作用已经遍及我全身血液，我的心脏狂跳着。我很快就打开了阳台门把乔治放了进来。他吻着我的额头，从衣袋里拿出一块糖给我，脱下了自己的大衣，好像在家里一样把大衣整齐地放在椅背上。我们穿过布置豪华的客厅，走进一个长长的过厅里。他确切地知道主人的卧室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有一张四角带床柱的床，每一面墙上都挂着油画。“就是这一幅。”他指着较小的一幅画说道。画的后面是一个墙装保险箱，上面有许多转盘，乔治开始拧动起来。有一会儿功夫什么结果也没有，我能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看上去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露出不安的神情。突然一声响亮的咋哈声后，保险箱打开了。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珠宝盒。乔治沉着地把盒子里的东西倒进自己的衣袋里，小心地关上了保险箱，把画放回原处。我们离开卧室，关上了门，回到

起居室。这时乔治笔直地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左手第一个抽屉，拿出了一串钥匙。在那个抽屉里还有现金，我伸出手去要拿，但是乔治拦住了我，说：“别动，那不是我们的，没有保过险。”

显然钥匙是开前门的，我催他赶紧离开。我都吓得僵住了。但是乔治却沉着地往沙发上一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并指着厨房说：“烧点水，斯蒂芬。”然后他打开了电视看新闻。他知道主人在剧院至少要呆到十点半。优雅流畅，这就是他的风格，可是我越来越恐慌，叨叨着要他马上就走。他平静地回答说：“你要么去泡茶，要么自己一个人回去。”我在厨房里又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拼命想要冷静下来。我们喝过茶吃了巧克力饼干以后，他让我洗干净杯盘，告诉我要对别人的家表现出尊重。我觉得像是过了很多小时以后他才站起身来，穿上大衣。

在门旁调整了一个小盒子里的什么东西后，我们就带着一包绳索离开了那套公寓，乘电梯下到一层。大门外站着两个警察。乔治泰然自若地走出大门，没等警察有时间张嘴，他用伊顿上流社会的口音厉声问他们道：“你们的警阶是什么？”“警佐。”其中一人答道，脸上露出了愕然的神色。“我从不和探长以下官阶的人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乔治严厉地继续说道。两个警察定在了地上，满脸迷惑地看着我们招来了一辆黑色出租车。我简直要急疯了，但是由于震惊反而没有表现出紧张来。车子开动后我松了一大口气。

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富人区照得通亮的街道，朝国王大十字火车站后面伦敦贫困得多的地区驶去。“我们就在这里下车。”车子开到一条灯光幽暗的街道的拐角处时乔治对司机说道。我们等到出租车开得看不见时才徒步走完最后的一百码的路程。“小心无大错。”乔治微笑着。我们爬了一段水泥楼梯来到一处破旧的肮脏不堪的楼房的三层。门开了，“你们好，请进。”一个大个子疤脸说。“这是谁？”他指着我问。“是我的新助手。”乔治开玩笑地说。那人在休息室里开始检查乔治从衣袋里拿出来的珠宝首饰。“我们得把这东西拆散开。”他看着一条精美绝伦的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的项链说。他们显然以前就彼此做过生意。“喝茶吗？”过了一会儿那人问道，他把乔治带到厨房里，在那里我听不见的地方谈妥了价钱。当他们回来时那人递给我一大听饼干，对我说：“巧克力的在底下，藏着不让乔治看见。”然后他看着乔治接着说：“我得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搞到那笔款子。在这期间你要点现金吗？”乔治点点头，那人交给了他我生平见到的最厚的一叠钞票，把他大衣的两个口袋全都装得满满的。

次日晚上，乔治数出一千英镑给了我，这相当于一九九六年的两万镑。他对我说：“这是你零花钱，小天使，这比和老色鬼一起喝酒强多了吧？”他看起来十分得意。他在感情上很迷惑，无法把自己同性恋的要求和想使我这样一个易受伤害的少年免受老家伙的剥削利用的愿望调和起来。显然他也把我看作他的弟子，一个他认为值得向之传授入室盗窃这一行中更为巧妙之点的人。

在吃过有和往常一样的巧克力消化饼干的午茶后，乔治建议我们出去“轻快轻快”，便带我到了一个设在地下室的俱乐部里，这地方看上去活像一个表现芝加哥黑帮团伙的电影的拍摄现场。灯光幽暗的地下室里满是烟雾。十个穿着黑色套服样子凶狠的男人，典型的帮匪，围在一张台球桌四周掷骰子。我们走进时他们都和我们点头，其中一个大声说道：“又赚了一笔啦，乔治？我在新闻节目里看到了。”“没有，不是我！”乔治微笑着说，一面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我。“我们在电影院看本·赫的电影，是个好电影。”他拿出两张用过的电影票来。那些人接着掷骰子。乔治拿出一叠钞票也参加了进去。他输了。“该你了，宝贝。”他说，把骰子递给了我。我不知道怎么玩，但掷了个七点，我们赢了。后来我又赢了三次，每次都把我们的钱翻一番。又轮到掷的时候，骰子打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黑黑的脾气暴躁的人手上，我输了。“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我生气地大叫起来。别人全都大笑了起来，但是那人却满脸冷笑，瞪着我。体内的毒品和笑声使我平添了几分勇气，我又大叫道：“你这个愚蠢的白痴！”突然笑声停止了。冷笑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看着我，像只患狂犬病即将向人袭击的疯狗。我看了一眼乔治。他脸色变得煞白。他转向那人，对他说：“别计较，他还是个孩子。”一把拉着我走上楼梯，把我们所有的赌本留在了桌子上。出门以后他急忙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匆匆地走开，对他嚷道：“咱们跑什么？我们正赢着呢！”“你知道你威胁的是谁吗？那是龙尼·克雷，伦敦最凶狠的匪徒之一！”“龙尼什么？”我问。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没把你剥碎了是你的运气！”乔治喊道。把我剥碎了？一切都似乎远得不着边儿。

几年以后我知道了龙尼·克雷那疯狂的脑袋是这样想问题的——一旦他那病态心理的怒气发作起来，他的受害者就完了，不是被杀就是缺胳膊断腿。他和他的孪生兄弟雷吉当时已经走上了在伦敦人人谈虎色变的犯罪团伙头目的路。他们的阴影几年后将笼罩我的生活。

乔治在他自己的旅馆附近下了车，他没让我下车。他说：“回家去，乖乖呆着。下个星期

我带你到爱尔兰去干件真正的大事。”

回到郊区我安静的家中时，家里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把钱全都堆在桌子上，然后用钞票沿着门厅和楼梯而上摆成一条小道一直通到我父母的卧室门口。我非常得意地上了床，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听见爸妈的尖叫声：“这么多钱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啊，就是赚来的呗。”我沉着地回答道，一面吞下了早晨那份兴奋剂。他们非常震惊，但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早已放弃了能够对我加以管束的希望。一周以后我又走了，离家去赴一个约会，见一个入户夜盗行里的人。我在门旁的纸条上写着：“因公赴爱尔兰。斯蒂芬。”

那时我的大多数毒品都是从黑市买来的，我走时带了很多，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去，也不知道要离开多久。我从伊顿广场抢劫案得到的钱被安全地藏在了我父母房子的屋顶里。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在那个地方藏了那么多的现金，它成了伦敦北部的诺克斯堡了，可能至今仍然有些钱藏在那里。

在尤斯顿站和乔治会合后，我们坐火车去换乘到爱尔兰的渡船。上船时我特别激动，任何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都会激动的，但是毒品和我们此行的性质使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不过对别的旅客来说，我们看上去一定很像是一对父子。晚上渡海风浪很大，船左右晃动，我无法入睡。我觉得烦躁不安，就留下乔治一个人在舱里打呼噜，自己跑到甲板上，在黎明中望着爱尔兰多山的海岸线渐渐出现在眼前。

上岸后我们住进了科克的一个小旅馆里。老板显然认识乔治，而且知道他要来。他们在前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单独谈着话，我从门口看进去，见他们在看一张大地图，讨论着什么事情。他们出来后老板把我们带到楼上我们的房间里。乔治对我说，他要和老板一起出去找一辆车，让我在旅馆等他。我对这没有意见，因为这时我已经累了，不久就睡着了。

好几个钟头以后乔治叫醒了我，说到干活的时候了。我到洗手间去吞下了比什么时候都多的毒品，不然我就无法去抢劫。我们到达布莱克岩附近一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大房子时乔治放慢了车速，指着一所看上去比白金汉宫还要大的宅子！有三层楼高，正面墙上有许多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子，活像个教堂。有两根白色的柱子，并有台阶通向黑色的大门，两侧有巨狮雕像。我们围绕着宅子行驶，能够看到宅子的深处还有一个天井。没有院墙，只有大片草坪一直延伸到马路旁。我们在两个街区以外停放好车子，像费金和奥利弗·退斯特那样步行着往回走。我们的计划是从被巨大的棕树遮着的侧面爬上屋顶，然后穿过屋顶到天井那面，再下到一座朝天井的后阳台上，从那儿进到宅子里去。这时兴奋剂在我身上的作用已经大到使我忘了害怕，甚至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我沿着离地面三层楼高的房檐上窄窄的突出部分爬行的时候，几片瓦松动了，掉到了天井里。我向下看去，见天井里满是沐浴在月光中的白色石雕像。乔治盯着我，低声说道：“别害怕。是恐惧才会使人失败被捕。”

原来下面的阳台比估计的要低一层，不可能跳到上面去。当乔治告诉我他打算用绳子把我吊下去时，我整个慌了。我，一个中学生，远离自己的生活范围，高高地爬在爱尔兰一所房子的屋顶上。我不想干下去了。我想回到家里父母的身边。乔治感觉到出了问题，突然变了样子。“按吩咐你的去做！”他严厉地低声说道，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样子完全变了，铁板着脸，眼光像刀子。我害怕得服从了。当我悬在半空中时，心里想，绳子随时可能会断，我会摔死的。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脚碰到了阳台。我哆哆嗦嗦地开始干活，用糖浆和纸把一个小玻璃窗盖上，砸碎了玻璃。碎玻璃掉在了房间里面。这时什么地方一只狗叫了起来。我吓得呆住了。比起抢提包来这可要难多了。不再有别的响动，这时乔治往下看着，指示我进到屋子里去。我从窗子钻了进去，在乔治看不见的地方又吞下了一些药丸。它们是我坚定的伙伴，放在衣袋里的勇气。现在我得把乔治从底层放进来。我蹑手蹑脚地走下主楼梯，经过套套盔甲时以为他们是真人，吓了一大跳。我吓傻了，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走到楼梯最下一层时，听见乔治已经在轻轻地敲玻璃了。我很快擦去眼泪，以免让他看出来，拉开了大窗子上巨大的窗棂。“你干得真漂亮。”乔治一面往里爬一面说。我们从主楼梯上了楼，沿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到对面一侧。乔治轻轻地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进入了一个极大的卧室。那张有四个床柱的床在房间的另一头，仿佛离我们见英里远。突然，天下大乱，一个男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到底出什么事啦？”

我们砰地一声关上门，又听见了狗叫声。叫声越来越近，我几乎脚不点地、飞一般地奔跑。我冲下主楼梯，撞在一副销甲上，销甲和我们一起倒了下来。一切乱成了一团。楼梯头上一片喊叫声，一条大狗冲下楼梯向我们追来，我们在销甲的呕噎声中摔倒在地。慌乱中我开始

往厅的另一头跑去，乔治一把抓住我，几乎是把我从开着的窗子里扔了出去。我们消失在株树后面黑暗的花园里时响起了一声猎枪声。“他可不太高兴。”我们走到汽车跟前时乔治大笑着说。

回到安全的旅馆里后，乔治坐在床上包扎胳膊上被狗咬伤的地方。他微笑着说：“对不起，老伙计，情报错乱。”一面从随身小酒瓶里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我。我还处于惊骇之中，但是乔治的镇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他仍然沉着自如。“明天我带你去都柏林作为弥补。”说着他就睡着了。他总是教训我，说偷窃比靠老同性恋弄钱要强。好像他要拯救我，不让我去过道德上比他的生活不如的日子，像一个搞同性恋的罗宾汉。我说不上他是否知道我吸食毒品，至少他从来没有提起过。

第二天早上，我们前往都柏林，在僻静的乡间公路上，乔治教我开车。我简直激动得要死。我们做着父亲和儿子在一起时做的事情，那些我自己的父亲忙得没时间和我一起做的事情。乔治毫不嫌弃地接受了我，总是关心我。他觉得值得在我身上花力气，这是我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到达都柏林以后，我们住进了最好的旅馆——坐落在市中心的格雷舍姆饭店。这是乔治心目中的乐事。前厅非常大，行李工奔忙着给有钱的客人搬行李。我们乘一台巨大的电梯上了楼，被带到一个有卧室、洗澡间和单独的客厅的套房里。套间里有电视机、豪华的扶手椅和带饭店信笺的写字台。浴巾比窗帘还大。还有洗发液、剃须后用的护肤液，应有尽有。

那晚乔治带我出去玩轮盘赌，很快他就全神贯注在赌注上。我正觉得这赌博很无聊时看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我很少看到另一个少年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便好奇地向他走去。他的名字叫肖恩，和我一样是个活跃的孩子，出来寻找比入睡前听故事更为刺激的事情。我马上喜欢上了肖恩，他有一张长着雀斑的圆脸，金色的头发和明亮的褐色眼睛。乔治正赢着，给了我们点钱，让我们在他继续赌博的时候在都柏林好好玩一玩。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注意午夜前要回到旅馆里。我们的飞机明天一大早起飞。”他以为我是什么人？我心里想，该死的灰姑娘吗？

到大街上后我给了肖恩几粒兴奋剂。很快我们两个就轻飘得和风筝一样了。原来肖恩是格拉夫顿街附近一家大银行经理的儿子。我把自己在伦敦过的轻松自在的犯罪生活全都讲给他听，突然我又有了一个好主意。“你为什么不把你父亲银行的钥匙偷出来呢？”我问他，“有乔治帮忙，我们这个周末就可以偷银行。”我告诉肖恩他可以跟我逃到伦敦去，在那里我可以一起住在自己的豪华公寓里，过君王般的日子。我们会有自己的大卧车，在我们到开车的年龄之前可以雇个司机。处于兴奋剂强烈作用的亢奋状态之下，肖恩同意了我的计划。我们在一家奢华的饭店里边吃冰激凌加草边详细讨论细节，简直感到像王子一样，用柠檬汁为抢劫计划干杯，因为那些愚蠢的招待不卖酒给我们。时间越来越晚，早已过了午夜，可是谁在乎这个！兴奋剂的作用使我们不想睡觉！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又看了一眼他父亲的银行。那可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一家昂贵的珠宝首饰店前停了下来，我提出，在去伦敦之前，肖恩应该给他的父母各买一只金表。“他们应该得到一件临别礼物，”我说，“特别是你爸爸。毕竟被盗的是他的银行。”最后我们分手了，说好第二天下午四点在他学校门口见面。

回到格雷舍姆饭店时，我发现乔治正在前厅里。他生气极了，把我带回套房后他大发脾气：“现在都三点半了！你上哪儿去了？”这使我想起了雷蒙德的父亲和他的狂吼。我仍处于亢奋之中，把我那抢劫肖恩父亲银行的惊人计划告诉了他，期待着他会对此充满热情。哪知乔治却生起气来，“你疯了吗？”他答道，“这事根本不可能！我们是用真名住在这家饭店里的，再说，那孩子会说出一切的！如果你抢劫那银行，不等你离开都柏林就会被抓住！”他努力平静下来，继续说道：“你还只不过是个孩子。睡觉去吧。再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飞回伦敦去了。”

他坐了下来，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可是我不听他的。我心目中的英雄乔治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小孩那样对我。“就不！”我尖叫道，“你一个人回去吧。这是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的机会！”乔治看样子很吃惊，心烦意乱。他听话的奥利弗·退斯特变成了个小造反派。他用和前一晚在屋顶上看我时同样的刀子般的目光看着我，抓着我的肩膀使劲摇，一面说：“你就得跟我一起飞回去！”我挑衅地挣脱出来，跑出旅馆到了都柏林的大街上。

我很生气，在兴奋剂的作用之下我在街上转了好几个小时，不愿让自己回去和乔治谈。他和任何一个爱管人的大人一模一样！我坚信自己通过抢劫那家银行能找到获得荣耀的机会，现在谁也别想阻止我！

那天早上过了很久，我终于还是决定回去找乔治，但是我十分愕然地发现他已经离开了。突然我感到害怕极了，像一个被遗弃在陌生城市里的小孩子，其实这确实就是我的情况。我不

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就吞服了更多的药丸，呆在房间里等兴奋剂发挥作用。后来，带着新的劲头，我出去转悠了一整天，直到四点钟在肖恩的学校外面和他碰头为止。在走向旅馆的路上我对他说了自己对学校的看法，并说不久他就可以不用上学了。他和昨天不同，一句话也不说，而且不知怎地看上去心事重重，但是我以为这只是抢劫前的紧张而已。到了我的套房里后，我要了冰激凌，冰激凌正要送来的时候肖恩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干不了这事。我太害怕了，我就是做不到！”他抽泣道。这时传者用推车把冰激凌推了进来，但我一把推开冰激凌，歇斯底里地尖叫道：“你这个胆小鬼！你毁掉了我们获得荣誉的机会。都是因为你乔治才离开了我！滚出去，你这个大坏蛋！”肖恩走后我倒在床上抱着枕头痛哭起来。肥皂泡破灭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没钱付多住的这一天的旅馆费，也没有回到伦敦的路费。我没有带钱到爱尔兰来。惊恐之中我给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想在房间里用餐。整整两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直到毒品和勇气都耗光了，重又变成一个吓得要死的少年。一个清洁工听见我在哭，向管理部门报告了，经理上来了解情况。我坦白说我一个人在都柏林，说乔治是我的叔叔。经理给我惊愕万分的父母打了电话，他们把我保了出去，替我付了旅馆的账，买了一张回伦敦的单程机票。为了保证我确实上了飞机，经理派了他的助手陪我一同去机场。

我父母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来对付我的越轨行为，已经安排好让我此后去和我的叔叔婶婶一起住，所以到希思罗机场去接我的是米克叔叔，看样子他觉得一切都很有趣。

几天以后，我从父母家阁楼上取出了偷来的钱和藏在那儿的所有剩下的毒品。我给绅士乔治打了个电话，但是他离开了住的旅馆，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

多年以后我听说乔治上了年纪以后曾试图安顿下来过日子，引退去做了和女王关系很密切的一个上等人家的住家男管家。一天，当他正在迎接参加一年一度的猎人舞会的客人时，他看见某某夫人戴着一串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乔治本性难移，他无法控制自己，一把将项链抢了下来。后来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保重吧，乔治。骑虎者难下。也许我们俩从来也没有下来过。

现在我和有钱的米克叔叔住在他伦敦中区的公寓里，这使我的缓刑监督官很是高兴。我的工作管理叔叔的一个较小的商店。我不喜欢，也不想干这个活，可是我确实在干活这一点能令当局满意。米克叔叔常常开玩笑地说：“你是城里年纪最小的经理。下次你就会当总统了！”肯尼迪在美国刚刚当选。这个安静的小商店离我叔叔的主店有一百码，早上他让我搭他的车上班。然而晚上就不一样了，我独自到伦敦的各个俱乐部去。我叔叔和婶婶允许我随便多晚回家，只要我回到家的时候安静点就行。他们什么问题也不问。

我在商店里除了吸毒或看报纸，实际上整天无事可干。一天早上我读到刚和布里特·埃克兰德结婚的莎米·戴维斯现在在伦敦。小心你的珠宝，我暗自笑着，心想不知绅士乔治现在会不会去偷他们了。

在我的商店上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她非常瘦小，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总是一副悲哀迷们的样子。虽然她已经八十岁了，身体却似乎挺好，但是她很少走出她那两间小房间。她的眼神呆滞，像死了一样。顾客这么少，加上我经常处于吸毒后腾云驾雾的状态，我常常上楼去和她聊天。她给我讲到她的孙女，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女，她很少见到她，因为她的儿子从不带她来见她。“只有这个小女孩关心我，”她会说，“我儿子就想把我送进养老院管得碍他的事。”她开始哭了起来，把一张有金色长发的少女的相片拿给我看，在相片背后写着：“我爱你，奶奶。”我很同情她，对她说我四岁时父母如何把我放进了一家育儿所而带着姐姐到法国去度假。“我们小的时候或者特别老了以后，”她说道，“都是招人讨厌的麻烦人。”几星期后，快圣诞节前我问她过节到哪里去，她答道：“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和平时一样自己呆着。”“别担心，我会让你快活的。”我说着给了他十粒药丸。“你年纪大了，所以得小心，一天吃一粒。”我警告她道，“这些药丸会让你高兴的。”“你太好了。”她说，吻了吻我的脸。她的脸冰凉，像鬼的脸。她答应呆会儿吃她的快活药丸，然后脸上带着轻蔑的神情说：“我保证，谁也别想把我们送到收容所去！”店里的铃响了起来，我离开她下去照料顾客。后来我关了店门，去到又一个夜总会去作乐，把老太太忘得一干二净。

当我第二天早上打开店门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气味向我迎面袭来。店里满是煤气味。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冲上楼去，发现老太太的头在烤炉里面，枕在一个小垫

子上。我关上煤气，打破了玻璃好让空气进来，往地的脸上泼水。但是她已经死了。她样子很安详，脸上微带笑容。我跪下身去，在她的手里发现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她的孙女的，另一封是给我的。我把给我的那封信放在口袋里，凝视着她，心里想，不知她的那些快乐药丸出了什么纸漏。

抬走她遗体的救护车工作人员称赞我勇敢，他们离开以后，我镇上店门好让自己镇静下来。我走了好几英里的路，最后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公墓，我坐在了东倒西歪的墓碑间的一张长凳上。我心里仍然很难过，无法止住哭泣。我打开老太太的信时天下起雨来，可是我不管。信上写着：“‘你比我更需要快乐。再见，我快活的小朋友。我们不去收容所/信是用墨水写的，整整齐齐，雨水顺着信纸留下，冲掉了字迹，就像那老太太的生命。我给她的十粒药丸一粒不少地放在信封里面。

两星期后在验尸官法庭上，我受到了赞扬，当地的报纸还给我照了相。我离开法庭的时候，一个金色长发的美丽的姑娘穿过审判庭，用双臂抱住了我。“谢谢你为我奶奶所做的一切。”她说。我们彼此拥抱，然后她走回到父母身边。她的父母甚至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这种生活见他妈的鬼去，我心里想，走出法庭，吞下了更多的药丸。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开始扮演一个芝加哥暴徒的角色。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是罗宾汉，但不可能整天在舍伍德绿林中消磨时光。我穿着新驼毛大衣，坐着黑色出租车出行，我发现了“巴黎咖啡厅”。这是一个时髦的跳舞俱乐部，里面总是挤满了女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在有钱人家吃住的交换服务的外国女孩。我和一个女孩跳了一夜舞以后送她回家，惊奇地发现她住在一所大宅子里。看到她用自己的钥匙开大门引发了我最新的提包计划。我不再抢包了，这些日子我的犯罪活动手腕要高明多了。在“巴黎咖啡厅”，姑娘们为安全起见一般把提包寄存起来，衣帽间给她们一个寄存牌。她们的提包里除了别的东西以外，还有大门钥匙。

我开始在汉普斯特德和其他有钱人居住区的咖啡店与交换服务的女孩子们聊天献殷勤。什么女孩都行，不管长得多丑，只要她是交换服务的外国女孩。我会有礼貌地送她回家。如果她住在一所小房子里，那就意味着我们友谊的结束，但是如果她住在大宅第式的地方，我们的恋爱就会继续下去。我和她握手，并不急于吻她，邀请她下次休息日的晚上到“巴黎咖啡厅”去。

一个多么有礼貌的可爱的小伙子，她们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一定都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还替我保管存包牌呢！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我把牌子偷偷交给我的同伙伯特。我是早些时候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的一家游乐场遇见他的，这是又一个成长中的小无赖。为了看起来他是在和人约会，伯特带着他妹妹内尔。在这个拥挤的俱乐部里，人家间也不间就把提包给了她。当我和女朋友跳着美国最流行的“扭摆舞”的时候，他们拿着提包到街角上，那儿有个不明不白的人物什么问题也不问就给把钥匙配了。内尔于是把提包重新存好，当我和那个毫不疑心的女孩子在扭摆中消磨这夜晚的时光时，她哥哥又悄悄把一个新的寄存牌塞还给我。夜尽时这段罗曼司也就结束了。伯特和我总是要等上两个月才会利用这些钥匙到伦敦最阔的宅子里去偷东西。我们的所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毛皮大衣、珠宝首饰、现金……所有这一切流进又重新流出，为我日益加深的吸毒习惯和疯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资金。

一天晚上我们到主教大道上一座大得异常的宅子里去盗窃。我们进去时宅子里一片漆黑。我们悄悄摸上楼去。从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漏出了微弱的红光。我们偷偷走到门前往里看，宅子的主人赤裸着身子脸朝下躺在床上，胳膊和腿被铁链子锁在床柱子上。他嘴被塞住，我曾经和她一起跳过舞的那个交换服务的女子正在用鞭子抽他，他发出了快乐满足的声音。她也赤裸着，只戴了一顶军帽，穿着一双黑靴手。那男人先看见了我们，但是因为嘴被塞着，只能发出哼哼声，而她则继续在鞭打他。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注意到了我们。当她认出我时惊得尖叫了起来。在毒品造成的亢奋状态下伯特和我都在地板上打着滚地笑个不停。突然那人嘴里塞的东西掉了出来，他开始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咯咯笑着跑了。

在一次这样的勾当中我遇见了在哈顿花园头号珠宝商家里做交换服务的女孩。还是老一套的提包、钥匙，等等。但是当我送她回到在汉普斯特德的铁环巷的家中去时，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陷入了爱河。这位线条优美的二十二岁的德国姑娘完全征服了我这个十六岁的无越学徒的心。我还想再见到她，无法像往常那样说再见，对伯特以及我所有的偷盗工作完全失去了兴趣。她的名字叫格尔达，她金色的长头发使她很像市里吉特·巴多。没有几天我就疯狂地爱上了她，开始每天晚上和她见面。其他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只有我的毒品除外。我假装自己二十四岁，编造了许多故事好让我显得大些。有一晚，我想显得浪漫一点，便抬头看着天说道：“我要把星星和月亮都拿来给你！”“谁来把它们拿下来呢，是尤里·加加林吗？”她玩笑着说，“你能往那上面给他打电话吗？”格尔达确实真对我感兴趣，总是对我说她有多么爱我。

每晚我们约会结束、坐出租车回到她家时，总是站在宅子外面长时间接吻拥抱，她的手摸着我的裤子下面。每晚我回到叔叔家时短裤子上都湿了一片。

格尔达表面很自信，实际上却是一个胆怯的姑娘。她离开了母亲严厉的管教，第一次自由地生活。对于她来说，我是个理想的发现，一个显然在性方面非常幼稚的小伙子。格尔达对于成年男人还有点怕，和一个不会用暴力破坏她处女地位的年轻人一起感到安全。和我在一起，她对于自己缺乏性经验并不感到愚蠢，反而可以表现主动。爱上她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我感到安全，不再孤独。我毒品用得少了，我们做着永远能够在一起的计划。我们打算结婚，格尔达甚至安排让我到德国去拜访她母亲。

在我们计划出行前的几个星期，我姐姐举行生日晚会。安妮特的开着惹眼的跑车的男朋友们一向把我当作傻小弟弟来对待，可是现在，胳膊挽着个身材苗条的二十二岁的美人，该轮到我为出风头了。为了这个晚会我给格尔达买了一件紧身袒胸裙衣，能展现她身体的每一个突出部分。她没有戴胸罩，简直像个性感女神。我姐姐自己是个伊丽莎白·泰勒型的美人，一向都是舞会上的王后，但是那晚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当我穿着红色粗花呢休闲上装和格尔达一起进门时，我得到了所期望的效果。安妮特的男性崇拜者们的眼珠子都瞪圆了，整晚围着格尔达乱转。然而发现自己被推到了第二位，我姐姐却恼火极了。整个晚上我像胶一样紧贴在格尔达身边，以保证没有人和她单独谈话，生怕他们会泄露我的真实年龄。

不久，格尔达的雇主外出度周末，她邀请我和她一起过夜。我很紧张。在性的方面，我应该做些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的全部性经历就是同性恋口交或她的手摸我的下身。我对女性的身体根本一无所知。我正要踏上一个未知的领域。那晚当我们坐在她床上，喝着酒以消除紧张时，格尔达脱光了衣服。她简直太漂亮了！除了和纽沃姆大夫在俱乐部看过的那个脱衣舞女之外，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裸体女人呢。“现在该轮到我要享受些满足了。”她说着，脱去了我的衣服。我们开始接吻、抚摸，我则尽一切努力和她做爱。我很兴奋，阴茎勃起，摸索着乱捅，可就是进不去。格尔达没有帮我，我们俩都越来越难过起来。“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做爱？”她抽搭着说。我觉得很丢人，什么话也没说，走下楼去。过了一会儿她裹着毯子也下来了。“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她问道，“你觉得我很丑吗？”“不，不，”我说，“你很可爱。咱们上楼去吧，我现在好了。”我在厕所里吞服了四粒麻醉剂，希望它们能帮助我找到那个正确的小孔。我回去进行第二次性交努力。我试了又试，祈祷着，但是遭到了同样的失败。格尔达是个处女，她可能和我一样紧张害怕。我感到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笨蛋，于是便喝得烂醉。我们吵了一架后，我坐出租车离开了她家。

第二天上午格尔达给我姐姐打电话，姐姐告诉了她我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包括我的真实年龄。过一天我给格尔达打电话时，她的雇主告诉我，她没有事先通知就收拾好行李，那天一大早回德国去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我伤心至极，在歇斯底里醉醺醺的状态之下拿出了所有藏匿起来的毒品，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扔进了河里。“去他妈的快乐药丸！格尔达走了我还怎么能够快乐得起来！”我尖叫道。我烂醉如泥回到叔叔家，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接着喝了一整天酒，说什么也不肯出来。像这样过了两天以后，米克叔叔认为他没有办法对付我了，便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让他把我接走。等我爸到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精神完全垮了，只有去找我的老保姆维奥莱特，她是我唯一信赖的人。

她和自己九十五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里，看见我这副样子非常吃惊，邀请我在她家住下。这两位妇女生活在一个离奇的过去的世界里。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对待维奥莱特，不停地要求她关心自己。到处都是维奥莱特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穿军服照的相片。后来的几个月我在持续的沉醉和麻木状态下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力图忘掉格尔达。一天，我又酒醉又狂乱，上街去买来了新的关于罗宾汉的书。“你已经长大了，这些书不适合你了，斯蒂芬，”维奥莱特说，“我读新闻给你听。看，他们在修一堵墙穿过德国的柏林市！”“我对人家该死的花园围墙根本不感兴趣，”我嚷道，“我要我的罗宾。”维奥莱特吓得没办法，只好每晚给我读罗宾汉的故事，而我则在一旁喝酒，直喝到人事不省的地步。“维奥莱特和你在一起。睡觉吧。”她总是说。一个晚上，我已接近酒精中毒，看见她厨房桌子上有一把切熟肉的刀。我童年时那个要杀死假维奥莱特的噩梦立刻变成了现实。我拿起刀走到她房间里。她正坐在床上，看见我挥舞着刀子，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我尖叫道：“我错杀了维奥莱特，现在轮到你了。如果我把该杀的那个维奥莱特杀了，格尔达就会仍旧和我在一起！”突然我开始颤抖，情不自禁地倒在地板上哭泣起来。一个邻居透过薄薄的隔墙听见了吵闹声，吓坏了，他敲着门威胁说要叫警察。我害怕了，就逃了出去，后来失去知觉，倒在了伦敦红灯区的什么地方。

我流浪街头，晚上随便找个地方过夜。几周以后，我回到了父母家中。我的意思是，我开始回去睡觉。一切都好像很怪。不用安非他明以后什么都慢了下来。我两只耳朵间的轰鸣声渐渐平静了一些，父母也没有那么让人害怕了。

不久我遇见了另一个姑娘，和她在一起我懂得了性游戏的一切规则。她十六岁，短短的黑头发，长长的腿，非常漂亮。她总是穿短裙，我们做爱时往腰上一拉就行了。像当时许多勇于玩乐的年轻女孩一样，她服用一种新型避孕药。

马上女孩的父母开始对女儿任性的新男朋友感到不放心，为了把我们分开，他们把她送到布鲁塞尔去做带孩子妈妈的帮手。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我新近在伦敦的同性恋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政客。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能不能在他那里住些日子。他很高兴，我感到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我的罗曼司了。我乘船到了奥斯坦德，再从那儿坐火车到列日附近那人的家中。这是一所巨宅，他雇了大约十个在他家住宿的仆人，一个厨师、一个男管家、一个园丁、四个女仆、一个司机，还有别的几个仆人。我到的时候他们全都在大门外排成一排欢迎我。就像四十年代电影里那样。

这位政客富得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付给我大量的钱好让他实现他那怪异的性幻想。我打扮成警察，把他相起来，假装他被发现超速开车，强迫他承认他的车速多高，同时他的那条丹麦大狗在一旁舔他。然后他在规定时速之外每超速一公里我就抽他一鞭子。有一天，在一场这样的活动结束后之时，他坦白说他撒了谎，实际上他开得要快得多。我醉醺醺的，又觉得特别厌烦，就嚷了起来：“你这个胡说八道的臭婊子，没车能开这么快！这个男人从来没有碰过我，但是有天晚上，我正在执行处罚的时候，那狗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咬了我一口。”

在政客家住了几天之后我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去看我那十六岁的情人。结果那天轮着说也是过得糟透了。由于我连续酗酒，造成严重的腹泻，使得我每半个小时就得去一趟厕所。看见女朋友后我可是激动地挥手，当她走近时，我以为自己想放屁，可是，哎呀，闹了半天是拉出了屎来，我都能感觉到稀屎在顺腿往下流。我惊慌失措地跑进了一家女美发厅，一路推开别人，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在一个女人用法语大声喊叫的声音和砰砰地敲打厕所门的声音中我脱下T裤子。我腿上全是尿。突然我屁股里又涌出一股臭气熏天的洪流，淌得满地都是，我自己则站在一排稀屎里面。我尽可能擦干净，穿上了臭裤子，冲过惊恐的美发师，跑去和仍在大街上等着我的女朋友打招呼。在比利时寒冷的空气里臭气还不怎么明显，但是当我们后来进到一家酒吧时，我们俩都闻到了这臭味。我们在冰冷的空气中度过了约会的其余时光，我不断往厕所里跑进跑出。我们没有做爱，我的情人早早就回了家。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面。

我回到伦敦时一切全乱了套。给我的案子派来了一个新的缓刑监督官。从我抢提包被判刑后还剩下几个月的监督缓刑期。新监督官非常严格，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得允许就到国外去了。他给了我一个最后通牒，七天之内找到工作，不然有坐牢的危险。我必须迅速行动。同一天，在答复了一则“激动人心的工作，报酬极其丰厚！”的招聘广告后，我参加了一次求职的面试，闹了半天那是个只有佣金的推销员的工作，为一家小规模而且挺让人不放心的公司推销加热系统。那天在接待处有两个人和我一起等着，他们将会改变我一生的道路。

第一个是个油头滑脑的犹太人，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叫特里·马文。

第二个是个极其漂亮的马耳他姑娘，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叫卡米拉。

我们是三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谁也不知道将要把他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命运，已经开始在织网了。

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三个我所爱的人是给我读罗宾汉的维奥莱特、珠宝贼乔治，跟着是逃走了的格尔达。在这样一种混乱的感情状况之下我遇见了卡米拉。她刚十七岁，有着黑色的长发和褐色的大眼睛。毫不夸张地说，当她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汽车会在地面前停下。卡米拉穿夏内尔式套装，衣着很保守，使我想到一个你可以梦见但却永远不敢奢望去触摸的修女。她美丽得令人难以相信，而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永远摆着一副样子，似乎在说，来呀，来和我色迷迷地调情呀！我知道我是上帝给予男人的礼物！

卡米拉对我不感兴趣这个事实丝毫也没有削弱我对她的感情。我对她是一见倾心，非想得到她不可。当她被派到我这一组做采访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每天我带着她和别的人到伦敦外面各个地点去，我们在那里工作几个小时。我利用一切机会去讨好她，但是尽管我一再努力，她总是以一种完全漠然的态度拒我于千里之外。有时我听见她和别的女孩谈到她的男朋友，一个显然比我年纪要大得多的意大利人，一个饭店的招待。一想到这个油腻腻的

小混蛋在抚摸她，嫉妒就使我痛苦得一抽搐。

每晚工作结束后送她回家时，我总要用胳膊搂着她，可是她把我推开，说：“别老纠缠我。”虽然她拒绝我，我总感到，她知道我多么想得到她还是很高兴，而且很欣赏她具有的操纵我的力量。她只需要把眼睛朝我一闪就可以早下班，或搭车到商店去。周末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渴望着星期一的到来，以便可以继续我幻想中的恋爱。缓刑期满后我之所以没有离开这份工作，淮一的原因就是卡米拉。

有许多日子我们和第一天遇见的那个犹太人特里·马文在一起干活，大多数的下午，当我们的访谈人四处游说的时候，我都和他在一起度过。我们到伦敦市外各个小城镇去，詹姆士·汉拉蒂在贝德福德被处绞刑的那天我们还真在那儿。监狱外面有大群大群的抗议者。“可怜的家伙，”特里说，“在这么一个地方结束生活。”特里是个瘦长个子、样子很利落的四十岁左右的家伙，刚从监狱出来，他来干活只是为了让他的假释监督官满意。我们只按工作结果领取报酬，但是不需要真正努力就能挣许多钱。特里的小聪明和在街面上混的本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在盘算着开自己的公司，请我当他的合伙人。显然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没有看到的才能。“我们会发财的。”他不断说道。我谈起卡米拉时特里总是大笑：“买花给她，这是获取女人的心的方法！对我来说，他成了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我依赖于他的忠告。有的时候他和样子很凶的人见面，当我问他这些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回答说：“一帮恶棍，斯蒂芬小兄弟。”为了模仿他那老于世故的举止，我开始仿效他，甚至像他那样说话。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一心只想搞上卡米拉。每天晚上，在她一贯冷冰冰的拒绝和她的名言“别来纠缠我”之后，我就到俱乐部去喝得人事不知。一个周末，我醉醺醺地独自到电影院去看《克莉奥佩特拉眸》，结果认为伊丽莎白·泰勒就是卡米拉。

突然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我那早已处于自动驾驶状态的胳膊和平时一样搂住了卡米拉，但是她没有推开我！我感到奇怪。她允许我吻她了！我的心狂跳起来。她回吻了我！很快我们就在汽车后座上做起爱来。我简直像在天堂里！我追求了这么多个月的禁果终于属于我了。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事后我问卡米拉，明天是否还是这样。

后来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她突然和我做爱？是她爱我胜过爱那个饭店招待，还是他离开了她？我不愿使自己欢乐的气泡破灭，便不再想下去，给她买了克利夫·理查德最新的情歌集。一夜之间卡米拉就成了我的“活宝贝”。

第二天卡米拉仍！日亲吻我，我继续飘浮在九天之上。我们开始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我对于能让人看见我挽着这么一个电影明星感到自豪之极，她使我觉得自己也变好了一些，就好像人们现在看着我时，他们心里在想，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一定是个可以的小伙子。

很快我们开始每晚都在一个小旅馆里一起过夜。我简直就不能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平生第一次关了灯睡觉。魔鬼消失了。和卡米拉做爱使我相信我找到了真正的爱，不论那究竟是什么。

卡米拉自己住在伦敦穷人区的一间小屋1千里。她父亲一年多以前去世了，母亲和四个妹妹在马耳他。几个月前她到英国来，想接受训练好当个护士，但始终没能开始。在英国的生活对卡米拉来说一定是很不容易的。在马耳他她有许多亲戚，可是在伦敦她什么人也没有。

她从小受的是严格的罗马天主教的教育，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由于我在热恋之中，很快就跟去坐在她的身边。对于一个犹太少年来说，教堂的礼拜显得很奇怪。他们老是不停地站起又坐下。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决定一下呢？我在想。她常常接受圣餐，考虑到我们未婚同居的事实，这意味着上帝着实是非常谅解人的。

过了一段时间她放弃了那个小房间，我们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公寓有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一个小厨房，很一般，但是我很为之感到自豪。这个在三层楼上的小单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那几扇大凸窗和窗外的景色。我快活极了，买了一把蓝茶壶，把它骄傲地展示在一个架子上，来纪念我们的第一个家。

我不必仅仅为了见到卡米拉而去工作，因此备感宽慰，便辞了工，好再次参与到各种犯罪活动中去。卡米拉从来不问我到哪里去，也不问我在干什么，只要不断来钱她就高兴了。起初，和她在一起的生活似乎十分完美，但不久那梦一般的浪漫爱情就开始遇到了风浪。我们开始每晚吵架，我发现她脾气暴躁得无法控制。争吵总是以她的尖叫和对我的殴打告终。我也大声嚷嚷，但是从来不还手，只是像个摔跤手那样按住她以保护自己。我最恨的是她抓我，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常常想到晏民共她，可就是做不到，我太爱她了，迷恋其中。对于在地中海长大的卡米拉，也许这样的尖叫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却感到无法忍受。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奇怪为什么即使我们没在吵架，卡米拉也从来不拥抱我，或者对

我说她爱我。我开始想，她仅仅把我当作摆脱她那只有一间屋子的贫困生活的出路。她有自己准则，在我身上很起作用，她叫得越响，得到的就越多。想到她只是在利用我，我感到无法忍受，随着她对我的感情的可悲实质逐渐明显化，我酒喝得更多了。由于我沉溺型的性格，我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留在那儿受到更多的惩罚。有天晚上我想到一个来月前自杀的玛丽莲·梦露，甚至考虑到自己也要自杀。

一旦我们结了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顾一切地推想道。于是，在一个少有的平静时刻我向她求婚了，出于某种原因她答应了。我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如果她和我结婚，那她一定真的爱着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我父亲，因为那时候不满二十一岁的人要结婚需要父母的书面允许才行。我到家的時候他还在睡觉。我坐在母亲的梳妆台旁骄傲地宣布了我的结婚计划，期待着他祝贺我。我的父母曾经见过卡米拉两次，但是并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兴趣，想着我的这次浪漫不过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的故事而已。听完我的话，父亲不仅没有为我感到高兴，反而从床上坐了起来，于巴巴地说道：“我的儿子甭想和非犹太女子在他们的教堂里结婚！再说，你年纪还太小。”在我抢提包和偷珠宝首饰的日子里，我一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现在我父亲可到了有权的一刻了。没有他的签字就不可能有婚礼。我求他，说：“你自己就是在基督教堂里和妈妈结婚的。你怎么能这么虚伪呢？”可他不为所动。回答是不行。我气冲冲地跑出了家门。

我回到卡米拉身边，但没有告诉她父亲拒绝的事。我已经有了个强迫她同意的计划，让卡米拉怀孕。两个月后她怀孕了。我洋洋自得地又去找父亲，觉得所有的王牌都在自己手里。他听到这最新消息后仅仅说：“那么，她只好去做人工流产了。”我感到如此震惊，发誓再也不和他说话了。我怎么能把这些告诉卡米拉呢？现在她迫切想要很快结婚，已经定好了举行婚礼的天主教教堂。

下一个星期，就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坐飞机到马耳他去见她的母亲。卢卡的机场非常小，一天只有几班飞机降落在推一的一条跑道上，航空终点站比一个棚子大不了多少。马耳他是西西里南边的一个小岛，仍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时还根本不存在旅游业。整个岛上只有四家旅馆，推一的城市瓦莱塔只有一条商业街。马耳他小得可以在一小时里开车绕整个岛子一圈。这是个炎热而荒凉的小岛，棕榈树环抱着小村庄，情形和伦敦是大不一样。

我们从机场乘出租车穿过全岛到达圣保罗湾，这是一个一片黑暗的小渔村。车子停在一条两旁是平顶房子、窄得仅仅容下出租车的街道上。我听任箱子放在街上，尾随着跑上了一段石台阶的卡米拉。在她们只有一间屋子的家里等待着我们是卡米拉的母亲伊莎贝拉和她的四个小女儿。这就是卡米拉的家！一个十二平方英尺的、在楼梯平台上有一个小厕所的房间。一段直楼梯往上通到平屋顶。卡米拉的母亲约莫四十岁，看到我们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她不住口地道歉，说她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解释说她丈夫突然去世后，家里什么也没有了。“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我爱他！”她神经质地哭着，两只手往上一甩一甩的。房间里到处是死者装在镜框里的相片。最小的女儿拿起其中的一幅大声说道：“爸爸，这是爸爸！”“住在天堂里。”四个孩子中最大的说。浑身上下一身黑衣的伊莎贝拉伤心地哭着，亲吻了一下相片，然后把它紧抱在胸前。她呼唤道：“乔治，我的乔治。”四个小姑娘拥抱着她。这个女人不仅仅爱她的丈夫，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爱只存在于电影脚本之中。

终于，伊莎贝拉平静了下来，能够好好欢迎卡米拉了。我们都坐下了。有了我带来的许多礼物，这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激动，孩子们跳跃着，猜测着每个包里会是什么东西。在她们母亲的建议下，她们把礼物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到圣诞节早上打开。我们刚到家对，卡米拉看到她母亲这种状态，心里很难过，这时也轻松下来，成了荣归故里的英雄。她爱她的家人，但父亲死后她感到肩负不了这过于沉重的责任。她的母亲把存了多年的一瓶红葡萄酒打开了，我们每人都喝了一杯。接着我喝起了在飞机上买的白兰地。那几个小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在地板上的一个大床垫上睡着了。卡米拉和她母亲谈着家里人的新鲜事，常常会说起马耳他话来。我感到这家人如此充满爱心地依附在一起，着实是令人感动。伊莎贝拉唯一能给予这些孩子的就是爱，她有着大量的爱。不久我就在地板上自己临时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四个兴奋的女孩子在等着卡米拉从商店回来。她们都是漂亮的黑头发女孩，穿着式样简朴的裙衣和凉鞋。最大的罗丝安娜十三岁，下面是八岁的约瑟菲娜。七岁的路易莎和五岁的劳拉。卡米拉回来时孩子们高兴疯了，看着她买回的一包包东西大声喊叫：“这儿有咸肉！菜，装在盒子里的鸡蛋。”她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多食物了。伊莎贝拉小心地把东西从她们手里拿下来，放在了她们够不着的架子上。她们没有多少钱，平时的食物都是些最基本的，多半是通心粉。面包和橄榄油。

黄昏时分，由于房间里太拥挤了，我开始独自坐在于屋顶上。从那儿，停满了小渔船的港湾一览无余，令人惊叹。伊莎又拉在屋顶上养了两只蛋鸡，鸡蛋对这个贫穷的家庭是奢侈品，她自己从来不吃，只有女儿们轮流吃。我在城市里长大，所以把这两只鸡当成宠物，非常喜欢它们，管一只叫查利，另一只叫弗雷德。一晚又一晚我喝醉了以后就满屋顶追它们。我最喜欢的是查利，它跑得快，可是蛋生得少。

圣诞节前夜我感到十分激动，想要给这些可怜的孩子一个永生难忘的惊喜：仙境里的圣诞节。我到当地的店里买了价值三十英镑的糖果，装了满满四个大手提物品袋。我把店里的全部存货都买光了，店主老太太惊奇得目瞪口呆。那晚，当女孩子们睡着了以后，我在地板上铺了一英寸厚的一层糖果。早上她们醒来时，我告诉她们夜里下了糖果雨，她们高兴地笑得闭不上嘴。她们跳着扑到我身上亲吻我，伊莎贝拉在一旁微笑。

我找到了自己的准则——给别人买足够的东西，你马上得到爱的回报。此后许多年这都是我的行为主导。有足够的钱，我就能买到我需要的所有的爱。我是个出色的贼，因此永远不再会缺少爱。我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在卡米拉和她的母亲开始准备圣诞节晚餐时，我进了街尽头的一家酒吧。喝了许多杯白兰地以后，四个小姑娘全都出现在门口喊我：“晚饭做好了！”回到屋子里，我看见伊莎贝拉四周像是几百个滚开的锅围着她。我们都挤坐在那张小桌子旁，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要吃的是什了。“啊，见鬼，不！”我大叫着冲上了屋顶。“我们吃的是查利！”我已经相当醉了，这时大哭起来。伊莎贝拉跟在我后面，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一面哭一面解释：“我爱查利，我们不能吃它。”“我还爱我丈夫呢。”她说。‘可是你并没有吃他呀。’我嚷道。“你是个好心人，”她说，想让我平静下来，“你给了孩子们这么多东西！从来没有别的人为她们做过任何事，我只是想给你应得的圣诞节晚餐！”伊莎贝拉对我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我两只胳膊搂着她不断地抽泣：“我要给你一套房间、电视、冰箱、电话，一切的一切。”她搂着我：“我爱你。”领着我回到孩子们中间，她们正快活地大吃圣诞节晚餐，吃得满脸都是油。至少查利没有白死！

后面的几个晚上，我常常和小姑娘们一起躺在地板上，醉醺醺地给她们讲神话故事。她们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我，我感到很高兴，仿佛我平生第一次属于了一个家庭。每晚等孩子们睡着后我就到酒吧去，不等过了半夜不回来，但伊莎贝拉总是准备好热汤等着我。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女人有多么关心我。

作为给她的圣诞款待，我请伊莎贝拉到电影院去看克利夫·里查德的电影（暑假）。她把馨曲的黑头发梳得高高的，笑的时候露出门牙间一道宽宽的缝，样子甜甜的，很漂亮。最小的劳拉哭得非常伤心，所以我们把她也带去了。我想坐出租车去，但是伊莎贝拉不肯，说出租车太贵了，于是我们就乘公共汽车。汽车行驶在海滨弯弯曲曲通向瓦莱塔的公路上，伊莎贝拉把各种地方指给我看，她初退已故丈夫之处、他们一起跳舞的地方、他们一同拥坐的场所。这是她自己的生活故事，完全环绕着她唯一爱过的人转动。

我们回英国的那天，大家都哭了起来。我转向伊莎贝拉，对她说：“你给了我爱，为我甚至杀了查利。很快你就会在斯利马有一套住房。你在圣保罗的日子结束了。”没有多久她们得到了新家，确保了她们对我的爱。我的准则很奏效。

回到美国，我父亲仍然不同意我们举行婚礼。“等你大一些以后娶一个犹太姑娘。”他像录音机那样一遍遍重复遭。我不断碰壁。第二个星期，我在绝望中假冒他签了名。很快，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在只有神甫在场的情况下，在托特纳姆一座空教堂里结了婚。看着一排排空空的座位，我心里很难过。我的父母又一次抛弃了我。仪式后神甫祝我们好运。我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一点，离开教堂时我心里在想，保持这桩婚姻会需要许许多多的钱。我们独自吃了一顿来庆祝自己的婚礼，跟着是和平常一样的争吵。我喝得醉醺醺地睡着了，灯又重新通夜不灭。

我们现在结了婚，但生活变得愈加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架打得更厉害了。每次大吵过后卡米拉总是哭得非常伤心，我安慰她，搂着她，常常以做爱结束。真是奇怪，总是需要打一架才使我们能有肉体之欢。八月份孩子即将出生时，火车大劫案的消息如一颗炸弹爆炸，震动了英国。两百五十万英镑的现金失窃。我暗自笑着，心想，两百五十万英镑可以买到许多的爱了。约一周后我回到家时，发现卡米拉已被紧急送到了哈克尼妇产医院。我疯了似地开车到了那里，冲进病房。她刚刚生下孩子。我们的女儿特莎·玛丽亚来到了人间。婴儿很漂亮，这么小就和她妈妈一模一样。我抱起宝宝，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了，这个人会永世爱我。我将是她唯一的爸爸。

卡米拉带着女儿回家以后不久，一切再度爆发。在甲壳虫乐队唱着他们最新的轰动歌曲

(她爱你)的时候,我搜索着自己的灵魂,不知道我的妻子究竟有没有爱过我。生活变成了永不停火的战区。我和卡米拉简直就没法在一起而不吵架,即便是在夜里三点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只有在我们俩都睡着了以后才有和平。我实在没法对付这种局面了,便建议卡米拉到马耳他去休息半年。这是惟一能够保持婚姻而又不至于完全发疯的办法。

在到机场去的路上,卡米拉又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说有了孩子,我们的公寓太小了。她要有个豪华的家,否则就不回到我身边来了。我答应给她一个豪华的家。不论留住她需要多少钱我都准备去弄,偷也罢,其他怎么着也罢。我迷上了那个女人,而且现在我还有一个小女儿要爱。

得劫十次火车才能保持让这个女人高兴,我绝望地想道。

看着飞机起飞时我哭了,吞下了许多杯酒中的第一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心想或许我也死了更好。

卡米拉离开了以后,我喝酒量猛增到完全失控的地步。

特别到了晚上,酒成了我的朋友,它握住了我的手。

那个冬天很冷,报纸上全是关于火车抢劫犯罗伊·詹姆斯被捕和克里斯廷·基勒进监牢的消息。现在卡米拉和女儿在马耳他,我本应感到更舒畅,可是相反,我情绪越来越消沉,酒也喝得越来越多。圣诞节后我觉得孤独极了,迫切需要一些理解和友爱。

事情显得不可思议,但是就好像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似的,我回到了皮卡迪利圆形广场明亮的灯光下。那晚,和我遇见绅士乔治的那个晚上一样,雨开始下得越来越大。我冲到一家珠宝首饰店的门道里去躲雨,紧跟着一个衣着考究的上年纪的绅士也冲进来站在了我旁边。他身穿一件定做的深色大衣,戴一顶圆顶硬礼帽。有好一会儿他一直看看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最后他终于说道:“这里东西有点贵,是不是?”“没错。”我同意道。“钱几乎可以买来一切。”他说。“如果你有足够的钱的话。”我补充道。“为什么?难道你没有足够的钱吗?”他笑道。我脑子里想到了卡米拉,便答道:“我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来买我需要的东西。”“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纠正上下这个情况。走,去喝上一杯。”

他带我去了一个高级的鸡尾酒酒吧,在夜雨淋不到的屋子里,他建议来林白兰地暖暖和和。他端着两只大玻璃杯回来,大声道:“祝你健康,我年轻的朋友。来,笑呀。我要给你一千英镑!”(值今天的两万英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吗?”他笑着问道。我惊讶地呆坐在那里。“对不起,今晚我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但我现在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明天给你。”他接着说。他拿出了钱包,数出了一百英镑。当他把钱递给我时,我心里想,这一定是某种电视恶作剧节目,只等着有人跳起来说:“我们把你给骗了!”这时,这位城市绅士站起身来,说:“我得赶快走了。咱们明天这个时候在这里见!”我点了点头。他一面穿大衣一面自我介绍:“我叫艾伦。你叫什么名字?”“斯蒂芬。”我答道。“很好。”他说着跑出门隐入了黑暗之中。我认识他才十分钟,可是却在这里手里拿着他的一百英镑。我醒悟过来,冲出去追这位衣着考究的陌生人,但是他已经消失在附近地铁站的洞口里了,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那只兔子。

第二天晚上,我按照约定到了那家酒吧,但是失望地发现他没有来。他昨晚一定是喝醉了,我心里想。没有人会在街上拦住一个人给他一千英镑的,在现实生活里不会有。在约定会面的时间过了三十分钟后,我站起身来准备要走,这时一个慌慌张张的艾伦一头冲了进来。

“真对不起,斯蒂芬,”他气喘吁吁地说,“请原谅,我正在有事开会,必须赶快回去!”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接着说道:“这是我答应给你的钱。咱们星期五一起吃晚餐好吗?请你说行。”“好吧。”我说。“那就七点钟在这里见?”他微微一笑,然后像一股轻烟消失了踪影。我茫然地往后二坐,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九百英镑,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像你具有的这种美不能没有报偿!爱你的艾伦。”这种事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我心里想。是谁给我送来了这个奇怪的恩人?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艾伦,他能够得到许多崭新的钞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钱,便在酒吧花掉了其中的一张。没错是真钱,真真的钱。

那个星期五我们如约见了面。我穿了一套蓝色新衣服,黄衬衫,系一条鲜红的领带,像时装杂志中的人物出现在酒吧里,急切地想要更多地了解我那神秘的朋友。艾伦是个瘦削的高个

子，有一张友好的圆脸，灰色波浪型的头发，牙齿很白但不怎么齐。他的眼睛很有生气，笑的时候闪闪放光。“‘你看上去棒极了。’他和我打招呼时说。‘我想让你看着喜欢。’”我回答道，感到很得意。“你是个奇怪的孩子。”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孩子？我都十九岁了。不过，当然在这个老人眼里我确实是个孩子。我们坐出租车到了西部大饭店，领班把我们带到预定好的桌子旁，给了我一份酒单，但艾伦意识到我的无知，便建议道：“五九年的不错。”“六四年更好。”我开玩笑道。“‘为什么？’”艾伦问。“‘因为这是我遇见你的一年！’”“是的，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了不起的一年。”他答道。

当有人爱你时，你本能地就会感觉到。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或干了什么，你就是知道。我知道这个叫艾伦的人爱上了我。如果我因爱上了卡米拉而痛苦，艾伦同样将要因爱上我而痛苦。饭吃到一半他递给我一个小红盒子。我激动地打开了盒子，看到里面是一块金表！“把它反过来。”他说。表上刻着：“我爱你。艾伦。”我直愣愣地看着他。“‘俄真的爱你，’”他说，“我知道这太快了一点，可我确实爱你。我也没有办法。”他握住了我的手。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我一生都在追求的那种复。我们继续谈着，不过现在他都谈些轻松的事。饭后他把来了领班，让他给我叫一辆出租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他大声说，一面向我挥手告别。

那晚回到家里我看到卡米拉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重复说她永远不会回到我们的小单元房里来了。读起来像是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爱的供给。我立刻写了回信，撒谎说我已经找到了一处豪华公寓，但是要到八月份才能搬进去。我其实还没有开始找呢，可是八月对于一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来说似乎是非常遥远的未来。

一想到任何和卡米拉有关的事，我的头脑就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因此和艾伦的约会成了我逃避现实的途径。且不说经济上的收获，他对我的奉承恰好和卡米拉的要求与最后通牒。全然相反。她认为是毛病的地方，他看到的是美。很快艾伦和我就开始定期约会，在这些浪漫的晚餐幽会中他总是对我说他有多么爱我。有时我微有醉意，便会闭上眼睛假装是卡米拉在说话。在卡修斯·克莱击败了桑尼。利斯顿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后的那个晚上，我和艾伦开玩笑，做些拳击动作，说我可以击败任何人。他用胳膊搂着我，答道：“你的脸太宝贵了，不能挨打。”

后来的几个月里，艾伦带我到城里最好玩的地方去玩。现在不只是个钱的问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并不需要钱。他对我的爱对于我同样宝贵。和艾伦在一起时我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没有责任，也不用去找公寓。我受到关心和照顾。艾伦从来不问起我的过去、我的父母或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对于他来说，我就出生在皮卡迪利圆形广场的珠宝首饰店外面。这样我就永远是他幻想中的完美的实孩子。自然，我从来没有提到我已经结婚。我认为这不会增进我们之间的“浪漫”。我开始在想，不知这一切会导向何处。艾伦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到目前为止，他什么要求也没有！我只需要在约会时出现，漂漂亮亮的，吃一顿昂贵的饭，接受又一件礼物，然后坐出租车回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尽管我很喜欢和艾伦在一起的新生活，我也越来越想念卡米拉。我读到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结婚的消息的那个晚上，我想到了卡米拉，差点坐上飞机到马耳他去了。

一天晚上，艾伦问我下次见面时愿不愿意到他家去吃晚饭。我想，终于提出来了，同性恋的性生活。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现在我得为了所有的那些钱和礼物出卖身体了。我感到震惊，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我无法应付更多的好意了。不要求回报的爱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东西。现在我们动真格的了——性钱交易。这是我能够理解的。我笑着对自己说，那就得用箱子而不是信封装钱了。下一个星期五我到了格洛斯特路附近他的家里。艾伦宽敞的公寓在一座乔治王朝式的六层楼建筑的底层，这座绅的城居公寓楼坐落在对着许多私家花园的一条富人聚居的路上。那个春日的下午，一个满脸微笑的艾伦欢迎着我的到来：“请进，亲爱的孩子。我们今天有客人一起花晚餐。”“啊，啊！”我心里想，来了吧！群交！某个乱搞同性恋的男人要照鞭答的镜头。这可得让你们大大破费一番。

艾伦把我带进了一间布置精致考究的起居室里。大钢琴和墙上的油画只不过是展示出来的巨大财富的一个部分。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这个变态的共进晚餐者，但是我的想象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屋子的一角坐着一个亲切的老太太，身材纤弱，银白色的头发换成一个警。这个身穿深蓝衣服的优雅的妇人是艾伦的老母亲。她微笑着说：“你好，斯蒂芬，坐到这里来。让我看看你！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这可真像是电影脚本里的情节了，我想道。

“他难道不漂亮吗，妈妈，就像我对你说的那样？”艾伦骄傲地说。“是的，亲爱的，他确实是个很漂亮的男孩。”老太太答道。啊，他妈的，我在想，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群交！更多的夸奖和亲切的表示。“喝点什么，和妈妈聊聊。你知道吗，她已经一百岁了？”艾伦骄傲地说。

“我去端晚餐。”说完他走出了房间。

到了六十五岁上，艾伦才刚刚开始对自己承认他是个同性恋，而我是他爱上的第一个人。他母亲是个很敏锐的女人，一直都感觉到这一点。在遇见我以前艾伦一直压制着这种感情，他妈妈现在认为，他还是把这个新爱人带回家来要好一些，而不要把地藏起来。尽管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她仍支持这事！她把我叫到她的身边坐下，专注地看着我，说：‘文伦爱你，这你是知道的，是吧？’我无法回答，只是点了点头，默默地坐着。她接着说道：“你要严肃地向我保证，永远不伤害我的儿子。’”

她正说着，通向穆室的标木大门打开了，艾伦宣布晚餐已准备好了。我们扶着他的老母亲在长餐桌的一头坐下。“你是我们的贵客。”艾伦说着，同时让我在餐桌的另一头坐下。整个就餐的时间里我都感到十分羞愧。如果他要的是件，我知道怎么应付，可是，不，艾伦要的更多，他要我爱他！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是同性恋，再说，我爱着一个三千英里以外的马耳他姑娘。生平第一次有人无条件地爱着我，现在是在给人造成痛苦。喜欢他？是的；但是爱他？不可能。负罪感开始重于信封中的金钱。当然，那天晚上我本可以说，谢谢，老伙计，对不起，我不是同性恋。可是我没有说。我需要有人爱我、需要我。晚餐后，和他的母亲闲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和往常一样坐出租车回家了，手里拿着又一个装着钱的信封。晚上在艾伦家里的见面继续着，但是有一点不同。现在老太太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了，留下我和艾伦单独在一起。进行性活动吗？不是的！艾伦弹钢琴，给我唱爱情歌曲。他最喜欢的歌是：（需要别人的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幻。他需要我，但是他可不幸运。除了在他家吃晚餐外，我们一起出去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城里散步，逛一家新开的“比巴”商店和别的许多地方。一九六四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摩派”和“洛克派”青年在布赖顿海滩上斗殴，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是通俗音乐之王，一切都在发生之中。我们从温布尔登前排的座位上观看玛丽亚·布埃诺在女子网球决赛中击败玛格丽特·史密斯。如果网球和草莓使我感到像个王子的话，很快我就受到了国王的待遇。几个星期后艾伦带我去伦敦展览馆参加甲壳虫乐队的电影（艰难时日里的一个夜晚）的首演。

是在和艾伦度过了像这样的一个快乐难忘的夜晚后，我突然意识到，卡米拉还有两个星期就该回来了，而且指望住进我骗她已经有了的那豪华的新住宅去。这使我立刻砰地一下回到了现实之中。其实我也知道就算有了一个豪华的家，我们仍然会继续吵架，但是我对卡米拉的爱就和艾伦对我的爱一样。我要她回到我的身边。突然我想到了特里·马文，心想这个花花公子认识这么多人，肯定能帮助我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已经一年没有见到过他了，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搬了家，但最后在伦敦最富有的地区之一的汉普斯特德旷原对面的一个阁楼里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开办了自己的名叫“高热”的热力公司，骄傲地让我看了他的新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我心中奇怪他的公司怎么能在一年中赚这么多的钱。这事怎么算怎么不对劲。“花得有点太快了。”我微笑道。特里是个瘦个子，黑头发梳成大背头，不是个特别英俊的男人，但很有悟性。他几乎认识伦敦所有的家伙，这一点令我佩服之极。特里又一次建议我和他一起干，现在我是太愿意了，但是我对他说，眼下我先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要干。我得在一星期之内找到一个豪华的住处，好把妻子从马耳他接回来。“这么说你还是把她搞到手了！”他听完我所说的困难后哈哈大笑。“该请我出席婚礼的。”回想那空空如也的教堂，我想我们本来至少是可以有一个人在场的。“房子的事就交给你特里叔叔吧！”他带着一贯的自信说道。我确实就是这么办的。特里的热情也感染了我，回到他的身边令我感到很高兴。两天后他交给我一串钥匙，笑着说：“离你特里叔叔不远的豪华新家，斯蒂芬，孩子。”在汉普斯特德道上一个豪华街区中的这套高档公寓避开大路，坐落在天工自然的美丽花园中。这是一套有三间卧室两间起居室的漂亮的大公寓。然后他邀请我到他的新办公室去，又一次敦促我做他的合伙人。他不断重复说：“我们会在一起发大财的。”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第二天我们定下了协议，我付给他三千英镑，成了高热公司百分之五十股份的持有者。

我们俩按典型的特里方式，到一个时髦的夜总会去庆祝我们的新合伙关系。那晚，酒后吐真言，我告诉了他关于艾伦和我的一切。特里注意地听着。当三个人过来坐到我们桌旁时，我们已经相当醉了。其中两个肤色很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第三个人是个红头发的矮个子。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仍然继续在说话，突然我认出了那疯狂的狂犬病般的神情——就是许多年前我和绅士乔治在那家地下室俱乐部遇见的那个人。可现在他们当中有两个这样的人，他有个孪生兄弟。“斯蒂芬，孩子，”特里说，“让我把几个好朋友介绍给你，这是雷吉和龙尼·克雷。”他们和我握了手。“这位是汤米·考利。”特里指着第三个人接着说。这是我正式被介绍给了伦敦犯罪团伙的最大头目。我意识到龙尼并没有认出我就是那个多年前侮辱过他的、神气活现的小孩，心里松了一口气。他们喝了一杯酒，和特里咬了一下耳朵后就走了。

公寓等问题解决后我感到很高兴，可以在飞去马耳他接卡米拉和孩子回来之前轻松过上几天。我去马耳他前一两天在艾伦家和他一起吃晚饭。我激动地告诉他我有了新公寓，但没提老婆和女儿的事。为了掩饰我的马耳他之行，我假装要到西班牙去度假一周。艾伦要给我一张古董书桌作为乔迁新居的礼物，但是当他提议我不在家期间派人送去时，我拒绝了，说最好以后我自己来取。我将我和艾伦及卡米拉的生活对彼此隐瞒已经引起了复杂的情况。第二天上午艾伦把我带到他公司的办公室去，这是伦敦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科佩尔—皮尔—林登—达克公司”。艾伦是资深合伙人，在公司有很大的控制权。那天他交给我一张数额很大的公司支票。“你的股票上涨了，”他笑着说，“你阔起来了。”他一直瞒着我以我的名义买卖股票。作为艾伦的第一个情人，他对我的慷慨简直没边，他给我多少都觉得不够。他常常给我写亲密的情书，有时就写在公司的信纸上，给讹诈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讲过了他，向他道了别，答应一从他以为的西班牙回来就给他打电话。

动身去马耳他的前两天，我和新结识的两个年轻人康以及基思一起外出。这是两个放荡的家伙，白天黑夜服用安非他明，亢奋异常。想起了纽沃姆大夫用毒品给我造成的可怕情景，我才不愿落到他们目前的这种状况呢。我整天喝酒已经造成足够的损害了，再用安非他明？我可不想再要它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是个公假日，在游乐场玩的时候康要给我一粒药丸，我拒绝了，告诉他我以前曾经用安非他明成瘾过，“谢谢，我还是喝白兰地吧。”可是他还是往我口袋里塞了两粒，说：“这东西不一样，伙计，不会上痛的！”我们都上了旋转木马，一面笑，一面大呼小叫的。在响亮的音乐声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把药丸吃了，把药丸吃了！”

我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把两粒全吞了下去。这两粒药丸开始了我后来二十年的吸毒生涯，二十年中我共吞下了五十多万粒药丸。我的生活也像这旋转木马，开始不停地急速旋转开了。起初我以为这奇怪的感觉是因为木马的上下运动造成的，就下来不玩了。几分钟后，当这种引起幻觉的麻醉剂起了作用，我又爬上了木马，一而再地花钱玩了再玩，一直玩了好几个小时。

我又开始吸毒，并又上了瘾。

最后我终于下了木马，去找那两个青年要药丸。我们失去了理智，都吞下了好几粒毒品，开始像疯子般行事。射箭摊前，在难以置信的迷糊亢奋的状态下，我们朝过往人群的头顶上射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我们疯狂地把冰激凌往开碰碰车的人身上扔。这样一直折腾到一群愤怒的摊主把我们赶出去为止。

我们仍处于吸毒造成的亢奋中，那晚在我的新公寓里我们搞了个放荡的晚会。到处都是女孩子，全都处于吸毒后的迷糊亢奋中，又喝得烂醉，半光着身子。我想必是在毒品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下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太阳已经从窗子里照了进来，浑身难受得要命。到处是赤裸裸的身体。我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连下身都没罩住，什么都不记得了。汗衫上一枚大别针别着一个信封，里面有七粒黄药丸和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去马耳他用的药丸！爱你的康。”

啊上帝！啊不！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那天早上本该乘飞机去马耳他的。我几乎连动都动不了啦，就把所有七粒药丸一口吞了下去。十分钟后我开始真正醒了过来，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很快就在开往机场的路上了。在出租车后座上我感到麻醉剂的强大力量越来越发挥作用，就像一壶马上要开的水。我们经过格洛斯特路时，我已经失去理智，让司机停在了艾伦家门口。当时是早上七点，可这并没有阻止我砰砰地砸他家的门。艾伦看到我这副样子，表现又这么古怪，大吃一惊。“怎么了，斯蒂芬？我还以为你在西班牙呢。”“我正要去呢！我现在有麻烦了，马上需要一千英镑。”我嚷道。出租车仍在外面街上走着表，他母亲大声问道：“是谁呀，艾伦？”“啊，没事，”他大声答道，“是挂号信。”他给了我一张个人支票，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斯蒂芬？回来以后请给我来电话。”我跳上出租车，对艾伦招招手，他站在自己的大门口，一脸的茫然。我并不需要他的钱，支票在马耳他也不能用。这是我在毒品作用下干出的许多毫无道理的疯狂事件中的第一桩。

在机场上，我的班机延误了许多个小时，当飞机终于起飞后，我已经开始感到麻醉剂的作用在消失。亢奋和快活的感觉变成了疲倦和沮丧。由于我没有毒品，便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不停地喝白兰地，以减轻这种可怕的感觉。到马耳他后我坐出租车到了卡米拉母亲的公寓，自己简直已不成个样子。看见我这副模样，人人都吃了一惊，但我难受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只顾喝醉了睡觉。第二天，我并没有因为看到卡米拉和自己的小女儿而高兴，反而只对毒品感兴趣，一

切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了。伊莎贝拉和她的女儿们无法明白我到底是怎么了。

在马耳他，我对毒品的依赖的真正可怕状态第一次表现了出来。过去几天中麻醉剂造成的迷糊亢奋重又勾起了我的毒瘤，现在我推一的渴望就是毒品给予的愉悦。当我意识到我在马耳他根本搞不到任何麻醉剂时，我的毒瘤使我感到走投无路，我试图以醉酒代替，但酒精已不能给我我极度渴望的那种感觉。在一家酒吧呆了大约五小时后我回到公寓里，嘟囔了一声有急事什么的，就去到机场赶下一班航班，回到伦敦和毒品身边去。妻子和她家里的人满脸迷惑的样子，但是好像相信了我的话。卡米拉仍旧同意一周后回英国。新公寓的相片起了作用。

在希思罗机场着陆后，仅仅是想到第一剂毒品就使我兴奋起来。我从机场给基思打电话要更多的麻醉剂，他让我和他的毒品贩子建立联系。两小时后我见到此人，他说当天早些时候可以给我一百粒。“别他妈的傻了肝”我尖叫道，“我需要办一大批货！”我给他钱让他把我介绍给给他供货的人，看到了那一大把钞票后他同意了。

我被安排和一个神秘人物在巴恩斯桥附近见了面。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在搞特务活动似的，要弄清楚我不是警察派来的。“你当毒品贩子有多久了？你认识帕特里克有多久了？”他想知道。“咽，有些日子了。”我答道。他怎么能够相信我是为自己买这么多毒品呢？他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你准备花多少钱？”我拿出两千英镑给他看，然后拍拍口袋，表示钱还有的是。现在他认真对待我了，让我跟着他沿河走了约一英里。我们一面走他一面不断回头看，确认没有人在跟踪我们。最后我们来到一艘宽大的游艇旁。我们上船后便锁上了门，下到船身内。在那里他给我看了许多装着成百瓶麻醉剂的箱子。“这都是什么样的药丸？”我问。“都是高级的，安非他明。”他说着递给了我两粒试一试。我吞服后我们坐了下来。很快我就获得兴奋的快感，脑袋炸了开来。“怎样？”他看到药丸已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咧嘴笑了。“多少钱？”我问。“买多少？”“这条船上的全买下！”我大声叫嚷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说好了价钱，我把停在驳船旁的汽车开了过来。我们一起把毒品装在了行李箱里，把行李箱塞得满满的，一共有三十多万粒。开车离开时我真是一个快乐的瘾君子！我有足够十年用的麻醉剂。从现在起，所有的同性恋医生和毒品贩子都可以见他妈的鬼去了！我永远也不会再缺少毒品或幸福了。如果有人出一百万英镑来买这些药丸我也会拒绝的。这些药丸是我的信心、我的自信，有了它们，我就可以偷来足够的钱去买我所需要的一切爱。

开了几英里后，我突然发现后面有一辆警车。我掉进圈套里了！带着这么多毒品被抓住得坐很久的牢。会有哪个陪审团相信这都是我自己用的？我努力表现得很镇静，把车停在“王牌”咖啡厅旁，结果发现警车在我后面也停了下来。我要不要逃跑呢？我走进咖啡厅，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心怦怦狂跳着，等着被抓起来。但是那两个警察进来后只买了三明治就走了。我放心地出了一口气，等平静下来后把车开回了家，赶快卸下毒品，把自己锁在了公寓里。真多啊！成百上千瓶！我购买的数量大得让人激动不已。我退后一步站在那里，像艺术品收藏家欣赏着自己的藏画般看着我的毒品，一间港是毒品的屋子。我狂喜地吻着每一个瓶子，开始一粒粒地数药丸，每五百粒放成一堆。不久我就不数了，得好多天才能数完呢。于是我往口袋里装满了药丸，出去度过放荡的一夜。

我亢奋迷糊得完全没有了理智。和基思碰头后开始了长达七天的吸毒作乐，这是到那时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我一次就吞下一把药丸，日子全都掺和在了一起，我一直处在幻觉之中，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

到这个疯狂的一周之末，我又在参加一个聚会时，突然记起了艾伦的有特殊意义的晚餐。我应该在场的！我离开了新的一批赤裸着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的人，跑到外面，像疯子般开车去了他的公寓二

我到他家时，他正和他母亲一起切蛋糕。他看上去很难过，对我说：“我还以为你忘了，不来了呢。”我找了个软弱无力的借口表示歉意，艾伦并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话。突然我意识到e已没有带礼物，便冲到附近的商店，买了巧克力和香槟酒，连包都没有包。但是艾伦看到我非常高兴，什么都可以原谅。然而他的母亲看我目光严厉得多。整个晚餐中我努力表现得正常，艾伦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找话说。他问我：“你明天，星期天的上午，打算干什么？”“星期天？”我尖声叫了起来，“明天是几号？”“今天是一号。”他母亲答道。附上帝，不！听到落地大座钟敲响八点，我心想，卡米拉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了。

“艾伦，我以后再解释，”我大声说，“我得走了。”饭吃到一半我跳起身来，在大门跑去。在前厅里我回转身子，冲回去扑在艾伦身上，两只胳膊搂着他，当着他母亲的面亲吻他，大声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冲出大门，离开了惊愕得僵在那里的艾伦和他的老妈妈。

在开车到机场去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怎么啦？我整个的生活在我眼前旋转。我

不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了！我是卡米拉的丈夫吗，正要去接她和我们的女儿？还是切他的有特殊意义的蛋糕的艾伦的情人？还是在另一个放荡的聚会中扮演基思的花花公子哥们？我也搞不明白，就又吞下了更多的药丸。

机场上到处是警察，他们仍在搜寻劫火车的大盗查利·威尔逊，他几周前从温斯顿·格林监狱越狱逃跑了。我看着妻子和宝宝过海关时我正处于亢奋状态。卡米拉晒得黑黑的，更迷人了，宝宝像个微笑着的玩具娃娃。和她们重逢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似乎把我从其他的身份中震了出来，似乎艾伦以及其他的人并不存在。

为了使我们能够直接就搬进新家，我已经让人把整个公寓铺上了地毯，部分家具也摆上了。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免得争吵，但是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卡米拉扔下了最新的炸弹。她要求分居，打算单独和孩子住在公寓里。我大发雷霆，叫嚷说如果我不能和她们住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公寓，她可以赶下一班飞机回马耳他去。我什么也不会失去，我真是这么想的。卡米拉意识到了我的心态，同意和我在一起，至少是住在同一套公寓里。毒品和卡米拉的最后通牒使我的脑袋更加晕乎，更加糊涂了。

在公寓外停好车，我们刚要下车时，一个蓬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姑娘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卡米拉说：“你看那个荡妇，连衣服都没好好穿上！”我惊恐地认出了那姑娘。前一天她和基思一起参加了我的聚会。啊，上帝！还有谁仍在我的公寓里？我想道。

“别，别下车！”我喊着把卡米拉推回到车子里。“我忘了，钥匙在特里那儿！我们得到他办公室去拿钥匙。”我让卡米拉在高热公司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借口是特里把钥匙拉在了一个工程师的汽车里，他马上就把钥匙送回来。我们喝茶的时候特里完成了他的又一个奇迹，把所有赤身裸体的人从我的公寓里清了出去，并严格地指示他们永远不得再到那儿去。

消灭了一切证据之后，卡米拉、孩子和我终于搬进了我们的新家，以继续我们风波迭起的生活。很快我就睡着了，一直人事不知地睡了整整两天。醒来以后，卡米拉说不断有奇奇怪怪的人来敲门，问关于聚会的事！“准是敲错门了！”我冷静地答道。

我的妻子和孩子回来了，我有一套豪华公寓，艾伦不断给我大量的钱或礼物。此外，犹太犯罪团伙分子兼我的合伙人特里把我介绍给了最凶恶的一帮罪犯，因此少说着我的日子也是乱哄哄的。服用这样大剂量的兴奋剂，生活变成了疯狂过山车，速度高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然而卡米拉对新环境似乎很满足，只要有钱花，什么问题也不问，就连我一连几天不照面时也是如此。

现在我拥有了高热公司的一半，虽然我对于他们在背后搞些什么一无所知。我的合伙人特里是个狡猾的人物，从不打算光明磊落地办事。在他眼中，我只不过是个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办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孩子，很容易刮用。他精神上一直朝思暮想的就是成为伦敦犯罪世界的教父，为此他让汤米·考利成了我们正式的成员。汤米是犯罪集团头子克雷涅生兄弟的得力助手，和他的老板们一样坏。克雷兄弟这时已成了伦敦黑社会无可争议的太上皇，没有人不怕他们。他们在三十岁上已达到了他们事业的顶峰，有着大群手下人保证他们的恐怖统治。雷吉是个暴的人，但他的兄弟龙尼更糟，整个是个精神变态狂。特里由于他的团伙犯罪情绪很容易就上了克雷兄弟的韵，因为他其实和他十分希望成为的阿尔·卡彭式人物是截然相反的。他只不过是个幻想者，对克雷兄弟怕得要死，他们使他完全按他们的愿望办事。然而有他们做后台，特里能够操纵自己的一摊，吓唬住我这样的犯罪新手。当然，汤米·考利什么也不用干，他之所以在公司的工资单上完全是因为克雷兄弟希望他在那上面。

有一天，我陪考利到海边找一家旅馆老板讨账，因为高热公司的活有毛病，他拒绝付钱。考利是个矮矮的长得非常像詹姆斯·卡格尼的人，他坚持要公司里的两个年轻女职员和我们一起去。在旅馆里，考利用克雷兄弟的名字威胁老板，立刻就拿到了全部欠款。“对不起我没有按时付钱。”老板把钱交给考利时说道。克雷这个名字所引起的恐惧使我惊讶万分。考利均已从中拿出了一大笔钱，说是给克雷兄弟的，把剩下的让我交给特里。

任务完成后，我们刚在旅馆的酒吧中和两个姑娘喝完酒，这时突然有三个人，个子比考利大出一倍，开始和他争执起来。我吓坏了，便照例吞下了更多的兴奋剂。考利又一次提起了克雷的名字，那些人就退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旅馆老板先前就免费给考利开了两间相连的房间，这时我们都有点醉了，便带着女孩子上了楼。她们已经脱掉了一半衣服，我们正开始在兴头上的时候，考利突然离开了房间，然后带着刚才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回来了。“她归你了！”他对那人说，同时把我和另一个姑娘领到了

隔壁房间去。两个姑娘似乎都吓坏了，怎么说就怎么做。几分钟后考利眼睛里流露出狂怒的神情看着我，说道：“这就是惹我们生气的人的下场！”他一头冲回到刚才那个房间，那男人正趴在姑娘的身上。考利拿起铜台灯向那家伙的头上砸下去，打得他头破血流。那个赤身裸体的姑娘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考利把那人拽到地板上，一次又一次地猛打他。考利把他踢得人事不知，他的鼻子都快给打掉了，满嘴都是血。考利把床单撕成一条条，转过脸来冲我喊道：“把这个杂种捆起来！”根本没有必要捆他，那人躺在一摊血里，一动不动。我吓坏了，按他说的把那人的躯体捆了起来，弄得手上全是血。这时考利把自己裤子上的拉锁拉开，跳到那吓得要死的姑娘身上。那姑娘身上溅满了血正哭着，但当考利扇了她一嘴巴、叫嚷着“我要操你了，好好享受享受吧！”的时候，她吓得止住了哭声。考利于了一半，从姑娘身上跳下，又去跟那被捆起来的人，那人只是茫然他睁着眼睛。然后考利又跳上姑娘的身子继续干那勾当。我吓得跑回隔壁房间，和另外那个女孩藏在了大衣柜里。

后来当一切归于平静以后，考利带我和姑娘们去到当地的一个夜总会。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们吓得不敢离开他。原先的三个人中的另外两个也来了，说他们非常抱歉说了那些话，求考利收下点钱，别向克雷兄弟提这事。现在我亲眼目睹了维护着克雷帝国的暴力。那晚回到伦敦后，我们下车时考利瞪着我们说：“你们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惊恐的声音齐声答道。然后他转向我，对我说：“下星期你去给克雷兄弟帮个忙！”我坐在那里，衬衫上仍留着干了的血迹，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点点头。

一个星期以后我发现自己在证人席上，为被指控盗窃的前英国拳击冠军桑尼·麦科西作伪证。我站在陪审团面前，心中自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甚至都不认识麦科西，从来没他妈见过这人。抬头向公众席看去，答案就在眼前。考利和克雷兄弟正在微笑。

此后的几个月，在特里花钱使人安分守己跟着他的过程中我目睹了更多的暴行。这给了他极大的乐趣。有一次，一个人离开了高热公司去办自己的公司，结果他被抓住脚，身子吊在五楼的窗外，有人告诉他，除非他关掉公司重新加盟特里，否则就要被从五楼扔下去。两天以后他就照办了。身一次，一辆微型出租车的司机给狠揍了一顿，就因为他不肯告诉特里头一天他开车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人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住了好几个星期的医院。特里从来不亲手打人，他雇二等流氓来替他干这类肮脏勾当。这样他就能继续做他的教父梦，但是就暴力而言，克雷兄弟完全属于另一个档次。他们是真正的血腥暴徒。

继续不断地使用大剂量的兴奋剂这时开始把我的生活带进了另一个领域，不知不觉我就滑进了严重犯罪的世界中。我追求的不是金钱，我并不需要钱。我追求的是刺激，是逃避正常的生活。

通过特里我遇见了一位人物，我姑且称他为比利。他是一个因一系列大规模抢劫工资款罪行而闻名的盗窃集团的一员。事情的起因是特里看见我开着我那辆美洲虎汽车沿单行道高速逆行，躲闪别的汽车，就为了刺激。我只有在安非他明加快了反应、使我看不到危险时才能这样做。比利听说了我的事迹后，要我在再次这样撒野时带上他。这样我就在一次抢劫工资款的大盗窃案中被她进了做接应逃逸的司机角色。这涉及很大一笔钱，当我们只是谈及此事时我觉得很了不起。当我意识到我真要去干时我感到了恐惧，因为没有安非他明给我勇气，我仍像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害怕黑暗。

在接近抢劫的日子里，我脑海里总是出现逃逸用的汽车被撞毁，有人被撞死的情景。我想退出，但为时已晚，当我表示犹豫对比利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抢劫的那天早上，我害怕得很，兴奋剂用得那么多，差点过了量，在我们去取抢劫用的接应车时，我已完全处于极度兴奋神志不清的状态。有个从来就不愿意我成为他们一员的年纪比较大的人意识到了我的状态，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你就死定了。”我非常害怕，想要逃跑，但这时事情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

从逃逸用车的后视镜中我看着同伙用我们的另一辆车狠撞运工资的车，当我听见叫喊声和玻璃打碎的响声时我哭了起来。他们拿枪逼着工资车的司机开了车门。几秒钟之内一切全都结束，一帮人挤上了我的车，这时我感到枪口比在我的后脖子上，“你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你就死定了，小伙子。”熟悉的字眼来自我身后一张蒙着的脸。我一脚猛踩在加速器上，车像火箭般冲了出去，但奇怪的是，车好像根本没有动。一切都似乎以慢动作在发生着。一个劫匪被抱在车外，有人把他从车窗拽进了急驶着的汽车里，他尖声咒骂我。年纪较大的那人扇了他一巴掌，说：“以后再说，让小家伙好好开车。”我们事先计划好了逃路，但是在第一个转弯处，一辆送货卡车挡住了整个路面。我手按在喇叭上开上了人行道。突然，一个妇女推着婴儿车从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钻了出来，但我们车速太高，根本不可能停住。她设法把婴儿车推到了一边，自己也奇迹般地跳到了安全的地方。当我一路撞击着各种各样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时，就感

到像是在一场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的电影里。

我们不停地左拐右转，很快就摆脱了一切，这时我意识到，除非发生愚蠢的事故，我成功了。我开始又哭又笑。到我们第三辆车所在之处时，大家全都下了车，我和那个年纪较大的人消失在附近的地铁站里。坐在地铁火车里他对我说：“干得好，孩子，你车开得真棒！”他的话对于我来说比那天早些时候拿到的钱更有意义。我一直希望得到的正是这种承认，而不仅仅是钱。从儿童时代起我希望的就是被接受，就是能属于一个人。悲惨的是，对于我，这只能来自一帮劫匪。

我把我的那一份装满好几个大购物袋的钱锁在公寓里卡米拉着不见的地方。好几天我都没能从这桩抢劫案中恢复过来，但是后来我恢复过来了。在兴奋剂的帮助之下我继续犯下了更多的罪行。在安非他明的影响下我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像是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抢劫案几天后，我们开车到伦敦机场去接千米拉的母亲伊莎贝拉和她的女儿们来过圣诞节。伊莎贝拉看到我这么瘦，感到无比惊异。从上次和她见面后我瘦了四十几磅。这是吸毒。犯罪和暴力造成的，但不管怎样我要让伊莎贝拉和她的女儿们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在圣诞节晚餐的时候，我看着我的家人。由于该死的毒品，我忘记了卡米拉和特莎的存在。那天下午路易莎推特莎打秋千，特莎摔了下来，她的哭声震动了我，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我抱起女儿，意识到自己已经这么久没有看看她的脸了。在剩下的假期里，我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也减少了吸毒量。

我们看了牛津街的灯火和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巨型圣诞树。在那几个神志清楚的日子里我们还去了女人巷的街边市场，当我们在人群中推搡着前进时我心里想道，看一看这些不用兴奋剂的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吧，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呢？姑娘们总是寸步不离伊莎贝拉，她是她们的一切。看着她们和卡米拉以及她们的母亲说笑，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成为这和四五常生活的一个部分。那天晚上我听着买来的滚石乐队的新唱片（现在一切都已结利，觉得很悲哀，就好像我知道自己清醒的神志不会持续多久。

她们要飞回马耳他前在机场告别时，我长久地握着伊莎贝拉的手，仿佛是永恒。她苍白的脸上一副倦容。她眼中有种神情，似乎想说什么话。

回到家中，圣诞节的停火结束，我们的家庭战争再度爆发。一天晚上，和艾伦一起吃过晚饭后，我回家时发现卡米拉在大喊大叫。她没有通过路考。我给她买了一辆崭新的胜利牌路车，停在外面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就等她通过路考。现在她没通过，狂呼乱骂，好像在做三点掉头时控上该死的人行道镇边石的是我。我花了一笔钱为保证就是蒙着眼睛她也能通过第二次路考。只要能够维持现状，我做什么都行，出多少钱都愿意。

几个月后，有天一大早卡米拉又嚷嚷开了，要一所房子。“我们没法在一套公寓里养大孩子。她需要有个能在里面玩耍的花园！”“别吵，”我答道，“今天晚上回家前我就买一所房子。”和往常遇到麻烦时一样，我拿出一购物袋的现金去找特里。“今天我必须得买所房子，”我大声说道，“没房子我可不敢回家。我受不了又一场吵闹。”幸好特里认识一个律师，急着要把在托待里奇的房子卖掉。“如果那房子有花园，我就把它买下。钱在汽车里。”我说。我们给房主打了电话，马上就去看房子。他要带我把房子看上一遍，但我说：“我妻子以后可以看。报价吧。”他一脸惶惑，但是说了个高出房子所值的价钱，我问也没问就同意了，我只求能得到平静。我用购物袋中的现金付了绝大部分房款。感谢上帝今晚不会吵了，我带着房子的相片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想道。

我们花了一笔巨款装修新家。我对装潢不感兴趣，对于我来说，这仅仅意味着花去另一个购物袋里的钱。这所巨大的独立的房屋有五间卧室，一个很长的向开阔的田野倾斜下去的花园。在伦敦，这样开阔的视野是很少有的，但是我成天吸毒吸得腾云驾雾的，根本无法欣赏这一点。

我父亲也牵涉了进来，帮着安排各种施工人员。他开始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努力接近我。帮着卡米拉装修房子是他第一次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出兴趣。他的友谊是因为我新获得的财富，还是他第一次发现我是他的儿子？我并不想知道真正的答案。我太喜欢他对我表示出的关注了。父亲的商店破产了，加上他现在身体不好，无法好好工作，我已经开始每个星期给他二十五英镑。最近我还给他买了一辆新汽车，这一切都是我“用钱买爱”准则的一部分。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他不明白他这个二十一岁的儿子怎么会突然有了这么多的钱。

为了庆祝乔迁新居，我带父母和卡米拉到时髦的“尽人皆知”去吃晚餐。我们坐在靠近看台的最好的座位上，看上去真是幸福的一群。我仍抱着创造一个爱我的家庭的梦想，希望使妻子和父母的关系密切起来。尽管我吸毒、犯罪。但我的一部分仍希望能正常下来。我们正开始用餐，突然我感到有人把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一回头看见演米·考利站在我的身后。“要你到我们那桌去。”他说。我惊恐地看到克雷兄弟和好几个凶恶的面孔在望着我。“我现在不能去，我们的庆祝活动还没有完呢。”我答道。“马上去！如果你以后还打算再庆祝的话。”他冷笑道。“我这就去。”我回答说。我强笑着向卡米拉和父母道了歉，他们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了。我先到厕所去大吐了一场，平静下来后重新出去，迎接我的是龙尼·克雷那著名的跳着牙执狗般的笑容。他以一种毫无兴趣的样子抬眼看着我说道：“今晚晚些时候我们有人要你去见一下。”他叫我一小时后到切尔西的一个地方去。“别迟到。”他微笑道。“可你要我干什么呢？”我问道。“我们要和你的证券经纪人朋友做点买卖。”龙尼答道。我惊呆了。特里必定是把我和艾伦的关系告诉了他们。这个杂种！

我回到自己的饭桌旁坐了下来，我受到的震动太强烈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眼前出现了艾伦给我弹钢琴的情景。难道我要出卖这唯一真正爱我的人吗？“你怎么了？脸色难看得很。”母亲说。“啊，没事。”我说，当着大家的面吞下了更多的兴奋剂。我已经陷得太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向他们解释我马上得到一个地方去，给卡米拉和失望的父母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自己开车到切尔西去了。

会面的地方是在一个高级的公寓大楼里。在五楼下了电梯，迎接我的是一个大约五十岁已经开始秃顶的美国人。他一点也不像通常的暴徒，而更像一个银行家。他把我带到一个拥挤的房间里，让我坐下后便开始评述这笔无情的交易。他整个讲话的过程中到人全都沉默不语。需要“柯伯尔—皮尔—林登—达克公司”来掩护一桩巨大的股票诈骗案。我没有必要了解所有的技术性细节，因为我的任务很简单。要我把艾伦引诱到一家旅馆去，在那里会拍下一些能用作罪证的黄色相片。克雷兄弟会利用这些相片对他进行敲诈，好让他按他们的要求干。那个美国人解释说，事关几百万英镑，他们会付给我可观的酬金。“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请求道，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恶。戈尼·克雷站起身向我走来。“考虑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他低声道，一面用手指骨节敲打我的脑袋。

我怎么能够对艾伦做出这种事情？但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我脑子一片混乱地离开了切尔西的那个公寓。开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晚上。为什么我不能像同龄的青年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新伦敦，卡纳比街上的商店、咖啡厅和俱乐部？我经过正在首演甲壳虫乐队的新电影（帮助）的电影院。“啊，见鬼，”我喊道，“谁来帮帮我！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一早就我给艾伦打电话，说我迫切需要见他。他请我过去吃午饭，一小时后我到了他家门口。“你脸色难者极了！”他说着请我进了门。他要到附近商店去一趟，让我和他母亲一起喝咖啡。老太太和我坐在客厅里互相对望着。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你打算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真是离奇得很，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似的。和这位高雅的老太太一起坐在艾伦的客厅里，离开我陷入其中的犯罪世界仿佛是这样的遥远。突然她站起身来，拄着拐杖穿过屋子走到我面前站住。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严厉地说：“如果这事和我的儿子有关，你得告诉我。”我抬头看着她问道：“如果你被迫要去对一个爱你的人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怎么办？”她在我旁边坐下，答道：“我根本不会去做！如果你此生能够得到哪怕一次真正的爱，你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值得为此而死。我的儿子艾伦爱你。不管是什么事，不要去做！”

我沉默地坐着。她是对的。有些事是值得为之而死的。我答应去制止这件事。“你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得多，不再会需要偷偷服用这么多药丸。”她平静地说。她正说着艾伦走了进来，“你脸色好点了，”他说，“你怎么着他了，妈妈？”“我只不过是让他就这么一次要面对生活。”她微笑道。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股自由的感觉。一位老太太去掉了我对克雷兄弟的恐惧。我现在更害怕的是她。她所说的话是我良心的声音。

从艾伦的母亲那里我获得了斗争的决心。我住进了国王大十字附近的一家我认识的马耳他人拥有的旅馆。几小时后在一位专家的帮助下，我在床底下连好了一台非常敏感的录音机，用来录下那个房间里所说的一切话。当晚我给考利打电话，说在进行拍照活动前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那极交易。一小时后他和那个美国人来到我的房间里。他们愚蠢地详细谈论了整个策划，我引着他们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在我对他们说我感到满意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走好他们在第二天晚上拍照。

我立刻复制了三份磁带，分别装在不同的信封里。一个信封上的收件人是伦敦警察厅，一个是世界新闻报。我把第三盘拿到一个我认识的律师那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又把另外两个信封交给了他，请他在克雷兄弟或考利伤害我时寄出。这上面的证据足够使许多人坐牢。

第二天我就像最后一次去执行任务的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那样处于极端亢奋的状态下。我在那间旅馆的客房里等待着摊牌。我手里拿着枪坐在床上，气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当考利和另外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冲进来时，我一跃而起，尖叫道：“什么都给录下来了！读一读那些信

吧！”我把枪指着自己的头，喊道：“现在你们他妈的能怎么样，杀了我吗？我会杀死自己！然后警察就会得到这一切，你们就都得进监牢。由于兴奋剂的作用，我成了一个自杀的疯子，什么也不怕。我死后律师会寄出磁带，引起警察的注意。”“安静点，”考利说，“咱们和特里谈谈。”“汤米·考利可能是个暴徒，但他不是个傻瓜，现在他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愿意忘掉整个这笔交易。他们保证再也不打艾伦的主意后，就丢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这一回，兴奋剂就像多年前在我对付那个凶狠的男孩时我父母的葡萄酒那样，站在了我的一边，使我疯狂到敢于去吓唬团伙匪徒的地步。”

我对一个虚弱的百岁老太的恐惧使我将了克雷兄弟的军。

我松了一口气，开车回家，这时真是筋疲力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挨床了，现在只想睡觉。

我刚躺在床上就听见电话铃响了起来，跟着楼下传来了一片哭喊声。卡米拉冲进屋子里来，哽咽地说：“妈妈住院了，她决死了。”

刚刚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从马耳他传来的消息压倒了我。罗丝安娜，卡米拉的大妹妹当时正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照着几天特莎。卡米拉和我在震惊中驱车到了伦敦机场，想尽可能搭下一班到马耳他去的飞机。我们得照料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们。

在希思罗机场我把卡米拉留在酒吧里，自己去安排机票。机场拥挤不堪，我在售票处排队时，突然在机场的喧闹声中听到了卡米拉在叫我，声音里充满了惊慌。“妈妈死了，斯蒂芬，斯蒂芬，帮帮我！我抬头张望，但是在人群中看不到她。我又一次听到了这尖叫声：“妈妈已经死了！”

我已经有三整天处于毒品引起的亢奋之中，现在感到浑身麻木。售票员转向我，说：“下一位。”可是我只是尖叫着：“现在他妈的太晚了。伊莎贝拉已经乘上了去天堂的航班！”我回转身，推开拿着箱子的人群，又听到了卡米拉的叫喊声。我跑到大厅的另一侧，看见她跪在二层的玻璃栏杆上失声大哭。

啊，上帝啊，真的发生了。伊莎贝拉死了！

麻醉兴奋剂控制住了我的眼泪，在极度亢奋中我哭不出来。我很爱那个女人，但是现在我得帮助伤心欲绝的卡米拉。在悲痛的打击下，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去拯救在马耳他某地的三个孤零零的孤儿。

我集中起兴奋剂浸泡下仅有的一点理智来处理目前的局面。我对卡米拉说，我去马耳他把她的妹妹接到英国来和我们同住，她则留在家里。我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毒瘤已经很深，自己也需要帮助，肯定不适合做孩子们的监护人。

我定好了晚些时候的班机，把卡米拉扶上了汽车。她伤心之极，在我们驱车回家的路上哭得非常厉害，使我对她的安全很不放心。我拼命想让她平静下来，便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在上帝感召下的独白。脑袋里有了兴奋剂给这出戏加油，我向她解释说死亡是种无比奇妙的旅行，是去到我们在天国的家园的最终放行。“你母亲的心在你父亲死后就已死亡。从那时起她只是为了孩子们活着。”我对她说。我指着天空说：“看呀，你妈妈就在那里拥抱着你的父亲。上帝正在向他们把手，让他们进去，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快乐。”我对天国至福的描绘一直继续到我们在家门口停下车子。这些活起了作用，卡米拉似乎平静多了。罗丝安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沉默无语。幸运的是，一位邻居主动提出陪伴她们，因此很快我就再度离家到机场去了。

怀着在兴奋剂之海中浮游的感情，我驱车离去时高喊道：“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一定要拯救那几个女孩子！”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更为糟糕的状态下乘飞机到马耳他去完成“救世主使命”。在卢卡的机场下飞机后，我在吸毒后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坐出租车穿过全岛到斯利马伊莎贝拉的新家去。公寓的门锁着，谁都不在家。当时已是正午，我站在街上，在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头昏。便坐在了马路边上。这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用马耳他语和我说话。他认出我以前来过马耳他，便把我领到一家拥挤的酒吧中，他和那儿的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看我。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听到他们几次提到“伊莎贝拉”这个名字。有人递了一杯东西给我喝，但我非常恼火，就大叫道：

“这不是什么该死的庆祝活动。那几个孩子在哪儿？”我跑回大街上，一个女人站在阳台上喊住我：“英国人先生，等一等，我来告诉你。”她走下楼来，解释说女孩子们在一条街区外，有人在照顾她们。她把我带到一条很窄的、坡度很陡的小街的头上，又长又平的台阶一直

通到山下。“姑娘们在下面喷泉旁。”她指着下面说，然后回过身子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伊莎贝拉前一天晚上刚刚去世，还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她们。命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高高的建筑物之间晾着洗过的衣服，好几家商店外面堆放着水果。我走过一个在清洁门外台阶的女人，正在我感到似乎已经走了很久之际，突然停下了脚步。那三个女孩在前面一个小广场上玩耍，还没有看见我。我不能哭，我心想，一面练习上帝感召下的第二个独白。“你们的妈妈在天堂里了，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呢。有鸡蛋，好多好多鸡蛋。”见鬼，听上去得真实才行，我走近她们时自己在想。我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就含着眼泪躲进了一家小酒吧，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我要付钱，但是老板只是摆摆手，意思是他不要钱。他知道我为什么到了那儿，他又给了我一杯酒，拥抱了我，把我送上了一生所走的最漫长的路。这时，村民们都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个为伊莎贝拉的孩子而来到此地的英国人。我步履蹒跚，但高昂着头慢慢向她们走去。

广场突然就空了。人们让我和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姑娘们坐在喷泉的台阶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她们看见我时抬起头来齐声问道：“妈妈在哪儿？”我摇摇头在她们身旁坐下。太阳仍旧火辣辣地照晒在我们身上，我开始了我的故事：“妈妈现在在天堂里了。”孩子们怀疑地瞪着我，但专注地听着一切细节。在兴奋剂产生的虚幻境界中，我像个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开始用她们的粉笔画图。“这就是你们在天堂里的爸爸妈妈。”我指着图说，“这就是他们有鸡蛋的早餐。”“那么多的鸡蛋！”路易莎说道。约瑟菲娜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她和劳拉一把抓住我，痛哭起来。我抬起头，发现路易莎穿过空旷的广场走了开去。“你为什么今天到天堂去？你不能以后再去吗？”她望着天空喊道，一面向我转过身来，“你为什么今天走？”“我也不知道！”我生气地答道。“那该死的时间表在上帝手里！”路易莎缓缓地走了回来，在我身旁坐下。她始终没有哭。

我们坐在喷泉分的地上，拉着手围成一圈，就这样坐了很久。村民们都不来打搅我们。时间停止了，兴奋剂、酒精和烈日开始对我产生作用。我往后一靠，闭上眼睛，短暂地睡着了。醒来时我看见酒吧老板和别的村民全都围着我们站在那里。好几个女人在哭。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兰地，拉我站了起来。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吻了吻孩子们，然后把伊莎贝拉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我。

我谢过众人，和三个悲伤的小姑娘一起向公寓走去。伊莎贝拉就是在这里卧床多日，整个公寓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床单摸上去还是湿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不能在这儿？我想道，很想大叫几声。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公寓里空落落的，这么多东西都不见了。后来有个邻居来告诉我，孩子们伯父家的人那天早上来把东西都弄走了。“那帮杂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大喊道。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伊莎贝拉的遗体在哪里？谁来埋葬她？

我坐在那儿，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使我不知所措。这时我听见从下面街上传来了叫喊声。我从阳台上往下看，认出是伊莎贝拉的父亲，便下楼去迎接他。他是个大约八十岁的结实的老人，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两手抓着我的肩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用马耳他语说着什么。突然他撒开了手，捏紧拳头，倒在我的脚下死了。“啊，见鬼，不！”我尖叫起来。怎么啦？为什么人人都在死去？村民们很快集合起来帮助我，把孩子们带开不让她们看到这情景。后来，为了平静下来，我把她们带到海边，往水里扔小石子儿，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谁也没有多说话。

现在我应该集中力量带孩子们离开岛子，但在我神智错乱的脑子里，觉得首先要和她们已故父亲的哥哥，她们的伯父托尼算账。以前伊莎贝拉曾写信说过托尼如何骗去了他父母遗嘱中属于她的那一份。她丈夫去世后，她悲伤过度，没有和他去争。我在吸毒后的亢奋状态下，要去为她报仇。要是有一支枪，我就会像约翰·韦恩电影里的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把他打死。幸亏我没有枪，那晚，我带着三个脑子里一片糊涂的女孩穿过小岛去到她们伯父的酒吧里。

出租车停在村子的广场上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让女孩们在我前面光着脚走进酒吧，我跟在后面像个喝醉了的亡命徒，叫嚷着：“这些是你弟弟的孩子吗？看，她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你这个杂种！你骗走了她们应该继承的遗产！”我不断怒骂着。“我要炸烂你的酒吧。炸烂整个该死的村子。”我本意是好的，可我是个有病的痛君子，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增加了刚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小姑娘们的惶惑，没有能为她们争到钱。她们本应在床上睡觉的。最后，在进一步说许多威胁的话以后，我把孩子们带回了公寓。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埋葬伊莎贝拉的事，我要给她最好的一切，给她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葬礼用了六匹黑马拉的马车，钱都是我付的。到安葬的那天，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睡觉了，人简直不像个样子。我独自到殡仪馆去看伊莎贝拉的遗体，要和这个爱过我的女人告别。她脸

色苍白，好像编在了一起，但神情平静，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照顾好我的小女儿们。”一个神甫走了进来，默默地握住我的手，一起祈祷。

一小时后我和孩子们一起站在殡仪馆门外，看着伊莎贝拉的棺材抬上了马车。太阳更热了。我听见有声音在天上喊道：“斯蒂芬，斯蒂芬，照顾好我的孩子！”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昏倒在了大街上。

一天后我在一个邻居的家里醒了过来，看到小姑娘们脸朝下看着我的脸。“我们要去找卡米拉。”她们都大声说道。这时我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她们没有护照，以前都是依靠母亲的护照旅行。由于我不是她们的法定监护人，不会允许我把她们带出岛去。以后的三天里我几次到所有的官方机构去，徒劳地想搞到她们的护照。我甚至去见了马耳他的总督明托夫。他解释说他没有力量帮助我们，事情要到法庭上去解决。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的“将来某一天”的作风，下次开庭是在三周以后。在兴奋剂的亢奋中，加上心烦意乱，我一把抓住了明托夫，开始对他进行威胁。马上有两个官员把我拉开，叫来了警察，警察把尖叫着的我拖了出去。他们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被打败了。这一回，一切的虚张声势都帮不了我。我剩下的只有上帝了。我跪了下来，闭上眼睛开始祷告。一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祷告已经应验了。

一个女人带着那三个小姑娘站在牢房门口。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斯皮图娜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我来帮助你，”她隔着铁栏和我握手时说，“我帮你搞个护照。我有亲戚在移民局工作。”

警察拒绝放我，但是允许孩子们进到牢房里来。她们头一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非常疲倦，不久我们就都在牢房的地上睡着了。几小时后一个微笑着的斯皮图娜小姐叫醒了我们。她向我们挥舞着的护照上面，三个孩子的脸照在一张相片上。“严格地说这是无效的，但是它能使你们离开这个岛。”她解释说。我付了罚金，钱直接落进了警察的腰包，牢房的门开了。我们放下心来，走出牢房，来到阳光之下。

在离开马耳他去英国之前，我想让孩子们的外婆最后再见她们一次。她现在又老又病，可能不会活着再见到她们了。

我们到瓦莱塔一家大商场里去购物，给女孩们从头到脚穿上了新衣服，黄色的裙衣、黑色的漆皮鞋和白短袜。最后我给她们买了鲜红的大衣和与之相配的贝雷帽。伊莎贝拉的女儿们看去就和公主一样。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小村子去看老太太的时候，领着她们的却是个吸毒亢奋的王子。

到她家时，另一个老年妇女开门让我们进去了。老外婆坐在她幽暗的房间里的床上和我们打招呼。她拥抱了每一个孩子。村子里别的孩子从窗户外向里面张望。最后老太太招手让我过去，他吻了吻我，用马耳他语说了句什么。

在飞机上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劳拉无法理解死亡是永恒的事，她转向我，问妈妈是不是已经在英国和卡米拉在一起了。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只能拥抱着她，又吞下更多的药丸，把眼泪强压了回去。

坚持住，别哭，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我对自己说。在英国护照检查处我们碰到了我预见中的问题。那位官员看了一眼护照就离开去找来了他的上司。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我许多问题，但鉴于这种悲惨的境况，他终于睁一眼闭一眼地让我们进了关。最后我总算取出汽车，把三个疲累不堪的孩子带回家中卡米拉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卡米拉就要像母亲一样把她抚养成人。

对于卡米拉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她自己才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值得永远赞扬的是，她干得很出色。

伊莎贝拉的女儿们总算安全了。她们一起长大，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里。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中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结了婚，看着彼此的子女长大。这一定会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

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床上安稳地熟睡以后，我独自来到花园里，仰望苍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该轮到我了，我等得够久的了。

我曾爱过那个女人，伊莎贝拉曾爱过我。

伊莎贝拉去世后，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她们互相支持，而照顾她们的卡米拉又是她们熟悉的人，因此她们感到很安全。罗丝安娜这时住在汉普斯特德一家人家里帮着带孩子，

路易莎、劳拉和约瑟菲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在当地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托特里奇的房子很大，五间卧室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车道里停着两辆汽车，当地的花匠一周来整理两次花园，这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关着的大门里面住着一个有大袋大袋偷来的钱和几百瓶麻醉剂的神智失常的狂人。日益增长的吸毒量使我越来越孤僻，对兴奋剂造成的亢奋和飘飘然的渴求控制了我整个的生活。

特里，还有他把我出卖给克雷兄弟的事对我的打击远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对艾伦讹诈的严重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看清了它的全部含义。这件事导致了我和亲爱的特里之间的许多争吵，在后来的几周中我把在高热公司的股份卖回给了他。我们互相叫骂着分了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离开他，因为这使我摆脱了一切责任，给了我更多的时间享用毒品。

在我蹲在家里这一期间的头几个星期，我仍在某种程度上和卡米拉及姑娘们频繁接触，到楼下去吃饭，偶尔把脑袋伸进客厅看看。但是不久这一切全都变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开始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吸毒，常常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和外部世界的推一接触是我三岁的女儿特莎。当我人事不省地躺在书房地板上时，总是被她在门外的喊声叫醒：“爸爸，爸爸，让我进去玩玩。特莎常常会在我的房筒里呆上一整天，画图画。因为她不肯离开，卡米拉只好用托盘把她的饭送到楼上来。女儿和我在那间书房里一起度过的随后的六个月，把我们永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从特莎那儿得到了从未在妻子那里得到过的爱。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房间成了我吸毒岛上的第一个监狱。这是一间很舒服的囚室，有厚厚的黑色地毯，四壁是高大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万多本书，倒不是我读了很多，而是收集书使我感觉良好。由于我对藏匿东西着了迷，我在许多大厚书的中间切出一个方洞，创造出秘密的藏匿处所。在书架的一层上我放藏毒品的书，在另一层上放藏钱的书。但我常常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忘记了哪些书里藏的是什么，要找的时候就把几十本书抽出来放到地板上。书房里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和两把黑皮椅子，那是爸爸和特莎宝宝的椅子。除此之外，惟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有锁的档案柜了，一个放我的毒品，另一个放特莎的画。我在一间小房间里建造自己虚假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不闻不问，如哈罗德·威尔逊在三月份的选举中获胜啦，等等。只要我有了兴奋剂，不论哪个政府上台，世界都是美好的。尽管我和另外五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她们却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幻觉中过着自己的日子。

由于我永远处于兴奋剂的作用之下，便开始发展起一种幻觉，整个世界都在服用快乐药丸。政治家、法官、警察，所有的人都在一片和谐中快乐地唱歌。将不再会有战争或饥饿，大家都像风筝那样飘飘然，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梦想，我确实认为是天意让我会使人类养成每天服用安非他明的习惯。要开始这项工作，从自己住的这条街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怎样才能使大家都服用毒品呢？我总不能去敲每一家的门，说：“喝一杯这种可乐吧！这儿不是哈利威克精神病院。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看着送奶工送奶时我找到了答案。我可以把安非他明和在他的牛奶里。但我意识到不可能买通他来做事，我必须把和好毒品的牛奶放在自己的奶箱里，然后把他支走一会儿，把我的奶和他的调换一下。于是我给牛奶店打电话，他们送了十篇奶到我的车库里，我在那儿仔细拿掉了瓶盖。和进了液体安非他明。我在吸毒后晕乎乎的状态下干了一整夜才完成任务，但是凌晨时分我搞得一塌糊涂，牛奶洒得满地。我的大量的安非他明牛奶混合饮料出了毛病，最后我误服了安眠药，睡得人事不知。花匠发现我睡着在草坪上，但喝了两瓶我自制的特殊牛奶后，我很快就恢复了。遗憾的是，那时邻居们都已经和平时一样，吃完天天吃腻了的玉米片离家上班去了，而引导他们进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也被正式取消了。

上述事件后我开始出去疯狂购物，在麻醉剂的影响之下我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服用安非他明后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而在商店里我保证能得到全神贯注的接待。没有哪个店主会叫你滚蛋，上别处去花钱。我停下买东西简直不可能。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买什么都行。鞋子、钢笔、水果、颜料、熟肉，什么都行，我发疯似的进这家店出那家店，不停地买呀说呀，提着雨伞。木制品、毯子、蔬菜、钻头、书籍、衣服，沿着高货一家家走下来，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当东西多得根本没法拿时，我就让一个友好的店主给我把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但往往会忘记自己存在了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在买一盒香烟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五个装满了新买的袋子的袋子。我根本不记得买过这些东西。又一天，我走进一家殡仪馆，说：

“嘿，现在还没有人死，但是我需要安排自己的葬礼。”花钱买下了他们现有的最昂贵的棺材。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我是这样孤独，需要和不管什么人说话，不管什么事情，甚至说说自己的死亡。一天下午在理发店里，人家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等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对我说他那天上午已经给我理过发了。“我只不过要在头顶上再剪那么两下！我还会付

钱的。”我答道，觉得自己干了什傻事。剪了两下以后我付了钱，那高兴异常的理发师大声对我说：“随时欢迎再来。今天我们一直升到六点钟！”英国和德国进行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我到文布利去看那场足球比赛，但是我把一种强力的合成致幻药麦角酸二乙胺和安非他明混合使用，结果达称得以为英国2：4踢输了。在我们离开体育场时，我不断安慰英国球迷们，说：“别难过。比赛踢得不错。”他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我。直到后来在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时才发现杰夫·赫斯特是我们这边的。

在后来的一两年里，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我生活在一片紫红色的雾霭之中。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仲夏时节。甲壳虫乐队正在反思，他们的总管布赖恩·爱泼斯坦刚刚去世。在“爱情与和平”运动的浪潮下，我自己的友好亲善时代开始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熟睡后，我接到了上帝本人打来的终极电话，不是从电话机上接到的，而是直通我被毒品麻醉得糊里糊涂的大脑的热线。起初有很多杂音，于是我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听得清楚一点。毒品开始生效时电话重新接通了。上帝在电话的那一头。“哎呀，上帝你好，”我说，“你怎么样？这简直太荣幸了。”“别说话，”上帝极其权威地说道，“仔细听着，像罗宾汉那样向穷人施舍。在你抢提包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施舍过一分钱，因此你被逮住了。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我将使你不再遇到麻烦。你有的只会是好运，我的孩子！”他说了“我的孩子”吗？我惊得目瞪口呆。是的，他说了。他在告诉我我是耶稣！现在卡米拉和邻居们可能会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了，至少她的神甫会尊敬我了。我跪在地上，接受了指令，要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证明我对（圣经）里那伙人的忠诚。我不像亚伯拉罕有儿子，那就得是我的女儿了。我走进特莎的卧室。她睡得很熟。我吻了吻她的头，然后闭上眼睛，站在她面前，把汽车钥匙放在了她身边，宣告说：“我将走到穷人那里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拿着装满现金的大口袋离家时，听见上帝用伦敦东部的口音这样说道。两条街以外，我正走过一个电话亭时上帝又说话了：“不用走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坐出租车吧！”我宽下心来，因为即便是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走到尤斯顿也是够远的。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尤斯顿火车站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月台布道”。在圣洁的毒品的过度驱使下我开始寻找穷人。尤斯顿周围地区通常总是有许多流浪者，街边的每一条长凳上都有人躺在那里。太妙了！我审视着我的羊群，心里在想。我的第一个受益者是一个很老的波兰老头和他六十岁的女儿。他身体虚弱，佝偻着腰，白头发很长。那女人个子很小，穿一件男人的大衣，长得在她身后拖着。这贫困、衰老的父女俩已经流落街头很多年了，睡在商店的门道里，吃的是我们这个关心人的社会扔在垃圾箱里的剩饭剩菜。这两个波兰移民并不是酒鬼，只是两个孤独衰弱的老人。在天国的药丸的支持下我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上帝派我来给你们食物，跟我来。”我说着把他们带向一家早开的小餐馆。他们在后面走得很慢，那个小老太太不断绊在过长的大衣上。这样蜗牛般的速度怎么行呢，我于是抱起她扛在肩膀上进了餐馆。这把他们俩吓坏了，但有不要钱的食物，他们便勇敢地坚持和这个吸毒吸得晕乎乎的恩人在一起。在排队等候服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早起的工人中显得很特别，但在他们吃着两个鸡蛋、两根香肠的大份量早餐时，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些工人之中上演一个奇迹。餐馆的收音机上播放甲壳虫乐队的《你只需要爱》时轮到我们的了。“想吃什么就叫什么。”我说，一面往我们的托盘上放了三杯茶。但是我的波兰朋友并没有叫丰盛的英国式早餐来塞饱肚子，他们怕叫得太多会滥用了他们了不起的主人的好意，每人只要了一个硬蛋糕。当我们等着付款的时候，老头内疚地伸出一只小脏手，又拿了一块硬蛋糕。“每人一块半，行吗？”他紧张地低声说道。啊，见鬼！我在毒品影响下的感情再也受不了啦，我把钱塞在他们口袋里，跑到了大街上。“好好买一顿饭吃！”我在门口喊叫道。来到外面，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非常气愤，开始大叫起来：“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穷？为什么他们没有该死的家？”我继续着上帝的事业，跑到能够看见的每一个流浪者面前把钱给他们，但每次都保证自己动作很快，免得又卷进另一个使人伤心的故事中去。许多没有醒来的穷困潦倒的人，我把钱塞进他们的口袋里，由他们去睡掉宿醉。

许多个小时以后钱给完了，我就给伦敦最大的团伙头子之一打了个电话。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但是我不在乎在对谁说话，冲着电话大喊道：“米克，赶快过来，带点钱救济穷人！”“滚蛋，你这个臭胚！你敢再给我打电话我把你的手指头剁了！”他生气地说，一面啪地放下了电话。感谢上帝我没有他的地址，不然我还真可能到他家去，被他剁掉什么东西。

既然施洗礼者米克不肯和我合作，我别无选择，只有等银行开门。哪家银行都行，我在所有的银行都存了钱。这时我觉得身上冷了起来，很想在暖和的餐馆里喝上一杯茶。我把金表作抵押，向一个旅馆的行李工借了几英镑应急。后来我兑换了一张支票，居然奇迹般地还记得赎回金表后再去继续上帝交给我的工作。离开旅馆时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刚才给过她钱的女人向车

站的小餐馆奔去，我追上了她，往她手里塞了更多的钱，大声说：“你一定是饿坏了，宝贝，再给你点！”我错了。她不是刚才那个流浪的女人，她只是个普通的过路人，她用吃惊的北方口音回答道：“不，我只是要误火车了！”她被我的行为吓坏了，跑得更加快了。

由于我分不清流浪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就随手把钱给所有的人，很快便引起了铁路警察的注意。当一个车站的巡警来质问我的时候，我马上就消失在地铁里，坐车回到托特里奇家中。在地铁火车上我吞服了剂量很大的安眠药，险些走不到家就瘫了下来，这回运气算好的。有很多次我就没能到家，路易莎或劳拉上学时发现我睡着在前院里。进屋时，卡米拉向我尖叫着说：“我需要更多的家用钱！”我生气地冲上楼到书房去，喊道：“你以为我们是用钱造成的吗？”她从锁着的门外和我争吵，但是太晚了，我得到了宁静。安眠药起作用了。你没法和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争吵。

做完了慈善之举，关上了收音机，我在书房的地板上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在这段宗教时期过去以后，我又一次渴望刺激，寻找那终极的兴奋和快感。我最近的吸毒引起的幻想是成为世界上最快的驾车手。安他明使这一切变得痴迷，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想高速行驶的汽车。和通常一样，除非我能够将这念头赶出去，否则别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和高热公司的司机史蒂夫·拉德一直很要好。他比我小两岁，但对什么事都感兴趣，对汽车非常精通。每个月末他都给我调那辆微型红色跑车的发动机。史蒂夫有一辆比较旧的汽车，我们经常车少的乡村大道上赛车玩。他车开得飞快，这使我很不痛快，我总想什么都比别人强，就向他挑战，进行一场终极车赛。为了保证两个车子谁也不占便宜，我买了一辆一模一样的微型路车，颜色是蓝的。我对史蒂夫说，如果他赢了，可以保留两辆车中他选中的那一辆。

我们一起计划好，要在天刚亮保证路上没有车辆时，沿着乡村大道进行五英里的比赛。终点线是一座窄桥的另一端，因为那桥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所以先上桥的车就自动成为赢家。比赛前的两整天我一直睡觉，在开始比赛前两个小时让路易莎叫醒我，我好吞下一个能在吞服后仍旧活着的最大剂量的安非他明。我离家时外面还很黑，路易莎祝我好运气，给了我一束她从我们花园边上采来的野花。在起赛线上，我亢奋得你都能够听见我的心跳。而穿着一件印度或背心的史蒂夫却一到完全轻松的样子，微笑着，唱着《朋友，那才是难忘的日子》。

比赛开始了。不久我们就像两个疯子一样，把汽车开得时速高达八十英里，车身不时互相碰撞。当接近那座桥时，我们的汽车仍在齐头并进，这就意味着不是我们中的一个气馁，就是两人全都撞在石墙上。这是一场为吓倒对方而相互威胁挑战的比赛，谁是胆小鬼谁输。

史蒂夫看着我笑了笑。我也报以一笑。他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他加速。我踩闸，车子一偏滑下马路到了地里。史蒂夫赢了，而我有的只是稍稍撞扁了一点的汽车和被摔得粉碎的自负心理。我看了一眼旁边座位上路易莎的花束，哭了起来。我看着史蒂夫从桥上走回来，又吞下了更多的药丸来安慰自己。吸毒后我总是变得十分感情用事，我把药丸往地上一扔，尖声叫道：“你全力以赴。可是我甚至用了这些该死的兴奋剂，但还是害怕了！”史蒂夫拿起药瓶，一只胳膊搂着我，对我说：“让我来教你怎么就能不害怕。咱们一起到布赖顿的悬崖上去开车吧！扔掉这些愚蠢的药丸，你就永远也不会害怕了。谁也不需要身体里有这种玩意！”我们约定下一个周末见面，便分手了。他笑吟吟地开着新得的蓝色汽车走了。

现在兴奋剂开始改变了我整个的性格。我的行为是如此疯狂，别人感到越来越难以接近我，甚至包括艾伦。他发现我在他的客厅里吸毒，非常不高兴。那个星期六和艾伦共进晚餐时气氛很沉重，艾伦讲着马丁·路德·金最近在孟菲斯被暗杀的事情。“这是人类的悲剧，”他说，“你看，生命是多么短暂。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你为什么需要服用那些垃圾？”

“我他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挑衅地喊道，一面当着他的面又吞下了更多的药丸。以前我对艾伦一直态度很好，而现在却高声叫骂，让他少管闲事。他母亲醒来听到了吵闹声，就到客厅里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告诉你儿子少管别人的闲事。”我大叫着从他们身边冲了出去。

“我得走了。明天我还要到悬崖上去开车呢！”现在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弹钢琴的晚上完全不同了。兴奋剂确保了这种变化。

我驱车去到海边时，发誓再也不见艾伦了。史蒂夫开的是我们专门为从山顶坠落而买的一辆旧车。他卸下了车门，这样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跳下车来。我们打算开过悬崖，在最后一刻车子实际上已在半空中时纵身跳下。最为重要的是我保证了，做这一切时不服用兴奋剂。

我在布赖顿城外靠近七姐妹峰的山崖上和史蒂夫会合时，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只能活上两次。”他开玩笑道，指的是最新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当我们俩头戴防撞头盔，一切都准备

好了以后，我开着车穿过长满青草的山坡朝悬崖驶去，尽量不让史蒂夫看到我的恐惧。当汽车蹿过崖边时，史蒂夫抓住我的胳膊喊道：“等一等，我们还很安全！”几秒钟后他把我推出了车子。我茫然四顾，但是史蒂夫还在车里开怀大笑。就在汽车垂直坠落前一刹那他安全地跳了下来。汽车在山崖下的岩石上轰地一声爆炸了。我躺在地上，震惊得瘫在那儿，望着史蒂夫向我的方向爬上来，他的头微微流着血。“你没用兴奋剂就成功了！”他高喊道，我们都躺在草地上，他用胳膊搂着我。他兴奋之极，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不断大笑、开玩笑。他留了两个姑娘在那家旅馆里，等着和我们一起庆祝呢。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又喝了许多酒，然后各自回房间去。“这很容易！你要干什么事情用不着再吸毒了！”他大笑着走出了电梯。我已经醉得可以了，对性发生不了兴趣，便没有理会我房间里床上半裸的姑娘，径直走进了洗澡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哭了，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瓶药丸。我撒了谎。和平时一样，我用了兴奋剂。我是个痛君子。我用药瓶把镜子砸得粉碎。

史蒂夫和我都是狂人，惟一的差别是他不借助于兴奋剂。他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替身绝技演员，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他创的记录是开车穿过最长的火洞。他穿了过去，破了记录，但是他为了获得加倍的荣誉，又回过头来再穿一次，开到一半时汽车爆炸成一团火球。他死去了，和活着时一样，没有恐惧，没有毒品。

而在此期间，尽管特里是个狡猾的杂种，却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或佩服他，或鄙视他，完全取决于当时兴奋剂在我身上的作用。我生活在如此朦胧的世界里，很快就把他们想敲诈艾伦的事给忘了，对我来说，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一天上午，特里来电话请我到他家去和团伙头子雷吉·克雷一起吃菜点。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是和他的李生兄弟龙尼打交道，但是我不顾危险，同意去。我采取的推一防护措施就是写了一张条子，放进信封里封好。条子上说我在斯坦莫尔的艾尔默大道和雷吉·克雷及特里·马文一起吃茶点。我把信交给了送我到那儿的出租车司机，严格地嘱咐他等在外面，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我没有出来，就把信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我没有理由要去，特里也没有理由请我，一切都是他的团伙情结在作怪。三个人中惟一清醒的是克雷先生，他从特里那里获得大笔现金，这是特里的报答，因为他在特里制造自己的阿尔·卡彭式的幻想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为了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世界中的一个部分，特里给了克雷兄弟大量的金钱。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他给龙尼一万英镑，今天准得是二十万英镑。在到特里家去的路上，我用了双份剂量的安非他明以获得勇气，到特里家的时候已经是飘飘然了。

雷吉一面呷着茶一面讲他最得意的一个故事。一只螃蟹欺骗了蝎子，结果是在蝎子报仇中死去。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警告我，如果我再敢欺骗他们或特里，我就会像那只螃蟹一样被蜇上一口。在整个讲故事的过程中，特里和往常一样带着伤感的笑容坐在那里。雷吉的隐蔽警告旨在使我感到害怕，但是我在亢奋迷糊的状态下，只觉得挺好玩。我在飘飘然中对这个故事的理 解和一个五岁孩子的理解一样，对危险浑然不知，就像一个婴儿不知道火的危险。伦敦最狠毒的匪徒在郑重其事地威胁我，可我却回答说：“这个故事真好！你还有别的关于动物的故事吗？”“听雷吉讲”代替了“听妈妈讲”。动物故事没有能够吓唬住我，特里生起气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怒冲冲地问：“你感觉这个怎么样？”我以为这是雷吉的动物故事的延续，现在到进行答问的时候了。在枪顶着我的鼻子的情况下，我停下来，翻翻眼睛，搜寻正确的答案。“怎么样？”嘴里嚷道，“感觉如何？”“等一等，别告诉我，再给我一分钟，让我猜猜看。给我的脑门上上来两个冰冷的圈圈。”我松开了枪的保险栓，说：“也许这会使我感觉不一样，更危险。”特里颤抖着，枪掉在地上，在地板上走火炸响了。“太幸运了。”我大笑道。这时雷吉已经受够了这种智力低下的成人幻想游戏，他只想收取他的娱乐费，然后回家找龙尼。“对不起，我和这位先生有点私事。”他朝特里点点头说。我离开时因吸毒而迷迷糊糊，但是非常高兴，一边还在想着那枪口下答问的答案。

一个星期后，我在特里的办公室又遇见了雷吉·克雷。他看见我在吞药丸，私下把我拉到一边，给我上了一生中最奇怪的一课。“那些兴奋剂会杀了你的。它们毒害极大，”雷吉说，“听着，孩子，我们向来只伤害我们一类的人，不伤害天真的少年。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龙尼从来不碰毒品。毒品对我们来说太恶毒了。你去找人帮助吧。”我惊奇极了。现在我受到了伦敦最危险的团伙头子的指导。雷吉·克雷的道德标准比我认识的许多别的人要高。这个人其实还关心社会。当我在五月份读到克雷兄弟被捕的消息时，还真有点糊涂了，心想，他们真那么坏吗？然而他们被捕后特里经济上大大受益，因为他不需再付给尤尼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了。

同是在这段时期里，我到了面对家庭中的现实的时候了，这使我感到很难过。卡米拉心里只想到一所清洁的房子，或者是上教堂。她和我说话时就好像我是个陌生人，而当她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睛似乎在说：“啊，上帝。我怎么会和这么个废物播在了一起？祈求上帝他今晚

上不想做爱！”我伤心之极，常常大叫：“我是什么？就他妈的是个赚钱机器吗？要是我没有钱，你和你该死的妹妹们马上就会离开的！”

我常常从窗口看着特莎和卡罗琳在街上玩。卡罗琳和特莎同龄，她家和我家隔几个门。偶尔我看见卡米拉和邻居们一起笑。为什么她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从窗帘后面张望时心里在奇怪。我惟一能够得到的平静是我睡着了的时候。我常常在几夜兴奋剂的亢奋后一连睡上两整天。如果有人在我睡觉的阶段来电话，卡米拉就会干脆地说：“过两天等他醒了再来电话吧。”我锁在自己的屋子里，路易莎、劳拉、约瑟菲娜和特莎照玩不误，在如此大剂量的镇静剂的作用下，什么也吵不醒我。我不是仅仅在睡觉，而是仿佛死了一样。我的头顶上终回笼罩着愁云，因此也只能看见世上的伤心事。那年六月当博比·肯尼迪被枪杀后，我回想起他哥哥杰克被暗杀时我是多么难过。什么都没有变，看来似乎只有吸毒能给我继续活下去的意志。

我醒着的时候总是火气很大，没法相处，不断和卡米拉吵架。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要在休息室里搭一个游戏房。我已经连续干了好几天了，在花园里锯木头，敲敲打打。第三天，大约午夜时分，一个邻居穿着睡衣来了，大叫说这该死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觉。我已经答应了特莎周末就可以做好，而且决心要做完，就到休息室里继续锯木头。卡米拉这时醒了，走下楼来。看见昂贵的地毯上满是锯末，就大发脾气，逼我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她用吸尘器吸地毯的时候，又重新大吵了起来。吵得把孩子们吓坏了，跑到一个邻居家里呆了一整天，我们则继续吵架。

我从来没有打过卡米拉，但是为了使她不再尖叫，我总是打碎房子前面的玻璃窗。所有邻居都能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使她吃惊得闭上了嘴。这是保证能得到和平的良方，它发生得如此经常，当地的玻璃匠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省时间的办法。他们量好了每一扇窗子，编上号，这样我打电话时只要说：“今天是六号。”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一周甚至要来四次。“啊，又是二号。这星期不错呀。”玻璃匠常常在电话上开玩笑。

在暴风雨中也有奇怪的间歇，那是我们做爱时的平静的晚上。在这样的一次平静后九个月，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安东尼娜出世了。当卡米拉的身孕明显后，一切变得有了点人情味，甚至邻居有时也问我妻子怎样了。安东尼娜出生的那天，我带五岁的特莎到产院去看她的新妹妹，特莎激动极了。母女俩看上去极美，但是卡米拉的表情使我感到她甚至不愿让我抱婴儿。那天下午，两个女邻居在我家的车道上向我跑来，问道：“怎么样？”“是个小女儿。”我答道。她们转过脸互相看着，说：“我们明天得去看卡米拉。”然后也不向我道别就走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医院来送信的门房，好像我和婴儿毫无关系，也无所归属。

可悲的是，这是事实。我透过兴奋剂的云雾来看世界，我确实无所归属。

安东尼娜出生的时候，随着我的毒瘤越来越大，我已是一只活药瓶了。我从来不和她在一起，也不再和特莎玩了。可怜的安东尼娜连她姐姐都不如，她姐姐至少还有短短的几年看见过一个吸毒成瘾的爸爸，可安东尼娜根本就没有爸爸。

没有哪个孩子该有一个这么坏、毒瘤这么大的爸爸。

安东尼娜出生后头几个星期，家里的情况稍好一点，但很快争吵又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读到约翰·列依和辛西娜要离婚的消息时，我心里想，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谣传就连甲壳虫乐队也要解散了。报纸上惟一正面的消息是杰姬·肯尼迪嫁给了奥纳西斯，但就连这似乎也显得快了一点。

我的父母开始每个星期日下午来我家，但多数时候我在楼上睡觉。有一天我醒来时听见楼下有叫喊声。我母亲建议卡米拉改信犹太教。我父亲对挂在我们厅里的耶稣十字架表示了不满。喧闹声不断，但是等到我的药丸起作用使我清醒过来、终于罐盼着走下楼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走了。卡米拉在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表示永远禁止他们来我家或看孩子们。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太遗憾了，因为我父亲确实爱来看孩子们，也许他现在意识到他过去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孩子。为了他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是不像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对妻子的决定提出异议，我只是用了更多的兴奋剂，砸碎了一扇玻璃窗，离家而去。到这时我们的婚姻已是一场闹剧，家只是我睡觉和存放毒品的场所。

父亲在赌博中把钱输得精光。他还有房子，但这就是他仅有的一切了。我父母惟一的收入是出租旧店的微薄租金和我每周给他们的二十五英镑。我一直都骗他们，说钱是特里给我父亲的，为的是不让他开一个公司去和特里竞争。这是个谁也不会相信的荒唐故事，但是这使他免于需要向我表示感谢。我利用我古老的准则，我是在拿钱买我父母的爱。即使是瘾君子也希望他们的父母关爱他们。有一天我爸爸和我吵了起来，我在火头上，而且毒性大发，就尖叫着说：“那该死的钱是我给你们的。现在是个抢提包的贼在供养你们两个乡巴佬呢。”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对他们是又爱又恨。

就在我对父亲发脾气后一个星期，我送父亲到了医院，当医生告诉我癌已在他全身扩散后，我几乎崩溃了。卡米拉听到他的病情时却无动于衷，仍拒不同意让他看看孩子们。“我爸快死了，你这个臭婆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嚷道。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她坚决不肯和解。那天上午我坐在楼梯台阶上，为这个无法解决的局面伤心大哭。“滚蛋，你个婊子，”我喊道，“把你该死的妹妹全带走！”我爱过的这个女人如此冷酷漠然地对待我得了癌症的父亲，现在我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受不了。我伤心至极，失去了理智，逼着卡米拉和孩子们当场搬到附近一家旅馆去住。我开车送她们去旅馆时歇斯底里地大叫：“该死的钱！从头到尾你们这些杂种要的就是我的钱！”在一阵大怒下我把几千英镑扔到了车窗外。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去找扔掉的钱，但是已经没有了。对于一些那天下午在托特里奇附近走过的人，那是个幸运日。

我开始蔑视金钱，终于认识到了它带给我的只有虚伪。

第二个独自一家的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尼克松庆祝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面前是两个带着毒品搜查证的警察。用不着有爱因斯坦的脑子就能知道是谁告的密。我顿时慌了，想着楼上还有几百瓶安非他明呢，法院决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供我个人服用的！我会被指控为贩毒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警察只拿到了一个大瓶子的毒品，相信这就是我的全部所有。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指控我拥有毒品，取保释放，等待下个星期出庭。

回到家里以后我冲上楼准备去拿掉所有别的毒品瓶子，生怕警察再度搜查。我打开放毒品的柜子，惊恐地发现里面只剩下了——一瓶。我发疯般搜遍了所有藏放的地方，包括阁楼上，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必再害怕警察会找到更多的毒品了。已经没有了！

我整整吞掉了那么一大堆该死的药丸！整个一船货，足够十年的供应量，不到五年就光了。

现在真到了恐慌的地步了。我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不是被警察指控，不是老婆和孩子在旅馆里，也不是身患癌症即将死去的父亲。我的问题要大得多！我没有兴奋剂了！我得找到新的来源，可是到哪儿去我呢？一开始我找了六个私人医生给我开安非他明的方子，可是这比起我对毒品的可怕渴求来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总是没有足够的毒品，绝望之下我撬开了当地的一家药店，这至少暂时提高了我的储存量。我得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于是开始制定我的终极计划——武装抢劫，但目的不是钱。我的想法是去武装抢劫一家制药公司。这回将是“安非他明大劫案”，一麻袋一麻袋的毒品装上军用卡车。对于像我这样的痛君子，这是个终极梦——弄到足够一生享用的药丸。储存着大批毒品所给予我的安全感就和别人看着自己的银行存单时的感觉一样。感谢上帝这次“安非他明大劫案”始终没有离开设计图板。

后一个星期我惊异地在巴尼特法院门外看见了父亲，在我为钱的事辱骂他以后，他还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次我是初犯，罚款了事。

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抑郁。有一天玻璃匠给我来了个电话，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好，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接到我的电话了。“我们都还行，”我说，“我妻子出去度假了。”“啊，怪不得呢。”他答道。那天下午，我完全失去理智地吸完毒接着就喝起酒来。酒精和毒品一向是双料毒药，这一点在那天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砸碎了房子前面的每一扇窗子。我拿起电话，对着玻璃匠狂呼道：“成啦！全家福！从第一到第十六号一块不拉！”几分钟后警察到了。“闯入者，该死的无赖们！他们都跑了。”我微笑着对警察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离开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还在哭着，玻璃店的老板亲自来给换玻璃，并且对我表示同情安慰。他是个工匠加治疗家。

几星期后我允许卡米拉和孩子们回家来了，但现在情况有了不同。我终于接受了她对我毫无感情这个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为了孩子们我仍想再努把力。我第一次开始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并且减少了吸毒量，晚上也不再外出，尽力作出最好的表现。我甚至不用书房，我们把它变成了约瑟菲娜的卧室。我相信这会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两个月后出现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吵得更凶了，该死的玻璃匠简直就像住在我们家一样。卡米拉的妹妹向来站在她的一边，现在几乎不和我说话了。为了防止吵架，我开始在楼下长沙发上睡觉，但是多数晚上当叫喊声上升到如雷灌耳的程度时，我就去睡在停在当地停车场的美洲虎里。

就这样，家里的生活又继续了几周，直到在砸玻璃的间歇中特里又来了电话。他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的青春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这一回他要我陪他到曼彻斯特去两个星期。“你要是陪我去我给你三百英镑。”他说。我想到这可以摆脱家庭战争，就同意了。除了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之外，他究竟为什么到那里去我并不知道，只知道特里想多见比莉·怀特洛，一个正在曼彻斯特拍电影的女演员。他迷恋上了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她在关于克雷兄弟生平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他们的母亲。在我眼中，特里这种痴迷的浪漫显得很可

笑。他干这种事年纪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四十五岁的人不会再迷恋上什么人了。

第二天早晨，他开着他那辆蓝色的罗尔斯·罗伊斯来接我，把我介绍给一起去的约翰·布莱克。约翰是一个拳击大出资人手下的末流拳击手。我眼足了毒品，坐在后座上着迷般地听他们谈到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贾维斯·阿斯塔尔、杰克·所罗门斯、米基·达夫等等。“现在是我们的的大好时机。”特里吹嘘道。“和谁？和穆罕默德·阿里吗？”我笑问道。“不，和杰克·康特尔民”他骄傲地答道。那个时候，杰克·康特尔还是个无名之辈，在利物浦之外比赛，但是在短短几年中他将会成为世界轻量级的冠军。“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一个世界冠军，然后让他输掉一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从这儿到拉斯维加斯的每一个收赌注的经纪人打得落花流水！”特里大声说道，他又进入了他每天的幻想世界。对这场谈话一无所知的杰克·康特尔最早是在特里的经济控制之下进入伦敦的。但一如既往，就在杰克成为世界冠军的前夕，在某些有势力人物的压力之下，特里放弃了一切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真正的阿尔·卡彭不同，亲爱的特里在这种压力下总是屈服的。

在曼彻斯特我们住进了皮卡迪利最好的旅馆，什么也不干，只要整天坐着听特里讲他的越来越长的狂想。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不断打电话让服务员送来更多的东西。没有女人，只有酒和特里——当他没有出去追寻比莉·怀特清的时候。

正是在曼彻斯特两周的平静生活中我最终接受了多年以来就看到了的现实。使婚姻继续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怀着混杂着悲哀和解脱的心情，我决定结束它。回到伦敦，特里把我送到家门口时，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知道一切就要结束了。我终日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宠爱着我的孩子，仍然爱着卡米拉，可是现在我要从战场上鞠躬退出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但仍决定第二天离开。我心情十分忧郁，为了保证我的最后一夜能平静地过去，我加大了安眠药的剂量。

第二天上午，我到特里的办公室去取陪他到曼彻斯特的钱，在那儿遇见了特尔玛，我们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她喜欢玩乐，我们偶尔晚上在俱乐部见面。特尔玛建议一起喝点什么。那天晚上她的同屋琼陪她一起来了，琼是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特尔玛给我们做了介绍，笑着说：“小心点这个人，琼，他是个疯子。”琼的温暖、友善的微笑立刻吸引住了我，当她们离开俱乐部时，我跟在后面到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车是哪儿来的？”他仍不放松。“从汽车库来的呀。”我回答。他气极了，问我：“你拿什么钱付的？”“拿英镑的钞票，前辈。”每一次去，我们的不太友好的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至少他们有诚实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看见电视上播放着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琼的父亲开玩笑地这样说。“对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尼尔·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上下来时骄傲地说道。“下个星期我上去，这次太空船已经满了。”我答道，继续逗着琼的不知所措的父亲。

不久，琼和我搬进了哈罗兹公司后面的那套小公寓。我整天在骑士桥附近闲晃，尽管我仍在吸毒，却令人惊异地安定了下来。我重又开始和艾伦见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爱着我，并且又一次原谅了我。我们恢复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的活动，就连他的过了一百岁的母亲

也说我看起来好多了。现在我从来不向他要钱了，但偶尔艾伦还是给我昂贵的礼物。当我不和特里接触的时候，我把艾伦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生活就像这样继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有一个老朋友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有笔买卖给我做，让我给法兰克福一个号码去电话。我打了电话，一个美国人让我飞到德国去谈一谈。第二天一早我搭机去了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漂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帮精明圆滑的家伙，他们让我参加进去。我不知道参加的是是什么，但听起来很令人激动，在他们表示要给我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我同意周后开始干。

但是我先得回伦敦，把父亲送到医院去等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我送他进去。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他毕竟是我爸爸，而我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帮不了忙。我不得不接受他即将死去的现实，过去吸毒能够掩盖我的痛苦，现在他患癌症所给予我的悲伤却穿透了这保护层。人类可以在月球上行走，却无法治愈癌症。

从法兰克福回来以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爸爸嗜赌如命，直到最后还每天在当地的赌赛马的经纪入那儿押点小赌注。当年和特里·萨瓦拉斯一起在“克岁克福兹”豪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了过去。他甘心拿最后几英镑去冒险，他的赌瘾和我的毒瘤一样毫无好转。他一生中每天要吸八十支烟，现在正在把最后的赌注输给肺癌。当癌细胞要致他死命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肥胖的上身已经耗子了，腿肿得像树干。为了压下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时的悲伤，我增加了安非他明的用量，到医院时快活亢奋得你会以为我们的彩票中了奖。每次看完他出来独自在汽车里时我总是忍不住大哭。有一天，我心里想，如果他很快就要死去，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药丸让他快乐地走呢？感谢上帝这只不过是想想而已。看到他因为癌症吃这么多药片，我们一起吃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一体感，我们俩都是为了减轻各自的痛苦。有天上我心里特别难过，就吃了几片他的止痛片，结果感到非常好，给了我一种新的兴奋的快感。后来我每天去看他都要偷吃一两片。

作为共济会的会员，爸爸仍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报喜节晚会。他的努力一向都得到了会员的感谢，他们给了他从童年时起就渴求得到的承认。他内心的空虚使得他落到了嗜赌一生的下场。那年的报喜节晚餐是他的最后一次了，那天过后，他干脆放弃了求生的痛苦挣扎。爸爸生命的轮盘赌之轮在上帝高喊“一切都不再存在”的时候停止了转动。

报喜节晚餐后的第二天，我和父亲开车去医院。到医院后我们停好车，从巨大的转门走了进去。他的病房在三层，我们要在拥挤的走廊里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电梯那儿。爸爸的腿肿得简直站不住，每走一步我都怕它们会像气球那样爆裂开来。我提出去给他找一辆轮椅，但他转向我，笑了，并且说：“儿子，我们要一起走完这段路，就我们俩。”他紧握着我的手，我们一寸一寸往前蹭。五十码的路走了二十分钟，但在我浸透了兴奋剂的大脑中，我感到自己像个被爸爸牵着手的小男孩，仿佛他正领我到公园去。这是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和不治之癌症才使我们这样接近起来。

身边不断有别的病人、护士和医生匆匆走过，我更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爸，多妙的散步，多可爱的天气！”他一心集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往前走，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一位勤杂工过来访他坐轮椅。“滚蛋！是我爸正领着我散步呢。难道你连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吗！”我嚷道。过了仿佛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电梯前，他按下按钮，说：“我们成功了，儿子。”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电梯门在三层打开时，一个护士推着另一辆轮椅正等着呢。我把她推到一旁，叫嚷道：“我爸爸不需要这。我们还没有散完步呢。”我们试图往前走，但是他绊了一下，两个护士把他扶送轮椅，推进了病房。

我哭着冲进厕所，用半瓶白兰地送下了更多的药丸，好让自己镇静下来和他诀别。我有这么多的话要告诉爸爸。但伤心的是，当我走近躺在那张床上即将咽气的他时，我的话语全部瓦解了，多年来我想说的一切这时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躺在那儿，我看着他，能够看见他眼睛里映现出的我。

这是很怪的事。我觉得自己又是个孩子了——一个孤独透顶的孩子！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能够说出来的只是；“我今天晚上到法兰克福去，爸。再见！”他手躺在床上，眼睛向上看着我，慢慢摇了摇头，前南道：“不，儿子，你不会见到我了。规规矩矩过日子！”他的意思是要我别惹乱子。我耸了耸肩，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吧，爸爸。”然后就回过身子走了。

我手控电梯按钮时仍能看见他躺在床上，我非常想回去对他说：“爸，我爱你！”也许我也能听见他说出我毕生都渴望听到的话：“儿子，我爱你。”电梯来了，当我站在那里望着父亲时，门关上了，电梯开了下去。我又接了按钮，眼睛仍在看着床上的父亲。电梯又来了。一切都太晚了，我辛酸地想道。这一切二十年前就该说了，而不是现在！这一次，电梯载着我下

到楼下。

两小时后我已经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哭，直到睡着。我多么希望我没有乘上电梯下楼去啊。对不起，爸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很痛，但在服用了晨间的安非他明后就去看那美国老板。对他来说，像对其他许多没有意识到我吸毒的人一样，我只是显得有些亢奋激动而已。他招呼了我一声：“喂，斯蒂芬！”我就开始工作了。奇怪的设备，我心里在想，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几星期前的面谈经过是这样的：“这么说你是特里的朋友了。你三个星期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连我的姓都不知道。老板转向他的同事问道：“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派到哪儿去？”不久我就上了去柏林的飞机，除了知道一周工资二百英镑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到柏林后，另一个说话圆滑的美国人在机场接我。他让我住进了一家高级旅馆。“想要什么尽管要，包括女人。记在我们的账上。”他微笑着说。三天里我除了吃喝和玩德国女人，什么事情也没干。三天后我的美国朋友来电话说：“你要到科隆夫一趟。”在科隆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只有一样例外，我和新东道主一起去看的是女同性恋表演。从科隆又到汉堡。每晚都把我带到人人胳膊上都挎着个漂亮女人的豪华晚宴聚会中去。我问一个老板，我是否可以让女朋友从英国来这儿。他的回答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人，痛痛快快地玩就是了！’”第二天琼就到了，一夜之间就把模特地的工作给辞了。这种一切花费报销的生活一直继续到被召回法兰克福总部的那一天。原先那个老板正在看着一张世界英语国家的地图，看看可以把我派到哪里去，因为我不会说别的语言。我想问我们干的是什么买卖，但是忍住了，不愿丢掉这份工作。“马耳他，我了解马耳他。”我建议道。“好主意，”他答道，“和乔治一起去。”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大约三十八岁的伦敦人，说好了乔治开车把我和琼送到马耳他去。

我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打电话到办公室，我接过了话筒。她的问题是：“坏消息，斯蒂芬。爸爸今天早上去世了。”老板向我表示了慰问。“想请多久的假就请多久的假吧。以后再坐飞机去和乔治会会。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勇敢？我想道。真是可笑。我听任弟弟保罗看着将死的父亲。我因为童年时没有人在入睡前给我讲故事而惩罚父亲，让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咽气。

我们商量好和乔治在瓦莱塔的排尼基饭店见面，然后琼和我就飞回英国去了。琼回到她父母家中，我则去取在国外时停放在托特里奇宅子车库里的汽车。在大门口，我六岁的女儿特莎迎接我时说：“爷爷病了！”“在天堂了，亲爱的。”我阴沉地答道。特莎对我说她妈妈开着我的车出去了，但我很快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和朋友一起说笑的她。当我大声叫喊着说“把车钥匙给我。我爸爸刚刚去世了”时，整个酒吧一下子静了下来。“那又怎么样？”她冷冷地答道。我感到极其伤心，真想宰了她。

在父母家中我看见爸爸的棺材放在饭厅的桌子上。我痛苦万分，用了大量兴奋剂，结果一切都像在一部被夸张了的由我扮演主要送葬人的电影里的情节。我神志迷糊地竟然躺在了棺材盖上。服用了这样大量的安非他明，我无法理解父亲已经去世。过度亢奋又使我哭不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姐姐安妮特从瑞士回来了，我、两个弟弟、母亲，加上父亲的遗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安妮特坚持要打开棺盖，我们好看到并记住父亲。想到要看到他的遗体，我惊恐万分，跑进洗澡间好再去吞点药丸。母亲跟着我走了进来，求我道：“看你爸爸最后一眼，你用不着药丸。”她拥抱着我。“把药丸扔了，爸爸会希望你这样做的。”在短短的一刻里，有母亲搂着我，我感到了安全，就把所有的药丸全扔进了马桶里，然后下楼去看我死去的父亲。不久，当地的犹太教士来打开了棺材。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样子非常安详。他一切的痛苦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有赌注上的输赢了。

没有了兴奋剂，我很快就把自己锁在了一间卧室里，抱着一瓶白兰地喝得人事不知。第二天，我们把父亲埋葬在沃尔瑟姆大教堂犹太人公墓里，尔拉姆共济会分会的三十个成员全都向他致了最后的敬意。由于某种原因，爸爸的共济会分会给了他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不能给他的东西。当棺材慢慢落入坑里时，我抛下去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我真的爱你，你是我没有得到的唯一的爸爸。”当其他的送葬人离开了以后，我独自在父亲的新坟旁呆了一会儿，我哭着，感到他的灵魂随着劲风而去。后来在公墓吻别了母亲，我乘出租车直接到了机场，在那儿和琼会合。现在我决心不再吸毒，没带任何兴奋剂去了马耳他。我已经两天没吸毒了，对我来说这是个世界记录。

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一直在睡觉，在到斯利马的旅馆去的出租车上时也在睡。以后的两周中，我多数时间似睡非睡地呆在床上，在停用安非他明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下处于半迷糊状态。猛然停用安非他明改变了我，现在我只想吃和睡。这种倦怠的感觉延续了好几个星期，但随着

时间的过去而逐渐减轻。

在我老是睡觉的情况下，琼就在对面的海滩上消磨时间，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她浓妆艳抹，粘着长长的假睫毛，看上去总像是直接从时装杂志上下来样子。一个月过去了，乔治却仍然没有到，但是至少我已经清醒一点了，开始大胆到外面去。一天我去到伊莎贝拉三年前在那儿去世的吉拉德街。我感到难过，但这是一种正常的难过。没有了安非他明的影响，一切看上去是如此不同。尽管现在戒酒喝得很多，但现在我是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兴奋剂的扭曲下看马耳他。事实上，在我未喝醉的情况下，我已经开始注意到像大海和小渔船这样普通的事物，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人类之中。没有了和妻子的叔伯或堂表亲的深仇。没有毒品的影响，你并不希望有这样的战争。渐渐地我酒甚至也唱得少了，有时晚上上床前得意地对琼说，今天我只喝了一瓶白兰地。这仍然是饮酒过度，但比起过去的年份来，我的行为就像是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里的僧侣。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开始看报，惊奇地读到爱德华·希思在选举中获胜，现在是英国的首相了。

一个多星期后，乔治来了，解释说他在意大利和一个女人搞上了。我盘问他关于我们工作的事，但他只是说，只要不断寄钱给我，再等几天也不要紧。他需要放松，既然我熟悉马耳他，他就让我带他看着岛子。我留下琼去晒得更黑一点，便和乔治一起开始了长达八周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性恋医生、珠宝窃贼和其他戏剧性事件剥夺了我正常的青少年生活。我的生活像一列特快列车从青春期一直冲进了成年，经过生活中的各站时开得如此之快，我连看都没有能够看见。现在我第一次享受着纯真无邪的快乐，没有恶棍，没有威胁，没有尖叫的妻子，有的就是乔治、琼、阳光和白兰地。

我和乔治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见面，每天都是同样的活动。我们先在他旅馆的游泳池旁下棋，一直下到三点，然后沿瓦莱塔的主街走到一个酒吧去打三小时的台球。六点左右开始喝酒。我知道自己最后会喝醉，每天晚上都喝醉，但是头几杯慢慢喝不知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安全一点。打完台球后我们走遍马耳他，进出每一家不三不四的酒吧，和里面的每一个女人鬼混，而琼此时总是耐心地在旅馆房间里等着我，不断往脸上涂防晒霜。

一天晚上，我们发现自己一家四处不着边的酒吧里。这地方有点像个西班牙斗牛场，可以容纳大约一百个人。往下看去是一个像马戏团表演场地那样的小跳舞台。我们都已经相当醉了，隔着跳舞台在两处坐了下来，大笑着互相向对方喊叫。一切都显得十分怪异，一排排空着的座位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终于，一个传者出现了，但是给我们拿来了一揽白兰地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这地方一直静悄悄的，又过了约莫二十分钟，突然音乐声起，灯火通明，出现了一个姑娘，裙子短得在她走动时可以看见她穿的鲜红色灯光短裤。她绕场一周后坐了下来。不久，另一个姑娘出来了，坐在了相对的一边。第三、第四、第五个出现了，转眼间整个场地上满是姑娘，没有一个男人，只有向我微笑的年轻女人。最后领班上场，他解释说随便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一切都包括在服务费里了。我们脑子也就是清楚到能够问一声服务费到底是多少，但是他说不用担心，只管快活便是了。我们哪用再催，顷刻就到了场上，和大约十个姑娘交欢。在我们纵情快活之际，我注意到其他女人们都坐在一张张桌子旁，或聊天，或看书，就像这儿是个自动洗衣房似的。我站起身来，醉醺醺地叫道：“能不能请你们在我享受的时候闭上嘴！至少也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来！”很久以后我们俩全都人事不知地躺在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醒了过来。我向四周一看，意识到姑娘们全都离开了。我们俩还没有醒透呢，老板和几位大个子朋友就出现了，拿出了我们的账单。大吵一场后我们付了高得近于敲诈的一笔钱，但至少是囫圇着个儿离开了那里。显然那天晚上我们是惟一的客人，那些姑娘们是在我们到了以后专门从附近的村子里用车拉来的。

生活继续无忧无虑地过着，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人乘飞机来到了马耳他。“对不起，伙计们，我们要终止在马耳他的活动了，回法兰克福去吧。”他说。真可惜，我心想，要和三个月的快活日子告别，觉得很遗憾。我已经决定离开琼，便送她上了去伦敦的飞机。她太安静了，我已对她感到厌倦。此外，我很怀念伦敦的热闹生活。乔治和我驾车出发经过西西里和意大利本上回去。但在车里呆了一两天后我不耐烦了，就在米兰离开乔治乘飞机回法兰克福。我让乔治答应我如果琼打电话，就说我在澳大利亚给公司干活。老板付给了我欠我的几个星期的工资，祝我好运，并且说：“很遗憾你走了。”我常常奇怪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像乔治和我这样的人显然在某件大得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对他们有用。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某个地方在出大批的钱支付一切开支。

富裕、闲适、纵欲的生活结束了。我搭上下一次班机回到了伦敦。

我盼着回伦敦，但是到达希思罗机场后，空虚感却重重地压向了我。尽管我有很多钱，我却孤身一人，无处可去。不知为何父亲曾是个遥远的稳定因素，但是现在他生活在天上，离得更远了。如果有安非他明造成的幻觉状态，一切会显得很容易。现在，一个没有妻子、没有家、没有爸爸的未来就显得令人十分气馁。我坐出租车到了父母家，到的时候母亲刚刚下班。她找了个工作贴补家用。我姐姐住在国外，弟弟们上大学，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环顾自己长大的地方使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什么都和我小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就连父亲的衣服和领带都仍然挂在他原来挂的地方。坐在厨房里和妈妈一起喝茶时，我不断看墙上的钟，等着爸爸下班回来。

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好忘记自己的烦恼，但是第二天上午醒来时脑子里一片混乱。母亲已经上班，我独自一个人留在这所充满了记忆房子里，开始浑身发起抖来，想到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惊慌。我应不应该去看着特莎和安东尼娅？还是去看艾伦或者特里？我该他妈干些什么？我浑身冒汗，于是照例伸手去拿白兰地。

到上午九点我已经喝醉了，除了睡着的时间外，接着的一个月我一直就醉着。我无法面对现实，感到老是醉着要容易一些，可以逃避到童年中去。独自在家，我假装自己再度成了个不需作出任何决定的八岁孩童，我的醉醺醺的幻想变得非常真实。我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在想象中和儿时朋友谈话，随着喝下去的白兰地的增加，幻想也就变得更加真实。我一天比一天更痴狂。一天早晨我去找原来住在对门的小男孩埃里克，叫他出来一起玩。他的老妈妈满脸惶惑的样子，告诉我埃里克已经结婚，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住在一起。我给弄糊涂了，往她家后面的小巷跑去，丢下那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呆站在门口。我失去了控制，当我寻找着自己小时候当孩子头时的那群孩子时。幻想在我的脑子里变成了现实。我烧掉的那个幼儿园的院子没有了一了，变成了新的住宅，但是我们的空心老株树仍在那里。这是一棵巨大的陈树，小时候我们常常从中间空了的树干里爬到上面的树枝上去。二十年以后，身子也大了点，我被夹在了空树干里，但是最后还是挤了过去，爬上了树枝。我坐在树上的时候，从一所房子里出来了一个小男孩，抬头看着我。“你是埃里克吗？”我醉醺醺地问道。“不是，我叫博比。”他答道，“你在那上面干什么？”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妈妈就出来把他拉回到自己的花园里，骂他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和生人说话！”“埃里克，你在哪里？”我一面喊着，一面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里。

下午我假装父母都在家，悄悄走进他们的卧室问道：“今晚我可以在你们的床上睡觉吗？”“只要你不到那间淘气屋去。”想象中他们答道。这是一间在后面的小卧室，小时候我有一次曾发现妈妈和在家里干活的一个施工人员在里面接吻。

每天大约四点钟，母亲下班回家，我迎接她的时候总是说：“我没有到那间淘气屋去！”她觉得很奇怪，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好孩子。”但她为了抚慰我总是这样说。我使她感到害怕，不得不附和着我的游戏。每晚我们的规律都是一个样子的。我喝完一半牛奶兑一半白兰地的热饮料后于八点钟上床。妈妈在胁迫之下坐在我的床头，给我读新买来的各种各样罗宾汉故事书。她别无选择。如果她拒绝，我就会大怒。威胁说要烧房子。我终于把她放在了应在的位置上：给她那盖好被子平平安安睡在床上的小儿子入睡前读故事。没有了欺负人的姐姐或讨厌的弟弟们，这个精神错乱的二十六岁的大孩子终于获得了他母亲全心全意的关注。“我很高兴我把保姆维奥莱特给捅了。”我睡着前会这样说。“我恨她。做个好妈妈，我就不杀你。”

我童年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我感到特别幸福，直到一天晚上故事正念到一半，门铃响了起来。母亲把书给我让我先看着，她下楼去开门。我半睡半醒、醉醺醺地看着罗宾汉搂着使女玛丽安的图画。我正朦胧欲睡，突然惊恐地看见琼赫然站在床的另一头，扑闪着睫毛。“现在你来给他念吧。”母亲说，露出很高兴的样子走出了房间。“我是个小男孩，我不喜欢女孩子。”我藏在被单下大叫起来。不一会儿，我感到琼赤裸的身体躺在了我身边。“我知道小男孩喜欢什么。”她说着开始和我口交。我的罗宾汉故事书和童年插曲一起正式宣告终止。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怒火冲天，觉得已经去上班的母亲和琼背叛了我。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住在一所成人的房子里，在一条成人的街道上，我的爸爸已经死了。他不再会回家了。一整天我都闷闷不乐，什么都没有喝，专等着那两个该死的成年女人回家来。

那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她们俩都坐在红沙发上看电视，就像我母亲每晚一样。两个普通的人过着普通的生活。一切都是这样该死地正常。我恨这一切！我想大叫！我夹在她们中间坐在那张该死的红沙发上，心里想，我要给她们点颜色看看。琼开始写信，母亲开始织毛衣，我坐在那里独自龇着牙笑。

五分钟后我想，好吧，我准备好要出发了。当过厅里的钟以从我的世界开始时就发出的同样令人厌倦的调子敲响时，我微笑着站了起来，默默地离开了房间。

我小心谨慎地走上楼梯去到了淘气室。该轮到淘气了。我爬上窗台把手伸进假天花板，多年前我曾在那里藏放过大量的安非他明丸。我伸直了手指，当我摸到了一个仍留在那里的瓶子时，我上过毒瘤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好不容易我把瓶子够了出来，眼前是一百粒安非他明。将要开始的恐怖吸毒之旅使我害怕，我想呼喊求救，但对为时已晚。我无法控制毕生的毒瘤，吞下了第一把药丸。

回到楼下，我一句话也没说，在琼和母亲之间坐了下来，拿着一支铅笔一张纸，用来记录我狂乱的大脑中的变化。我等了无限长的时间，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琼仍在写信，母亲仍在织毛衣。过厅里的钟发出响亮的滴答声。突然，随着可卡因地震在我脑子里爆发，琼的写信有趣起来，母亲的编织也开始吸引我。整个房间活了起来。母亲的编织针的声音响得像打鼓。

我开始记下我的感觉，突然我开始害怕得发起抖来。我正在飞速回到吸毒岛去。我一跳而起，跑上大街，把剩下的安非他明倒进了下水沟，回到客厅坐到了两个一声不响的女人之间。我坐在那里，拼命想抓住正常世界，但是已经太晚了。

一切都像多年前在纽沃姆医生的洗澡间里的感受一样。我企图强迫自己保持平静，继续坐在沙发上，但是不可能。突然我有一百万件事情要做，一百万个地方要去，一百万个人要谈话。“怎么啦？”琼问道，我跳起来冲回大街去拣回我刚扔掉的药丸。我使劲想用铁铲撬下水沟盖，但盖子纹丝不动。我如下面看去，能够看见几十粒黄色药丸漂在浑浊的黑水上。这时我记起来阁楼上兴奋剂，便疯也似地跑回房子里去。我把推开忧心忡忡的琼冲上楼去，爬进了多年来我藏放过那么多现金和毒品的阁楼。我找了又找，花了近半个小时搬开那些破烂的旧东西，越来越绝望。最后挖到了宝。在最远的犄角里被瓦挡住的地方有两个银制的钱盒，可是没有钥匙。我冲到楼下车库里去把盒子砸开，就像小鬼付了身似的。琼和母亲吓得不敢来拦我，站在那里看着我像个神经错乱的吸血鬼一样猛砸钱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发出了很大的响动之后，一个盒子啪地裂开了。里面只有钞票，大约一千英镑，但是没有兴奋剂。琼恳求我住手，但我暴怒着叫她滚蛋，厌恶地把钱扔了一地。第二个盒子更结实，我只设法砸开了一个小口子，伸进手去摸到了更多的钱，仍然没有兴奋剂。盒子的裂口割破了我的手，我大喊：“又是该死的没用的钱！”这时，两个警察出现在车库门口。有个邻居向他们报告了巨大的敲砸声。他们问我在干什么。我手滴着血，地上到处是钱，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景象。我不得意地答道：“就是丢了钥匙，没有犯罪行为！”他们记下我名字后就走了，警告我：“别再弄出大响动，不然我们会以扰乱治安罪把你带到局子里去。”

在马耳他晴朗的间歇后，毒品又一次诱拐了我。我的毒瘤凶猛地回潮。我抓了一把钞票，开车到了红灯区去买兴奋剂。我发动汽车时琼企图阻止我，但已经晚了，我痛太大了。我开动了汽车。

以后的几天几夜，我和所有其他吸毒成痛的人一起，从一个俱乐部到又一个俱乐部，被兴奋剂搞得神魂颠倒昏天黑地。最后我和一群嬉皮士一起，参加了其他十五万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在怀特岛的狂欢活动。在那儿，在神志木清的状态下，我见到了吉米·亨德里克斯，那个同性恋之王本人。

一周后我不成个样子地回到了温奇默山。母亲和穿着一条新的冬季短外裤的琼坐在红沙发上，和我离开她们时坐的位置一模一样。

我生活中的酒精间奏曲结束了，吸毒主片正式开演。

回复到吞食改变理智的安非他明后，我开始梦想着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开始阶段安非他明能够激起巨大的创造性，我在这种激励下开始制订建立一个公司的计划，目的是能使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我是这样想的，我总是可以用我那些偷来的钱给公司额外的推动以保证成功。和往常一样，这个新念头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别的什么也不存在了。我住进了大理石拱形牌楼处的坎伯兰饭店避免受到打搅，开始打出了一份长达七百三十页的详细的总计划，告诉自己以后两年中每一天做什么。第一天，找办公室，雇用秘书，第十四天，登广告招代理商，第一百天，仓储食品中心开张，诸如此类复杂的细节。上面甚至列出了我吞食毒品的量，但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按此具体估算行事。计划本身是建立在美国折扣销售的基础上的，这种方法当时在英国还是个新鲜事物。

十二个月后我的计划实现了，在伦敦地区就有五千个以上的商店，只要出示我们的卡就能

打折购物。公司的年交易额是五十万英镑。

我只有在买干净内衣和兴奋剂时才离开饭店的房间，这样用了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我的总计划。在我很少或几乎不睡觉地日夜制订总计划时，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或根本不存在。我偶尔给琼打电话，只是告诉她我还活着，但拒不讲出我在什么地方。终于我带点迷糊地走出了坎伯兰饭店三十三号房间，手里握着个压印着“总计划”金色字样的红色新公事包。就像在纽约重新获得了拳击许可证的阿里一样，我感到像个百万富翁，准备好了要去征服世界。

在我制订计划的几个星期里，琼找到了一套公寓。巧的是，公寓在坎伯兰饭店后面的一个街区。一周后我们就搬进了大理石拱形牌楼西摩街二十一号，在那儿，我马上就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一页。真有点不可思议，我打出的每一个字现在变成了现实。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全部实现了。琼继续做她的模特儿，使我不受干扰地运作兴奋剂引导下的梦想。我们偶尔做爱，但我匆匆了事，之后总是马上回到书桌前继续我的任务。琼是个好人，她爱我，不顾我的疯狂行为，留在我的身边。

不到几个星期，我就和一个报机灵的叫杰克·布拉姆福特—埃利克森的人合伙干了。他和大规模旅游管理业的布兰普逊公司协作，在十七个不同的国家经营过一个类似企业。比起一般单调的商业活动，我和我的狂热方式对于杰克来说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他和我联手以后，整个计划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大量的金钱开始滚滚流入。每天早晨代总是微笑着打开红色公事包勾出昨天取得的成绩。在第七十五页上，或者是第七十五天，你怎么看都一样，我到温普尔街萨洛米大夫的诊所去找他。他只是给我开安非他明的二十几个私人医生之一，他们加在一起差不多刚能满足我对毒品的需要。我打开了红公事包拿出总计划中未执行的剩余部分，说道：“大夫，我需要帮助。我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管理大公司的行政经验的人。我一个人管理不过来了。”“我正好认识这样一个人。”萨洛米大夫笑道。

我求他立刻就给这个人打电话，但他解释说只有周末才能给他的朋友打电话。真怪，我想，平时不通电话。他住在哪儿，在石油开采平台上吗？

那个星期六的上午，在大夫的诊所里我见到了一个高个子。说话斯文、大约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穿一件带丝绒领的蓝色大衣，干净利落。他自我介绍，说名字叫史蒂文·达兰西廷克，眼下因为参与了埃利克·卡玛德拉的那桩汽车保险诈骗大案正在服刑，五年刑期未滿。我记得那个案子，牵涉到百万英镑，当时是条大新闻。史蒂文一面用金质香烟嘴抽着烟，一面解释说他现在是从旺兹沃思监狱获白日释放，每天下午五点半必须回监以“我有丰富的经验，不过我有过污点，也许对你不合适。”他最后说。“星期一开始工作。”我高兴地咧嘴笑着说。他照办了。

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史蒂文告诉我我们需要一个公司会计，一个在账簿上很精明的人。“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货币改成了十进制制。”他开玩笑地说道。自然他认识正好合适的人——吉米——他的同牢房的伙伴，不久吉米就加入了我们迅速发展的公司。“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像罗尔斯·罗伊斯那样破产的。”吉米在第一天结束时笑着说。

后来的几个月，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超过了我最大胆的梦想。正如总计划所预计的那样，它就越来越来大，包括代理商在内，我们的雇员已经超过了二百人。伦敦方面的业务已经顺利运转，现在该去征服伦敦附近各郡了，然后是全英国，然后自然是征服全世界了。和任何沉浸在新获得的成功中的安非他明君子一样，我认为现在什么也无法阻挡我了。在和大的食品公司谈妥合同之后，我们按照第一百六十三页上的计划，开办了许多展销部中的第一个，展销部设在帕丁顿区教堂街一座四层的办公大楼中。在那儿，出售我们会员资格的代理人很快突破一千名。

教堂街坐落在伦敦的一个老区，有许多古董和废！日货店，我们灯火辉煌的鲜红色的门面招牌引起当地商家痛苦的注意，新旧并存。我们隔壁住着一对卖废旧货的叫老妈老爸的夫妇。他们家几代人都是干这行的，老爸已经八十岁了，仍旧每天出去，和他父亲一样，推着推车去收运破烂，只不过他父亲用的是马。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坐着豪华轿车来到那里是个奇怪但又有趣的景象。沿街往下一点是家高级的古董店，是那条街上最好的一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叫马丁的同性恋男子在经营。他个子高高的，长得相当吸引人，扭捏作态，总在微笑。我经过时他常常从店里出来和我打招呼。我在服用毒品后晕乎乎的状态下开始每天在他的店里买点昂贵的东西，不是因为我要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而已。我非常招摇，喜欢享受买昂贵的艺术品就像买炸鱼和土豆条那么随便的一种乐趣。如果马丁和他的时髦漂亮的商店是那条街的王子，那么我就是作为国五到来的了。每到星期六那条街就变成了市场，我看着商人们摆出不值几个钱的小摆设的摊子，觉得很奇怪。他们干吗费这个事？他们全部的货物只不过值一百来英镑。一个星期六，完全在兴奋剂的控制下我买下了三个摊主的全部货物。对我来说是小

钱，在他们可是经济的奇迹。我把所有买下的东西放在我们大楼门外一张桌子上，写了一张很大的通知：“免费，请自取。”几分钟之内大群大群的人来拿走了一切，我则在展销部里看着，歇斯底里地大笑。

大约这个时候，我开始每天在服安非他明之外还吸食鸦片。我在闭路电视上看阿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输给了弗雷泽的那场比赛，和往常一样，由于飘忽忽地思维不清，我不知道谁赢了。我是谁一的吸毒迷糊的拳击迷，在比赛后的一场争论中被击倒在地。

史蒂文和杰克负责我们展销部的设计布置。他们搞得很堂皇，整个的四层楼都销了深绿色的地毯，十间房间里全是崭新的办公室家具，接待处设置了电话交换台。一切看上去极其体面，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会议室在二层，史蒂文把自己昂贵的会议桌和十二把椅子搬了来，其中一把椅子是真正安妮女王时代的制品。在同一层楼上的会计室里，姑娘们处理着每天涌来的千百件长期定单。顶层是我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陈设着昂贵的白色真皮家具。餐具柜上方挂着一幅维多利亚时代一位绅士的油画像，我声称此人是我的祖父，公司的缔造人。对面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标志出持与我公司相关卡有效的三十个国家，使整个一切看起来非常有气派。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构，由一个脑瓜里想出了这个主意的年轻人为首，此人一面不歇气地吸着鸦片一面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尖声下达命令。这个公司的主要高级行政人员在五点半钟以前必须回到旺兹沃思监狱去，他们常常借用总经理的白色美洲虎轿车，并且把它停放在监狱的院子里过夜。一切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按计划进行着，只有一桩美中不足的事情，我和我的吸毒。我每天服用的毒品量已经高到了荒唐的地步，使我的行为越来越乖僻无常。

随着我疯狂程度的增加，我让把父亲死于其中的部把！口扶手椅送到了办公的地方去。从那天开始每一个到接待处去的人都要被迫坐在里面，这时我会骄傲地宣布：“我爸爸就死在那张椅子上。”夜里我也无法平静下来，就把琼留在床上自己到通宵吸毒俱乐部去，常常一连几天不睡觉。很快我就从自己公司的一个讨厌鬼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不利因素。当我在整夜吸毒后瞢眬着走进公司时，杰克和史蒂文总是说：“呆在家里去梦想出光辉的新项目来，把经营公司的事留给我们干吧。”有一天早上他们建议道：“到圣特洛佩去看米克·贾格尔结婚吧。那能让你不惹乱子。”我的行为完全无法估计，有时一连失踪好几天，使整个公司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只有我有权签支票。我不干涉公司管理工作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抽鸦片，把许多个小时花在看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的一个女秘书的屁股上。我让她从早到晚把文件归档放在档案柜最下面的抽屉里，这样她的腰就得弯得更低，我就能更多看见她的大腿。吸毒后晕晕乎乎时在性的方面对你产生奇怪的影响。这个女孩意识到她能引起老板的性欲，于是很快就根本不容衬裤了，但尽管她很积极，我却从来不去碰她。我只是整天晕晕乎乎地坐在那儿。至少暂时她的屁股使我没有到别处去造成更大的破坏。

以后的几个月中公司的收入增加了，但我的吸毒量和大发脾气的次数也增加了。大多数傍晚时分，当我把手伸进口袋，发现我已经吞服完了每天允许的一百粒安非他明时，总是感到十分惊恐。一天早晨琼开始严肃地对我现在服用的安非他明的数量提出质问。“你愿意像去年吉米·亨德里克斯瓦贾尼斯·乔普林那样突然死去吗？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她大声喊道。她把我的一些毒品藏了起来，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背叛。谁也不会瞎动瘾君子的毒品的，我大发脾气，把琼和她所有的东西扔到了大街上。我的合伙人杰克发现她在他小巷的住宅门外哭，就让她过去呆了几天，然后她就离开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琼。她的离去使我失去了保持健全神志的最后机会。

从此以后就是一路往下滑了。吸毒后情绪的大起大落使我和所有人都吵架，并开始凭一时冲动解雇人员。我每天最爱说的话成了“你也可以滚蛋嘛”。史蒂文和吉米自动离开了，几个月后杰克也走了。人们感到无法对付我变成那个吸毒后迷迷糊糊、神经错乱的精神变态者。独自一人住在公寓里增加了我已经完全失控的毒品、酒精和鸦片消耗造成的混乱。我逐渐失去了对公司和秘书屁股的一切兴趣。我要的只是吸毒后的兴奋和坐在家里得到更多的麻木的感觉。一直在公司印刷部工作的一个叫比尔·斯通的小青年，当我开始一鞋盒一鞋盒地购买大麻和鸦片时被提升为我主要的大麻香烟制作者。我指示他用一支软头钢笔把大麻香烟一一标出记号，一个圈表示一般强度，两个圈为烈度，三个圈为炸弹级。不久，我宣布从此以后只要炸弹级的，于是瘦瘦的有一头黑卷发的比尔就把钢笔扔了。这一阶段，公司大部分的收入仍能自我再生，因此虽然我的行为如此愚蠢，钱和大麻香烟一样，依然滚滚流入。

到了吸毒的时候了！我不再想任何别的事情，一心只想寻求最大的兴奋快感。为了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试验，我告诉每一个人我因公要到国外去，把公寓的玻璃窗漆成黑色，像战争时期那样。我有大约十种不同类型的安非他明，我把它们压成粉末，像一个精神失常的弗兰肯斯坦，用许多时间以不同的比例把各种粉末混合在一起。我企图在自己的脑袋里制造电能，相信信当的混合比例会给我永久的兴奋快感。

我吸用了太多这样调制出的毒品，结果在一次试验中心脏开始无法控制地狂跳。我怕会发心脏病，就打电话叫来了急救车。这一事件使我感到害怕，从医院回来后便决定以后的试验用动物来做。

我的研究工作从三缸金鱼开始，我喂它们掺了安非他明粉的食物。不久金鱼好像真的游得快了，但是遗憾的是，有的金鱼太爱这种兴奋感了，吃得太多，漂到了水面上。

毒品研究是一项孤单的工作，为了有人帮助我，我把比尔·斯通从办公室大麻香烟制作者提拔为实验室第一助理。他带一个装满毒品的大购物袋来上班。“用大麻好，”他宣称，“你看着吧！”我们没法让金鱼吸大麻香烟，就用吸管把大麻烟吹进水里去，吹出气泡来。后来我急了，扔掉试管去找一个更快的办法。我把脸放进水里把烟直接吹进去，不小心吞进了一条金色，大吐起来。于是试验突然终止。比尔在兴奋剂的作用下亢奋地笑得满地打滚，口齿不清地说道：“我得辞职了，你得找个新助手。我怎么也不能再换了。”

过了一阵子，当我们恢复过来能从地板上爬起来以后，比尔建议道：“用鸚鵡。鸟呼吸空气！”不久我们从哈罗兹买回来了三只鸟，放在三个笼子里，一个房间里放了一只。我们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到一间屋子里去吸大麻，制造旨在使我们长羽毛的朋友亢奋起来的烟雾。很快我们就清楚自己不能支持到试验的完成，于是决定需要帮助，让更多的人来吸烟。比尔正好有办法。他认识八个薄皮士，他们擅自占住了离波托贝洛路不远的一所空屋里。比尔肯定，白让他们吸食毒品能够获取他们的帮助。一个小时后他把我们的新工人塞在两辆出租车里带了回来。很快他们就都一支接一支吸起了大麻，对于他们这简直是天堂。比尔作为工头，必须以极快的速度把一个装满“黎巴嫩红”大麻的大购物袋里的大麻备好，不断补充供应，来跟上我们的吸食量。现在已经开始像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了，我锁上了公寓所有的门窗，以保证大麻烟雾漏不出去。但是没有多久我不得不把门窗重新打开，因为许多嬉皮士紧张不安起来，以为这是一种新型的以毒攻毒的抗毒药物。在整个的试验人员气色难看、鸚鵡沉默地瞪着眼睛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宣布试验结束。经过五个小时的大麻宴以后，最佳吸食者获得了一只大获全胜的身。“你这人真酷，非同寻常，有事随时找我们。”他们说着缓慢地走出了公寓。后来我们发现剩下的金鱼不见了，主要的嫌疑犯是一个嬉皮士的宠物猫，他随着吸食大麻的主人离开的时候满脸暗自得意的神情。“必须给我时间休息。”比尔宣布说。“干什么？”我惊愕地问。

“去睡觉。”他答道，剩下我一个人在完全昏昏然的状态下呆在试验室里。

又吞服了几粒安非他明后，我又突发奇想。蚂蚁！容易观察多了，我寻思。那天半夜，我在一袋碾碎的安非他明和一只手电的武装下，去到坎伯兰饭后背面的垃圾箱分。我在地上撒满了药粉，开心地等着蚂蚁爬过安非他明粉的白色小山。试验一直平静地进行着，突然被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打断了，他们询问我，半夜两点钟拿着个手电在干什么。“研究蚂蚁的表现。”我解释道。“你会被逮捕的。为什么不去上床睡觉，早晨再来研究。”其中的一个警察建议道。他们回过身走了。我惊恐地眼看着警察一只十二号的脚碾碎了世界所见到过的最快活的一堆蚂蚁。

野鸟！这是下一个飞进我脑袋里的愚蠢的妙想。黎明时我已经来到了海德公园，用在安非他明溶液中浸泡过的湿叽叽的面包喂麻雀。许多麻雀都吃了，但是在它们飞着的时候无法观察它们，也难以判断它们是否快乐。

那个上午早些时候，我发现我的嬉皮士朋友之一躺在蛇形湖附近的草地上，便重新雇用了他去用带兴奋剂的食物喂鸭子。鸭子行动慢些，因此观察起来要容易一些，我离开去吸食午间毒品时这样想道。我把劳力士金表借给了这位长胡子的朋友，让他按时记录鸭子的情况，把图表留给后代。但是这位年轻的毒品研究专家很快就和图表及金表一起不见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躺在草地上瞪眼看天，等待遇见天上的带着钻石的露西。我正要睡着的时候一只鸟从头顶飞过。我笑着想道：“至少它是快活的。”

“醒醒！你不能呆在这里。”公园管理员说。我在湖边睡了一整天。这时天已经黑了，我走回家去时心里想，不再用动物做试验了，它们太他妈的难以估计了。我需要的是人，用人来试验。我蹒跚着走进一家咖啡店坐了下来，发现自己眼前是一双漂亮的长腿，勉强被一条最短的迷你裙盖住那么一点点。盯着她的大腿，我有了个会造成梦中遗精的好主意。我将要给最快的女性性高潮记时！那一整个晚上我招募了几个新老嬉皮士，两个男妓，再加上两个妓女。到

第二天傍晚试验室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开张了，不同的各对服用了不同混合的兴奋剂，我作好准备给他们的性高潮记时。不幸的是，我的人类试验品迷糊兴奋得过了头，没法记下刹那间的结果。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我越来越感到孤独和悲哀。晚上我独自在公寓时，孤独使我即使服用了大量安非他明也仍然无法入睡。恐慌疑惧与日俱增。我深信全世界都和我过不去。为了准备本目的到来，我买了十辆“出选车”，停放在伦敦各处。每一辆车上都储存了一切备用用品，并且在公寓中存放了三十加仑汽油。我极度渴望能够睡一会儿，便开始给自己打安眠针。一天夜里我吸着香烟就在金属床上睡着了。燃着的烟蒂点着了床垫，熊熊大火把我烧醒。我迷迷糊糊地爬到厅里，在强大的药力下继续睡了下去，全然忘了着火的事。我听见门房猛砸前门，大叫“着火了，着火了！”又半醒过来。我一翻身，看见到处都是熊熊火焰，整个床垫都已经烧着了。我沿着过厅爬到门口，打开了前门的锁，嘟哝道：“快，叫消防队！”“他们已经在路上了。”门房说。我身体里仍旧满是安眠药，就那么德在他的脚下，在电梯边的地上又睡着了。

消防队到后，他们从四楼窗户破窗而入，把水龙软管伸过起居室越过我藏匿的汽油桶灭火。幸运的是，铁床的高床架使火没有能够蔓延到整个公寓，不然会把整个大楼和半条西摩街炸飞的。

杰克·埃利克森和妻子半夜三点钟从夜总会回来的时候，看见救火车停在大楼外面，就说：“‘肯定是他！’”他们发现我仍睡着在电梯旁，就把我抬到附近小巷中他们的家里，我整个第二天都没有醒。

当我终于醒来以后，这场新灾难使我十分烦乱不安，于是就到海边去和艾伦一起呆了几天。尽管我愚蠢疯狂，他仍旧和以前一样爱我。

差点一命呜呼，我非常害怕。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我迫切希望得到上帝的党总，便重又开始整夜到火车站去送钱给流浪者。我不再把自己看成耶稣，而是一个当代罗宾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教掉的越多，每天流进公司的钱也越多，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反正已经成有了巨大的财富，怎么着都没什么关系。

在非洲的比夫拉发生了大饥荒，我感情上受到很大震动，决定单枪匹马去拯救世界。我捐了一千英镑给救灾基金，中止了正常的经营事务，让全部工作人员不干别的，只去组织大规模的筹措资金的邮寄宣传品工作。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加上英国广播公司的捐款，我们筹措到了很大一笔钱。遗憾的是，对待我这一切善行的回报却是说不出门的轻慢和钻心的痛。当我把筹措所得交给“儿童救迹基金会”的总部时，那个职员仅仅说了一声“谢谢你”，给了我一张收据。一张该死的收据？对于我这样一个感情饥渴的人来说，这根本没有用！我需要奉承，荣耀，而不是该死的收据！在这次失望之后，我把以后所有罗宾汉式的工作局限在了酒鬼们身上。流浪者不写收据，他们当而赞美我。

大约这个时候，我和克拉拉的恋爱开始了。她是一个有名的体育评论员的女儿。我是在几个月前她为杰克工作时认识她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她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有趣的姑娘。她和我认识的别的女人很不一样，极其聪明，很自信，和她在一起很有意思，床上床下都如此。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爱上了她。她是第一个我确实喜欢与之相处的人。我总是叫她“乔治”，不知怎的这使我感到更安全，能使我克服对女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克拉拉是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她在外形上甚至都和我以前深色头发的女朋友不同。她出身于一个上层家庭，母亲定期参加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游园聚会。对于接受过私立学校教育、结交的都是彬彬有礼的朋友的克拉拉来说，有我这样一个“银行劫匪”精人具有一种全新的吸引力。比起和有闲的上层社会年轻的名流一起打打壁球来，与我及我的团伙朋友一起的夜生活对于她可就有天壤之别了。

如果说我是罗宾汉，克拉拉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使女玛丽安。我们彼此真有好感，很多时间都在一起，或在我的公寓，或在她家位于汉密尔顿台地的五层楼的宅子里。许多个周末我被邀请到她父母的周末乡村别墅去过夜，尽管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克拉拉的父母对我总是很和气。这是两个爱护子女的爸爸妈妈，我看着克拉拉的兄弟们，羡慕地想，他们不必用论提包的办法来获得父母的注意。克拉拉是我找到的最接近于真正的爱的人，事实上，如果我没有毒瘤，她很可能会成为我真正的爱。可悲的是，尽管她对我有着极好的影响，我的毒瘤注定了我

这段半理智时期不会延续很久，很快狂野的阶段又开始了。

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才会愿意和一个危险的心理变态，而且又是吸毒成癮的、像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我遇见布赖恩·克利福德的那一天就像是一头吸毒的公牛遇着了一块举起的红布。我并不需要钱，而且我甚至也不需要和他说话，但是我说了。通过他我被迫参与了更多的犯罪，招来了一大堆麻烦事。我整个的生活像疯了一样。我的公寓里全是一车车偷来的香水、香烟、红酒等等，简直就像是（雾都孤儿）里费金的贼窟。

布赖恩·克利福德在黑社会犯罪圈里被称做“小短腿”，因为他是个有两条小胖短腿的矮个子。他波浪形的黑头发梳成大背头，长得其实挺俊的。但布赖恩是个危险人物，正是他的心理变态的行为吸引了我。他那狂暴的脾气使得龙尼·克雷在对比之下像个女童子军。克雷兄弟遵循的是伦敦下层社会的行为准则，只攻击其他流氓，而小短腿却没有任何准则，他会眼睛都不眨地杀死一汽车的修女或当地教堂的唱诗班成员。他不但是个恶棍，而且在情绪不对劲的时候够得上是个确诊的疯子。我是通过原来认识的一个撬门入室贼“猫约翰”在杰明街的土耳其蒸汽浴室里结识他的，第一次见面以后，布赖恩开始每天来接我到惠勒饭店吃午饭。马丁在一旁看着我坐上布赖恩的罗尔斯·罗伊斯，总是会说：“哦，阔朋友，宝贝儿。”

随后的几个月中，小短腿和我每晚带着女朋友一起交际。克拉拉并不知道真情和存在的危险，觉得一切都特别刺激好玩。有一次吃过晚饭以后布赖恩在沃尔沃思路他的办公室外面停住车，让克拉拉在车里等着，把我和他的女朋友琼带上楼去打了个私人电话。他叫我们坐在高背皮椅子上，我和琼说话的时候布赖恩离开了房间。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回来，他毫无警告地突然攻击起这可怜的女人来，给了她脸上一拳。他像恶魔般尖叫道：“你这母牛，屎罐子。”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后拽，割掉了她金色的长发，让她像个战俘营里的受害者的样子。我坐在那儿呆住了，一动也不能动。“咱们回家去，斯蒂芬。”布赖恩说着把刀子扔在了地上。他把我拽出房间，留下那姑娘吓得呆呆地看着撒得满地的自己的头发。几分钟后汽车经过巴特西发电站的时候克拉拉傻乎乎地问道：“琼在哪儿？”“洗头发呢。”小短腿答道，一面在后视镜里冲我怪笑。克拉拉在汉密尔顿台地下车后布赖恩把我带到摄政公园，停好了车。在头昏眼花中我听着布赖恩陈述他最新的一包诡计。

小短腿很清楚他要干什么，在疯狂的表面下他有一个极会算计、非常聪明的脑袋。为了吓唬我，他开始详细描绘人死前一刹那脸上的神情。他列举了他进行过的谋杀，我恐怖地坐在那里听着。“现在说说我最高的一招，”他说着递给我一大叠百元美钞。“这些是假钞，但很容易能在银行换成真钞票，”他解释道，“特别是在国外的大银行中。”显然英国的银行已经意识到这批假钞的存在。“你的作用就在此，”他拍拍我的膝盖说，“明天早上我们到瑞士去，而你，我的朋友，要和我们一起去换钱。”如果出了事，我是他们献出来让人抓住的替罪羊。我惊愕得回答不出来，而且和平时一样，我处于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同意和布赖恩及他的帮手一起搭早班飞机赴苏黎世。

一小时后当我回到公寓时，恐惧感攫住了我。我十分惊慌，因为我相信一旦我们换掉假钞，小短腿和他的疯子伙伴肯定会把我杀掉。这些贪婪的杂种决不可能把他们的收益分给我。我吞服了更多的兴奋剂好想得清楚一些。有安非他明在我脑子里流动，我不久就找到了如何从瑞士活着回来的办法。我要带一个我认识的末流恶棍和我一起去。我的计划是通过在最后一家银行把一模一样的两个公事皮包换一下，把钱转到我的同伙手里，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带回英国。这样一来，布赖恩为了弄到那笔钱，就不得不至少让我活着回伦敦。打了几个电话后，我雇好了我要的小流氓，秘密地替他订好了我们去苏黎世的那班飞机的机票。

吸足了毒以后，整个事情突然变得像小说里那种紧张激动的间谍玩意。第二天早上，就像在活生生的詹姆士·邦德的电影里似的，我和布赖恩及其帮手坐在一起，我的同伙隔着两个位子坐在后面，拿着一只一模一样的公事皮包。着陆后，他的出租车跟在我们后面直到苏黎世市中心，我到几家银行把假钞换成了英镑，不久我的公事皮包就鼓鼓地装满了英国纸币。那天下午当我们离开最后一家银行时，我的小流氓居然奇迹般地仍跟在后面。

这时，布赖恩把我带到最高级的饭店之一，我相信他就是想在这里杀掉我。在繁忙的接待处我放下了公事皮包，朝这时正戴着一顶可怜巴巴的浅顶花呢帽和一副墨镜的同伙挤了挤眼。他拿起我的皮包，搭下一次航班回到了伦敦。

一切都像是场幼稚的玩笑，我兴奋地欣赏着这一出戏——就是说，在我们到达房间以前。布赖恩听我说完所干的事后并没有叫喊，他变得十分沉默，但他眼睛里的神情说明了一切。他喘着粗气，不理睬我，转向他恶狠狠的同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调换了皮包，调换了皮包。”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鼻翼一动一动，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终于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微笑着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干的。让我们回英国去，把钱分成四份。”他想只把我应得

的部分中的一小点给我，骗我说钱的一半得给制作假钞的团伙。我们在瑞士不声不响地过了一晚，然后搭清早的航班回到了希思罗机场。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感到非常得意，转向布赖恩说：“木，我的小个子朋友，分成两份。我们对半分。”早晨的安非他明劲头正大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特别是在波音707的安全环境之中，我心里想：“现在我说了算。”是我身体里的安非他明在说了算。

抵达希思罗后，我傲慢地叫布赖恩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到我的公寓去拿他那份钱。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安排好让摩西和另外五个牙买加看管人员到我的公寓来给我以精神和体力上的支持。那天晚上我从小无赖徒弟那儿把钱取来，回到西摩街，在和小短腿斗最后一个回合之前好好睡上一个晚上的觉。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真正的麻烦开始了。西摩街的公寓很小，当门铃响起的时候，卧室里挤着六个默默警戒着的大个子牙买加人。我已经吸足了毒，但当我走在过道里时，最后还是又吞下了一把药丸以增加勇气。我把门打开，准备着布赖恩拿枪比着我，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是卡米拉。

她更漂亮了，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正像一袋海洛因对于一个吸毒的人那样。我很快把她领进客厅，关上了门，说：“在这里等一等，有个重要的客人要来。”在惊慌失措中我把两个门全锁上了，结果牙买加人和卡米拉都出不来了。顷刻间门铃又响了，这回是我的小布赖恩，样子挺和蔼，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狠毒。在我给他的钱数问题上我们吵了起来，他开始威胁我，于是我打开了卧室的门，放出了挥舞着刀子的牙买加人。布赖恩站在那里，毫不在乎，争吵着要更多的钱。我心里琢磨，要不要把卡米拉放出来试试？

古怪的是，这时候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卡米拉对这一切的反应。这时她已经在颐门了，在房间里大叫：“马上把门打开。”“你最好赶快走，”我对布赖恩说，一面冲锁着卡米拉的门点头，“你先把这钱拿去，我们再找一天谈这事。”他摇摇头，大叫道：“我简直没法相信这一切。”但奇怪的是，说完后他居然就走了。卡米拉的砸门声越来越响。我给了摩西一千英镑，把他和他的杀人眨眼的凶手打发回诺丁希尔门。关上大门后我松了一口气，开了客厅的门，发现卡米拉非常生气。我们谈了一会儿，但我怕克拉拉会来，就带卡米拉到炊伯兰饭店去喝点饮料。按着我痛君子的本性，我邀请她下周和我一起到爱尔兰去。

几天以后，卡米拉和我在菲什加德上了渡船。我要去见一个有名的撬保险箱的贼，我姑且称他为奥格雷迪。我新近购得了一座楼房，打算从那里挖条地道通到附近的银行去。

到达栋拉雷后我们住进了埃尔芬饭店。我把卡米拉留在饭店里，没有立即进行和解的谈话，只身去到都柏林。

我想再访格雷舍姆饭店。这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的同性恋珠宝贼朋友绅士乔治把我独自扔下的那家饭店。我站在奥康奈尔街上，呆呆地看着这巨大的旅馆，当思想从过去转到将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脑子里开始出现了未来几年中在我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幻象。这种预感令人恐怖。

那晚我想要停止吸毒列车，赶快下车，但是却做不到。现在车速已经太快了。我已被毒瘤锁定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消失在车窗外。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奥格雷迪，在他的游艇上度过了一天，为的是能私下里讨论些事情。卡米拉在顶层甲板上作日光浴，我们在下面船舱里谈话。我们坐在那里，阳光从舷窗照射进来，当时我已经能够看到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两个悲惨的罪犯：一个无法停止吸食兴奋剂，另一个不歇气地喝威士忌。总之，我们不是可靠的一对，但尽管如此我们讨论结束时，两个人对一切都晕乎乎地表示了同意。在开回岸边去时，快艇正在全速前进之际，烂醉的奥格雷迪在驾驶盘前失去了知觉。只差二十码就要迎头撞上港口护堤了，我扑到他身上，设法把小船调转了头。

回到旅馆后，卡米拉和我仍惊魂未定，决定多住上两天。就在那晚，我们同意再给我们俩的关系一次机会。这是愚蠢的，注定会失败。我知道这事肯定木会成功，就尽可能拖延搬回去的时间。浪漫的梦想比生活的现实要容易相处得多。

第二天早餐时，我们遇见了鲁浪特·克罗夫特一库克，他是个有名的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刚看过一本他写的书（从门进来的狼）。我发现这个老人及他和有名的罪犯一起的经历非常有趣。我们一直聊到半夜，第二天鲁四特宣布说他想和我一起回伦敦去写我的故事。我晕乎乎地同意了。那天下午我和我那撬保险柜的窃贼朋友安排好几个月后再见，告了别，就和卡米拉及鲁用特上了渡船。

回到英格兰后，卡米拉坐出租车回家，我把鲁拍特带到我的公寓，公司里的两个高级职员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他们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巴克利银行宣布结束我们公司的账户。这事

很奇怪，因为我们在银行一直有结存，而银行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结束盈利的账户的。也许他们听到了我和犯罪界有联系的风声，怀疑我在洗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公司已经有了未来十二个月的长期定单，从中可以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将使我成为一个合法的百万富翁。我那份在兴奋剂作用下制订的、长达七百三十页的总计划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我严重的毒瘤也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可怕的吸毒已是止不住的了。

鲁用特和我一起呆了几天。但是我实在太忙，不得不取消给他讲述我生平故事的计划。“等我把一生过完了再来吧。”我驱车送他到希思罗机场搭飞机回都柏林时笑着说道。

一个月后我去机场接奥格雷迪。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糟糕。我认识此人已经好几年了，就在我这个神志迷糊的人的眼里，他精神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浑身颤抖，通过海关后他直接去了酒吧，喝了几大杯威士忌后才平稳了下来。在开车到伦敦的路上又让我停车去买了两瓶威士忌。我们将要进行的抢劫是由两个严重病态的人策划的，但最准毒瘾使我们盲目地全力以赴。在观察过两处地方后我开车把他送到旅馆，让他能够睡上一点觉。

我却没有休息的可能。我病态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出格。我计划在打劫银行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一辆破婴儿车把劫得的钱财推走，理由是警察决不会把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和抢劫案联系起来。这已经不是正常的犯罪而更像疯人院里的疯子所为。我完全被这个念头迷住了，我穿上了破衣烂衫，戴上头发缠结在一起的发套，在银行附近的艾奇韦尔路转悠，以考验一下我的伪装。我走过一个邻居的身边，向他乞讨还真行了，他没有认出我来。我穿着破衣服，和在地下挖地道的同伙用无线电话交谈，我该去的是疯人院，而不是抢银行。就像在现代版的劳莱和哈代电影中那样，组成我们这快乐的三人小组的第三个强盗从早到晚不停地吸大麻。

我盗窃的目的不是钱。对我来说，盗窃是对生活本身的疯狂嘲弄，童年反叛的继续。这时我已经完全浸沉在流浪汉的角色中，决定在打劫银行的前一天和帕丁顿车站后面的酒鬼们在露天过夜。我的计划是确认一个出了事可以躲藏的安全地方。我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当地的流浪汉社会，经受了过去从来没有经受过得强烈感受。当然，他们主要欢迎的是我带给他们的新的、大量的照酒，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有人真正需要我。在长久的孤独之后我在脱离社会的人群中找到了平静。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因为宗教信仰或所读的学校不同而与人格格不入，谁都可以加入到这一群人之中。他们没有担忧，没有责任，没有人使他们烦恼，没有人爱或恨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除了不小心把酒洒了之外，不会出任何毛病。我第一次尝到了“烈酒”，即用甲醇变性的酒精。也许正是在帕丁顿车站后面和酒鬼们共度的那个晚上，我预订了进入这个感情上安全的、被忘却了的世界的车票。

一切必须的设备在第二天都已运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往银行的保险库挖地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在进行响动大的工程时，我伪装成流浪汉坐在银行外面，当有警察经过时，我用无线电话通知下面的同伙停止用钻。起初一切似乎顺利，但是挖地道用的时间比我们估计的长得多，奥格雷迪的酒也越喝越凶。短波中不断传来他的口信：“急需更多饮用品。”我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买两瓶威士忌，每次都拿着一叠钞票付钱，一定是个奇怪的景象。我推着婴儿车走来走去，把购物纸袋里的威士忌放在地下室的门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星期日傍晚，我感到恼火起来，决定把婴儿车停放在一边，去检查一下下面到底在干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最坏的估计变成了现实。那个爱尔兰播保险柜的贼醉成一摊泥，一部分地道也塌了下来。“真他妈一团糟。”我嚷道。“动着急，”小组里的第三个成员说，“你又存多了兴奋剂了！银行到星期二才开门呢，我们有时间。来，抽一支大麻香烟吧。”

看，我们这三个可怜的无赖是“毒品、酒精、大麻之结合”，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恶瘤之中，全部到了生涯的尽头。即使在抢劫银行之时都不能停止喝酒、吸大麻或一把把地往嘴里送安非他明。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吸鸦片休息。

大麻香烟和安非他明及其他兴奋药品的结合使用，使我身上产生了毒品大地震的感觉，昏昏然到了都没法从地上爬起来的地步。培也开始摇晃起来。我的同谋上着镜铐。我在幻觉之中，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切似乎都真正在发生着。我躺在地上，听见从半完成的地道里传来狗叫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响，十几只戴着警察帽的大狗蹿了出来。我一点也动弹不得。看到后面跟着一只戴着法官的假发套的更大的狗。他凶恶地叫道：“你去坐车吧，小伙子！我们在你的床

底下发现了这只提包！”突然，千百只鸟从地道里飞了出来，嘴里全部叼着提包。我拼命想从这恐怖之旅中逃出来，便滚进了地道，在吸食鸦片后的源俄中看见穿着警察制服的巨型蛆虫朝我走来。我跌跌撞撞来到大街上，我的幻觉仍在继续，我发现在街上一切也全变了！

汽车变成了里面坐着警察的大罢此车，追赶着我。我精神要崩溃了。我仍旧推着我那宝贵的婴儿车拼命逃走，听见从车里传出了尖叫声。对讲机还开着呢。“带湾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奥格雷迪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响起，我极力想把它关上，但是糊涂得关不上机。绝望中我跑进了一家加油站，从惊愕的服务员那里买了一桶汽油。就好像是粘在了罢此车上似的，我继续在伦敦繁忙的大街上奔跑，最后停在切尔西桥上。我在那里把婴儿车浸泡在汽油里，放了一把火。当我把燃烧着的婴儿车推落到河里去时，随着婴儿车下沉，我仍能听见，“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咕喀，咕哈……”

幻觉继续了几个小时后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失去了知觉。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奥格雷迪，但是许多年以后在伯明翰的温斯顿·格林监狱里我遇见了抽鸦片的那位。我们稍稍清醒了一点，一起绕着活动场走，对那个迷迷糊糊的周末觉得很可笑。“那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兴奋剂吸食得太多了。”他说。那时？我心里想，倒不如说现在仍是如此。

我醒来时特别难受，发现自己躺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身上仍旧穿着破烂衣服。用了不少安非他明我才清醒到能够回到自己的公寓去。

在以后的数周里我变得越来越糊涂。持续滥用安非他明的危害暴露了出来，我精神错乱了，开始认为全世界都和我过不去。严重的受迫害感越来越强烈，直至我想象着所有的人都想骗我，哪怕在某天是星期几这种小事上。一天早晨九点半，我等在银行门外，对一个过路人大喊：“他们为什么他妈的不开门？”“今天是星期日，老兄。”他答道。我不信他的话，气呼呼地买了好几张报纸查看。没错，都是星期日的报纸，可是我还是不信，怀疑卖报纸的人和他勾结一气，于是开始问街上的陌生人。听到他们都说是星期日，我更糊涂了，愈加感到痛苦。我回家去时心里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

我老觉得，不是警察要抓我，就是坏人要开枪打死我，于是我继续执行从地球表面消失踪迹的计划。我的表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纳粹战犯。首先我把十辆二手车停放在伦敦各处，里面藏好衣服、毒品和现金。在一个小红本子上我用暗码记下了这些车辆停放之处。在逃离的第一步实现后，我决定把大部分钱藏在尽量多的地方，琢磨着这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我所有的钱。在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我订购了一百只防火的箱子，差不多塞满了我西摩街公寓里的两间屋子。好几天的工夫我把钱从原来的藏放地拿出来，把巨额财富带回到我在大理石拱形牌楼处的“柏林地下防弹室”法。

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我在每个箱子里放了一千英镑面额为十英镑的钞票和战时生存所必需的医药用品。每个箱子里还有三种不同成分的兴奋剂各五十粒，及五支卷好了的大麻香烟。锁好每只箱子，编好号，最后我落下了庞大的一串钥匙。当战争在我紧锁的门外和遮黑了的窗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我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了这一庞大的任务。在我昼夜忙碌的时候，惟一缺少的就是防空警报的尖啸声。

和一个神经完全错乱的疯子一样，我开始把这些箱子藏在伦敦各处的房子里。这件事用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的神智进一步崩溃。为了藏放这些装了钱的箱子，我租房子，住到朋友或任何让我去住的人的家里，只要能够进入阁楼或闲置的地下室就行。在我吸毒后晕晕乎乎的脑子里，我想的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我总可以有办法把钱弄回来。就在我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伦敦肯定还有许多房子的阁楼上藏着钱和毒品。

我把头发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用假名在银行里开了十几个新账户以藏匿更多的钱。我已接近永久性精神错乱，比起我来，在地下防弹室里的希特勒一定感到很安全。当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以后，我把自己锁在了公寓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一连几天我独自坐在位于四楼的黑黑的“柏林地下防弹室”里，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小短腿来的，他威胁说，要是我不给他更多的钱，他就要把我的老婆、孩子、克拉拉和艾伦都杀掉。我害怕他们出危险，把一半的牙买加大汉安排在汉密尔顿台地克拉拉家、格洛斯特路艾伦的公寓和布莱克希斯卡米拉家外面进行二十四小时守卫。整夜的时间，在吸足了专以后我驱车经过他们的房子，检查坐满了黑人守卫的汽车。我脑子里一片糊涂，只有吸食更多的毒品，如果还有可能再增加的话。

由于担心孩子们的安全，第二天的上午我决定把她们迅速而秘密地搬出伦敦。两周后我在

梅登黑德附近的布雷买下了一所六个卧室的住宅，一家人在根本没有意识到危

我搬回去和卡米拉一起生活，几乎没有在公寓里留下什么衣服。在新住宅里共同生活的四个月结果成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时间。少年时代的恋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冷漠而专为自己打算的女人。假笑代替了歇斯底里的尖叫，我们的婚姻此时仅仅是一种摆设。我回到从来不曾真正意义上存在过的婚姻中来简直是疯了，但像个名副其实的痛君子，回来是为了受到更多的惩罚，就像一只正在被挤干的柠檬。

新住宅坐落在离伦敦约五十英里的伯克郡，我们的女儿和卡米拉的现在已经长成漂亮少女的妹妹们同我们住在一起。在我吸毒以及与家庭很少联系的这些年里，她们和我疏远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我和卡米拉准一真正的谈话都是关于装饰新房子和买家具要用钱的事。“早上好，你好吗？”被“我们还需要五百英镑买地毯”所代替。我时常感到，如果我们在过厅里放个文件盘子来留便条，对大家都要容易一些，省得她们看到我恼火。帕了顿车站后面的酒鬼跟我说我的话比我全家人跟我说的话放在一起都要多。

克拉拉，一个我确实爱着、有可能一起生活得幸福的人，就住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我却摆脱不掉长期对卡米拉的依恋。我和所有的癌导干一样欺骗生活，指望着克拉拉能屈居一会等着我。其实我只要承认我的卡米拉梦想已经结束，重新开始生活就行。但是我却做不到。

使事情更糟的是，在伦敦我公司和团伙的麻烦越来越大了。在一次吸毒后大发脾气时我把剩下的办公室人员全解雇了，而且换掉了所有的锁，不让任何人进到公司里去。在这场感情大混乱的中间，我料定小短腿会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他仍然没有发现我搬到了什么地方去，但还在到处找我。我急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使这个疯子不要再来骚扰我，便去找内希兄弟。和克雷兄弟一样，内希兄弟是第一流的暴徒，在伦敦人见人怕。我们安排好在我西摩街的公寓里见面，内希兄弟中的两位来见了面。

我在伦敦时总是要和克拉拉会面，他们来的时候克拉拉正在厨房里。我们坐了下来，我听着内希兄弟解释说。克利福德可不是个傻子，因此要警告他木来骚扰我得花一大叠钱。为什么特德·希思首相不用这帮人来对付斯卡吉尔和矿工呢，我心里在想。内希们很快就能解决煤矿争端的。当我和伦敦最凶恶的暴徒们谈判时，克拉拉端着茶和黄瓜三明治走了进来。突然电灯灭了，矿工的罢工引起了又一次停电。感谢克拉拉，我们的会谈得以在烛光下继续。“挺温暖亲切的。”她离开房间时说。

两个内希兄弟走后，想到要受惠于内希们，我突然感到这比和克利福德打交道要糟多了。现在我成了一部永远不会结束的恐怖电影中的主角，像人家换用汽车那样换用暴徒团伙。完成了这笔交易，我把一个疯狂的杀手换成了一个更为凶恶的暴徒。但是对于克拉拉来说，伦敦的匪徒头子问她“还有三明治吗，宝贝？”都只是女子中学里好玩的言行。那天晚上我看见她在日记：“一天活动领繁。约翰打来电话要求教训不听话的布赖恩。”

布赖恩·克利福德受到了口头警告，由于惧怕内希们的权力，同意不再和我作对，算是一切扯平。这是好消息，但是很快一大堆新问题替代了小短腿。我唯一没有藏起来的巨额现金是大量的爱尔兰钞票，过了一天我用这笔钱来支付内希的第一笔账。我们在这是不是合法贯采的问题上吵了起来，嚷嚷了半天以后，我同意第二天自己去把它换成英镑。

这是使我垮下来的最后一击。内希兄弟走了以后我崩溃了。我受不了啦。我不想继续下去了。人们想从我这里得到的就是钱。妻子、父母、匪徒，他们要的只是钱。准一不要我钱的人是克拉拉，可是那天晚上她对我说，不久她要离开英国到澳大利亚去生活了，她的父母担心女儿的安全，决定把她送得离我越远越好。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样做的。但是当时我伤心极了，这是针在我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

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公寓，再也不回来了。西摩衍的岁月就此结束。在我向牛津街走去时，我走过一个躺在一家商店门道里的流浪汉。我被他吸引了，站在那儿看着他喝烈酒，全然感觉不到世界的存在，全然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我能成为像他这样的流浪汉吗？那时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麻烦我了，我暗自笑着，心里想道。

那天下午稍晚我到帕了顿的时候，同性恋古玩南马丁正要关门。我给了他一个“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笑容后，说服他同意让我把一些文件存放在他空着没用的地下室里。他交给我地下

室的钥匙后就坐出租车离开了，临走时流里流气地笑着说：“宝贝儿，你欠我一份情。”

我即将结束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了。那个流浪汉给了我如何获得宁静的提示。我首先要做的是使公司消失。我环顾那十间办公室，意识到如果自己一个人干，那就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因此我给一家提供办事员的机构打电话，他们派来了四个壮汉。在我的指点下，他们把整个四层办公大楼里所有的档案、分类账和支票本等一切文件全都搬到了从马丁的地下室岔出去的一条地道里。我梦想的事业、那个总计划的具体结果现在都被埋葬在马路下面了，但是我并不悲哀，我自由了。当大约三十只箱子的最后一只放好了以后，我封上了通向岔道去的洞口。在地下室里我留下了几只箱子，好让马丁以为这几只箱子就是所有的东西，不知道还有别的。这时那几个人把办公大楼的门面装饰拆了下来，拿到我付给他们的钱以后就走了。十五分钟后一个经营旧家具的小商人来把办公楼里所有的家具都请走了，只剩下了绿色的地毯。任务完成后我到马路对面的酒吧去庆祝我的帝国的消失。不到三个小时它就木复存在了。

没有公司可以榨取，匪徒们就木会来麻烦我了，我笑着坐上了从帕丁顿到梅登黑德去的火车。我因酒醉驾车被罚不能再开车了。我在火车上，心里考虑着我最后的问题，那就是卡米拉和她永无休止的要求。两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发现问题已自行解决。卡米拉已经给我打点好了一只箱子。现在柠檬不只看上去干了，而且已经过了销售期，于是她要在发霉之前把我扔出去。那晚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尖叫，也没有争吵，一切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只是提起箱子走出了大门，后来证明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这扇大门。

五个孩子都在前院和我告别。大家都很激动。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并不完全理解是怎么回事，但卡米拉的妹妹们看上去很难过。我一个个和她们吻别，然后带着伤心和解脱混在一起的感情高抬着头走了。不要回头看，我满含眼泪对自己说，不要让她们看见你哭。在街角处我放下箱子，回头看了最后一眼，看见她们仍旧远远地站在那儿。一时间我感到像回到了马耳他，我对三个小姑娘说她们的母亲正在天堂里和上帝一起吃有鸡蛋的早餐。

没有了家人，我做好了在吸毒岛上过独自囚禁的生活的准备。

在我拼命为寻求快感而不断将各种毒品混合使用时，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晚在梅登黑德火车站里我吸食的是什么样的混合品。在回伦敦的路上我情绪非常糟，一路哭着，当火车轰隆隆驶过伯克郡的乡村时，我回想起所有那些在毒品左右下的岁月。和同性恋的纽沃姆大夫第一次用兴奋剂，绅士乔治，艾伦，整船的毒品，成箱的金钱。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飞速旋转。我正经历着身心的全面崩溃。一切都出了故障，全部的螺丝都松了，现在我真的是只差一张牌就什么都齐了。

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打开了车窗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在了行驶着的火车的窗外，然后我从口袋里把钱掏了出来，开始脱衣服。我哭着说：“你们这些杂种不会得到这些了！”就把衣服一件件地扔到了窗外。火车到达帕丁顿的时候我身上一丝不挂，从空车厢里跑出来，经过惊愕的铁路工作人员，他们根本无法接近我。没等有人明白出了什么事，我已经消失在车站后面醉鬼们坐着的地方中了。甚至我的醉醺醺的流浪汉们也对我赤裸裸地来到颇感惊奇。我用模在手里的钱从一个醉鬼那儿买了件大衣，他的朋友把剩下的钱拿去买了酒。突然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兴奋剂了，我把药丸和衣服一起扔到车窗外面去了。但是那晚我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知，很快就感到安全了。

当我们没有一丝牵挂地互相堆叠在一起睡着了的时候，我终于真正到家了。

次日早上醒来我感到一片糊涂，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尤为什么我只穿着一件臭烘烘的大衣？“啊，他妈的，昨晚出了什么事？”我大叫道，吵醒了一两个打着呼暖的朋友。

我惊慌失措地躺在那儿，迫切需要我的早间安非他明。突然我想起来，在教堂街空空的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还藏有毒品，离这里只有两英里远。只有一个小问题，钥匙也从车窗扔了出去。我泰然决定破门而入，这毕竟是我的楼房。大约清晨四点钟时，我穿过空无人迹的大街向那座大楼走去。帕丁顿警署外面的两个警察在光脚流浪汉拖着脚走过他们时几乎连头也没有抬。到了无人的办公大楼处，我发现从楼后面破门而入非常容易，我在地下室岔出去的一条小地道里找到了藏在那儿的钱和各种各样的药丸。

为了摆脱这一噩梦，我吞服了大量的镇静剂，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我混乱动荡生活的新一页即将开始。

我在空空的四层大楼中醒来，感到非常害怕。我怎么了？我的衣服到哪儿去了？我脑子里一片

糊涂，看到钱和各式各样的毒品撒了一地，就吞下了几粒黄色药丸好停止身上的颤抖。我极度恐惧地躺在那里，身体在臭烘烘的大衣里面哆嗦着，耳朵里听得见外面生活在正常地进行。这天是集市日，我从肮脏的窗子里看出去，看见了我非常熟悉的摊主，然而不知怎地他们使我感到不安。我蹲在地上怕他们看见我，悄悄走进地下室里，突然一阵兴奋的快感传遍全身，毒品开始起作用了。我很快越来越亢奋，又感到自己是主宰一切的君主了。但国王陛下穿什么呢？我到一间间屋子里去找衣服，但是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绿色的地毯。我沮丧地坐了下来，但是感谢兴奋剂的影响，不久勇气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决定干脆从大门走出去，去买新衣服。管他妈的！如果有人拦住我，我就说，我昨晚把衣服丢了。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这种狂妄的心态下我走下楼去，却发现楼门是锁着的！我慌了！钥匙呢？我怎么进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我是昨天从楼的后面砸碎了一个小窗户爬进来的。我爬出去的时候腿被尖利的玻璃茬子割破了，跑过小巷时血流到了光着的脚上。多么大的不同啊！毒品在我脑袋里产生着兴奋快感，口袋里装满了钱，该是买东西的时候啦。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牛津大街一家英国主要的服装公司马克斯一斯潘塞的门外。门里站着一个保安员，幸亏我还算清醒，知道像我这副样子，不等我能买到什么东西就会被他赶出大门。我必须动作迅速，至少抓上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赶快把钱付掉，这样我就能穿得像样一点，再去买我需要的别的东西。

他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看到机会来了，就蹿了进去，抓了两件眼前的衣服。在我等着付款的时候保安员向我走来，但是他晚了一步。我已经买好了裤子，正往商店外走去。在外面繁忙的大街上，当我站在人行道中间，脱下臭烘烘的大衣，得意地换上了一件粉红女式毛衣和一条小了两号的裤子时，所有购物的人都猛地停住了脚步。我穿上这身衣服，进了最近的一家鞋店，从一个有几分害怕的店员那儿买了一双厚底便鞋。脚上有了鞋子，怀着像个石油王子的感觉，我回到了马克斯一斯潘塞，对保安员微笑着，他瞪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别紧张，我是个电影明星，”走过他身边时我说道，“这些都拍下来了，是个电视记录片。”我正在毒品亢奋的高潮中，在店里一共买了价值二百多英镑的衣服，然后到坎伯兰饭店去刮脸。换好衣服，刮过脸，一副百万富翁的派头，我回到服装公司去找那个保安员最后报仇，骂了他个狗血喷头，他只是答了一句：“滚吧，吸毒虫先生！”他怎么知道我吸毒？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呀，离开商店时我心里在想。我叫了一辆黑色出租车，当汽车加入星期六上午的车流时我看见那件被扔掉的大衣仍躺在路沟里。当自己噩梦般未来的情景再一次闪过我的脑海时，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再一次回头看去，恐怖地看到自己躺在那件大衣里面。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位锁匠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就进入到办公楼里，装上了新锁。他把新钥匙递给我时我笑着在想，我真的不能再生气把这些钥匙扔了。不久我就穿着新衣服，像只孔雀那样炫耀地在教堂街上走来走去，买了许多人造珠宝、古画和其他便宜古董，我把这些东西放在空空的展销室里，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创造出了自己的废旧品商店。我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不需要钱，我要的是能够平静地吸毒，同时有点事情可做。这里是我自己的东西，我的妻子和所有的暴徒连看都不屑一看的東西，更不用说想要拿走了。

对了！现在该弄住的地方了，我笑着想道。我在对面的商店里买了一张旧床，在一个摆摊子的人的帮助下，把床搬到了顶层我原来的总经理室里。这就是我的新家，我想，一面摇着头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忘却痛苦。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就把自己从一个裹着臭烘烘的大衣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在楼上有卧室、经营废旧品和古董的店老板。

现在毒品使我能够完全浸沉在我这新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把过去几个月的痛苦抛在脑后。我的商店马上就开始营业。我在店门外贴了一张巨大的告示，上面写着：“收购一切十万英镑以内的物品。备有现金。不提问题。”啊，老天，瞧这引起了多少好玩的事！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什么人都拿着东西到店里来卖，多半都是偷来的。我根本没有费劲买卖就兴隆了起来，更多该死的钱流了进来。我简直躲都躲不开这玩意。现在没有人来打搅我了。但是一天晚上，从停放在街对面的一辆大轿车里我看见了熟悉的面孔，不过这些暴徒显然相信我得了神经病，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这段时间里克拉拉常来看我，她看到我这样对待自己，心里很难过。悲惨的是，我们俩都觉得失去了希望。这儿有两个互相爱着的人，一个不久就要去到地球另一面的岛上，而另一个多年前已经去到了另一个岛上——吸毒岛。

那年夏天，克拉拉开车送我去参加艾伦母亲的葬礼。看着她和艾伦，我认识到了，为了得到吸毒后的瞬间兴奋快感，我故意抛弃掉的是怎样的一份爱。看到那位老妇人的棺材，我回想起混在克雷兄弟匪帮中干讹诈的事时她说过的话：“如果有人爱你，就值得为他们去死。”悲哀的是，对于我，甚至都不值得为他们去停止吸毒。

我吸毒后反复无常的情绪大起大落使克拉拉感到厌恶，她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没有了任何意义。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廉价的二流电影。

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总是在店里呆到很晚，抽大麻香烟，快活地在飘飘然的状态下炫耀卖弄。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匆匆走过。她身材苗条，有一头长长的黑色鬈发，我看着她走进马丁店楼上的公寓里，心里想，我得了解了解那姑娘的情况。第二天我问马丁的同居男朋友戴维她是谁。“‘她是楼上的房客，美国人。’”他说。“挺漂亮的小妞。”我暗想道。后来那天上午我去买香烟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店里有十几本杂志的封面上都是这个女孩，半裸着在阳伞下接着姿势照的。现在我更加迫切地想要见见这位漂亮的美国邻居了，便买下了店里所有的杂志。我撕下了封面，把它们贴在商店的橱窗玻璃上，那晚她经过时惊异地停下了脚步，大笑起来。我从店里走出来，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有名的邻居呢。”我作了自我介绍，我们站在街上聊了一会儿。她的名字叫兰娜，我满怀勇气自己提出到她的公寓里去喝点什么。我使劲想和她做爱，但是当她的内裤只剩下村裤时却拒绝进行下去，说我们应该先互相多了解一些。彻底的做爱不得木等到第二天晚上。

兰娜想做一个摇滚歌星，当她在等待获得名扬世界的机会时，她靠做摄影模特或买卖廉价首饰维持生活。我的投机取巧的买卖方式给了这个野心勃勃然而十分单纯的年轻女孩极深的印象，我们谈到深夜，我照例神侃开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幻想。我告诉她我和埃尔维斯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间的友谊。“认识他很多年了，明天我替你打电话给他。”我说，一面仍努力想把手伸进她的衬裤里去。我一直没能给埃尔维斯成他的经纪人打通电话，但是第二天我搬去和兰娜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我废旧品店的合伙人。我向来没有关心过钱的进出方面的事，现在干脆把一切交给了兰娜。对于我，做生意只是逃避令人痛苦的现实的一种游戏。

在内心深处我感到非常悲哀，但我使自己不停地吸食毒品，永远处于晕乎乎的状态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不去想它。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我开始注意到毒品在我身上产生的反应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年来我可以一连数目都处于兴奋的快感之中，可是现在无论我服用多少兴奋剂，这种兴奋快感只能持续几个小时。我的新陈代谢机制对于毒品产生了抗药性。我开始记不起自己每一个小时都在做些什么，精神状态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糟得多。我常常开始准备做一件事可又忘记了要做的是什么，或者发现自己在一家商店里仅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些偷来的珠宝，那是我一年多以前在一次吸毒后的飘飘然状态中藏在地下室里的，藏起来以后就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我把这些珠宝塞进了口袋里，结果又给忘了。

为了吸引过路的人群，兰娜开始把装饰性首饰陈列在店铺门外，卖得很便宜。那个星期六上午，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成面的人。好像发了病的足球迷一样，他们拼命互相推挤，争着在耳环和项链里细细翻来找去。我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把偷来的珍贵的珠宝首饰和不值钱的假玩意混在了一起。一切乱成了一团，什么东西都比平时卖得快得多。也该卖得快，二十便士一只钻戒太值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疯狂的插曲使我们的生意火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因为消息不胜而走，从那以后人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们商店里来。

许多人不明白究竟我的行为是为了掩盖什么而做出来的表演，还是说仅仅是一个痛君子为了给自己取乐而进行的游戏。这儿是一个有大把票子的精神上困惑忧虑的人，似乎一心一意要把这些票子送人或扔掉。谁能够对像我这种行为的人作出任何评价来呢？一会儿他穿着一件破大衣和酒鬼们坐在一起喝得醉醋酸的，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却又坐着出租车离开一家服装商场。起初装疯卖傻是为了摆脱犯罪团伙的一个游戏。这种做法是不是出了大毛病？是又不是。我吸毒吸得太厉害了，即使今天也无法说清什么时候在装假，什么时候是真疯。

克拉拉那个周末要到澳大利亚去了，她来向我告别。我们知道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正站在我的店门外吃着冰激凌告别的时候，卡米拉突然闯来了。她大喊大叫，要钱给梅登黑德的房子做完内装修。克拉拉在一边不敢相信似的看着，在争吵当中突然一个大蛋卷冰激凌拍在了她的脸上。我是怎么做的呢？叫卡米拉滚蛋吗？没有，我把钱给了她。这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也许和艾伦一样，我无法从幻想中醒来，便用给钱的方式来维持这个难以捉摸的梦境。现在不是要让医生检查我的脑袋是不是疯了，而是到了应该把我的脑袋整个砍下来的时候了。

当吸毒又一次导致恐惧妄想狂时，我完全生活在了现实之外。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和我作对，但是我应该最怕谁呢？龙尼·克雷翻过监牢的高墙来攻击我吗？还是警察、内希兄弟、小短腿，或者说不定是乘着装甲运冰激凌车回来的我的妻子？这是一个我永远无法从中醒来的活生生的噩梦。

一天上午，多年吸毒的恶果终于攥住了我，我倒在大街上，哭了好几个钟头。商店和整座大楼都关闭了，剩下的古董废旧品和我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一样，不知怎地都消失了。最后的一

天我喝醉了，在窗子上留了一张很大的通知，上面写着：“永别了。和阿波罗11号一起上了月球。”这是美国人在月球上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具有清醒神志的最后一天。

我身体上和精神上全都彻底崩溃了，大脑里永远丢失了一个主要部件，一连好几天我躲在兰娜公寓的小橱里。

末日一天比一天临近了。

这时，随着我开始为多年吸毒的恶果付出代价，在我身上产生了第一个重大的变化。以后的一个月左右，兰娜基本上不在家，我整天睡在床上，吓得连门也不敢给人开。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房子、公寓、商店。不知怎他就那么没有了。就连我新买的衣服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瓶瓶的安非他明，而这些药丸也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我再也得不到快乐亢奋或飘飘然的感觉了。我无法该对别人。有一次马丁来看兰娜时我吓得躲在了床底下。

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以为是兰娜来的电话，就去接了，结果发现自己在和从前认识的一个窃贼说话。他们计划第二天要去抢劫，而几个月前我在吸毒后兴奋迷糊的状态下同意去参加。“今天晚上十一点钟去接你，斯蒂芬老伙计。”他说。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电话挂上了。啊，老天爷！我该怎么办？我必须振作起来，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设法从内心崩溃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我照着镜子，无法相信这个鼻涕呼啦不成样子的人真的就是我。毒品毁掉了我的心智，只剩下了个不中用的大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头子。这就见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痛君子都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一锤终究要落下。那天我吞下了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仍然期待着给我以信心的兴奋快感再回来。我想，点上了火以后，水壶必定会开的；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甚至都不能从床上起来。这些兴奋剂可不是黑市上搞来的便宜货，而是私人医生开的右旋安非他明片。什么地方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了——不是毒品，而是我那被摧毁了的头脑。

那晚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爬到了大楼的顶上，默默地看着那两个窃贼的到来。在我严格的指示下，兰娜开了门，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们等他，”他们说，“他知道我们要来。”我高高地躲在上面，看着那两个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我不仅怕得不敢去盗窃，而且甚至连下去告诉他们也不敢。他们最后很生气地走了。

时间过去了，我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开始和兰娜一起看电视了。她高兴地看到美国从越南撤军，她的堂兄将要回家了。然而并不全是好消息。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去世了。

又过了一周左右，兰娜动员我下了床。在更大剂量的兴奋剂的帮助之下我开始出门了。起初主要是在晚上街上没有车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我到高热公司的办公室去看特里·马文。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也许是希望这能帮助我找回自我吧。

特里张开双臂欢迎我，他向来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有过多大的争吵。那天上午他介绍我认识了杰克·康特尔，未来世界拳击冠军，那时仍在特里的掌握之下。我在等待特里的时候和杰克聊起了最近在牙买加举行的弗雷泽和福尔曼之战，他和许多别的人一样，对于弗雷泽的失败颇感惊奇。我在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遇见了许多黑社会的有名人物。接待室成了暴徒们的社交俱乐部。特里的阿尔·卡彭狂想招来了恶果，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他在为暴徒们工作了。各种暴徒取代了挣正常工资的正常工作人员，特里付给他们大量的钱，而他们什么也不干地到处晃悠。有着暴徒情结的特里不计支出，必须每天注入感到“和他们是一伙”的这种刺激。他在个人的办公室里自豪地给我看了“龙尼·克雷”从监牢里给他送来的一张画。这是否真是克雷画的水彩画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全都相信是克雷画的就行了。

特里坐下后笑着说：“我有个棒极了的工作给你做。”他接着提出一星期付我两百英镑做我觉得几乎是什么事也不用干的工作。我没有意识到的是，特里心中自有打算。

那个时候，他正在受到一家有名的英国小报《世界新闻》的调查。报上要载的故事非常具有刺激性，揭开了一个把公司用作掩护进行冒险活动的克雷兄弟和另一个显赫的罪犯家族中许多人物的面纱。这一丑闻是特里自己的“水门事件”。尼克松也许觉得自己有了麻烦，但是在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绿地才是真正酝酿着麻烦呢。故事就像是罪犯人名录，谋杀、诈骗、毒打。不正当的抵押、被收买了的警察以及讹诈，等等，等等，像个描写犯罪的肥皂剧。我同意开始工作，指望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一两天以后有人看见马路对面停了一辆汽车，《世界新闻》的摄影记者正在忙着把每一个

进出公司的人照下来。那篇揭发的报道估计星期日就要发表，特里召集了几个可疑人物来开紧急会议。没有一个匪徒能承受得起这个故事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许多当地的警官都受到了特里的贿赂，但是这类丑闻会引起上面的行动。特里和他头发灰白的同伙们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想出了一个狡诈的办法，以阻止这个故事的发表。有一个人将和那家报纸接触，提出把从特里的个人档案中偷出来的文件卖给他们，而使《世界新闻》接受这些盗窃来的材料，双方就都犯了重罪。这时偷文件的贼就会把一切向警察交代出来，警察将以盗窃罪起诉他，这样就自动把报纸因接受盗窃的赃物而牵连进来，报纸就只有在法院审判此案后才能发表这个故事。如果在审判前刊登，就是违反审理的行为。

现在特里和他的一伙需要的就是一个愚蠢到真会承认自己犯了盗窃和密谋策划罪的人，一个十足的笨蛋。他们不用往远处去找这样一个傻瓜，只要到办公楼的卫生间去就行了。我已经是一天里不知道第多少次在那里吞服安非他明了。我晕晕乎乎地甚至都没有考虑一下后果就快活地答应去欺骗那家报纸。口袋里的安非他明药丸沙沙地响着，我横穿过芬奇利路向摄影记者招招手，他们跟着我来到了拐角处。我给他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文件来吊他们的胃口。他们中了计，把我带到编辑室去见编辑。在《世界新闻》的办公楼里我拿出来了几份显示有罪的文件，谈好了价。编辑愚蠢地同意付给我一笔钱作为部分付款，我被带到了出纳办公室，拿到了钱。有了我的那份签了字的收据，特里和他的暴徒朋友就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制止登载那篇报道。在报社的办公楼外，一辆有个大个子司机的汽车在等着我，他一言不发地把我送回到特里那儿。当有个人到对面戈尔德斯绿地警察署去安排逮捕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和几个粗壮的人物在办公室里等着。五分钟后我被带到了警察署，在那里我在一份供状上签了名，牵涉到了《世界新闻》。警察关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将我交保释放。一个有名的犯罪家族中的小兄弟到拘留所来接我，把我送回到兰哪家里。我下车时他说：“别见人，别惹事。”我哪里用得着多嘱咐！我浑身难受，直接上了床，在上面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

我的母亲和弟弟保罗收到了克拉拉从澳大利亚写来的信，告诉他们我病得很厉害，他们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在他们的邀请之下，兰娜和我退掉了马丁楼上的公寓，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把原来家里的房子卖了，这时住在芬奇利区亨登巷的一套小公寓里。

这时我急需住院。对我来说惟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疗养院。我脑子的状况越来越恶化，现在已经不仅是吸毒的事了，我得了精神病。我怀疑所有的人，觉得说不定把我搬到母亲的公寓是个阴谋。也许妈妈和兰娜是那些每天早上从信箱里钻进来的六英寸小人的同谋。他们都想偷我的小红本。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记本里我仔细地记载了我仍然能够记得的藏钱的地方。其中有的房产已经换了主人，新主人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财宝。随着不信任感的加剧，我甚至在睡觉时把红本子塞在衬裤里。但是有一晚，我实在受不了本子压在阴茎上，就想出了一个轻松得多的主意。我编了一首诗，在诗里用暗语列出了所有藏钱的地方。这首诗是这样的：

清晨与百灵鸟同起
一切都隐藏在公园里
让我们一起快活精戏
一切都隐藏在一号教堂里
大家一起把枯枝拾起
一切都隐藏在七十六号里
那首诗就这样一直继续了两页……

公园指的是海德公园大道上我们家原来的房子，教堂是指教堂街马丁的店铺，七十六号是诺福克大街上祖父的房子，如此等等。我整天背这首诗、天天背这首诗，我那可怜的被摧毁了的头脑是在努力从那些疯狂吸毒的年代中抢救出些什么来。许多个星期以后，当我已能将那首诗倒背如流时，就郑重其事地把那个小本子烧掉了，把灰放进了一个小果酱罐里，罐上贴着“红本酱”。“流浪行动”按新的总计划执行，我笑着想道。现在谁也不可能得到我的钱箱了，只有我知道那首诗。我一天三次把这诗写出来，每次都把写下的东西烧掉，把灰放进罐子里。最后，在每次活动结束后，我就在随时带在身上的“诗歌记忆表”上打一个勾。

我的神经已经近于失常，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更糟。我最后在繁忙的事登巷里乱跑，嘴里高喊着：“杂种们，现在得用十吨卡车才能害死我了！”许多车子都急拐弯以避免压着我，其中一辆是警车。结果导致伦敦最出名的精神病医生约翰·兰德尔给我检查。以前我看过不少精神病医生，只是为得到毒品而装疯，可这回是真的了，我确实疯了。

从兰德尔大夫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光荣，一个真正的人，对于他来说，病人的利益比钱包更为重要。“你今天就得住院，”他对我说，“我现在马上把你送到庙堂山病院，这是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精神病院。”接着他说：“我不能让你离开这个

诊所，你会危及你自己，也会危及别人。”一小时后我来到了庙堂山，这原是坐落在汉普斯特德旷原上的一座独立宅院，被改成一个有三十间病房的医院。当救护车开进大门时，我看见杰克·康特尔跑了过去，他正在对面的旷原上进行训练。他在为不久即将在文布利举行的世界冠军挑战赛做准备。我向他招手，可是他没有看见我。

医院的接待处里尽是一些怪模怪样的人，打扮成女人的男子。除了他自己的一般住院病人外，兰德尔大夫每星期到这里来两次，给患有易装瘤的精神病人看病。在等着住院的时候，我写下了我那首诗，烧掉那张纸以后我大声背诵“清晨与百灵鸟同起……”，这时一个漂亮的碧眼金发的人走过来对我说：“而你会被鲨鱼吃掉！”他一她微笑着说：“这首诗更好些，宝贝。”我开始哭了起来。另一个有易装痛的人用他的一她的胳膊搂着我说：“别理睬琼，她是个淫妇。”这时一个护士走了进来，把我带到楼上一间病房里，并给我服用了强效镇静剂。

一个女大夫第二天和我谈了整个一上午，但是我没有承认自己可怕的吸毒恶习，因此她不可能作出诊断。谈了几个小时以后她在我的住院卡上写道：“严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妄想恐惧。”对于真正的问题所在，即安非他明依赖症，这是能做到的最接近的判断了。

开始时对我采取了深睡疗法，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使我一天二十个小时人事不省。我醒来只是为了进食和上厕所。每一次苏醒的时间是三十分钟，然后打一针再睡。我每次醒过来时都背那首诗，睡着前还在嘟囔。我不再把它写下来，我的拍纸簿和装灰的果酱罐在什么地方的小柜子里。许多星期后当治疗结束时，他们允许我和别的病人在一起，把我的东西也还给了我。我又可以烧我的诗了。

在进行作业疗法时我们常常画画，我总是画诗里的景象，百灵鸟啦，教堂啦等等。我看见墙上的这些画时常常会笑起来，心里想，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画里包含的秘密。有一个护士总是开玩笑说：“你要成为新毕加索了。”这位老画家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世。

只眼用医院的药，我似乎平静了下来，但随着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我感到厌倦起来，觉得该是进行补充治疗的时候了。我给兰娜打电话，让她给我带已经装好了衣服的箱子来。箱子有层假底，我在里面秘密藏好了应急用的毒品。在兰娜拿来箱子的那天上午，我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她的探视，她挥手和我告别时我就冲进厕所，一下子吞了大约三十粒右旋安非他明。我以前从来没有一次吞服过这么多，在医院这平静的一段生活后，我的脑袋准备好了要接受一次无比剧烈的兴奋和畅快的满足。我坐在其他半死不活的病人中间，开始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百病皆无的感觉，我的脑袋膨胀爆炸。我大笑着在医院到处乱跑，对护士说我要走了。我找自己的大衣，眼看着就要离开时一个大个于男护士突然一把抓住了我。“可抓住你了！”他喊道。似乎是刹那之间他就把我拽进了一间侧面的病房，在另一个护士的帮助之下把我捆在了床上。我拼命挣扎，可是根本动不了。他给我打了一针。这一针本该使我失去知觉，但由于安非他明这时正发挥着最大的效力，我仍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以避免再给我打针。我感到他们在我头上放了垫子，猜想大概要给我做头部扫描，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可能通过机器读到我的诗，就感到放心了。突然阵阵闪电照亮了我的脑袋，我的身子蹦到了空中。

上帝的脸在望着我。几秒钟的沉寂。然后地震又一次发生，如爆炸的焰火照亮了我大脑的细胞。这一次上帝在嘲笑我。在这一切数次重复之时我在痛苦中呻吟。然后是空无。寂静。

我的头阵阵抽痛。我睁开了眼睛。电线已经没有了。我独自躺着。我能听见附近有人在呻吟。我们都死了吗？我是不是在真实的“驱魔”电影里？教士在哪里？他已经把我身上的恶魔赶走了吗？突然一个护士出现了，没有拿钉着耶稣像的十字架，而是拿着一块书写板。他把我领进了一间陌生的房间，我和一群神情恍惚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喝着茶，两眼茫然地瞪着天空。几分钟后我意识到我记不起我们是怎么进到那个房间去的，也记不起那该死的茶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给我进行了电击治疗，这会使你暂时失去记忆，在有的情况下会永远失去记忆。记忆丧失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在我身上是记忆的完全丧失。过去十年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被全部扫净，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一小时后护士把我送回到娱乐室，我只是心满意足地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奇怪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当有旋安非他明在我空白的大脑中打转的时候，护士过来给了我一块花生着三明治。

我觉得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伸手拿出来了一张图表，上面写着，诗已写，灰入罐。在每一行下面都有打的勾，最后一次是星期四上午记的。一个护士走过，我问她今天星期几。“星期四下午。”她回答说。“我在什么地方？”“你在医院里。你刚做完电击治疗，你会暂时忘记一些事情。”她解释道。她看着我的图表笑了，问我那首诗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愚蠢的诗！”我叫喊着把图表扔进了废纸篓里。“跟我来。”她说，把我带进了作业疗法室。她指

着架子上二个装满了灰的果酱罐：“这是你的吗？”“别他妈傻了。你下面还要说些什么？”我尖叫道。“这是什么地方，疯人院吗？”我生气地走开了，回到娱乐室里坐下，脑子里一片糊涂。我整个的一段生活不存在了。我见过的人和地方在脑子里都没有了，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我的情况是，我的记忆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渐渐恢复，即使在今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根本没有恢复的东西。

我后来还经受了多次电击治疗，但因为用了镇静剂，所以没有再看见上帝的脸。最后我从庙堂山病院被放了出来，不再抑郁，什么也不再了。头脑里一片空白，我甚至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兰娜。

我们搬进了兰娜在戈尔德斯绿地的阿尔巴花园区新租的一套公寓里。在那儿我很快就重新过着依赖安非他明的生活。我推一没有忘记的事就是吸毒。当兰娜开始询问我关于藏匿的钱的事情时，我觉得非常有趣，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认为这是某种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笑话。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我母亲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存有一千英镑的银行存折，兰娜高兴极了。我觉得很奇怪，根本不记得在银行开过这样一个户头。但是这钱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料想得到，很快毒品就不起作用了，我又整天躺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月。兰娜越来越感到恼火，最后又把我送进了庙堂山病院去进一步抹除记忆，我的脑袋变得像个发电站一样。

我在庙堂山的那所病院里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忘记了兰娜的存在。除了病人和护士，医院以外的人一概不再存在。有一天兰娜带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来看我，她微笑着解释说她现在和这个人住在一起，他已经搬到了我们的公寓里。空白的头脑不会难过，我祝他们好运气，心里想，挺好的一对，他们干吗要来看我呢？我莫名其妙地站在砾石车道上挥手和他们告别，然后走进去再把脑袋给他们去通电。

几个星期后母亲来接她儿子的空壳子。我的脑袋像个烧坏了的灯泡，跟着妈妈到了她的车子那儿。坐在这里，跟我走，吃这个。我像一个所有的保险丝都烧断了的机器人一样，完全听任别人摆布。

在母亲家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地住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卡米拉的一个电话。我知道她是谁，但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面，也想不起来我们之间关系怎样。“好极了，我盼着呢。”当地邀请我到她那儿去度周末时我说道。星期五下午我在帕丁顿车站上火车时心里想，她为什么搬出了伦敦？

卡米拉比从前更漂亮了，她开着新车到车站来接我真是怪极了，我根本不记得买过那所房子，更别说在那里住过了。星期六全家围坐在一起共进午餐，无忧无虑地开始了周末。看着卡米拉的妹妹们时，我能想出自己把她们从马耳他带回来的事。但是那以后呢？当我努力想回忆往事的时候，头就剧烈地疼痛起来。我的女儿们特莎和安东尼仅微笑地看着我。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我上次坐在这儿后，我到哪里去了？热情款待在饭后卡米拉开车带我去看她想要我给她买的房子时结束了。

电击想必把我脑子里的愚蠢阀门上的保险丝给烧断了。我平静地回答道：“木行，我给你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恐怕你那‘对斯蒂芬和气点’的使命结束了。我不再想购买你的爱了。我宁愿没有它。”

在沉默中她直接开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都没有让我回去和孩子们说声再见。没有争吵，我只是下车走掉了。在火车上我读到安妮公主要和马克·菲利普斯结婚了。我希望他们干得比我好些。我暗自笑了，服用了更多的不那么快活的药丸。

大约一月以后，我收到通知，在伯克郡二个县法院审理我的离婚案。但是到了具体的那一天，我心里非常难过，吸毒吸得迷迷糊糊地到了法院。当传唤我们对我跳了起来，向法官路去，高声叫喊：“‘停止，停止这个案子！’”我吵得非常厉害，被官员带出了法庭，之后他们继续审理，我们正式离了婚。

我非常难受，但是离不离有什么区别呢？从在汽车里的第一个吻开始，这么多年以来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一个不存在的梦。

当我离开法院的时候，卡米拉的大妹妹约瑟菲娜告诉我卡米拉怀孕了，很快就要重新结婚。那天我看着卡米拉和她未来的丈夫开车离开时感到了钻心的痛苦。

这个伤口是最深的。回到母亲的公寓后，我情况更糟了，又产生了六英寸的小人从信箱里爬进来的恐怖幻觉。对我来说，那些小杂种在门厅里到处乱跑，嘲笑我，都是完全逼真的。在这一段僵尸般生活的最后，一件可以预见到的事发生了。兰娜打来了电话。她对新的男朋友感到腻味了，她仍希望能够找到藏起来的钱箱，所以要我回到她的身边。

本性难移，按照一贯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我答应了。

这时兰娜住在事登的一套供给伙食并有佣工服务的漂亮的一居室公寓里，她到我母亲家来接我、我们又一次在一起过日子。这段时期我开始剧烈头痛。于是便在已经吞食三量安非他

明的情况下加用了大量的止痛片。我连数也不数，就那么每隔小时左右各吃几粒。头痛得没法忍受，但是我得不到兰娜的真正同情，她决心不空着手离开我。只不过在等待不见了的钱箱重新出现而已。法庭判决离婚，并给予我对女儿的探视权，她们在圣诞节前要在我这里住两个星期。卡米拉已经再婚，和新丈夫巴里在惠灵顿买了一所大宅子。此人在他们认识的时候一文不名，搞到一个像卡米拉这样有钱的漂亮女人对他简直就是中了六合彩，一夜之间从租住屋搬进了时髦的大宅子。我只是在法庭上见到他一小会儿，但看得出来他是个自以为是了不起的杂种，碰上谈个好运气后一看见我就神气地一笑。我到他们的新家去接女儿时，惊愕地发现他们住在一步极其巨大的白房子里，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看到这种显赫的局面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然而特莎和安东尼姚却很高兴和我住在一起。那两个星期她们玩得高兴极了，可是对于我却不知怎地相当悲哀。和这两个孩子在一起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当然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做她们的好爸爸，至少当她们在我这里的时候。和所有父母离婚后受探视的儿童一样，她们享受着我这个不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父亲的没有水分的、过量的关注，一切充满孩子气的要求全都得到了满足。在每次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要做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并不是件难事。有的夜里，看到她们紧挨着睡在床上，我哭了，我是多么想能够使时间倒转、回到过去啊！

她们应该在圣诞节前的两天回到卡米拉那儿去，但是那天早上她们不肯走，十一岁的情莎仍旧迷恋着爸爸，她影响了小安东尼娜的思想，反复对妹妹灌输说：“和爸爸住在一起好玩多了。”我给卡米拉打电话，她认为这是个过圣诞节的临时问题，同意让她们继续住到元旦。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小女儿，这是极其美好的几天，我们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喂鸽子，到牛津街看彩灯。在特莎于一个周末给她母亲打电话之前，一切都十分平静安详。特莎在电话里告诉卡米拉，说她们要永远和爸爸住在一起，不回她那儿去了。这下子可乱套了。卡米拉大发脾气，但是社工部门拒绝行使紧急权力，除非法院作为诱拐儿童案重新进行审理，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在盛怒之下向当局告发我的吸毒问题，但他们拒绝干预，把孩子留在了一个无法照料自己。更不要说照料两个孩子的病人手里。这就和给一个带着一支装好了子弹的机关枪的杀人犯以假释一样！是夸张吗？如果考虑到我在接受了电击治疗后刚从锁着的精神病房里给放出来，而且仍然和过去一样吸毒成瘤，恐怕这说法就并不夸张了。

要在兰娜的一居室公寓里带大两个孩子，这地方可太小了，因此我们必须马上找个大点的地方。是我母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已故父亲的商店上面有一个四间住房的公寓刚刚空了出来，因为原来的长期住户突然得到了一所地方当局建造的房屋。这套坐落在托特纳姆的公寓非常简陋，需要修缮，但是几乎没有地皮租，我们住在那儿可以不用花什么钱。以典型的吸毒者的匆忙，我们当天就搬了进去。我买了鲜红的地毯铺在其中的两个房间里。利用了所有留在那儿的旧床和破旧家具，现在我的女儿们有个新家了。

特莎和安东尼境在等待监护权审理时开始到附近简陋的学校去上学了。令人惊讶的是，三个星期以后，一个无望的德君子，甚至在法院里还跑到厕所去喝白兰地的人被判得到了临时监护权。法院做出这一临时判决，等待高级法院审理，届时将听取所有的社工部门报告。

判决后的那些星期里，我竭尽全力想照顾好女儿们，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感情上起落很大。我把抗抑郁药、安非他明和烈酒一股脑儿混合使用，使得我越来越糊涂，远不是个好爸爸。我就是没法停止吸食毒品，但尽管如此我还多*常爱我的小女儿们。我设法保证了她们每天早晨上学时穿得干干净净的。夜里我洗干净她们穿脏了的内衣，常常得在热烤箱里把它们烘干，因为她们带来的衣服太少了。每天早上，尽管自己站立不稳，还是和她们一起走到拐角处送她们到学校去。我在吸毒后的瞠目中总算保持了我们的漏船没有下沉，但是在夜里，一见孩子们睡着以后，我就把自己喝得忘却了一切。我基本上是独自在照顾她们，因为兰媛和我维持这关系完全是为了有如一日可能会有钱，对孩子们丝毫不感兴趣，不是不在家就是睡大觉。

有一天早上学校打来了电话，说有人企图从操场上把安东尼妮抢走。头一天，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帕符里夏·赫斯特被绑架了，我脑子里转着这件事，便发疯般跑到学校去，结果发现一个非常漂亮、肚子已经很大的卡米拉在上锁的操场大门外尖叫。当她看见我时简直是怒气冲天：“你这个杂种，我保证不会轻饶了你。你很快就会和龙尼·比格斯一样给关起来的。你们这种人早晚会给逮住的。”她叫了又叫。比格斯是火车大劫案中的劫匪之一，刚在巴西被

捕，正等着引渡回国。卡米拉的丈夫巴里此时只是站在一边持着他那长得过长的小胡子。他已经从新婚姻中以砖瓦灰浆的形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现在是一脸厌倦的神情。警察被召唤到了学校里，但是他们无权干预民事纠纷，只能命令卡米拉不得扰乱治安，把事情交回到法院去审理。为了保证安东尼不再被抢走，那星期剩下的时间里我没有让她去上学。

这种病狂的局面一直继续到学期中间放假的时候，按法侯的命令，安东尼和特莎应该到她们母亲惠灵顿的住所去探视，住两个星期。卡米拉的自命不凡的新丈夫，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假英来接孩子们。他把车开走时，安东尼正从后车窗往外看，看见她的小圆脸我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永别。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她。

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里，这个不明就里的六岁小姑娘被洗了脑，相信了我会把她杀掉的说法，不愿意再回到我这里来了。然而对于特莎情形就不一样了，谁也不能使她相信我对她会有危险，她拒绝说她害怕自己十分喜爱的父亲。过去我们在托特里奇住所我的书房中所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是很难破坏的。现在她回到了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的爸爸身边。火上加油的是，一个更为迫切地追寻钱财的兰娜仍旧和她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父亲住在一起。

只有特莎一个人，照顾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她开始照顾起我来了。大概在这个时期，我收到了一万英镑，这是出卖梅登黑德那所房子中我的那份钱。但是由于找谁也不相信，甚至连银行也不信，就把支票兑成现金。好把钱全塞在自己的口袋里。就像命中注定的，我从银行出来时碰上了过去的一个老相识萨米，一个典型的二流精明角色。在七十年代中期房地产看涨的时候他做房地产买卖。萨米给我看他最新到手的一所叫林福德堂的大宅子的照片，不久前他把这宅子租给了在拍外景的电影明星。这所大宅子坐落在白金汉郡乡间自有的十英亩的土地上，有自己的群鱼湖和一个跟奥林匹克比赛用的游泳池一般大小的室内绿地。和往常一样，萨米债台高筑，急需钱以免破产。听说了我的意外之时，对于他简直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我迷迷糊糊地同意了和他的交易。我们就在银行外的大街上做好了一切安排。我给他两千英镑，他给我宅子的租约，使我即使在银行收回房产时也是租用宅子的人。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状态下跟着他到了格林街他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在那里用打字机把租约打了出来。

我手里拿着一个大宅子的钥匙，想象着自己是个百万富翁电影明星，觉得需要有那个派头，就去买来了适合身份的衣服。一套纯白色的服装及与之相配的白鞋和领带。从时髦的梅费尔区的大街上回到工人阶级居住的托特纳姆，我的样子像个电视洗衣粉广告和当地的摇滚歌星杂交失败的产物。我不断在街上摔跤，那套白衣服没有能够白上多久。

我感到自己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几天后，符莎学期结束回到惠灵顿探视，我挥手向她道别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竭力想在监护权审理前减少吸毒量，就定好要进赫特福。德郡特灵附近的一家叫钱普尼的高级疗养所。因为预料到戒毒时即刻面对的冷漠，我决定进去前再痛快大吸上一次，结果在一家通宵小麦厘里和常见的一帮痛君子搅在了一起。我吸食了那儿所有品种的毒品后在凌晨三点爬到了台上，一把抓过音乐广播主持人的麦克风大叫道：“为监护权案而吸毒的幕间休息！该休息了！不许吸毒了！”“滚开，继续放音乐！”有人从拥挤的场子里高声喊道。

第二天一大早我竟找到了我的汽车，还开了三十七英里路到特灵去，实在是个奇迹！天亮时车子打着滑停在了钱普尼疗养所的大木门前。我响动很大地到达那儿，吵醒了住在这个僻静建筑里的许多人，好几个工作人员急忙跑出来查看。很快我就被带进了医疗办公室。他们看到我当时的状况，多数工作人员反对让我留下。我的运气不错，因为在我一再保证保持安静后，他们接受了两个星期的预付款，把我带进了一间窗外是公园般景色的美丽房间。我设法安静了一个多小时，等待阿拉伯百万富翁和其他有钱的阔老起床。后来的两个星期中我还真大大地减少了吸毒量，感到很平静，直到我快要结束在这里的生活时，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兰娜来到了。

她不相信我真的失去了记忆，越来越生气我不告诉她钱盒子藏在了哪儿。“只有疯子才把钱埋藏起来。它会发霉，虫子会把钱蛀坏，那时就没人能花了！”她高声喊道。我看着她离去时心里想，不知她究竟怀着什么样的打算。

过了一两天我离开钱普尼疗养所的时候，一个和我成了朋友的有钱的超级市场老板邀请我去参加他的银婚纪念。下一个周末，兰娜和我驱车来到了曼彻斯特郊外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的主人给我们在那里的一家旅馆定好了房间，以便在晚宴后过夜。后来发现这是兰娜算总账的一夜。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夜晚，当我们最后终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喝得很醉了。睡觉前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吃惊地发现在几个月不管不顾地大把花钱之后，只剩下一千来英镑了。兰娜看着我数钱时脸沉了下来。看来她要白白和我呆在一起了，什么也得不到。那晚有些事情奇怪，她在凌晨时不断下楼到接待室去打电话，可是当我盘问她时，她说她是往美国打电话。

第二天上午我们和主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就动身回伦敦。当我们沿高速公路开着的时候，兰娜突然坚持要在林福德堂过夜，说她有些衣服还在那里。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说只住一夜，因为特莎第二天要从惠灵顿回托特纳姆去。

我们到达那巨大的宅院时已经快到午夜了，兰娜似乎很紧张，好像要出什么事情似的。就连在吸毒后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我也能感觉到事情不怎么对劲。她不断从主卧室的窗子里向外张望。“我们在等客人吗？”当她走出房间，借口要到汽车里去取什么东西对我问道。她离开以后我和往常一样吞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她回来时我已经开始要睡着了。“啊，不，你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别睡着！”她惊慌地喊道。药已经开始起作用，我半睁开眼睛，看见她又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我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的砾石车道上停了下来，传来了人声和砰砰的关门声。“他在这里，绝对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听见兰娜在说。我企图起来看看是谁，可是一点也动不了。我药吃得太多了，起不了床。主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吃药有多久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咱们甭管，反正给他打一针就是了，这样那个杂种就会开口了！”另一个男人说。声音越来越近，然后三个影影绰绰的面孔正脸朝下看着我！

透过膝盖的迷雾我突然认出了布赖恩·克利福德的穿透一切的眼睛，这时我感到胳膊上被扎进了一针。这是真的吗？我心里在想，开始觉得很快活，飘飘然的，就像在多年前纷汉姆大夫的诊所里一样。然后小短腿开始大声喊道：“那些该死的放钱的盒子都在哪里，你这个臭东西？我们知道你把它埋在了这地树林里的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啦？什么该死的盒子？为什么人人都没完没了地说埋着的钱的事？我语无伦次地嘟吹了点什么，就闭上了眼睛。“你这个笨娘们，”我听见他尖声大叫，“这个臭东西吸毒吸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了。把这狗给毒死。宰了这个杂种。”他指的狗是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毒劲发作，失去神志，人事不知了。

我醒来时已是白天，一切都像一场恶梦，但是在我的胳膊上能够看到打针的地方有一片乌青。这可不是想象中的幻觉，这是真实的生活。到处一片寂静，但我还是头昏眼花，起不了床，因此只能躺在那里望着湖那一边的树木。最后我滚下了床爬到厕所里去，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安非他明，全部吞了下去。当毒品起作用以后，我向窗外看去，可是我的车没有了，只在砾石车道上留下了轮胎的印痕。我紧张地走下楼去，期待着发生最坏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游泳池旁所有的家具全都给扔到了水里。在垫子之间是不是漂着个尸体？“啊，上帝啊，不！”我大声喊叫，吓坏了，又不敢看，跑到厨房去打电话叫出租车，但是电话线被从墙上扯了下来。我想下一步这些人会很快回来杀我，就跑出了老子，沿车道跑着，从巨大的金属大门出去，一直跑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感到安全了为止。我在这里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附近的火车站，然后我搭上了回伦敦的火车。

回到托特纳姆的家里，我看到了兰娜的衣服，但是没有兰娜。我买了一瓶白兰地，付钱时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十英镑。其余的钱全都不见了。那天我对发生的事情又糊涂又害怕，整整一天吸食了越来越多的毒品。

下午五点左右，特莎的继父拼命捶打着大门，门外特莎高兴地咧着嘴笑。“你好，爸爸。我回来了。”她说着用胳膊抱住了我。她的继父把五个大箱子搬进来后就走了，我没有和他说话。特莎激动得要命，一面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一面给我讲她的新鲜事，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在她周围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这个天真的孩子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搬来了，每一件玩具，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衣服。她来到了这里，一心一意要和她所爱的爸爸开始新的生活。

那晚在特莎熟睡了以后，一个中年妇女来取兰娜的衣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酿成大醉，没有问是谁派她来的。等我第二天醒来时，才意识到兰娜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就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也没有听到有关她的消息。

从钱的角度来看，她是空着手走的，没有能找到她那难以捉摸的钱盒子。它们一直埋藏了许多年。

现在只有特莎和我两个人了。

到目前为止的噩梦般的故事仅仅只是预演。现在主要的故事片就要开演了。

特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为了我你要赢得监护权。我要在你身

边长大！”这就是我那天真的女儿，非常单纯，她始终紧抱着童年时代爸爸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意识到我的毒瘤有多么大。对于她来说，我一直是带着许多玩具回到家里来的英雄，而实际上我离家是去毒窟消磨时光。即使现在，我们生活在田间寒酸的房间里，而她的幻想仍继续着。

头一天，特莎一整天都兴奋地把她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寓各处。她对那四张为我画的蝴蝶特别感到骄傲，把它们贴在起居室的墙上。住在对门的女人答应给她一只小狗。她最后上床睡觉已经很晚了。“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包打听’。”她说着闭上了眼睛。我坐在她的床脚头，看着她入睡，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了，毒品已经俘虏了我，我无法停止下来。我听着老鼠在楼板下而奔跑，决定等她醒来时告诉她，她得回到她母亲那里去。我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她离开我这条迅速下沉的小船。

当地在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些什么了。“特莎，我有病，实在没有精力去打这场监护权的官司。你必须得回到你母亲那里去。”哦喉咙咽便，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开始哭了起来：“不要送我走，爸爸。别这样做。如果你想赢，如果你真爱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能够告诉我的小女儿，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稳君子，没有毒品就不能活？我又累脑子里又是一塌糊涂，躺在床上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这对待莎下了床，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无助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护士。“爸爸，你歇着，我给咱们俩做一顿热的早餐。”她说着骄傲地从自己的储钱罐里拿出钱去买鸡蛋。吃着她做的早餐，我的眼泪不住地落到盘子里。“你为什么哭呀，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做的早餐吗？”她问道。“非常喜欢。”我答道，一面强迫自己咽下食物。过了一会她上学去了，她向我挥着手，大声说：“为了我要去赢来监护权，爸爸！”我下了床，从窗口看着她 and 马路对面的一个女孩一起走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前途如何，我必须赢得监护权！否则就意味着对她的爱的背叛。

我振作起所剩无几的精神，明白首先得搞到一些钱。突然我想起了安迪，一个与我多年交好的希腊银器商。一个多星期前我看见他开着货车从我们公寓前经过。他是个善良的人，最后几个还肯给我一点时间的人之一。那天下午我到他的工厂去找他。他看到我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给我二十个银水果钵去卖，也不搭望着我付钱给他。这是他的告别方式。“这些毒品会要你的命的，”他样子很难过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呢？我把银钵放在车里以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去学校接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在一片废弃了的工厂区里迷了路，惊慌之中车子撞在了一只垃圾斗车上。没有人看到这个事故。我记得那猛的一下碰撞，楼后就失去了知觉。后来我终于苏醒过来，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头流着血。我忍着极大的痛楚设法从撞坏了的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车头整个被撞启了。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小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了撞坏的汽车旁，他把银果钵装到了他的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因为当我们终于把车停在公寓门外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特莎正站在开着的窗户旁，看见司机扶我下车时就跑下楼来。我坐在楼梯上，她帮着把银果钵拿到了我们的过道里。我没有钱付出租车费，司机同意接受两个银果钵，还找给了特莎一点现金。离开之前他扶我上了吱吱嘎嘎的楼梯，问我需不需要找人帮助，我说不用，他把我扶上床就走了。

次日上午，特莎没有上学，她给处理我们案子的社会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不久来了一位高级检查员帕里先生，他一看见我马上就叫来了救护车。他们把我抬下楼的时候我想必是晕了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两天以后才在医院里醒过来。

想着特莎仍旧是独自呆在公寓里，我用床头电话给她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满脑袋噩梦般的幻觉，给社会工作者打电话，他告诉我我住院已经两天了，女儿在孤儿院里，很安全。我十分震惊，我明白特莎住在孤儿院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地影响我得到监护权。

虽然我的脑震荡还很严重，我仍然从床底下拿出衣服，没有被护士发觉偷偷溜出医院。我连路都走不稳，在街上到处摔跤，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了公寓里。上楼前，我从我们楼后废墟上一辆破车里找出了我藏在里面的一些毒品。在我病态的、毒品作用下的脑子里，我觉得服用了这些药丸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显然生着病、吸毒吸得晕乎乎的人居然能够从孤儿院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接回家，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回到公寓以后，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有任何获得监护权的机会，我必需再一次减少吸毒量。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给钱普尼疗养所打电话。我没有多少钱，但是琢磨着既然他们认识我，我可以在出院时用支票支付，我明知道那空头支票会遭到拒付，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特莎的学校打电话说她病了，然后我们就动身到特灵去。我们居然完整地到了那里，他们允许我们住在主楼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我接二连三地摔跤，特莎哭喊着

“我爸爸病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收留了我们，简直是个奇迹。我感到放了心，知道特莎在名人和阔老之中很安全，就上了床。头几天我一直在睡觉，得到了我极其需要的休‘急。渐渐地我觉得有力气了，就和别的客人一起到主楼去吃饭。电视女演员希尔达·贝克常常在我们桌吃晚饭，饭后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希尔达是个说话坦率的兰开夏郡姑娘，年纪比我大，在仅仅听我讲了一小点我不幸的故事后，她就坚持要我马上把特莎送回她母亲那儿去。“趁现在还不晚，让特莎离开你这糟糕透顶的生活。”每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时希尔达都这样对我说。

在此期间，托特纳姆的社工部门知道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知道特莎一直没有上学，但是监护权的审理日期就要到了，他们也就没有怎么样，等待着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我觉得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受够了。我拿不定主意在钱普尼住多久，但是当老板惠勒夫妇拒绝继续让我赊欠时，他们就替我作出了决定。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那些名流和草莓，回到托特纳姆和老鼠为伍。

这时我卖掉了剩下的银果钵，至少有钱买食物了。一两天以后，邮差交给我一封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寄来的信，通知我特莎·玛丽亚的监护权案将在一个月后审理。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休息，我脑子清楚了一点，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得人心的长期解决方案，一个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牢靠的什么东西。打定主意后我登广告找一个管家，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天就有两个刚刚到英国的十八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和格雷丝来见我。她们非常单纯，在伦敦没有亲戚，很容易就相信了我在兴奋剂作用下的一通胡言。胖胖的黑头发的格雷丝作为免费住宿的交换，同意说她是我们的兼职管家。漂亮的、留着红色短发的玛丽则会声称她认识我已经很久了，我们已经订婚，快要结婚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这对于法庭来说是个十分完美的形象。为完成体面家庭这幅图像，必需让人觉得我有固定的职业。为此我去找了一个老相识，他给我写了证明信，说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家里显得情意绵绵、温馨宜人，特别是每次当地的社工部门的人员来探访时，家里摆设着给他们看的鲜花和一盘盘水果。

就连老鼠也似乎规矩了。

在法庭审理前一周左右，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特莎、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进行了口头审查。我们都按照排练好了的说法回答，显得是个稳固的集体。玛丽和我甚至还拉着手。我能够感觉到，法院的人巴不得我们有这样一个装出来的格局，在这场审查中我们获胜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那可爱的、自信的、坚决要在爸爸身边长大的十一岁的女儿。在那时，很少有父亲在争夺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获胜，更别说是个毫无希望的、吸毒成瘤的罪犯父亲了。

从法院开车回家时我们经过了丽生树丛街和马丁的古董店。看到这些熟悉的景象我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停下车呆了一会儿。我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问题，便重又上车回家。第二天早上特莎上学后，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我简直能够看见自己把许多箱子埋在马丁的地下室里的情形，但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想不清楚细节。格雷丝工作去了，因此我带着玛丽到教堂街去查看。一路上，我一面听着阿巴唱（滑铁卢），一面激动地告诉她埋藏财物的事。到达帕丁顿后，我惊奇地发现马丁已不再拥有那片产业，现在在不远处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那家新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地下室的房间全是空的，他接手后亲自把里面没用的东西都清了出去。我仍坚持要看上一眼，不知何故，他虽不怎么情愿还是让我们下去了，他自己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推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子中的第一批搬到了上面的院子里。我很快叫了两辆黑色的出租车，把箱子从大门上递出去，把两辆出租车装得满满的。经理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前刚到的这奇怪的一对在出租车的护送下离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连作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托特纳姆后，我们把箱子搬到休息室里，用玛丽存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出租车费。不久格雷丝回来了，看见二十来个奇怪的箱子简直惊呆了。我竭力想把锁弄开、但是总是不行。我越来越激动，最后拿一把切肉刀把箱子划开了。

我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不能完全明白我发掘出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电击治疗后的记忆缺损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像个发现了久已遗失的玩具的孩子，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触发了大量的记忆，使我狂乱起来。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但是看到所有那些文件后我坚信这仍是一九七〇年，我周围的人都是从某位博士的时间机器中出来的。我没法全部理解。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着几十个存折，为什么却和托特纳姆的老鼠住在一起？箱子里有许多汽车和产业的钥匙，藏匿起来的钱箱的清单，太复杂了，我弄不明白。在一个信封里我找到了一千英镑现金，我欣喜若狂，大叫：“我们是百万富翁了！”两个爱尔兰姑娘跑了进来，看见这些钞票后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找到了我那失去的百万钱财了。我们三个都疯也似的把其余的箱子撕扯开，发现

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用一些新找到的钱买了一台电打字机，开始口授有关五年前就已经了结了的事件的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信件。最后我和格蕾丝就信上应写什么日期的事激烈地争吵了起来。她要写上一九七四年，可是我怒火万丈地坚持是一九七〇年。当她拿着一张报纸回来给我看日期时，我非常生气。“是他妈假的！”我嚷道，但是脑子更糊涂了，于是不再写信。

到特莎放学回来时，为了庆祝找回财宝，我喝完了好几瓶香槟酒，已经醉了。玛丽和格蕾丝也有点醉醒醒的。一个满脸狐疑的小学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拼命想弄明白在她遍遍的托特纳姆家里出现的这一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就想要几只鸚鵡来着！”我醉醒醒地吻着特莎的额头，大声说道。我给了格蕾丝一把钞票，一个小时以后她和特莎一起坐出租车带了两只唧唧喳喳的鸟回到家里。大鸟笼里的鸚鵡被骄傲地放置在地板中央，周围是钞票、汽车钥匙和天知道什么的别的东西。我们以我的一个强盗朋友的名字为一只鸚鵡取名叫查利，另一只的名字是斯威维，马耳他语幸运的意思。

我们把两只鸚鵡放出笼子，让他们在房间里乱飞，公寓简直变成了像疯子办的茶会。房间里大音量放着滚石乐队的（这只不过是摇滚乐可我喜欢），推一没有醉的人是特莎。她像个被弄糊涂了的爱丽斯，最后在地板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和格蕾丝互相搂着在长沙发上睡得人事不知，只有我一个人丝毫睡意也没有。好奇的鸚鵡从笼子里钻进钻出，查看他们陌生的新环境，我则在吞服安非他明和重新审查文件中度过了整整一夜。

到了早晨，我已经决定到林福德堂“萨米”宅去住，相信在一好一些的环境中我能够想得更清楚些。我开始忘乎所以，把三个女孩子全都叫醒了，声音尖得像个吸了毒的流浪风笛手：“我们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像王室一样生活。跟我来！”

我从马路那头一个市场摊主那里借来了一辆运水果的旧卡车，两个睡眼惺忪的爱尔兰姑娘帮着一个快活极了的女学生装车。她们把二十个箱子、两只鸚鵡和几床毯子放在敞篷卡车后面。那辆老卡车一路上抛了好几次锚。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流动的山民或吉普赛人。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嘎嘎响着开进了林福德堂的大门，在满月下，站在台阶上看宅子隐在一片黑暗之中。进到里面之后，我发现电源和电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感到十分震惊。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这所宅子的地毯和电灯装置全被拆卸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洗涤槽和抽水马桶都给拆了。我非常生气，开始像个什么怪物似的大喊大叫。那两个爱尔兰姑娘不愿睡在光地板上，非要我把她们和特莎送到旅馆去过夜。

把三个筋疲力尽的女孩子留在村里的客店过夜，我又开着运水果的货车回到了那座无人的宅子里，更加发起疯来。我在整幢房子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喊：“我要把那找不到的几百万绪烧了，哪个臭东西也别想弄到手！”在近于完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我正是这么干的。我在房子的后回廊上燃起了一堆巨大的黄火。我点着了二十个箱子里的东西，把钱藏在什么地方具体细节全销毁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失去了多少钱，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喝掉了最后一瓶香模酒，喝醉以后看着火焰蹿上天空，开始唱起歌来。那夜刮着风，火没有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也没有把房子烧掉，真是运气。

一定是有人通知了警察，因为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开来了一辆当地的警车。两个村普看到眼前的情况时眼睛都瞪圆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不断重复问我：“你在烧什么？”放在运水果的货车后面的鸚鵡查利开始模仿他。“让那只该死的鸟住嘴，你也别笑了。”警官非常不高兴地说。他说话的时候鸚鵡继续叫道：“你在烧什么，你在烧什么？”

最后我平静了一些，给他们看我手上的这片房产的钥匙和所谓的租赁协议。我没有犯法。光是烧烧鬍火不是犯法行为，而且这时火也已经灭了。警察怒冲冲地走向警车，说他要和地方当局查对这座宅子的所有权问题。“我肯定会再见到你的。”他冲我晃着手指头说道。

警察走了以后我开车离开了，听任灰烬自己熄灭。我开着排气管像坦克样轰响着的货车回到客店，叫醒了可怜的女孩子们。我们开始长途驱车返回到仅仅十四个小时前才离开的托特纳姆的老鼠窝时，是凌晨四点。

回到公寓后我瘫倒在地，睡着了。晚上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已经花掉、丢失或烧光了我所有的现金。在头昏脑涨的情况下我决定要干些更加疯狂不怕死的绝事。监护权案子要在那个星期三审理，我感到十分担心。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还是可能会输掉官司。如果真输了，我要特莎风风光光地离开我。为了能好好地最后款待她一次，我吸食了更多的毒品，好有勇气去偷更多的钱。

我们的公寓在我父亲的旧裁缝店上面，这地方现在租给了一个卖高级首饰的印度珠宝商。他的店铺里有防盗系统，但是我知道自己能从走廊的内墙破墙而入，不会引响警铃。半夜里，当女孩子们在楼上安睡之际，我在吸毒后的幻觉中在墙上挖了个洞，很快进到了首饰店里，偷

了一大堆华丽的首饰，甚至都没有考虑店主下星期一开门时会出现的问题。

星期日早上，两个茫然的爱尔兰姑娘和特莎陪我去到女人巷的露天市场，我们把偷来的首饰在那里卖得了许多钱。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潇洒漂亮地提着第三只名叫闪亮的鸚鵡，去到大东方饭店享受一顿豪华的香滨宴。我们为希望取得监护权官司的胜利而干杯，就连侍者祝我们幸运时也喝了一杯酒。回到家里以后，在我等待警察到来之际我们继续喝着酒。

第二天一早帕特尔先生打开了店门。我听见他的惊叫声：“哎呀老天爷，墙上有个洞！”不久警察来到公寓对我们进行询问。为了看起来好像有人从外面破门而入，我已经把街门砸开了。我们声称昨天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盗劫，大家都非常吃惊，但是我们全都喝醉了，没有能打电话报警。警官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的话，但是暂时离开了。这就够了，监护权案子两天后就要审理，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星期三，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里，尽管我的前妻指控我严重犯罪、吸毒和大量其他事情，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监护权。即使在法庭上，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我仍在不断吞服更多的药丸。我已接近精神错乱，也没有钱。更糟的是，我没有前途，只有一个老鼠成灾的家，但我还是赢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制度就有什么地方在腐烂发臭。毕竟这是我女儿生命攸关的大事。

在这场有重大意义的案件结束后，我完全垮了，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由玛丽和格雷丝照顾特莎。

很快事情越来越糟。警察威胁说要指控我和两个爱尔兰姑娘，甚至可能包括我的女儿，犯了盗窃罪。为了保护女孩子们，我别无选择，只能承认，说自己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干的。我被指控，但不久即交保释放。玛丽和格雷丝的父母十分担心，几天后把她们接回爱尔兰去了。她们以进入我的生活时同样迅速的速度离开了我的生活，两个天真的姑娘不幸地陷入了一个痛君子的悲惨的蛛网中。

那个高级社工人员一向对许多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一开始就知道我从来没有工作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正是他在帮助我申请社会保险金。我们一星期得到大约二十英镑，在一开始领到补助金时特莎就负责掌管这笔钱。“我们要按定量来支配钱，”她自豪地说，“一半用来买食品，一半给你买头痛药。”这就是这个可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眼中的我的安非他明药丸！我们像这样生活了几个星期，特莎成了小学生兼妈妈，而吸毒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则一天比一天严重。然而特莎还是很高兴，因为她的爸爸在家，我们的新小狗“包打听”睡在她的床脚头。

风暴总要来的，而且也的确来到了。有一天当我和特莎从学校回到家里时，我们发现叫斯威维的那只鸚鵡头朝下栽在鱼缸里。门马上开了，布赖恩·克利福德走了进来。和他一起的是一个魁梧的男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还有个有一头金黄色短发和两只冷酷的眼睛的年纪稍大的女人。“这些事故其令人不快。”克利福德向死鸚鵡的方向点点头说。

特莎伸出胳膊抱住我，开始哭了起来。那个大个子用枪指着我。这可真糟糕。只有我和宝贝女儿在家，这个危险的精神变态者又找上了我。对于小短腿来说，如果那天他气不顺，那么你的老婆、孩子、爹妈都是他攻击对象。我吓得哆哆嗦嗦地紧搂着特莎，准备着最坏的事情发生。虽然克利福德仍旧认为我欺骗了他，但是在当时这并不相干，因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小短腿只是代表了我过去生活中存在过的一位人物，除了最近在林福德里那可怕的一夜之外，一切其他事情在我脑子里都是十分模糊的。那两个男人抓住了我，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金发女人把特莎从公寓里带走。我被捆了起来，但仍不住求他们把我女儿还给我。“我是个有病的吸毒成病的人，”我哭喊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接受过电击治疗。”当另一个人搜查房间的时候，克利福德拿着一把切肉刀向我走来，尖声叫道：“也许来点脸部手术会唤起你的记忆。”我感到冰冷的刀刃割破了我脸的一侧，温暖的血开始顺着脖子流了下来。他把我推得后背贴在墙上，我的双手被捆在背后，只能看着血滴在T恤衫上。我闭上了眼睛，准备死去，这时另一个人回到房间里来了。他很不耐烦，开始和克利福德争吵了起来。“这一切依然是白费工夫。走吧。”他喊叫道。

“他有钱，我知道。”克利福德坚持说，一面开始踢我。我倒了下去，躺在地上忍受地皮靴的猛踢，我真希望多年前没有留他一命。可是我不可能杀他或别的任何人，我从来都不是个暴徒，而只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德君子，满脑袋的关于罗宾汉的幻想把我带到了远离他的好汉们的现实生活的情景之中。“你如果不说，我们就带走你的孩子！”他叫嚷道。听到这话，那个大个子大发脾气，开始喊道：“我才不愿意被指控绑架呢！这个臭东西病得太厉害了，说不出东西来，咱们快走吧。”克利福德尖叫着说：“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望我脸上辞了一日唾沫，跟着大个子离开了公寓。

啊，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了？我没法给自己松绑，只能捆着胳膊躺在地上。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恐怖的念头使我的思维完全麻痹了。克利福德把我的安非他明扔得满地都是，我的两只胳膊被捆在背后，只能滚动着倒转身子，把药丸舔到嘴里嚼碎，到死都是个痛君子。毒品刚刚开始发挥作用时突然门开了，特莎冲了进来。尽管看到父亲被捆绑着，身上都是血，她并没有哭，一直十分冷静。她给我把捆着的手解开的时候，小狗“包打听”开始舔去我身上的血。特莎给我洗去血污，把一张床单撕成一条条的，为我包扎好脸上的伤，止住了血。

不久，当最厉害的一次吸毒引发的惊恐出现时，我全身开始发抖。我把“包打听”锁在特莎的房间里，拉着女儿到了最繁华的购物街上。住在街对面的女人看到我们这么急慌慌地往外跑吃了一惊。我们搭火车到了伦敦的飞机场，特莎在那里头枕在我腿上睡了一夜。我在人群中不仅没有感到安全，反而开始认为机场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暗中监视我们，想象每一次宣布航班都是有关我们在什么地方的暗号。坐在那里被安非他明搞得满脑子幻觉真是巨大的折磨。早上七点左右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惊慌，就叫醒了特莎，开始长达八小时的认并不存在的人身边逃跑。我坚信有人在跟踪我们，拖着可怜的孩子在伦敦四处上下公共汽车。我们在地铁里折腾了好几个钟头，在一列车上坐两站，突然便跳下车坐上往相反方向行驶的车子。我神志不清的头脑中在重演电影（法国接头）中的一幕。在整整一天中我不断用药丸给自己加油，越来越惊恐。最后我们在汉普斯特德站出了地铁。来到地面上，我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觉得是在找我们。现在追捕开始了！我们推开惊愕的购物人群，拼命往汉普斯特德山上跑。在杰克·斯特劳斯基城堡边上的水塘旁，我听见直升飞机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我相信他们随时都会开枪，我把特莎推到水塘对面长满青草的岸上，自己迅速找地方隐蔽。我们滚到坡下藏在小树丛里，我紧紧地抱着我的女儿。特莎哭着结结巴巴地问：“爸爸，出什么事了？谁在追我们？”我指着直升飞机，大声说：“是他们！”

特莎突然又继续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从树丛中钻了出来，“它飞走了，爸爸！”她说，泪水从她肮脏、疲惫的脸上流下。她穿着撕破了的校服站在那里，严厉地说：“爸爸，我饿了。你不能走这么快。你吃几粒晚上吃的蓝颜色的药丸吧。”她脸上的神情使我震惊，我回到了现实之中。啊，上帝，看着我都对孩子做了些什么呀！

我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带到了我吸毒形成的偏执妄想狂的病态世界里来生活了。

是我绑架她来到了吸毒岛上。

我在汉普斯特德绿地的树丛里躲避敌人的时候嚼服了一把蓝颜色的镇静剂。十分钟后镇静剂开始起作用，坏人都不见了，我也镇静下来，能够带着特莎离开那片长满石南的地方。我们步行到附近戈尔德斯绿地我认识的一个律师的办公室去。特莎这时是又饿又累。我认识这个律师已经很多年了，他看见我脸上包着绷带，身后拖着满脸泪水的小女儿，吓了一跳。他只听我讲了我们这个不连贯的故事的一小部分就打断了我，指示秘书把特莎带到附近的餐馆去吃饭，然后让我坐下开始教训我。“除去你该了人家钱的骗子，没有人在追踪你！”他大声说道，“是毒品搞得你神经错乱了。你吸毒吸了这么多年，现在影响到你的大脑了。你急需帮助。如果你不把那孩子送回到她母亲身边，我要向社会福利当局告发你。我保证他们会相信我的话的！”

镇静剂已经使我平静了下来，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必需让孩子走。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斯蒂芬，你曾经有过一切，”他平静地继续说道，“难道你就看不到毒瘤使你失去了什么吗？你仍然有特莎，趁现在还来得及，请你把这个宝贵的孩子送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他给卡米拉打电话安排第二天早上来接特莎，这时羞愧的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后看着我说道：“斯蒂夫，要把你锁起来的不是警察，而是那些毒品！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是很快死掉，就是要在贫民窟中和酒鬼们住在一起！”他摇着头。这时特莎回到了办公室里，他让她坐下，对她说：“特莎，你爸爸病得很厉害。他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尽量理解这一点。我们给你妈妈打过电话了。你继父明天来接你。”说完后他离开了，让我们单独在一起。特莎双臂搂着我哭道：“爸爸，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才赢了监护权的官司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摇头。稍后我和特莎被送回到托特纳姆家中。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很可能此后我们要过很久很久才会再见面。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几乎说了一整夜。现在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不知为何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就连小狗“包打听”似乎也安静多了。我们依偎在一起就这么哭着，谁也停不下来。天快亮的时候特莎实在累了，她上床后我仍坐在那儿继续和她说话。当我讲给她听我孤独的童年、维奥莱特和罗宾汉的故事时，小

狗就睡在她的床下。特莎用胳膊搂着我，让自己像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在那最后的几个小时中我成了她的爸爸。我说到安东尼娜从来没有过爸爸，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我吸毒已经失控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安东尼娅的照片说道：“看看这个可爱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抛下这一切呢？”

特莎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爸爸，咱们做个交易吧。”她说，“如果我回到妈妈那里去，你愿意保证不再吃那些药丸了吗？”我流着泪回答说：“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真正的爱。也许我会遇见我的公主，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够停止吃药丸了。也许。”特莎在睡着前说：“我希望她快点来，爸爸。”

对我来说，悲哀的是她没有来。

当我们听见特莎的继父大声捶门而醒来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我们在休息室等着我女儿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转向我，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开口说：“很遗憾在你的生活里事情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真想杀了这个嘲笑我的杂种，他似乎在说：“哎，现在你的妻子和孩子属于我了，你就呆在这里吸你的毒吧！”

特莎先拿来了她的行李袋，然后抱着“包打听”出来了。“不行，特莎，不能带狗！”巴里坚决地说。她求他答应，但是他只是来回来去地说：“我们已经有一只狗了。”求也没有用，特莎含着眼泪转向我，对我说：“你留着它，爸爸。看见它你就想起我了。”她哭着把小狗送回她的房间里去，关上了门，省得小狗跟着她到繁忙的大街上去。

片刻以后特莎又走了出来，她拥抱着我，哭着说：“爸爸，我多想和你在一起啊！”我心里难受极了，但是不愿让那个狗娘养的更快活，就忍住了自己的眼泪。我和特莎拥抱告别时巴里不耐烦地说：“快点，特莎，我们要开很远的车呢。”他真是个冷酷的杂种，对我们父女最后告别完全无动于衷。我们没有再说什么，一起走下楼去，他把她推到车子里，说：“别来什么戏剧性场面了，你们俩有一天还会再见的。”

我看着汽车开走，看见特莎在哭，我明白自己的正常神志也和她一起离开了我。没有多久车子拐过弯去，我精神崩溃了，就在大街上毫不害羞地哭了起来。回到脏乱的公寓中我摇着头，心里想，我究竟是怎么了？我怎么会落到这么孤独这么穷困的下场？答案就在我的脚下，一个空了的安非他明瓶子。我已经陷入了如此凄凉的境地，就更没有力量来对付毒魔了。

这四间地板吱嘎作响的房间里充满了回忆，特莎在这儿住了一年，她画的一些图画仍钉在墙上。这个给这一套房间带来生命的勇敢的女孩子走了。一切都像久无人住的样子。我一面哭着一面从破旧的楼梯上到她的卧室去把“包打听”放出来。这只棕色的混血小狗见我进去向我摇尾巴，我觉得好过了一点，我并不是完全孤单的。在屋角里给它留了一碗牛奶。在女儿的床上我看见有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枕头下面有使你惊喜的东西。”我拿起枕头，发现了二十英镑现金，二十粒安非他明药丸和一封信，信上说：“爸爸，这是我的积蓄，给你。我偷了你的一些药丸，这样我走的那天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药了！”

看到安非他明，我的心充满了快乐。这就像彩票中了奖，我的伤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狂喜地吞下了十粒安非他明，坐在床上等待部无比畅快和飘飘欲仙的感觉出现。当毒品开始起作用后我兴奋异常，充满了活力，意识到她的钱可以使我在兰多大夫那里买到更多的药丸。我很快换上了我的蓝色的医生装，我管这套衣服叫医生装，因为我只有在找医生开方子时才穿它，怕如果我的样子太激遇医生不给我开我要的药丸。瞎说！如果我赤裸着走进他也不会注意到的，他只管又开一张方子就是了。现在我体重减到只有一百四十磅，这套衣服穿在身上太大了，需要用绳子系住裤子。我推一的钱是每星期一的社会福利金，所以特莎留给我的可以买更多毒品的意外之财简直成了天堂之喜。我真是高兴极了。留下五粒安非他明在公寓里作备用，我吞下了剩下的药丸，冲出大门。在大街上走了一百码后，就像一个真正的吸毒鬼那样，我转过身子跑回家把备用的也都吞了下去。在更加力奋迷糊的状态下我去到医生的诊所，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火车上时，最后服用的毒品开始起作用了，我读着一张别人扔下的报纸，上面登有度假广告。乘船旅游！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乘船环游世界好好休息休息！我沉而在选择航线上，坐过了站，不得不又往回走。

兰多大夫在哈利街有个一间屋子的诊所，和别的几个普通的医生共用考究的候诊设施。兰多的病人多数都是去开毒品处方的，和别的病人一看就不一样。如果有个人在紧张地来回溜

达，你准知道他是在等待新的毒品供应的兰多的那伙人中的一个。对于吸毒鬼来说，医生就是具有给予或是剥夺几天狂喜的上帝。兰多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灰白头发的高个子，他按先来先看的原則，一个小时要接待十五个病人，往往连头也不抬。他是这样看病的：“你怎么啦？”病人答：“我还需要右旋安非他明和镇静剂。”佩咧斓，医生写好了药方交给病人，病人交了钱离开，医生喊道：“让下一个人进来！”如果没有人打喷嚏，每一个人只要三分零二十八秒就可以拿到方子奔向威格莫尔街的“约翰·贝尔·克洛伊顿”去按方买药了。在这儿等着买药的是在诊所里排在你前面的同一伙人。这家药房总备有足够量的、由兰多和无数私人医生毫木控制地开出来的方子上所需的货物。偶尔卖药的人会提出问题，这使得等着的吸毒鬼狂怒起来，特别是如果他还得回到大夫那儿，让他在方子上加写点什么的时候。那些宝贵的片刻对于瘾君子来说简直像一生那么长。我一拿到药丸总是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站在药店里就先吞服一些。这并不使店员们吃惊，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每次只要买好毒品我就直接回托特纳姆，到家是已经迷迷糊糊飘飘然了的。在毒品的影响下那几间屋子和里面寒酸的摆设具有了新的意义。我在那里感到安全，逃避了给我这么多伤害的世界。我坐在肮脏迫退的环境中，充满自怜地问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把我扔在了垃圾堆上？总应该有人来看看我是死是活吧！我的母亲，伊莎贝拉的女儿们，难道她们谁都不关心我了吗？她们当年看上的是不是仅仅是我的钱？为了减轻痛苦和被伤害的感觉，我日益退缩到自己的毒品世界中去。每一天，当兴奋剂起作用后，我便再一次全神贯注地开始重摆那几件破家具的仪式。我一连几个小时忙着把那几张旧床从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我在布置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想要从我这里拿走的家。

当特莎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有时候还和这条繁忙的街上的当地人谈谈天。现在毒品对我的危害越来越大，我完全脱离了世界。除了每星期一次对兰多大夫说“我还需要右旋安非他明和镇静剂”之外，我从不和任何人说话。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精神和身体的状态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快恶化。吸毒使我感受不到我正在经历的精神崩溃，因为如果你永远处于吸毒后的迷糊幻觉中，你就不会觉得伤心，更不要说为此而哭泣了。晚上强效镇静剂使我进入没有意识、没有梦境的沉睡世界，从来不会睁着眼睛伤心。在这样大量的兴奋剂和镇静剂的作用下，你的感情被锁在了你的心底深处，就像放在了一只高压锅里，等待着最后爆发导致精神失常。

我完全控制不了服用毒品的量，常常每个星期四就把安非他明用光了，这时我对事情的看法立刻就变了。没有毒品的作网我就像得了一场厉害的热病，大脑里没有安非他明在流动，每周出现在脑子里的恐怖电影开始显得十分可怕。为了抵制这突然的木口感觉我就用大量的安眠药使自己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睡死过去。常常在睡了三十个小时以后醒来，我还能够知道是不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商店都开门了，街上也嘈杂多了。如果一切都很安静，那么我还得再睡掉一天才能去取福利金买毒品。我现在不给任何人开门，只在半夜出去到垃圾箱里去找食物，或者偷走送到当地食品店门外的面包。

这套公寓的租约还有一年才到期，我母亲已经付过钱了，所以让她的病儿子住在里面也不多花费她一文钱。这能使她良心不受责备而又使我不去打搅她，实在是很便宜的事。她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在电、煤气和电话被切断后，我周围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了。只有水不知怎地还没被切断。小狗“包打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几间房子，并且和我一样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疯。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关在纳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囚徒，但现在是和平时期的伦敦。随着日子的过去，我向阴沟更深地滑了下去。

有一天，在吸毒后的一大发作中，我把公寓里所有的家具和地毯都搬到后院去烧掉了。这样一来，我就像只野兽，和饿得半死的狗一起在光地板上生活，老鼠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吸毒后醒着的日子里我开始从一间屋子爬到另一间屋子，和想象中的人久久地谈话。我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毒品，但是他们从来都拒绝，然而却说，如果我要吸毒是可以的。我吃得很少，但满地都是从这些食物上掉下来的碎渣，任凭狗和老鼠去抢。“包打听”越来越弱，老鼠就吃得更好一些。后来我也不再洗自己了，把厕所的设备全都打碎以后我就和狗一起随地大小便。整个公寓臭气熏天。一个晚上我迷糊得把自己的粪便吃了下去，后来吐得一塌糊涂。

在完全糊涂和精神失常的状态下我开始半夜出去把垃圾箕斗里的破家具搬回家来。有三条腿的椅子，破电视机，站不住的桌子，全是没用的废物。很快所有的四间房子都堆满了没用的破烂，可我相信它们是无价之宝的古董。

我把椅子放成一圈，和一群群并不存老的人在想象中一决雌雄。“你这只胖猪，你从来没有受过我。”我冲着想象中是我妻子的椅子尖叫着；“你们两个就那么把我抛弃了。”这是对妈妈爸爸椅子。有时候我认为特莎还和我在一起，就对她卧室里的一堆破烂说晚安。当我想象中的客人在这里过夜时，我告诉他们要轻一点，不要吵醒我睡着了的女儿。也许这种假装的

生活起了安全阀的作用，使我可以不必承认现实里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如果面对现实恐怕我就会永远疯了，或者把自己投到公共汽车的轮下。

等到毒品带来了急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我坚信警察要来袭击我的公寓，就把街门钉上了不让他们进来，只留下一个小后窗供自己爬进爬出。我觉得每一辆经过的汽车都是在查看我是否单独在家，就用旧大衣和破布搭在摆在一起的破椅子上，做了些我认为看起来像人形的东西。我肚子贴在地上爬着把我唬人的东西移到窗前，看起来好像是有人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地对我那饿得半死的狗说：“这样就能挡住敌人了。”

当偏执妄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开始向窗外的行人大喊：“来抓我吧，杂种们。”这不只是毒瘤作怪，我正在进入永久精神失常的边界线。夏天，冬天，春天全都混在了一起，是什么季节也都没有关系。在那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就龟缩在那个地狱般的地方。推一的安慰就是和我的同车伙伴“包打听”说话。这只饿坏了的狗只吃我带回家来的零星食物，他一次也没有出去过。在我长题的阶段，我总是盖着破单子搂着它。

那年冬天，我有一天从大夫那儿回家时发现“包打听”已经死了，它从来没有出去见过天日。我伤心极了，歇斯底里大发作。我想保留下狗的一部分，就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把它们包在银色的纸里，在口袋里放了好多天。我把“包打听”和一些砖头包在毯子里，步行到伦敦桥为我推一的朋友举行了海葬。我点燃了蜡烛把他扔进了河里，早晨高峰期的人群惊愕地看着我。我望着我的狗沉入混浊的泰晤士河水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回到公寓后我继续我的吸毒生活，但是没有了“包打听”对我作出反应我变得更加内向，直到一次在吸毒中间我找到了生活的答案。死亡，自杀。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这不是呼救。我只是要去参加死亡的神秘旅行，使我终于可以对给了我这样多伤害的世界说一声：“见你妈的鬼去吧！”

整整两个星期我把兰多大夫给的安眠药积攒在一起，直到有了足够保证我能够到达天上的假日之家而不至于受到洗胃打搅的药量。在那两个星期里，一切都暂时好像不一样了，仿佛我已经在天上看着人间的一切。我没有感到抑郁，而是恰恰相反。我很快乐，想着我们大家反正都只是经过此地而已。我仅仅是搭上了早班公共汽车，而别人还在继续挣扎之中。

我飞向天堂的前一天，我假装腹痛到了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他们让我住院观察。那一晚我不停嘴地和年轻的夜班护士讲话，把我全部生活都告诉了她。她注意地听着，只偶尔因为去照顾病人而打断一下。我把所有积聚已久的感情全都说了出来。我小的时候怎样得不到爱，一个同性恋心理医生怎样欺负我，我是怎样害怕暴徒，我那个不爱我的妻子，我把自己可怜巴巴的故事讲了又讲，却根本没有任何要自杀的暗示。到了早晨，最后的实情也说完了。我声称脚痛已经好了，自己就放自己出了院。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牛奶好把安眠药吃下去，骄傲地想道：不用水，我才不能像个叫花子那样死去呢。我到原来特莎的屋子里，躺在破布堆上，吃了第一把安眠药。当药力开始起作用时，我心里想，不知道我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就像一个出门旅行的人在去机场的路上要检查看看护照是不是带好了。我站起身来最后一次看看窗外，心想，我要离开这一切堵车现象了。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害怕起来。别做个该死的懦夫，一辈子哪怕就这一次做个男子汉大丈夫！我一面吞下最后的安眠药一面对自己说。我等待着，但是又开始感到惊慌失措了。我要不要打碎一个窗子喊救命？这有用吗？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安眠药，反正是死定了。我非常害怕，当我闭上眼睛迎接死亡时，我看见上帝在向我微笑。

等我醒过来时，发现正低头看着躺在破布堆上自己的身体。我死了吗？我自由了，所有的麻烦都是过去的事了。有一小会儿这感觉真好，但是突然我感到自己被往下拖到下面的尸体中去。我拼命想反抗，但只能设法不再进入那个尸体。但是那个力量越来越大，我一再反抗，最后还是被征服了，被迫回到自己的躯体中去，去再一次经受那一切的痛苦和伤害。

我跟拥着走到了大街上，仍然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超然，好像我摸不着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走进了一家面包店，求他们给我一点面包。那人给了我一只大面包，这时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又一次被欺骗了，但是这一次欺骗我的是上帝本人。和所有别的杂种一样，就连上帝也欺骗我！

在自杀未遂后，我变得更加郁闷，我相信自己现在是生活在地狱里，就开始和老鼠说话。很快我们就亲密无间，我开始不用姓只用名字叫他们。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相信甚至连老鼠都背叛了我。他们偷了我的药丸。我暴怒起来，把地板掀起来找丢失的药丸，结果身子从天花板掉下去了一半，整个周末都夹在那儿动弹不得。到了星期一，楼下的商店老板帕特尔先生听见了我的叫声，给地方当局打了电话。我被送到圣安妮精神病院，给我服了一个星期的

镇静剂。我一醒过来就逃走了，但是我十分沮丧地发现我的贫民窟基地已经被完全封死了。我最后的拥有一个家的外表也一去不复返了。

二十年后我仍会在晚上醒来，听见“包打听”呼叫我的声音。

现在我露宿街头，生活也变得更加朝不保夕，因为没有了固定的住址，我的社会福利金也停发了。我只得靠小偷小摸弄点钱来买毒品。当我吸足毒以后，我会从大商店份定手套、钱包或其他小物品去卖给小的旧货店。由于有偷得的收入，我的吸毒量翻了一番。这和公寓里的独居生活完全不同，但是绝望感是一样的。我不再整天重新安排家具，而是在大街上无目的地闲逛。在安非他明引起的幻觉中苏醒过来以后，我仍吃过量的安眠药，但是现在是赶到哪儿就在哪儿吃，在公共厕所、公园的长凳上或商店的门道里睡死过去。在哪儿都是一样。大量吸食毒品使我不再为承认自己成了一个流浪汉而感到痛苦。

偶尔在吸毒产生的亢奋下我思维比较清楚，就开始偷衣服，成了伦敦穿着最讲究的流浪汉。在大商场里我拿起需要的衣服，不是走向交款台而是撒腿就往外跑，而且一直不停地跑到几英里以外才停下。即使是商场的警卫发现了我，他们也逮不到我，因为我以闪电的速度消失在远处。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偷食物，我已不再是一个逃跑的驾车者，而是用两条腿逃跑的高手。令人惊异的是，只有三次强健的商场警卫跑得比我快，抓住了我。一个澳大利亚的女保安官员原来是马拉松运动员，她追了我将近三英里才把我抓住。听起来好像我是在恶作剧，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一种非常孤寂和痛苦的生存方式，在伦敦的水泥森林中像只野兽样活着。

我常常乘伦敦的环行地铁睡上一整天。我常在早上高峰时拥挤的车厢中睡死过去，在晚上醒来时看到同样的人群下班回家。有时我在从伦敦开往各个城镇——比如说利物浦——的末班火车上睡觉，到达后我干脆告诉车站的人员我喝醉了，上错了车，钱也丢了，需要赶快回伦敦。这样的故事总能使我在温暖的候车室一直睡到坐早晨的头班火车回来。有时我甚至还能得到英国火车公司提供的免费热早餐。有一晚在格拉斯哥，迎接我的是：“你他妈是怎么回事？上个星期你就来过！”在这件事情以后，由于我记不得已经坐过了哪些线路，只好结束了在火车上睡觉的历史。

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买毒品，我开始偷饭店走廊的墙上挂的画。在这样一次盗窃活动中，我发现了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叫格罗夫诺的繁忙的五星级大饭店。在安静的四楼上我看见了放床单被套等的房间。里面有大约三十个堆放在一起的床垫，我把床垫重新安排了一下，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床位。很快，利用饭店的后门、躲开守门人的工作台进出我的新居就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一旦进到了繁忙的前厅，我就沿漂亮的楼梯偷偷上去，消失在走廊上，进入我的新家睡上好几天。这是一个离白金汉宫中的女王不远的理想的流浪汉的歇脚点。这个在床垫后面的躲藏地成了像家里一样舒适自在的地方，我把暂时不用的毒品和新偷来的衣服都放在那儿。我像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有点趾高气扬起来，我走进饭店的餐厅叫了一顿热早餐，在账单上签了个假房号。那晚，两个门卫在楼梯头上等着我，我在格罗夫诺大饭店的生活就此突告结束。

饭店里的房间没有了，我重又流浪街头。冬天已经来到，我知道快到圣诞节了，因为商店里放满了圣诞树和圣诞节装饰品。我失去托特纳姆的贫民窟基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年头了。

我的受伤害感正是在这个时候特别猛烈地出现了。我不仅是一个吸毒鬼，而且还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无所有地露宿街头。这是一个互表友好的季节，我独自躺在公园的长凳上，想象着前妻和她的新丈夫以及她所有的妹妹们一起在那所大宅子里吃火鸡，拉响礼包爆竹。至少特莎和安东尼嫩和他们一起在那儿。生活把我像旧包装纸一样抛弃了。是毒品置我于今天的境地，可是我却觉得人人都利用了我。我又生气又痛苦，不过不会比艾伦意识到我并不是同性恋、说的没有一句是实话时更为痛苦。

也许上帝是以我之道还治于我身了。

落到了阴沟里以后我才愈加意识到真正的爱的价值，从一张公园的长凳上，在稀有的片刻清醒时分，我给艾伦写了一封信，乞求他的原谅。我一生都是用金钱购买虚假的爱，但在贫困中爱情之店都关门了。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之中，仅仅为了能够承受住活着的痛苦，我需要更多的药丸。

后来的几天中我在商店里偷了各种东西，在我神志错乱的脑子里这些都是给家人的圣诞节礼物。我带着这些东西到处走来走去，想到经过我的陌生人会相信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就产生

了一种安全感。想到他们会把我看作街头流落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就觉得无法忍受。那个晚上我到圣詹姆斯公园里小湖附近去睡觉。在吸毒后无比畅快和满足感消失后，我痛哭起来，自己知道每次这种时候我是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在服用了大量镇静剂后我睡死了过去，手里仍旧紧抓着偷来的酒和其他物品。

醒来时我觉得身体冻水了。正下着雪，只有在服用了大量的安非他明后我才能够起来活动。我觉得这是圣诞节早上。至于是不是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对于孤身一人在公园长凳上的我来说，这天就是圣诞节。

我迫切地想找人和我共进圣诞节午餐，就开始到处乱转，直到在一家商店的门道里看见了三个正在睡觉的流浪汉。我给他们看了看我的酒，他们便都急切地跟着我来到了已经积上了厚厚的一层雪的公园中央。我让他们都坐在长凳上，然后宣布道：“是吃圣诞节正餐的时候了，你们都是我的新家人。”他们开始缠着我要酒喝，我生气了，大声说道：“要么做我的家人，要么滚蛋。”他们大眼瞪着酒，服从了我的要求。我一个个指着他们，喊道：“你当我的弟弟，你当我的老婆。不。你当我的女儿，不，我的妈妈！”我自己也糊涂了，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啊，他妈的！就不管当爱我的什么人吧，只要他妈的爱我就行！”那个苏格兰流浪汉大笑着说：“只要给我酒喝，你让我当他妈的谁都行！”很快我们就唱得醉醺醺的了，我跑到了一棵树后，重新出现对头上戴了一项纸帽子，用更多的酒收买他们一起唱起了圣诞颂歌。

我越是酒醉迷糊，就越一门心思地想使这成为一次家庭的圣诞节庆祝。通过朦胧的幻觉我想象我们都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可是我们的圣诞树呢？我把雪堆成了四英尺高的、我觉得像个雪人的一堆，用两个空酒瓶做眼睛。“这是我们的圣诞树！该讲故事了！”我大喊道。我让他们都听我讲，然后进行了通常的自怜自艾的长篇独白，如何从家缠万贯到流落街头。我手里有酒，所以他们都得听着。那个苏格兰流浪汉，一个戴顶红色呢帽的粗矮个子，同情起我来，说道：“我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图书馆工作过，本来是可以负责那个图书馆的，可总是喝醉了不能上班，所以就提拔了别人。”他接着告诉我们，他怎样在盛怒之下离开，喝得酩酊大醉，在许多年前流落到了伦敦的街头。那个年纪较大的人，穿了一件用绳子系在身上的褴褛雨衣，他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突然，三人中的那个老太太似乎清醒了过来，她占据了中心地位，骄傲地声称：“我曾经是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就住在威斯敏斯特这儿。”她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瘦削而憔悴，但不知怎的在她讲述自己走上酗酒的下坡路时，还显出几分威严。她告诉我们，有一次她怎样在午餐休庭后浴器键地回到法庭对被撤出了案子。其他两个人笑了，但是我制止了他们。她的故事显然是真实的。当她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口音叙述时，我能够想象她穿着律师抱时的样子。

当时的一切使我难以克制自己，我对他们说我去弄点滴回来，就跑到附近艾伦的家里去讨钱。在过去我吸毒闹事后，他已经很久不愿和我打什么交道了，这次开门后很是生气。“不能进来，我有朋友在，我ffl正吃饭呢。”他简短地说。“吃他妈的饭？不再需要我了？给我钱，不然我就硬闯进去！”我大叫道。“在这儿等着。”他紧张地回答道，随着关上了前门。很快他回来了，给了我一百英镑，说这是绝对最后一次给我钱了。“如果你再回来，我就叫警察，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尴尬局面。”他坚决地说。他的话让我难过，这回可是真格的了，在这么多年以后这是又一个最后的告别。我回到仍旧坐在公园里老地方的三个流浪者那儿，把他们全塞进一辆出租车中，高叫着说：“今晚有床题！这个圣诞节我们不再睡公园的长凳了！”

不久，三个莫名其妙的流浪者坐在出租车里等在维多利亚一家小旅馆外面，我会预付了四个房间的房费。房门钥匙安全地放在了口袋里以后，我们在拥挤的酒吧里坐下来吃晚餐。吃到一半时我意识到我们非常引人注目，我怕被赶出去，就把大家带回房间里去。我的新家庭成员一人抱着一瓶酒，很快就在干净的床上睡着了。

我自己呢，想睡可是亢奋得睡不着，就开始在走廊里转来转去。过了一阵子我决定离开旅馆，但是在离开之前要在三个朋友的门下放上一张“圣诞节快乐”的纸条。

我来到老太太门外时她的门开了。她邀请我进去，我们坐下来分享她那瓶酒。她给我看了用绳子挂起挂在她脖子上的。她父亲的有顶饰的金质图章戒指，讲起了他的自杀。她父亲发现她的母亲和他自己的亲兄弟在床上。老太太讲述这段事时关得非常伤心。我给了她两粒安非他明，对她说：“这会令你快活的！”十分钟后她好像真的高兴了起来。“再给我点！”她说，又开始失了起来。我看到她的悲伤，就扔了几粒安非他明在地上，大声说：“把我的快活拿去吧，我已经品不出它的味道来了。”她拾起药丸，要把她这么多年来在困境中仍一直安全探存着的图章戒指给我。我激动地拒绝了，跑到了大街上。转悠了一夜之后，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公园里我们聚会过的地方。我们家庭的雪人仍在那儿，绿色酒瓶做的眼睛望着我。我狂热地倒在

雪中，唱起了圣诞歌曲。

当早晨的太阳升起后，天气暖和了起来，雪人开始融化，和我生活中其他一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吞下了一把安眠药，望着酒瓶做的眼睛跌落在一摊雪水中，睡死了过去。

许多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雪已全部化尽，只有一片空空的绿地。吞下了安非他明后，我又冷又僵地等待着化学药物造成的兴奋。使我能够不是生活着、而仅仅是存在着熬过又一个空虚痛苦的日子。

我流落街头的日子就这样继续着，不间断地夹以许多短期的监狱拘留。我干的最愚蠢的一件招致逮捕的事发生在伯明翰。我不知道怎么会到了那里去的，可能是在火车上睡觉出了岔子。我和在街上遇见的一个陌生人一起破门进入了一家百货公司。他偷了一些表后离开了，而我有更大的计划。报警系统不起作用，因此我有一整夜的时间独自呆在百货公司里。我从文具部拿了一个书写板，想在每一层走走，把我打算偷的东西写个清单出来。不幸的是，我最先到的是酒类部，第二天百货公司开门时警察在这儿发现了我。我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周围全是空酒瓶。我烂醉如泥，在温斯顿·格林监狱里关了三个星期才醒过酒来。令人惊奇的是，法院只判了我罚款，规定了交付期！

当我被发现不省人事地躺在公园的长凳上时。常常会被送到把病人锁起来的精神病院去，但是由于多数时候我都是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医院还是回到了监狱之中。我只知道自己在某个地方。我在这么多监狱和医院里呆过，已经记不得数目了，但是我偷带过毒品到其中的一些中去了，大多是塞在肛门里带进去的。

有一次被还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时，我偷带进去的像麦角酸二乙基酸胶片这样的廉价毒品使我产生了可怕的幻觉。我想象监狱的墙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幕，不断变大变小。当牢房变小时，我觉得头被挤压在天花板上，然后突然一切相反，牢房变得巨大无比，我的上铺升得离地二十英尺高。这些幻觉就够糟的了，但更为可怕的还在后面。我用一些烟叶换来了一杯洗涤液洗狱中穿的衣服，但是我的新狱友以为这是绿色的烈酒，就把这该死的一杯全喝下了肚。不一会儿，当我的幻觉世界正在收缩的时候他大吐起来，同时还拉开了稀。他脱下裤子的时候，屎从他屁股里直喷而出，地上哪儿都是。我感到自己像恐怖电影中一只蚂蚁，就要淹死在粪便和呕吐物的海洋之中。那个家伙呻吟着，疼得窝起了身子，但是我们就一直这样被锁着，直到第二天牢房门被打开为止。

我仍在幻觉之中被送到了监狱的医院，一个上锁的大病房，里面有大约十五个犯人。我并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接受观察的判了罪的杀人犯。我在吸毒后的迷糊状态下，躺在床上听着两个囚犯在谈话。他们的床分别在我的两侧。“我的那个没有马上死。你的那个呢？”他们在平静地谈论着各自是怎样杀死自己的妻子的，就像在谈论上星期六的足球比赛似的。“没有。”另一人答道。“我的那个一直喘着气，看着我，一副嘲笑的神气。她还他妈的咧着嘴笑呢，所以我刺进了她的心窝，又把她的脖子切开了。这一下她不再看我了。你的那个怎样，弗雷德？”“老是嘟囔着，她还不肯停下。我不断用锤子砸她的脑袋，可她就是不断地哀声嘟囔。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参加掷骰比赛，已经晚了，所以就把它捆起来塞在了床底下。那晚我抑掷擲得特奥，结果输了！床底下老有呻吟声，我也睡不着觉，所以我就下楼去睡在长沙发上，好安静一点。早晨我上班前上楼去看了一下，她已经不出声了，一切非常安静。这种杀老婆的事情，可是不容易，是吧？特别是第一次干的时候。她们死起来可慢了，对吧？”然后他又平静地继续道：“该决喝茶了，弗雷德。把报纸递给我。他妈的！你看，斯琅思足球队又输了！切尔西队踢平了。”那晚我做了许多可怕的梦，梦见他们杀我，争论着谁的方法更好。第二天早上在洗淋浴的时候，另一个犯人向我吹嘘他怎样就在这个淋浴的地方用刀子捅了另一个人，好像手里拿着把刀子般做给我看。我吓得跑回到杀老婆的两个人那儿才觉得安全了，他们现在在讨论清除血迹的问题：“就是洗不掉，而且还是新地毯哪！”

几个月以后，在另一个精神病院里，我醒过来时真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现在在地狱的吸毒鬼部。我床脚头的表上写的是“吸毒过量”。几英尺以外，一群长鼻子妖怪坐在桌旁吃东西。他们笑话我，说：“我们也像你一样吸毒！”我摸摸自己的鼻子，看是不是也长得和他们的一样长了。一个戴着一顶巫婆的大黑帽子。吹着喇叭的妖怪来到我的床边。“你好，”他说，“来和我们一起吃吧！”这是终极的恐怖表演吗？“走开！”我尖叫道。这时所有的妖怪都过来了，都吹着喇叭，高声叫着：“欢迎吸毒过量先生，现在你是我们的一员了。”我闭上了眼

睛，等待着魔鬼本人的到来。

突然我又飘到厚厚的白云里睡着了。是上帝原谅了我吗？是魔鬼那天太忙了吗？我发现自己和女儿们一起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

有人在叫：“斯蒂芬，过来吃晚饭了。今天是圣诞节。”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站在我的床旁。护士用柔和的爱尔兰声音对我说，我是吸毒过量在街上失去知觉后被人发现，从一家综合医院转到这里来的。我起床加入到戴着圣诞节聚会的帽子和小丑鼻子的其他病人之中，在一个上了锁的精神病房里吃圣诞节晚餐。

后来躺在床上，我隐隐约约记起，我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夹杂在购物的人群中，感到十分失落。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了，我却无处可去。我又一次整天拿着个空盒子走来走去，假装我是去参加家人的圣诞节聚会。当毒品造成的亢奋感渐渐消失时，我坐在切尔西车水马龙的国王大道边的一张长凳上，感到现实太痛苦了，就吞下了一把安眠药来进进一切。药开始生效，街上的闹声不再突出，我飘然而去...不再有人，不再有车，只有白云朵朵。

但是，突然，四周充满了妖怪。我的鼻子在哪里，我的喇叭呢？护士，我在什么地方？

一天多以后我完全清醒过来，现实像把手术刀一样刺痛了我。我身无分文，形影相吊。我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更为糟糕的是，我是个痛君子，却没有毒品可以吸食！

从床上我能看见，当时不时地有人进出时，锁着的门就会打开。我站起来等在门边。机会来到的时候我偷偷溜到人多的走廊里。到处是匆忙来去的医生和护士。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下去，当我看到医院药房的窗口时，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一个护士正推着一个小台车从里面出来，我看她锁上下半扇门时意识到她没有锁上半扇玻璃门。我一直等到她走得没有了影子，然后跳进去，发现自己站在放满药丸的药架之间。一个痛君子的天堂！我疯狂地寻找安非他明，但是知道护士随时都可能回来，就抓了三瓶药跳回到人多的走廊中。几秒钟后我进到了厕所里，吞下了第一把药，既不知道也不在乎究竟是什么药。不久我感到头昏，蹒跚着回到走廊里，走到医院的院子里，被一个保安发现了。他找了好几个病房，最后才使我和我的妖怪同伴们重新团聚。他们现在没有了帽子和可笑的鼻子，都显得十分驯服。

不久我在床上睡着了，每隔几个小时醒过来去病房的厕所里吞下更多偷来的镇静剂。在那儿一个妖怪同伙看见了我，他敲诈我，要我给他一些药丸。我很不情愿地给了他一些，又回去睡觉。但是不久护士长叫醒了我，没收了我剩下的镇静剂。那个妖怪吃药时被逮住了，就告发了我。

在那种医院里要出院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能够使医生们相信你对自己和别人都不会构成危险。在装出我常用的“一切都挺好”的样子后，我在一月五号就可以出院了。那天，天意以一个小个子爱尔兰护士的形式出现了，把我从肯定面临的二十年徒刑中拯救了出来。那个女人看到了多年吸毒对我造成的恶果，意识到我仅仅是一个靠一瓶一瓶安非他明混日子的空虚迷失的人。她企图让医生改变决定，使我出院晚了宝贵的五个小时。

牛仔、俄国特务：远方世界的国王和一个耶稣的狂热信徒是我在加销的病房中遇到的许多人物中的一部分。我自己是罗宾汉、耶稣或仅仅是个可悲的斯蒂芬？也许现在已经是一个吸毒成痛的由他们构成的混合物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继续不断的吸毒使我的精神分裂变得更加严重。有一次，在不停地走了十个小时以后，我于黎明时分来到了肯特的乡间。我站在一片田野的边上，这时一匹黑马走过来和我说话，解释说他是上帝，说黑人更为神圣，不久将统治世界。虽然我是个白人，但在天堂里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将得到耶稣原来的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这匹神马详细地讨论了我的新工作，直到一辆路过的警车把我带走。他们并不欣赏我将要得到的新工作，把我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但是我并没有犯法，他们给了我友好的忠告：“滚回伦敦去当耶稣阳！”然后就放我走了。

又经历了许多警察局的拘留所里、监狱中、公园的长凳上和商店的门道中的生活以后，我再一次离开了一家疯人院。不过这回有点不同。为了让我有个地方睡觉，他们给了我一封信，把我介绍到伦敦北部的庞德巷重新安置处。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是我住过的这类机构中的第一家。我当时心理状态极差，来到一条通向重新安置处大门的狭窄的长巷子中。巷子两边都是很高的铁丝围墙，里面是一个很老的犹太墓地，这使得远处的砖结构维多利亚式的宅子显得更为凶险。我在大门前踌躇着，但是一个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的老头子用手指着让我进去。就在这么暖和的春日里他竟还穿着一件厚大衣，他的手肿着，充血的脸上表情茫然而悲哀。

在接待处一个不友好的男子拦住了我们，命令我们等在那儿。他个子高得出奇，我把信递给他时他低下头看着我，凶恶地大声说：“啊，这是什么？”看完后他大笑。“这些日子到处都把你们送到这里来。”“送谁来？”我问。“贫困潦倒的、像你这样的流浪汉！”

这使我震动。过去我一向是吸毒吸得迷迷糊糊的，没有把自己想成是个流浪汉。“进去！”他指着一扇门命令道，“把衣服脱光。我们得消灭虱子。”“我身上没有虱子。”我大声说，把空衣袋给他看，以为他指的是毒品。“跳蚤，臭虫！”他扯着我的头发喊叫道，“你身上满是这些东西！”北把光着身子的我推进了淋浴室，在那里，一个穿着长筒雨靴、戴着橡皮手套和口罩的人用水龙头把我浑身上下冲了个遍。我哭了起来。我成了个将要被丢进麻风区去的没人要的空壳子了！另一个人在我身上洒满了白色的粉末，这时我喊道：“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衣服？还是叫肮脏的破布条吧，必须烧掉！”他假笑着。我以为他是说必须把我烧掉，我慌了，想要逃走，结果滑倒在地上。“啊，天哪！”我喊道，“他们要怎么着我呀！”这一回，这个罗宾汉珠宝贼可是一下子败在了毒品手下。

我原先遇见的那个老头子进来了。他也是赤裸着身体，身上搽满了白色的粉末。他接着我说：“别哭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对我这样友好、亲切。我双臂拥着他站在那儿，就这样仍然赤裸着身子哭得伤心欲绝。看守们在一旁看着，笑着：“喂，你们这对情人，把这些衣服穿上。”他们送给我们一人一套最简单的衣服。“今晚你可以在路那边的酒吧里把这些衣服卖掉，”老头低声说，“买点猫尿，你就不会流眼泪了。”“猫尿？”我问道。“酒。”他答道，“衬裤不错呢？”

于是我们又被推进了另一扇门，我几乎想着门里面会是一个死刑毒气室。“这儿是两个怪东西。”让我们淋浴的那个人把我们交给另一个护理员对评论说。后者带我们走进一条黑朝辘的过道，说：“三号房，左边最后两张床。”

三号房是一个气味难闻的大宿舍，里面大约有四十张床，一边二十张，住的都是贫困潦倒的人。看到这么多人挤在一起，都是被抛弃在人类之外的社会麻风病人，我又开始关了起来。更糟的是，现在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许哭你这个小臭货，不然我把你那个该死的脑袋给踢扁了。”有个人冲我喊道。“把这个杂种给赶出去。”另一个人尖叫道。他们脸上都是同样的迷茫和失望的神情。眼睛里一片茫然，没有任何希望。我在厕所的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也是同样的神情。即使我强迫自己笑，那迷茫的表情依然存在。

我在床上默默地哭着睡着了，但是只有几个小时又醒了，听着四十个人打呼略放屁熬过了一夜。这些年来我也进过许多精神病院，但是那里的男女病人、护士和探视的人和这里的是如此的不同。即使在监狱里，你失去自由，但是并不失去尊严。

庞德巷和别的机构不一样！没有人强迫我来这里，而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法再在外面世界里生活了。即使在英国，在这个不用工作社会保险金也替你支付房租和食品的国家里，我也无法用最简单的方式活下来。我成了生活中的失败群体中的一员。这个慈善机构并不是一个把人锁起来的地方，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离开那间臭气熏天的屋子，但我做不到。我完全被击垮了。

在这些年里，我失去了婚姻、女儿、房子、汽车，失去了一切。但是比起现在来那些都算不了什么！在这里我失去了勇气，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我为了一点慈善的施舍卑躬屈膝，只是为了苟延残喘。一天又一天我就那么万分沮丧地坐着，看不到从这个麻风区逃出的任何可能。整幢建筑都很暗，墙是灰色的。白天宿舍都锁着，我们不得不在阴沉沉的娱乐室里过上一天，坐在硬椅子上，互相吸着别人的烟屁股。下午他们打开有二十来张椅子的电视房。这是一天的高潮，总会引起一阵猛冲，所有的地方很快会被占据。如果你站起来上厕所，就会像抢座位游戏里的那样失去你的座位。晚上要活跃得多，许多人醉醺醺地回来，睡觉尿床。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喝酒的钱是哪儿来的。

那几个月里我感受到的痛苦之深，后来从未完全离开过我。这是一种绝望、末日临头的孤立无助的感情，总觉得最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对于我来说，失去财富和信心跌落到这个简陋的地方，不幸已经发生了。

许多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恢复，但是从麻木中稍稍醒来，就再度想到毒品和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毒品象征着离开此处的推一希望。比起这个慢性死亡来，流落街头似乎也是一种句好的生活方式。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卖掉大部分衣服之后走了，留下那些麻风病人仍旧坐在庞德巷的硬椅子上。带着那一点点钱我直奔兰多医生的诊所而去，开来了原来的处方，重新乘上了疯狂吸毒的过山车，四处流浪，睡觉条件极差。回到街头的头一夜，我坐在威斯敏斯特桥附近的一张长凳上，彻夜未眠，当初我就是在这里把“包打听”扔进河里去的。

次日早上，我在牧师绿地发现了一个未用过的地下室的人口，进去时撞上了两个忙着喝烈酒的样子粗暴的家伙。他们让我呆在里面，但其中的一个警告我不要睡在右手的一边。“那是我的一边。这里我说了算。”那晚，也许是第二晚，我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以后回到了那个地下室。所有的破布堆成的床还在，但酒鬼不见了。我倒在空酒瓶上失去了知觉。我记得半恢复

意识时看见了其中的一个酒鬼站在我边上，他大喊了些什么，拿瓶子打我的头，把我的前额打破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过来，发现他一面笑一面往我脸上撒尿。可是安眠药的作用还很大，我根本起不来，只好闭上眼睛接着睡下去。后来他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倒在了我身上。我动弹不得，就这样躺了不知多久，最后才有了力气翻身把他推开了。我和那人并排躺着，突然意识到他死了！我吓坏了，但即使在服用了安非他明后，我浑身的骨头还是僵得站不起来。

我爬出了地下室来到大街上，开始感到不知所措。我要不要告诉警察那底下有个死人？他是被谋杀的，还是我在吸毒后迷糊的状态下杀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啊，上帝，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跪在人行道上开始祷告起来。我蹒跚着走进附近一个教堂，在里面呆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自己平静下来。我感到像一只掉在陷阱里的狐狸，眼前出现了千万个酒鬼逐渐包围上来。要找个最近的灯柱好把我吊死的景象。从那一天起，我害怕被处死，只在感到比较安全的商店门道里睡觉。

我穿着四层衣服，露宿时从来不感到冷。我的头发长得很长，缠结在一起，很久以来就不洗澡了，身上很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最终流落到了尤斯顿火车站后面的长凳上，那儿正是多年前我施舍掉大量现金的地方。唉，现在没有吸毒迷糊了的耶稣瓦罗宾汉来施舍钱了。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多数时候我都被廉价酒醉倒，没醉也是在睡觉。

过流浪生活时，你常常会一连几个星期都用自一条长凳，和已成了你家庭中一员的当地的贫困潦倒之辈分享劣质酒。然后，你会毫无理由地突然搬走你所有肮脏的厚纸袋到另外一个公园去，就像为寻找新希望而移民。季节变得不相干了，你只通过天气的冷热知道那是一年中的什么时候。

在酒鬼的世界中，这一切都毫无关系。

有一天，我坐在公园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对面。她看到我坐了下来，就移到稍远处另一张长凳上去了。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自在，就移回到酒鬼堆里去了。在自己同类之中我觉得更为安全。没有拘束。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生存的愿望又很快消失。我放弃了。失去了份新衣服的任何欲望，我甚至觉得搞到更多的安非他明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想睡觉。过去我还曾在乎来往的行人对自己是怎么想的，而现在根本就忘却了他们的存在。仿佛有一道玻璃屏幕，把我和其余的世界隔离开来了。

我经常在一个女人的商店门道里睡觉，她在早晨开门对总是用儿童车推着孩子一起来。每天早上让我挪开时，她常常从她的小食品店里拿几个陈面包卷给我吃。有一天，我意识到她的孩子现在会走了。在我无家可归的期间，我眼看着她长大，舍去了尿布。

在这些迷失的年头的后期，我开始每晚和另一个流浪汉一起睡在同一个门道里。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过话，但是总是越挨越近，直到我们的脚碰上为止。仅仅没得有另外一个人在动就使我们感到安全一些。这让我们放心了，我们还没有进棺材。

已经死去，已被埋葬，已被遗忘。

在度过了很长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早晨我醒来时看见两个小学生在我旁边扔硬币，他们说：“看看这个可怜的老头。他永远都在这儿！他都可能是我们的爷爷了！”

爷爷？

这话震动了我。

我只有三十几岁，却已经变成一个漂泊街头的老朽了。

天气冷的时候，我睡在希思罗机场的锅炉房里，和所有的流浪汉一样，把在世界上的一切财产都放在购物袋里随身带来带去。袋子里装满了没用的废物，但是带着仍然属于我的东西使我总感到好一些。

小学生管我叫“爷爷”震动了我，使我采取行动。在长期仅仅在公园长凳上凑合过夜之后，我又开始吞食安非他明了。虽然我不到什么地方去，至少我在活动，这总比整天和酒鬼们烂醉在一起要好一些。有一晚，在温暖的锅炉房里过夜时，警察发现了我，尽管我没有犯罪，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我已经好几天因吸毒兴奋没睡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们从我嘴里得到的惟一情况是我出生在巴尼特。但是那两个警察确实真是关心我的安全，就设法安排把我送到二十来英里外的巴尼特综合医院。他们仿佛在设法为这个在他们家门口找到的破损了的人体躯壳寻找一个主人。他们不忍心就那么把我扔掉。

到达医院时，我被放在急诊室屏风后面进行检查。我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好几个觉得奇怪的医生来看我，最后才有一个医生恍然大悟，明白我过量服用了安非他明。他把我在那个隔开的小室中留了好几个小时，等待药力慢慢减退。

我在那天所受到的精神病人幻觉的折磨充分反映了滥用安非他明的严重副作用。我只穿着一件纸质长袍躺在那儿，开始认为自己被带到了火星上，护士们把头伸进帘子看我时我害怕得要死，觉得好像她们在看一个外星人。我坚信只有吃一次性的纸质长袍才能回到地球上，于是就开始了吃了起来，一次嚼一大口。当安非他明的药力逐渐减退时，我已经又吃下去更多的医院的纸质长袍，回到了地球上。医护人员换班时我被发射回了地球。这使我更加相信新来值班的护士是地球人在欢迎我回来。

后来一个精神病医生和我谈话，他从多年前医院的老病历上了解到我的情况。我只有一个病，我是个没有希望的老牌痛君子。把我在这里再留上两个星期，放出去后我再抱着另外一瓶安非他明，这有什么意义呢？医院给了我到查灵道口的吸毒者之家去的车钱后就让我出了院。那个吸毒者之家位于我最近和酒鬼们一起过夜的一条路上。我的火星之行把我吓坏了，现在拼命想停止吸毒。

我带着我的全部破旧购物袋来到这个慈善之家时，一个友善的长胡子汉子迎接了我，请我进去。我们聊天时他表现出很大的理解，说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吸毒成痛的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他问了我那个最终的触及灵魂的问题。我究竟是希望他给我一百粒安非他明，还是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戒毒？“好好想一想。你的回答必须是诚实的，出自内心的。”他说。他给我半个小时自己考虑。显然他并没有一百粒药丸，但是那时候我相信他有。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因为对于一个正处于吸毒后的幻觉和快感消失期的痛君子来说，一百粒安非他明简直就像是金矿一样。

我回顾了多年贫困潦倒生活的痛苦，怀着自己所能具有的全部诚意，平生第一次作出戒毒的决定。在每一天从早到晚吞食安非他明整整二十年以后，这对于我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决定。当我把决定告诉他以后，他给美国最好的戒毒中心之一的凤凰戒毒所打了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告诉我有两个人要来看我。“我不能作出任何保证，”他说，“不过他们有可能把你带回戒毒所去。”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男一女，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俩人原来都是吸毒者，现在正在戒毒的最后阶段。他们问到我的吸毒习惯，盘问我为什么想要戒毒。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痛苦，他们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把我带回了凤凰戒毒所。首先他们搜了我的身，看看有没有毒品，然后对负责吸毒者之家的那人表示了感谢，就带我离开了。在外面大街上，这基本戒了毒的俩人之一问我：“你真的需要这些破烂购物袋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咱们把它们扔了吧。”他指着一个垃圾箱建议道。我稍带犹豫地把两个袋子扔了进去。当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香烟。上了去赫恩山的公共汽车后我回头看了看垃圾箱，看见了我经常挨着睡觉的那个酒鬼。他正在翻我的购物袋呢。这一切显得是这样奇怪。

坐在公共汽车上层，我感到很安全，仿佛是和老朋友在一起。在许多年独自流浪街头之后，这是一个奇迹。看见我的同伴在一起开怀大笑，我感到很难相信他们曾一度和我一样是吸毒或薄的人。

凤凰戒毒所在伦敦南部一个小山上，是一座由私家路通达的有三十间屋子的大宅子。这是一处没有毒品的绿洲，在一切方面都超脱在伦敦生活之外。那一天我开始执行十八个月的戒毒方案。作为新来的人，每一天我都在那些已经正式接受戒毒的吸毒者的严格指导下活动。在戒毒所时间长的老资格们已经取得了进步，现在向新来的人发布他们曾经接受过的同样严厉的命令。方案仿效真实的生活，首先教你接受控命令行事，逐渐教你承担责任。在治疗的后期，戒毒者搬到恢复部，那时他们可以在外面找工作，找住的地方。这使得他们能够重新回到外部世界，同时仍能享受戒毒所集体中的安全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所长在内，都是吸过毒戒了毒的人。为了打破旧习惯，第一年中新来的人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

我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活动室，大约二十个年龄在十七到三十岁之间的吸毒成瘾者在那儿排着队迎接我。他们处于不同的戒毒阶段，和他们见面是个令人十分可怕的经历。这一帮人将成为我的新家庭成员，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和交往。没有毒品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是我所需要攀登的最高的山峰。从十四岁开始我都是在吸毒后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我只有在毒品的作用下兴奋迷糊或喝醉以后才和别人交往。酒和毒品这两根拐杖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糟的是，许多年以来我只和护士、医生或警察说过话。除此之外我就只和一只饿狗或以黑马的形式出现的上帝讲过话了。现在，真实的人，二十张陌生的面孔在看着我。那

天当队长说“这是斯蒂芬”时，我害怕得只希望地板能张开口把我吞下去。

一共有五个小组，每组六个人，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里。我们的小组长彼得大约三十岁，个子很高，短短的黑头发，两只手上都制有花纹。他是经法庭许可到凤凰戒毒所来的，否则就要判刑后监外执行。他带我看我们的住宿处时显得很有自信。我们俩和汤姆一起住在这间大屋子里。汤姆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吸海洛因成瘾，他使我想起了约翰·列依和他的小圆眼镜。那晚，彼得对我解释说，在头六个月期间我只能往外寄一封信。我决定给我母亲写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封致命的信后来毁了我。我坐在桌旁写信，听见彼得和汤姆在正常地交谈，感到十分惊恐，我祈求赶快熄灯，我好独自躺在被单底下。在凤凰戒毒所的第一夜我确实感到像一条落到了沙滩上的鱼。

次日一早，汤姆教给我怎样把床收拾得十全十美，一个精子都没有。不久就有两个拿着书写板的年长的正在康复戒毒者来检查。他们看了看我十全十美的床铺，然后把床单全都拉到地上，说必须得重新整理过！他们又这样做了两次，才最后通过了我整理的床，我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早餐前在饭厅时，和别人在一起所造成的焦虑感觉又开始涌现出来。仿佛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早饭后是会议时间，给了我一包烟丝和卷烟纸，这包烟丝要吸一个星期，教育你要按定量进行消费。

在戒毒所的头一天，我被分派去帮厨，作为新来的，我得把一切东西，包括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另外只有两个人和我一起干活，一位是个快活的高个子小伙子，叫阿什利，另一位叫珍妮，是个漂亮而自信的红头发姑娘。和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干活，我觉得比和大家在一起时威胁感稍稍小一点。

凤凰戒毒所是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地方，人们像蜜蜂一样整天忙忙碌碌，完成着室内室外的无数工作。戒毒者自己管理一切，炊事、清洁、维修、种花、洗衣。我们生活、吃睡在一起，创造了自己小小的无毒品世界。无论你是在用剪刀剪草，还是用牙刷清洁大片地板，你都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对我来说，就是整天洗碗。直到晚饭后，一天中最可怕的部分开始了——集体治疗。

集体治疗是由十个人坐成一圈进行的。头一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在“包打听”死后在托特纳姆那地狱般的地方与破椅子说话时的情景，就开始哭了起来。组长感觉到我很痛苦，就把我带到厨房去喝点水，好让我平静下来。因到房间里之后，当大家开诚布公地轮流就每天所发生的事情说着对别人的看法时，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如果有人指责你，你有机会对针对你的指责作出回答。谈话总是变得很激烈，互相咒骂，但从来不动手。当我们对别人大声叫嚷时，总要抓住椅子座，这样就永远不会用手势去威胁别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怕，总是胆小地设法避免直接冲突。

每晚在集体治疗之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有热的奶制品饮料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和海洛因好君子、法国人皮埃尔成了朋友。皮埃尔的父亲是巴黎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自己掏钱让这个任性的儿子在这里治疗。这个法国小伙子长得很帅，金色的头发，穿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他比我们其余的人要高级一些。他讲起他这个花花公子和法国头号帮匪们在一起时的冒险故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相似的背景使我和他更密切了。皮埃尔决心戒毒，非常严肃地对待凤凰戒毒所的活动，单单是每晚和他在一起就使我开始和别人也有了稍稍多一些的接触。

我仍感到与人交往是件难事，但是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情况变得好多了。现在偶尔我和别的痛君子会聊起自己吸毒的情况，在集体治疗时甚至开始回敬对我的辱骂。

几个月后，当我被派到花园去干活时，情况真正有了改进。也许就是这样计划的，但是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和我一起花园里干活的是皮埃尔和汤姆。皮埃尔是负责人，他不那么严格，允许汤姆和我长时间闲谈。尽管活儿设计得要保持我们整天忙碌，但是终究给草坪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草，给树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枝。我们常常把棚子里已经点尘不沾的工具拿出来擦拭。皮埃尔的责任是检查我们的工作，但即使在他让我们返工的时候也是笑着对我们说的。有一天我们需要烧掉许多垃圾，包括大堆大堆的报纸。我看着这些报纸，意识到自己在湮没的流浪生活中虚度了这样多的年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阿里又一次成了重量级的拳击冠军；一九七五年二月奥纳西斯在巴黎去世；一九七五年十月伊丽莎白·泰勒再度与理查德·伯顿结婚；一九七六年一月协和式飞机首航；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九七七年一月吉米·卡特成了总统；一九七八年五月玛格丽特公主和托尼·阿姆斯特朗离婚。最后一像报纸中的一张登着，一九七七年八月，摇滚歌王埃尔维斯去世。我晃了晃脑袋。埃尔维斯死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他妈在什么地方？

“你记得这些事吗，汤姆？”我问道。“不记得，伙计，我正忙着给自己打针呢！”他笑道。

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把汤姆和皮埃尔看作好朋友了。我向他们吐露是什么使自己对于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感到恐惧。听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的恐惧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发现自己真的在盼望着每天去干活。

偶尔我村1庆祝生日，厨房的工作人员为此会专门做大蛋糕。所有的桌子会被拼在一起，就像国王的宴会似的。在皮埃尔生日的那天，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最后，而是勇敢地在中间和过生日的人坐在一起。

我们每星期两次组织起来在后院的大草坪上进行足球比赛，在这样的一次比赛中，我和一个已经在戒毒所呆了很久的戒毒者冲突起来。那晚这人和我在一个治疗组，他比我更自信，没有多久就把我压了下去，说我根本不懂足球。轮到皮埃尔和汤姆说话的时候，他们各自表示了反对此人的意见。有朋友支持自己，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尽管有这些激烈的争论，所有的人，包括敌对的人在内，都不再吸毒了。凤凰戒毒所创造了奇迹。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吸毒了，戒毒的时间越长，我和大家的交往就越多。事情发展得很慢，但是在发展着。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把落叶耙在一起，抬起头来时看见了在厨房干活的珍妮正站在窗口。她微笑着看着伦敦的方向，没有看见我在看她。仿佛她在想象不久就要开始的她的没有毒品的新生活。她看见了我，大声说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可以又在那边生活了！”她举起了一块小牌子，是我在美术课上做的那块，上面写着：“凤凰人骄傲地前进。”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和皮埃尔及然热告别，他们要到巴黎去。然热已经在戒毒所生活了很久了，他被挑选陪皮埃尔一起去给他帮帮忙。在皮埃尔最终回法国之前这是他最后一次探家。

在毕生吸毒后，我自己的恢复仍旧是如履薄冰。继续木间断地在凤凰戒毒所生活一段日子将会给我时间去成长，教会我表达自己，成为和别人平等的人。然而可悲的是，这宝贵的时间被残酷地缩短了。两个从伦敦警察厅来的警察正等着要和我谈话呢，他们通过我给母亲写的那封信找到了我。我沮丧极了。在多年的流浪生活后我在这里竭力想把毒戒掉，可是现在又来了这事！他们想要什么？从英国警察总部来的警官是木调查小偷小摸的罪行的。这些警官是否有权把我从一个治疗中心带出去，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同意第二天早晨跟他们走。

别的戒毒人员不断问我：“出了什么事了？”于是，我在凤凰戒毒所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出了名。我变成了苏格兰场警察缉拿的特殊吸毒鬼，这不仅使我和他们产生了距离，同时也使他们和我的距离加大了。我不稳定的薄冰上的康复之路现在有了一条巨大的裂缝。我从一个前流浪汉变成了一个超级罪犯明星！

那夜躺在床上，我被是否要逃跑的念头折磨着。这次警察调查的决不是停车罚单，必定是我过去的某极恶行回来讨债了。汤姆和彼得都睡着了，我从卧室的窗子向外面看去，考虑着如何逃跑。可是我能逃到哪儿去呢？所有的路都只会通回到吸毒岛上的无期徒刑。我回想着那酒鬼在我的购物袋里搜寻的情形，和在庞德巷被像个麻风病人般用水龙头冲洗时的痛苦。我决定必须留下来，必须面对一切。我无法入睡，整夜睁着眼躺在床上，我咒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不来打搅我呢？特别是现在！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警察来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了。凤凰戒毒所的规定是，谁也不可以在没有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独自离开，就是去法院出庭也不行。然而没有人和我一起去。我想许多资深员工现在很怀疑我并不是个流浪汉，我吞服安非他明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到警察署去的路上，警官们是超级的友好，“来支烟，来点巧克力吧。”所有用来感化人的老一套。

登记以后我被带到一个狭长的房间里，里面约有三十个档案柜，装满了多年前的相片和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文件。在许多个小时的询问开始以后，很快我就明白他们调查的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已经关押起来的犯罪团伙的头子克雷兄弟，以及伦敦其他犯罪家族，其中有美国人艾伦·库柏以及他与黑手党的关系。

警方在调查，像高热公司这类的小公司是怎样突然拥有起赌场、夜总会和许多别的产业的。他们的钱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使一切显得更为凶险的是，我过去的同伙，梦想成为阿尔·卡彭的特里·马文帮助过伦敦的每一个有名的匪徒。苏格兰场要处理的既有事实，又有幻想，二者完全搅混在一起，看起来比真实的情况要凶恶得多。警方出示了我是总公司的具有一半资产的合伙人的证明。面前摆着回溯到一九六二年的相片和文件，我看到的是我生命的高潮期，我是在吸毒的云雾中飘飘然地度过这段岁月的。

没有了安非他明，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不同，非常虚假，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似的。坐在那儿时我开始想，我们在谈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不可能是我，我刚刚才不再在商店的门道里睡觉！也许他们要找的是我的孪生兄弟？当我穿着戒毒所简朴的衣服站在那儿时，就连警察似乎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找对了人。询问的时间越长我越糊涂，没有了毒品给我的勇气，我只想回到凤凰戒毒所那安全的环境中去。

询问了大约六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们要我写一个书面声明，我写了，谁也没有牵连，只解释自己什么也记不得了。我宽慰地想，总算完事了，期待着他们把我送回戒毒所去，可是却被带着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关进了一间牢房里。

我又喊又使劲砸门，但是两个小时以后小门才打开，出现了一个警察的脸。“放我出去，”我尖声叫喊道，“我只是个证人。”“你不是个证人，”他答道，“你因严重的罪行被捕了。牵涉到枪支呢！”“什么罪行？”我问道，开始感到惊慌失措。他不能告诉我，解释说牵涉到伦敦外的一个警区，他们已经派出了一辆警车来把我押过去。小门关上了。

我吓得呆在那儿，不知道警察究竟发现了什么。枪支，啊上帝！我有什么东西没有烧掉吗？我的脑子开始一件件回想过去犯过的罪。几秒钟之内我从一个吸毒成瘾的前流浪汉变成了一个陷进深渊里的人，这个深渊是由自己犯罪的过去所造成的。稍后，原先的侦探之一从小门向里看了看，嘲笑着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偶然地看见了通缉令上你的相片。”“你这个骗人的臭东西，”我叫喊道，“你从戒毒所把我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我被通缉了。”“我忘了。和你一样，我们记性都不好。”他咧嘴一笑，关上了小门。

我独自关在牢房里，自己的过去如此戏剧性地被带回到面前，心里很混乱，但是也开始记起了许多往事。不是按年代顺序，只是各种事件的星星点点的片段。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曾经拥有过一家夜总会，驾驶一辆白色的美洲虎牌汽车吗？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明明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街头流浪挨饿？随着长夜渐渐过去，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安非他明造成的损害。

从巨富到贫民窟，从香槟到廉价酒。一时间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一度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

牢房的门在第二天一早打开了，我带着手铐被带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警车上。当我们行驶在早晨的高峰期车流中经过尤斯顿车站时，我因为担心一夜未眠，因而神志十分失常。看到睡着在长凳上的酒鬼，我开始希望自己没有离开他们。当警车停在红绿灯前时，我看见一个流浪汉睡在我曾经常常睡觉的那张长凳上，他把脸向我们转了过来，我吓坏了。他有着我的面孔。我在看着我自己！“在长凳上总比进监狱强。”我的孪生兄弟大叫道。我猛拉手铐尖叫：“让我下去，我的家和这里的流浪汉在一起。”“安静，不然对你更没有好处。”和我铐在一起的警官严厉地回答说。

两个来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贝德福德城外一个很小的乡村警察署里，我被关进了一间牢房。我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门开了，我的面前站着当年调查我在林福德堂烧东西的那个警官。“你好啊，”他一脸假笑地说，“很高兴这么久以后又见到了你。”

几年前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罪犯没有被抓住，他用枪威胁着绑架了一个开汽车的人开车逃跑了。这个警官心里长期一直藏着怨恨，就怂恿证人从警方的嫌疑犯照片中认出我来。他提出只要我在供词上签字，可以把我减成短期徒刑；但是当我拒绝以后，他发起脾气来，大叫道：“那么你将参加接受指认。你会被判长期监禁的！”

回到牢房后我琢磨开了。我会不会是在吸毒后的幻觉中进行了抢劫，尔后就全给忘了？我能够记得起零星的枪啦劫持啦什么的，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绑架过任何人。他们又一次把一张认罪书放在了我的面前，这次我好好地读了一遍，注意到这个案子发生在几年前一月五号中午十二点钟。为什么一月五号这个日子会在我的脑子里唤起了某种记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我确实记起了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医院。如果出于某种奇迹，这和那个爱尔兰小护士把我留到中午十二点才放我出去是同年的事情，那么我就是自由人了。

我现在已经被拘留了三十个小时了，我拒绝参加接受指认，再一次要求见律师。我告诉警察关于那家医院的事，说：“如果在绑架的那天我是个吸足了毒在大街上游荡的痛君子，你的指控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我在哪家医院里面，你就见你妈的鬼去吧。”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我开始得意起来，觉得我会胜利。不幸的是，这种新出现的狂妄加强了我内心不断增长的对凤凰戒毒所系统安排的生活方式的反抗情绪。

那层薄冰上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我正在重新漂向吸毒岛。

一天以后，牢房的门开了，等待着迎接我的是凤凰戒毒所的彼得。那个爱尔兰小护士真的救了我，警察不得不让我离开。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比坐在我旁边的这

个平庸的吸毒者彼得强得多。我又属于第一等的了。我是个明星。我是个回到凤凰戒毒所去受到低一等的吸毒者奉承的英雄。我战胜了对我绑架的指控！

回到戒毒所后，我发现并没有为欢迎我回来安排特殊的晚餐，感到非常愤怒。连汤姆也没有对我进行特别的吹捧。我感到受到了伤害，便又开始把自己隔绝开来，心里想：“这些白痴。他们从来没有和伦敦警察厅或者显赫的罪犯打过什么交道。”

起先，凤凰戒毒所的好处胜过了我的反抗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天平渐渐倒向另一边。到皮埃尔和然热从巴黎回来之时，我对戒毒所的态度已经变了。即使是皮埃尔，他一心想着巴黎，也不觉得我在伦敦警察厅历险有什么了不起。更糟的是，我从花园被调到洗衣房去和一个几乎从不说话的、样子令人压抑的女人一起干活。整理床铺，集体治疗，事实上一切现在都显得十分愚蠢。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不满更加厉害，我开始在晚上偷食物，吃得胖了许多。当戒毒所的头头之一提起来我长得有多胖时我很反感，相信他们全都在和我作对。我惟一感到好过的时候是熄灯以后，那时我就可以独自想心思了。

在这样一个夜里，我躺在床上，开始怀念伦敦的辉煌灯火和我有钱的那些个年头里的狂热生活。我脑袋里面熟悉的那盘磁带又开始放了起来，没有道理地找道理。钱？可以去偷呀！我只需要信心！我只需要勇气！我只需要毒品！

第二天一早我从凤凰戒毒所逃跑了。警察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判决我服最可怕的刑罚方面他们助了一臂之力。

这就是在吸毒岛上的无期徒刑。

我祈求其他在戒毒所戒毒的痛君子不要像我这样逃跑，不要承受像我将要承受的这样可怕的后果。我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现在我将要得到的是那该死的主菜了！

当我跑过花园的时候，一个刚来了一星期的年轻人在我身后叫道：“我和你一起去！”起初我们打不开后门，在我们使劲弄门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喊：“斯蒂芬，别走。等一等，我和你谈一谈！”这是珍妮，她正从窗子往外看。木一会儿当她穿过草坪跑来时，门开了，我们消失在路的拐角处。五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开往伦敦中区的火车上了。我始终也没有弄清那个年轻人的姓名，他建议我们呆在一起。他去取了她的旧汽车，从他母亲那地弄了点钱。

他口袋里有了钱，那天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把车停在哈利街兰多医生的诊所外面。十五分钟后我们就买来了大量的安非他明和镇静剂。我们在他的汽车里开始一把把地吞服药丸。此时我的口袋里放着他剩下的钱，我们又往另外一个医生那里去。这时我们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我的同伴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下汽车，突然他失去了知觉，倒在方向盘上。他刚才弄错了药丸，吃的是安眠药。我把他拽到旁边乘客的座位上，自己开车。我的这位昏倒的乘客倒在我身边一动不动，我也迷迷糊糊，拼命想找到另外一个医生，开始开着车兜起圈子来。突然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呼吸很怪，而且已经出溜到了地上。我把车停下，发现他已经昏迷。我以为他要死了，慌慌张张地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他急诊住院洗胃。我极其惊恐，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把汽车钥匙留在护士那儿，抓起剩下的毒品撒腿跑了。

在凤凰戒毒所呆了这么久以后，吸毒后的毒效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又一次单身一人流落在伦敦的街头。我紧握着药丸，当那恐怖旋风力量越来越强时，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绝望之下我买了一些廉价白兰地，用最后的一点钱付了在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住两夜的房钱。我被带到了地下室里的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煤气炉，煤气炉上方有一个木架子。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一扇极小的窗子对着上面的马路。我力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药丸倒出来分成两堆放在架子上，安非他明在右边，安眠药在左边。我得意地在架子的两头各放了一瓶白兰地，眼睛盯着展览的毒品，心里想，这些药丸无疑能使我运作起来，回到我一度所在的地方！

独自在房间里，有着小山堆似的毒品，我不断吞下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期待着辉煌岁月的灵感重回到我身上。我等了又等，等待着那极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的出现。但是我等来的不是快乐，而只是紧张和恐惧。

过了一天，我已经一连三十个小时不歇气地服用毒品，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我拼命想要停止头脑里的恐怖电影，就伸手拿起了尚未开瓶的白兰地，吞下了第一把安眠药。我躺下等待着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从窗子里我能够看见许多脚在早晨的高峰期间在上面的街道上匆匆来去。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咳嗽，现在他们在聊天，过了一会儿我能够听到他们性交时发出的呻吟声。

突然安眠药和白兰地起作用了，一千把小提琴开始在我的脑子里奏起了胜利进行曲。我又感到快活了，呼呼呼味地喘着气。房间在打转，一切都十分美好。我能够听见隔壁房间里的那对男女，他们又开始做爱了。我要不要参加进去来个三人同乐，我心里想，一面把安眠药往口袋里装。

我拿着最后的一点白兰地蹒跚地走出了旅馆。我从阿盖尔广场穿行到繁忙的国王大十字车站。当我跌坐在长凳上继续喝白兰地时，我觉得早上的行人都在为我这个‘世界吸毒冠军’欢呼。

我必然地毒醉得木然恍惚，把自己锁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在地板上一摊摊尿液间睡着了。那天下午有人从门下面把我踢醒了过来，我浑身又冷又僵。“不许在这里睡觉。”一个很响的声音说。我把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了嘴里。爬出了厕所，在一列火车正要离开车站时我爬到了温暖的车厢里。

许多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自己在纽卡斯尔，离伦敦三百英里。

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吸毒过程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疯狂的吸毒事件使凤凰戒毒所在我身上取得的所有成就毁于一旦，似乎我从来没有在那儿生活过。我的毒瘤已经到了头了。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半黑暗区，这是一个比烂醉在贫民窟里还要黑暗还要无望的地方。当所有的吸毒成瘾者和酒鬼的化学纳入已经不再能够起作用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进入这个底层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的鼓舞。将要淹死的老鼠都比这些人活得更有希望。

我根本站立不稳，在纽卡斯尔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不住跌倒，后来被警察带走。他们把我送到当地救世军的门口，对我说：“到那里面去睡过了醉劲再出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头栽进去的。将近一年以后我才再看到白天的世界。有人给了我一杯甜茶，我用这条又送下了更多的安眠药，好逃避我的恐怖感。我在地板上睡死了过去。当我又一次滑入湮没无闻的状态之际，在我的想象中，巨大的蚂蚁正从地板上爬过来要吃我。

一天多以后我被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头头叫醒了。他气极了，严厉地说：“别再这么干了，不许死在这儿！”我像个迷路的孩子，把手伸进口袋里，把最后的几粒药丸交给了他。现在不再有毒品了，只有穿着肮脏的牛仔裤、跑鞋和绿色T恤衫的我。

“现在到了祈祷的时候了。”头头说着把我领向公共休息室，那里面已经面向着讲台放好了三排破旧的椅子。台上有一架旧钢琴，盖在上面的灰色毯子刚刚被拿掉。六个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开始唱起了《优荣光荣，哈利路亚！》房间里开始充满了生气。强制参加的、由三十个老流浪汉构成的会众个个放声高唱起来。唱完每一首歌后，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就高抬起双臂叫喊道：“赞美上帝！”正在热闹之时，音乐停了下来，弹钢琴的那个带着角质框眼镜的瘦女人走到台的中间，开始向安静下来的会众布道。“上帝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救世主”在布道结束时她高喊着说。现在那个老头子喊得更响了：“赞美上帝！”所有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应答道：“愿上帝与你同在，肯尼思。”这样结束了祈祷。礼拜结束，上帝离开了这间屋子，毯子重又罩在了钢琴上，一台！日电视机被推了出来，我们大家都留在那地瞪着屏幕，也不管电视机是开着还是关着。

在这间大屋子的另外一头发食物的小门前是吃饭的地方，有大约十张桌子和许多红塑料椅子。响铃时，三十个疲累的老头拖拉着脚步走过去坐在桌子前吃饭。两片面包，一块陈奶酪和倒在白铁杯子里的茶。然后回到屋子的上帝那一头，坐在软一点的椅子上，一直到该睡觉的时候。

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每一小时响一次铃，然后把宿舍门锁打开五分钟。你一旦决定去睡觉就不能再走出来了，要在里面呆到早上。宿舍里满满地塞进了三十几张铁床，每张床上有一条薄薄的灰毯子和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枕头。在我的枕头上面，前一个流浪汉的脑袋留下的凹坑和他的脑子一样空空如也，正等着我把头放进去呢。

早上我们沉默着蹒跚地走到桌子和红椅子那儿去吃千篇一律的早饭。一条干巴巴的香肠，盘子另一边是大约二十粒烤豆子，两片面包加一贯的一白铁林温吞茶水，这就是全部早餐。吃完后我们就坐到吃午饭，坐到吃午后茶，坐到睡觉。在这一片空虚之中，准一的变化是下午三点钟时给上帝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整个屋子充满了生气。上帝每天从来不迟到，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也唱起了赞美诗。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出到外面去，大家甚至连话都不说。我们全都这么整天坐在上帝的椅子上，天天如此，半睡半醒，什么也不想。

这个慈善机构比起庞德巷来差得太远了，相比之下庞德巷简直像个假日俱乐部。这里没有免费的衣服，虱子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因为纽卡斯尔是个安静的小城，又不是通行要道，住在救世军里的，大多是当地的老人，根本没有离开的希望，只是在那里等死而已。

起初我还能闻到这些老朽身上的臭味，但是很快我就成了这个臭味的一部分。和别人一样，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从来不脱衣服。有一次我把袜子洗了，结果被偷走了，我只好许多天没有袜子穿，直到头头给了我一双灰色的袜子。“别再把这双给丢了，”他说，“不会再给你了。老穿在脚上吧！”脱鞋睡觉的人抱着鞋睡。刷牙、梳头、洗澡都是历史了，在活死人的世界里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有一个长得很像比利·邦特的肥胖的流浪汉腿痛得非常厉害，从上帝的椅子到吃饭的地方这二十英尺路程要走半天。他和别的人一样，从来不说话，但是几个月后他问我，在穿过房间时能不能扶着我走。

我们这些迷失了的灵魂被共同的空虚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人可以写信，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没有事情可以迟到，甚至也没有事情值得从床上起来。我们谁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落到这个地步的，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流浪汉。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有过妈妈爸爸，甚至妻子儿女。对于我，这里是多年吸毒后的终点站。我永远感到疲累不堪，仿佛在看自己的葬礼却又得不到允许爬进棺材里去。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地道，更不用说有亮光了，这里有的只是虚空。我的精神已被摧毁，我已经放弃，不再希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是毒品。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邦特总是对我说：“好了，又打发掉了一天，又少了一天要去过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所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都在肯尼思的床旁。忙来忙去的。这个白头发的虚弱老头在夜里死去了。他平躺在床上，两只手举过头放在枕头上。所有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他的床边，一起高举起胳膊同声高喊：“赞美上帝！”我们一个其他的字也没有多说，转身拖拉着脚步去吃另一顿香肠和二十粒豆子的早饭。就像肯尼思一样，如果有人在夜里死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遗体搬走，尸体早就僵了。又一个可怜的尸体，埋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甚至没有送葬的人在场表示知道他死了，罗别说哭化了。死亡仅仅意味着从活死人搬到已死者中间。那天在祈祷的时候每个人唱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但是不再有人高喊“赞美上帝！”了。这和肯尼思一样成为了历史。

他的死把我从整天像个半睡半醒的呆坐着的僵尸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在救世军呆了十个月后我开始再一次想到外面的生活。每天早晨我开始照顾所里的镜子，不断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出去，出去！”这种自我催眠术似乎有点作用，几天后我第一次离开了那座建筑。

那是个清新的春日的早晨，我沿着海边步行，在过去一年中看惯了潦倒虚弱的人。这时看到这样多的新面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着一群打鱼的人，在有一个人打上了一条鱼后一起开怀大笑。把所有那些老流浪汉放在一起也没有在阳光下扭动着的那条鱼有生气！突然我害怕了起来，开始往回跑，正好在祈祷前回到了救世军。我坐了一会儿，但是当高声响起钢琴和赞美上帝的歌声时我的勇气回到了身上。在大家仍在唱赞美诗时我离开他们又走了出去，但这次我走过了打鱼人，继续向着半英里外的小城走去。

城中心有商店、银行、图书馆和干干净净忙忙碌碌的人群，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人都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爱、可以恨，有事情可以想。我在看着的是活着的人的世界。当我开始拾烟头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线渺茫的希望。我向人讨钱买卷烟纸，不久就点燃了第一根香烟。在和活死人一起过了十个黑暗的月份后，我重又有了生气。

在慈善机构里生活一如既往，但我现在经常到市中心去。戒毒后我第一次在外面世界里生活。除了和酸鬼们一起以及在凤凰戒毒所之外，我另外不吸毒的生活都是强制性的，木是在监牢里就是在不能自由行动的疯人院里。一天晚上，那个胖流浪汉邦特对我说起惠特尼湾，这是十英里外的一个海滨胜地，他提出也许我能在游乐场找个临时性的工作。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怕失去救世军所给予的安全感。于是我再度在厕所的镜子前行催眠术，一再重复说“惠特尼湾”。我决心越大，声音就越响，最后头头以为我醉了，进来看是怎么回事。这面魔镜又灵验了，一星期后我步行十英里，到惠待尼湾去了。

一路上，每走一步希望和梦想就增加一分，但是我到达后看到的是一个淡季的海滨胜地，所有的游乐场都关闭了，这时我一切的希望和梦想很快就被打碎了。天开始下起雨来，我一路哭着回救世军去，到达时浑身湿透，还误了吃下午茶。

第二天我的斗志又回来了一些，我再次和胖子谈起这事，他告诉我可以去利兹，那是一个活动很多的大城市，不过离这里有一百英里。我很想去，但是又害怕，万一不行我就不可能回到纽卡斯尔这个基地来了。我反复对厕所镜子中自己的影像说：“到利兹去。”好几天以后才又鼓起勇气离开。离开不再回来是个感情色彩很重的决定，我要和我的“歌唱哈利路亚的人”像模像样地告别。首先我到市中心去乞讨，带回来了大约五十根卷烟和几大块巧克力。那天祈祷结束后我跳到台上，大声说道：“我要到利兹去了，再见！”我给每人一根卷烟和几小方块

巧克力。当我和大家握手时，有的人答了话，但大多数人仅仅和平时一样沉默地看着我。我正要最后离开时，胖子把我叫了回去，他双臂搂着我：“祝你好运，孩子。你必须前进，不能留在这儿和我们这帮人死在一起。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走，可是这双老腿不行了。”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他那红肿的腿。“扶我到街门口去，我要看着你走。”他说。他靠在我身上慢慢挪过房间，沿走廊来到大门前。

他出门到了街上，扶着墙站在那里。我走了，身上仍旧穿着我一年前来的时候穿的那条牛仔裤和绿T恤衫。走到拐角处时我回过身来向他挥手，看见有好几个老人和他在一起，挥手大声喊着：“祝你好运。谢谢你的巧克力！”我向他们挥手致意，眼睛里含着泪拐过了街角。我哭了，感到海风吹在脸上，但这是希望的泪水。再见了，纽卡斯尔，再见了，“歌唱哈利路亚的人”，再见了，扭动着的鱼！

只有命运使我免于永远停留在那里，免于今天仍旧坐在同样的一些人中间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高唱赞美上帝。

我连搭车带步行，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利兹。每走一步都带来了新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不再吸毒、重返人类。这是我在吸毒岛上二十年之后首次走向自由。到达利兹后我找到另一个救世军机构住了进去，但利兹是个大城市，即使在流浪汉的集体里也不断有变化。在这个大的慈善机构里生活要活跃得多，里面有许多不同程度的退出社会的人。

最底层的人约百分之三十，这些我称之为“活死人”，和纽卡斯尔的老头子是一样的。他们长期住在慈善机构里，虚弱得连出去找酒喝都不行了，几乎从不活动，也不说话。

其次是“流动流浪汉”，约占又一个百分之三十。这些人还有足够的体力去乞讨或者偷酒喝，会短期到外面去，喝醉了回救世军来睡觉。他们吵闹的声音比别的人都要响，也相互交流，不过仅限于他们一伙人之间。

百分之二十是“痛君子”，多数年纪比较轻，存在着心理障碍，穿着稍稍像样一些。他们很安静，不愿与人交往。这群人和除了身上衣服一无所有的“流动流浪汉”或“活死人”不同，他们在购物袋里或破箱子里仍有一点所有物。

另外百分之十成为无家可归者还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一组的成员还有新来者的神情，仿佛是在说：“我不会呆长的。”他们仍常常喝醉酒，不过不那么招摇。

最后的百分之十是恣意挥霍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有非全日制的、挣现金的工作，如在旅馆里洗餐具或卖晚报之类。他们把钱全都花在喝酒上，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是最讨厌的一群。这里面的许多人虽然肮脏，但仍穿衬衫，有时甚至还打领带。他们来到救世军后的头几个星期偶尔会脱下一两件衣服洗一洗。他们把罐装啤酒偷偷带到救世军里面来，躲在厕所里在睡觉前一起喝。和慈善机构里别的低于他们的群体比起来，他们还把自己看成是成功者，根本看不出他们已经在社会的阶梯上滑到了什么程度，随着时间的过去，最终必然会落入更低的群体中去。有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加入到了“活死人”的行列之中。在较上层的退出社会的人中，有许多是可以挽救、回到社会的。但是可悲的是，正是社会本身对于这些人是否能够回来根本毫不关心。

在利兹的救世军中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我还从未在没有毒品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生活过。这就像把一个抢提包的十四岁的少年在吸毒岛上关了二十三年，然后把他在利兹放出来，无亲无故，无钱无物。对于我，这个被释放的囚犯，这个感情上仍停留在十四岁上的人，利兹是个令人十分敬畏的、使人害怕的地方。

有一天我正在火车站附近乞讨的时候，看见了一张通知，说有一个新单位为酗酒者提供帮助。那个下午我去那儿面谈，不过我只谈了自己的酗酒问题，觉得如果我提到毒品，他们就会拒绝收留我。和我面谈的人疑心我只是为了得到比较舒服的住处，所以坚持要我参加一个月的嗜酒者互戒协会的活动后再去找他们。我这样做了，每晚去参加会，但主要是去吃饼干和偷香烟。我从不发言，遗憾的是，我心理上所受的毒害仍很深，体会不到这些活动所传递的信息。

一个月后我被接受，进了利兹城外一个乡村医院中新型的戒酒部门，我在那儿生活了十个星期。

在救世军慈善机构里度过了一年以后，戒酒部门就像是希尔顿饭店。戒酒病房占据了一所很大的乡村医院的整个二层楼，医院坐落在一片极大的场地上，很有一点乡村疗养院的气氛。为期十周的项目执行一种戒毒式的禁酒活动，为了帮助病人敞开心扉，每个人都必须轮流把自

己的过去讲出来。在讲述的过程中谁也不许打断，但是讲完以后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个戒酒部门没有凤凰戒毒所那么紧张，加上我已经一年没有吸毒这个事实，使我很快能够适应。我有了稳定的栖身之所，美丽的环境和良好的饮食，就一天天地强壮起来。

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在医院老年病房中整理病床，工作很轻松，能赚几英镑零花钱。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他患肝硬化，年岁又太大，快要死了。每天早晨我给他整理床的时候我们都谈一会儿，他逐渐告诉了我他的一生。他从海军中临时获假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和别人在睡觉，从此以后，七十年来每晚喝得一醉方休。“那天就该把他们给杀掉。”他眼睛里带着恍惚的神情说道。他接着告诉我，在十分伤心的情况下，他只得泡在酒吧里过日子。“他们把我弄到这里来之前，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清醒着上过床。”他骄傲地声称。多数早晨我把他推到院子里，好让他看看草坪和草坪上的大橡树。“你看那些鸟，”他会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们。”“真让人惊奇，”他接着说，“他们不用汽油就能飞。真是机灵的小东西。”“我叫西德尼。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斯蒂芬。”找答道。“你可以当我的孙子了。”他微笑道。“那两个杂种有十个孙子辈的人。现在俩人都死了。她是去年死的。”他带着迷们的神情喃喃道，“去看鸟儿的飞翔，看风的吹拂吧，不要像我这样放过了美好的一切。”

几天以后我下楼来时发现他的病床空着，而且床单什么的也给拿掉了。“西德尼呢？”我问另一个老人。“坐盒子旅行去了。”他说。“盒子旅行？”我纳闷地问。“棺材，死了。”他答道。我放下了整理病床的工作，坐在院子里，心里感到很悲哀。一只小鸟停在了我身边。“机灵的小东西。”我心里想。

随着时间的过去，良好食物的效果开始出现了。我体重增加，看上去很健康。大约六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注意到医院里的一个漂亮护士，她总是坐在老年病房门外的长凳上吃茶点。有一天她提出付给我钱，让我帮助她照料一年一度的旧货义卖中她的服装摊。我非常愿意帮忙，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开始，以便作好一切准备。她把我带到医院的另外一边，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装满了村子里富有的人们捐献的东西。有几十个盒子里都是质量很好的旧衣服，她让我整理这些衣服，并告诉我我可以拿我需要的东西。对于去年一年都穿着同一条牛仔裤和绿T恤衫的我来说，这简直如同打开了阿拉丁的服装宝洞。我贪婪地装满了两个大衣箱。她大笑着说：“你就是活到一百岁也穿不了这么多衣服！”倒不是她在乎我拿了这些衣服。这里的衣服够二十次义卖的。再说，所有的旧货都来自当地居民，所以你只会在义卖的那天听见一个村民对另外一个说：“那是我捐的一件旧大衣，穿在他身上还挺不错的。”

义卖那天，穿上了新行头，我看起来好阔气。我用整理病床赚来的钱买了一个床头灯和一台旧收音机。回到戒酒病房后，我把台灯和收音机放在床的两边，觉得很自豪。躺在床上听音乐，我开始感到自己几乎又是一个人。可悲的是，第二天早晨，护士长把头伸进门里，说：“别太舒服了。你就要离开了。你的治疗下个星期四就结束。”这时我新获得的平静很快就消失了。

我酗酒达二十多年之久，现在我的治疗下个星期四就要结束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啦！这就好像告诉一个十岁的孩子让他离家去自谋生路！三号，你的时间到了，你好些了。祝你好运，再见！

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我感到惊慌起来。但是那天早上我交了好运，我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看到，附近一个城市里有家旅馆要雇一个包住的工作人员。一个星期之后那个漂亮的护士开车把我和我的箱子、床头灯以及收音机送到火车站。她和我吻别时我感到很快活，这是一个吻，而不是仅仅在脸上啄一下。带着所有的行李到达伊尔克利火车站后，我坐出租车到旅馆去了。这是个进步，我坐在出租车里想道。进步！啊，他妈的！要是那天早上我知道前面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的话该多好！

我到旅馆后，经理在前厅等着我，把我带到我的房间里。“欢迎你，斯蒂芬，”他说，“我希望你在这里工作会很快乐，你会长期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个和善友好的人，说话带伦敦口音。这个豪华旅馆坐落在约克郡高沼地的边缘，客人都是很高级的，查尔斯王储都在这里住过。我的房间很大，可以俯瞰花园，那晚我听着收音机，感到像个有钱的旅游者。

次日早晨我开始洗餐具。我是惟一洗餐具的人，所以你可以说我负责这个部门。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厨房，一整天传送带不停地把脏碗碟送过来。我休息的时候别人把碗碟从传送带上拿下来，但只是给堆在一边，等我回来时，迎接我的是堆成山的脏碗碟。

我第一次生活在正常的气氛之中，尽管环境宜人，我很快变得紧张起来，非常怀念医院里的安全感。过去我和同是酒徒的人来往，医护人员对我和蔼，而这里一切都大不一样。我独自和普通的劳动者相处，人们期望我适应下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没有人再给我量体温，或者

对我的健康表示关心了。我只是墙上的另一块砖头而已。由于恐惧我又变得内向，和同事连一个字也无法交流。对于他们来说，我必定像个从不知什么地方蹦出来的沉默的怪人。说不定是个活动中的系列杀人犯？

逐渐我开始面对吸毒给自己带来的现实后果。它使我震惊。想当初我有那么多的钱，我他妈怎么会落到洗盘子的下场？那些钱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些年以前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每一天，当我站在那里干活的时候，以前会背的一首诗逐渐回到了我的脑子里——“早晨和百灵鸟一同起床……”我过去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脑海之中。埋葬金钱之类的事开始在脑子里浮出又消失，像慢慢拼起来的一幅拼图。

在这么多年以后，记忆像洪水般涌回，我害怕极了。电击治疗抹掉了这么多的往事，现在我正在记起我从不知道存在过的事情。我曾经一度像个国王一样住在大宅子里，开最高级的汽车。现在我能够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我并不是从头就是个流浪汉。随着时间的过去，一切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是的，我能够想象出自己藏钱的情况，但是藏在了什么地方？当我企图集中精力考虑具体的问题时，一切就变得过于复杂，造成我剧烈的头痛。在庞德巷、凤凰戒毒所或纽卡斯尔我都没有这么清楚地记起过这些事。在那些年里我的过去停止了存在。现在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我曾经认识的人。

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开始想到我的女儿们特莎和安东尼仅。仿佛我头脑里的一扇门打开了，里面有个声音在说，好了，尽管很痛苦，你现在能够应付这些思想了。似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再见到她们，但是有一天我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向一个年轻的女招待寻求帮助。我记起了前妻住的街道的名字，心里想，如果能够找到电话号码，这个姑娘就能假装是特莎的朋友给她们打电话。遗憾的是，我的前妻早就搬走了，没有留下转信的新地址。此后那个女招待常常对我微笑，但我总是往别处看，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

岁月随着脏碗碟流过我的身旁，逐渐在休息的日子里我开始在约克郡高沼地散步，一连几个小时在无人居住的山丘间漫步。一天下午我在山边上发现了一条流进山下小河中去的小溪。我搬来一些大石头，垒起一道堤坝似的东西，使水沿另外一条路流下去。我完全被迷住了，看着水沿新路慢慢流下，对于我，这新路代表着新的生活，自由，摆脱过去。这是一个远离一切伤痛的、我个人的希望世界。我常常坐在自己的小溪边，看着我的水沿着我的路涓涓流去，心里感到非常安全。

但悲哀的是，离开了我的小溪，宁静感就消失了。随着更多地忆起过去，我愈加感到痛苦的折磨。一切都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渐渐地我都快被逼疯了。

在我情绪特别木好的一天，我在洗碗碟的时候听见别的工人在休息室休息，大声笑着。当我去拿茶水的时候笑声更响了，就像有一面大鼓在我的脑子里面捶响着。我看到这些无忧无虑的人快乐地在一起，感到受到了威胁，从小卖部跑了出来。我坐在外面的院子里，但笑声更少入了。我想象着他们在笑我，嘲笑这个沉默的洗碗碟的怪人。在我的脑袋里刮起了可怕的风暴，整个下午越来越强烈。

那晚当我走到我的小溪旁时，惊恐地发现所有的石块都被搬开了，水又流回到原来的路上。我大怒，把石头往地上摔，尖声叫道：“他妈的杂种们！那帮臭东西跟踪我，把我的河给偷走了！”小溪离旅馆有好几英里，但是随着风越刮越大，风把笑声又传了过来。我看着被风刮得乱摇的树，就连树叶也在嘲笑我！

我又一次被出卖、被欺骗了。

我痛心地大哭了一通，跑回到村子里，在当地的商店里买了两瓶白兰地。

回到旅馆后我喝醉了，在一阵怒气中砸了自己的卧室，连珍贵的收音机都砸坏了。我就像疯了一样下楼到了厨房里，开始把盘子从架子上拿下来扔在地板上摔碎。在混乱之中有人把我拖回卧室，放在床上，在笑声仍在我脑子里回响的时候，我失去了知觉。

次日一大早经理把我叫醒了。他对发生的事很关切，问我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个富有同情心的男人具有透过表面现象看问题的能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答说，“但是我要回伦敦去。”尽管出了头天晚上的事情，他还是劝我留下来，说伦敦是个大城市，充满了邪恶的引诱。我眼泪汪汪地说：“现在我不能留下了！我必须得回去。”

一个小时后，我拿着箱子正要上出租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招待走到我的面前说：

“真可惜你要走了。我挺喜欢你，我曾经希望你散步时会邀请我和你一起去呢。我本该和你说的，可是我做不到。我太腼腆了。我猜现在已经太晚了……”她微微一笑。出租车开走了。

二十分钟后我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离开伊尔克利，离开把我看作是个洗碗工的人们，使我感到很高兴。离开嘲笑我的人。离开使我感到害怕的人。这一回一切都会大不相同的。

火车开出约克郡火车站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火车到达伦敦的时候我感到糟透了。我很

害怕。我不愿做个伦敦洗碗工，让新的人来嘲笑我。

我需要东西使我能显得好一些。

我需要摆脱必须面对自己由于吸毒失去了一切的事实。

为了摆脱。

我需要毒品。

回到伦敦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吞食了大量右旋安非他明，过去一年的一切收获毁于一旦。在长期没有吸毒之后，一切更加混乱了。我想要得到那种无比的畅快和满足，但是当这种感觉到来的时候我又感到非常害怕。我仍竭尽全力想抓住现实，就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在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紧张不安地把箱子里的东西拿了出来。我努力想保持正常状态，把衣服一件件挂了出来，为了能像别人一样睡觉我吃了大量的镇静剂。和以前许多次一样，血液里仍有大量的安非他明，安眠药正好起相反的作用。我得到的不是睡眠而是折磨，但至少我不是独自一人。坐在我床脚的是魔鬼，他笑着说：“欢迎回来！”

到大约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仍然毫无睡意，于是决定干脆醒个彻底，就吞下了一把安非他明。十分钟后，在一片漆黑之中我离开了旅馆，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转。天亮的时候我想要回旅馆房间里去；但此时我已经迷糊到记不得旅馆在什么地方了。我疯了般地在维多利亚一带乱跑，寻找那家旅馆，在我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听见药丸在口袋里碰得格格响。这时我情况已经糟到分不清马路之间的区别了，也闹不清刚刚跑过的是哪一条马路。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那家旅馆，因此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

我再一次只剩下了身上穿的衣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一片糊涂，就到了一家通宵咖啡馆，那儿瞪着眼睛的吸毒者在我走进的时候好像都在欢迎我。在那里我用全部剩下的钱买了更多的廉价安非他明，那种会使你神志更错乱的劣等货。回到伦敦十六个小时我就失去了一切，包括我的健全神志。我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又回到了边缘地带。

伦敦的街头使人感到这样孤独凄凉，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过去认识的人，想起了马丁，我在教堂街时认识的那个同性恋古董商。步行到帕丁顿用了一个小时，到那里时发现马丁正在他的新商店门外和一个人聊天。他仍然吸毒、酗酒、赌博，因此，毫不奇怪，他的生活方式已经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他穿着蓝色的丝绒套装，看起来很奢华，但身上有一种疲惫的样子。他一度精心梳理得纹丝不乱的棕色头发现在乱蓬蓬的。银行早已收回了他那宽敞的房产，现在他在街的另一头一个小门面店里做买卖。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迷迷糊糊地上去和他打招呼，表现得像个凯旋的英雄。可悲的是，我看不到自己仍然是那个多年前和兰挪一起离开那条街时的可怜巴巴的痛君子。在上午十一点时已经喝醉了的马丁很高兴看到他自己过去风光的好日子时的熟人。我们谈着我们的得意时光，马丁企图再现自己失去了的魅力，建议我开始给他干活。整天喝酒的马丁，和成天吞食安非他明迷迷糊糊的我，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今天就开始。”他说，一面就着瓶子又来了一口。毒品特快过山车的引擎正在轰鸣，等待着我们上车。

表面上，他的买卖看起来还很风光，但是已经没有了他从前经营过的精美的古董。商店外面的街边上现在放了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廉价的锅盆之类的东西。整个地方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马丁本人也有很怪的地方。同一个人，不同的调子。当年使他得到很大成功的同性恋的傲然扭促的态度已不复存在，和他的商店一样，现在他只有一个装作一切都很好的外表。他是个长期酗酒者，表面上有来没有醉，眼睛里却有一种失败的神情。我们这些沉迷于这一切的人，在我们的心灵之灯一盏盏熄灭时，都有这种神情。当我们的嗜好不可避免地毁掉我们的物质世界时，一开始我们企图掩盖自己的损失，竭力掩饰对自己已经造成的危害。

马丁有三条小狗，其中两条是白色的卷毛狗。那天看着他就像是看我自己当年在扎特纳姆和“包打听”及老鼠在一起的日子录像带的样子。连他的狗都有着被击败了的神情，仿佛它们知道自己一度经营无价之宝的艺术珍品的主人，今天成了个醉醺醺的废旧货商。有一天需要挖出六只眼睛来，我心里想道，回忆着“包打听”之死。马丁多年吞食安非他明和酗酒，他从在伦敦修道院路的一流的豪宅中落到了今天的地步，已经沿着和我同样的毁灭之路走了很长的一段了。今天也罢，明天也罢，吸毒——酗酒的游戏的结局永远是一样的。

可悲的是，马丁的游戏行将结束。

在他邀请之下。那晚我和他一起住在格洛斯特广场一家叫做“美国人”的私家小旅馆里。他好像在那里长住。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床，他脱光了衣服躺在上面，说道：“让我们在这个小时里忘记我们的一切烦恼，好好做爱吧。”他一向知道我不是同性恋，我想到这只不过是

又一个企图利用我不利处境的杂种，心里很是难过。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没有人和地做爱，马丁继续喝下去，不久就人事不知了。我则一夜不能成眠。三只狗睡在我们的床下。

第二天早上马丁在床上吃了他天天吃的早餐：三大份白兰地。这使他能够穿衣起床。又喝了几杯后我们坐出租车到了他的店里，去打发又一个浑噩的日子。

那晚回到旅馆，新的问题在等着我们。经理坚持要马丁付房费，不愿再让他赊欠。马丁又喊又叫，但最后只好离开，坐出租车到他去世的母亲在圣约翰林地高级街区里的一套公寓去。我们到那儿后，一个柔弱的老者开门让我们进去了，他显然是租住这套公寓的房客。马丁立刻开始和他争论起来，要求他付钱。马丁利用我做他的打手，当即把这位不怎么高兴的先生在深夜十一点的时候赶了出去。

于是我们住了进去。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后我很快在一间卧室里睡着了。这是星期六晚上，我一觉睡到星期日傍晚。我醒来后发现马丁睡得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服用了一把安非他明，开始在公寓里东翻西找起来。这里究竟怎么了？到处是狗屎。垃圾、脏衣服和空酒瓶。厨房肮脏不堪，厕所臭气冲天。每个房间的地上都放着一个床垫，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名贵的威尔顿地毯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地板。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这是在看着我们从前来看望他母亲时她住的那套高级公寓吗？这是她曾经住过，每天把她漂亮的古董家具擦拭得发亮的公寓吗？我开始感到害怕，以为已被某种时间机器载回到我在西格林路满是老鼠的老公寓里去了。马丁在托特纳姆干什么？我跑到大门外，看到自己仍旧在修道院路上，放下心来。他肮脏的住所局限在前门里面。在外面的公用大厅里，一切依然一尘不染，楼梯上铺着品蓝色的地毯，墙上挂着镶金框的镜子。

马丁在睡梦中沉重地呼吸着。我坐在床脚看着他，开始哭了起来。马丁，当年伦敦的一流高手，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啊，见鬼！我大声道，我们都对自己做了些什么啊？两个一度享有一切的花花公子之王现在成了无用的废物，在付出着代价。我的哭泣声惊醒了马丁。“别哭，咱们买酒去！”他说。他摸摸索索地找到了七英镑。“们满全部的钱都在这里了吗？”我喊叫道，“所有我们修得的财富，只剩下这该死的七英镑了？”

我们对视着，长时间的沉默。

马丁暂时恢复了原来的自信，命令道：“按我说的买酒去。”一小时后我拿着价值六英镑的安非他明上瘾的人喜欢的饼干和甜食回来了，往他的床上一扔。“‘那该死的酒呢？’他尖声叫道。”你见鬼去吧！”俄大声答道。我们开始互相叫骂。我体力上比他强，就开始威胁他，要求他给我钱去买毒品。我盛怒之下要想惩罚他，拿走了他有钱时剩下的几件昂贵的皮夹克。十分钟后我在修道院路二十一号的赌场卖掉了这些皮衣，很快口袋里就又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廉价的安非他明。

在超亢奋的状态下我一连许多天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我的毒瘤现在更厉害了，我一点都无法控制。毒品完全控制了我。我像魔鬼财身，只能不停地吞安非他明。马丁对我的性要求引发了我埋葬二十年的痛苦。即使在烂醉的情况下痛心的感觉仍会冒出来。这是难以名状的痛苦。生活是不是为了我所有的欺骗行为在惩罚我？

那晚我最后在伦敦的贫困区克拉普顿落了脚。我偶尔走过一片轰炸后的废墟，看见一群长期依靠救济为生的铁杯酒鬼坐在塞火边上。他们向我要钱，我给了他们一些，受到了接待王室般的欢迎。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递给我一个酒瓶，说：“我们爱你。喝点这个！”她已经很醉了。“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斯蒂芬。”我答道。“我叫玛丽。”她说着用胳膊搂住了我。坐在温暖的火边，她紧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回到了童年时代。“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我以前有过一个像你一样的小男孩。”烈酒烧热了我的肚子，我看着她的脸，在她的眼睛里我者见了自已的母亲。“妈妈，再让我喝一口。”我请求道。“别喝太多，我的小儿子。”她答道，捏着酒瓶不松手。“妈妈，给我讲个故事。”俄大声说。别的人开始实了起来。“妈妈，你又醉了，你的新儿子也醉了！”“住嘴，你们这帮臭东西。”她尖声叫道，“滚蛋！他是我的儿子，他很伤心。

他们站起身走开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费火决要熄灭了。

“你希望故事怎么结尾？”她问我。

“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结尾。”

她看着我，眯起眼睛吞下了最后一口酒，手更紧地抓住了我。当火苗越来越小的时候，她开始把我紧抓得痛了起来，但是我已经迷迷糊糊的了。火灭了。一会儿忽闪着又亮了一下，然后是一片黑暗。几个小时以后我恢复了知觉，但是无法把她紧抓着我手腕的手掰开。最后我像撬开一把钳子那样才把手挣脱开来。

她的眼睛直瞪着天空。她已经死了。

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出几英里才停下来。当我看见一个警察时我向他冲了过去，大喊道：“快点，玛丽则死。到天堂去了！”“耶稣也上天堂了，好啦，别吵吵，刹乱来。”他一面回答一面走开了。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住在伦敦设在维多利亚区的救世军收容所里，经历了新的厌世的低谷，一种感到活够了的情绪。

我是不是已经接近了我二十年恐怖之旅的终点？在我的头脑里一切都已慢了下来，在很少有的清醒的片刻我去看了看母亲和弟弟保罗，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母亲和弟弟见我还活着，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唉，我吸毒后的行为仍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太害怕了，不敢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妈妈现在已经年老，不可能再来应付每天的戏剧性场面。她作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努力，给我找了一个房间，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希望这会导导致好的结果。这是间卧室兼起居室，还包括房东夫妇提供的早餐。房东夫妇是印度人，住在旁边的一所一例和别的屋子相连的房子里。所有的房客都和他们在他们家的厨房里一起吃早饭。我搬进去的那天，母亲给了我一个小孩子用的硬纸板箱子，只有鞋盒子大小，这是她许多年以前在我们家的阁楼上找到的。箱子里全是文件，她一直留着，怕万一有什么价值。这时我脑子里还是一片迷糊，对它根本不感兴趣，就把这只棕色的小箱子塞到了床底下。可以用来放药丸，我心想。两天后母亲来电话，说要是我还是整夜不停地走来走去，就会被赶出屋子去。别的房客抱怨我凌晨时声音太吵人。和往常一样，我服用了大量安非他明，几天都睡不着觉。

回到伦敦熟悉的街道上，我开始看着那些建筑物，想道：我是把钱藏在那幢房子里的吗？我仍然不能把自己的过去串起来，所以没法子找到答案。反正眼前我更感兴趣的是搞毒品。我又开始偷商店里的东西，用得到的收入买更多的黑市毒品，我把大量的毒品存放在床底下。我不愿失去住在房间里的安全感，不得不找一种保证我晚上能够睡觉的毒品。我带着这个念头去找兰多医生。他还在哈利街的诊所里给人提供毒品，他和以前一样头也不抬地问：“你怎么啦？”我走到台灯前关上了灯，说：“这是我，快要睡着了。我几分钟之内就要人事不省了。我想你是明白的，大夫。”“把灯打开，坐下。”他说着给我开了一片现有的药力最强的巴比上酸盐。“最多吃两片，不然你就要永远睡下去了。”他警告道。“你能肯定我一定会睡着吗？”我付钱给他时问道。“绝对肯定。”他笑着说。

离开哈利街后我去看望路易莎和劳拉，我前妻的妹妹，她们已经在切尔西时髦的国王路住了很多年了。这个吸足了毒品把三个小姑娘从马耳他救出来的英雄，在流浪的岁月中偶尔也曾向她们要过钱买毒品。那几个昔日穿着白短袜的小姑娘现在出落成了漂亮的女郎，享受着伦敦的富人阶层的生活。在我找到她们的那几次，我情绪激动，表现极糟，她们吓得不敢让我进门，总是从窗户里把钱扔给我。当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大声叫着“路易莎，劳拉！我需要钱。”时，过路行人都奇怪地驻足而望，而后当一个漂亮的女人出现在窗口，喊着“等着。我在找钱包呢。”的时候，他们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我哪里知道，正是这个十月的一天将要改变我整个的生活。劳拉独自在家，她向我招着手，从窗子里扔下来了几个英镑。她早就放弃了进一步帮助我的努力了。所有的医生和那么多别的人都没有能够使我戒掉毕生的毒瘤，她帮我又会有什么用呢。和路易莎一样，她只是给我点钱，像对待一只病狗那样拍拍我，然后让我继续回到街上流浪。

吸毒吸了二十年后，我现在就像一台用化学药品做动力的机器，没有毒品就无法运作，已经完全不可救药。我拾起了钱，沿国王路去到“切尔西酒店”——不是去喝酒，而是到厕所去用里面的水吞服药丸。酒吧刚刚开始营业，吧台边只有一两个客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下面的事。我吞服过安非他明后停下来要了一杯啤酒。这是很少发生的事，因为对我这样酗酒的人，一杯啤酒什么作用也不起，再说，我有的任何一点钱总是全部花在毒品上的。

我付啤酒钱的时候抬起了眼睛，看见一个有金褐色头发、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在对我微笑。我惊异非常。她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当然她不会是在向像我这样的吉卜赛人笑吧。我回头张望，但是我背后什么人也没有，只有那架沉默的自动电唱机。我心里纳闷，相信自己在瞎想

象，慢慢喝着啤酒又看了她一眼。她依然在微笑。我看见什么了？这是生活又走回到我身边来了吗？我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竭力想说点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凝视着她的眼睛。这个姑娘怎么会看着像我这样的流浪汉呢？我又一次回过头去，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我过于孤独离群，不知如何接受这个重回生活的邀请，只会呆呆地看着她。我坠入了爱河，不是爱上了一个老保姆和她的罗宾汉故事。不是爱上了一个马耳他电影明星般的偶像。不是出于毒品的速效因果。我爱上了这个年轻姑娘。我想讲话可是说不出来。我只会呆呆地看着她。时间凝固了。她就那么回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一切。

为了增加勇气，我回到厕所去又吞服了一些药丸。我感到非常害怕，比过去所有的匪徒和杀人犯加在一起还要怕。我爱上了一个人。走向酒吧时心里琢磨，不知这个卡萨布兰卡的陌生人会不会走了，留下萨姆被毒品迷糊得再也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她仍旧等在那里！

我的心剧跳着，开口说道：“你好，我请你喝点什么好吗？我只是一对令人难堪而已。请作答应吧。”她同意了，于是这个被毕生的毒瘤毁掉了的潦倒不堪的人骄傲地带着她走到自动电唱机旁的一张桌子边坐下。

我们又说又笑。这是我十年以来第一次笑。她告诉我她名字叫汉雷洛蕾。她从德国的巴伐利亚来这里度假一周。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挑选歌曲，好像其余的世界已不再存在。“我曾经像国玉般生活过。后来失去了一切。”我摇摇头，伤感地诉说道。我们坐在那里互相对绝了片刻，然后我擦擦眼睛，又买了两杯啤酒，把最后的一点钱放进了自动电唱机里。“你来挑最后的两支歌。你是我的客人，我最好的客人。”我微笑道。

这是我表现尊严的时刻。

我为自己邀请的客人付款，和从前一样由我来买单。

我们一起又听了几支歌，喝完啤酒后我陪她走到斯险广场地铁站，在那里分了手。临别时我让她往我母亲那里给我打电话，也许在她飞回巴伐利亚之前我们可以最后见一次面。我的头脑里响起了新的、温柔的铃声。她的眼睛说出了一切。

回到屋子里以后我吃了四片安眠药，使自己整整睡了两天。在同一姿势下睡了说不定二十个小时后，我浑身酸痛，吃了许多安非他明才算下了床。我不是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在我的脑子里上演着充满希望的电影。和我一起观看这部电影的名人多过任何一次好莱坞电影的首映式——埃尔维斯·玛丽放吉米·亨德里克斯、布莱恩·琼斯人我们一起吞服安非他明，他们都为我高兴。

过了一天，汉雷洛蕾给我母亲打来了电话，留下了她住的旅馆的名字和星期日上午我们见面的时间。可惜的是，当星期回到来的时候我已经一连三天大量吞食安非他明，到约会地点的时候情况简直糟透了。我没有钱，于是建议到附近的海德公园去散散步。

疯狂的吸毒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我走不了多木的路。几分钟后我们不得不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突然我感到很不舒服，以为自己要晕过去了。我不愿汉雷洛蕾看到我昏倒，就解释说马上得走了。在分别前我希望能有最后一些珍贵的时刻，就问坐在对面长凳上的女人要了一点面包来喂鸟。

我们又向公园里走了一段，然后坐下来喂我们自己的麻雀。吃完面包之后我向汉雷洛蕾告别。我离开”她满脸莫名其妙的表情。我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回过身去挥手，却发现我的公主已经走了。她走出了公园的大门，和别的游客一起去参观伦敦的景点了。我回到长凳旁，又吃了几片巴比上酸盐片，看着鸟儿啄完了我们最后的一点面包渣。我醒来时已经是那天深夜。他们在锁公园的大门了。我像只病狗般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

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保是我存在着一个幻想。在某个地方有着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记得我，记得公园里我们的鸟儿。我不再孤独。我认识一个人，有个人认识我。

尽管我仍然是个没有希望摆脱毒瘤的痛君子，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平静了。不知怎地我周围的一切似乎显得好了一点。在生活的长卷中已经写下了我的这一章了吗？我开始减少吸毒量后，我脑袋里的野马现在平静地吃起草来。我甚至开始和别的房客一起吃早餐了。前面那间小屋里的怪人起来走动了，告诉大家他的德国女朋友以及他们一起喂过的马。在某种魔力的作用下我的行为开始正常起来，使我的母亲和房东大为高兴。白天我不再在毒品区转悠，而是到公园去长距离散步。现在我每晚都睡觉。

几个星期后，母亲安排好两个医生和一个社工人员在她的公寓里和我谈话。这次见面本身就是个奇迹，因为伦敦的每一个精神病院都已经觉得我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了。她求他们收我住院，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医生们对我询问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当即用他们的车把我带回医院去。我们离开我母亲的公寓时，邮差递给了我一封盖着德国邮戳的信。我笑了；“我知道这

封信会来的。”

医院里的生活是一种新的经历。我瞒着医院里的人继续偷偷地服用安非他明，但是一天只吃四粒。比起过去一把一把他吃，这只是沧海一粟。这四粒药丸使得像我这样的长期安非他明吞食者能够和人交流，而不至于因突然终止而完全隐入孤独之中。我不是医生，对于有控制地逐渐减毒和突然彻底戒毒，特别是在早期的日子里，很难说出是非来。但像我这样的长期吸毒者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进行缓慢的、持续不断的治疗。在通常的八个星期之内不可能把我治好放出去。一个相信持续减毒的资深男护士总是这样说：“你可以高高兴兴的，我们不会打发你回家。”可悲的是，女护士长不同意他的看法，不久她就好意地给了我致命的一击。

我每天从早到晚读着汉雷洛蕾的信，给遇见的每一个病人和护士看，而且总是说：“当心相片。”每次医院里的人看见我，他们就不得不经历整个看信的仪式。我只吃很少的安非他明，所以虽然医院的镇静剂药效不强，我每晚还都能安睡。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会开始回忆我所呆过的所有的戒毒机构。多琳、胖胖、“真死掉”、邮差罗杰……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最后一次返回正常生活的舞会，我心里想。我必须小心举步。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当地的一家公司里做扫地工，但仍住在医院里，付一点吃住费。我总是小心地只吃四粒安非他明，从不超量。我怕如果我晚上不能睡觉，就会被赶出去。干活的时候工头给我三把扫帚，告诉我什么地方用哪一把。我讨厌这个工作，但是在安非他明的帮助之下坚持扫了下去。一天我建议用较好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监工回答说：“伙计，这儿不用想，你扫就是了。”持续的对吸毒量的控制，正常的食物和睡眠显出了效果——我不仅看上去好多了，而且脑子很久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过。我正渐渐爬回到正常世界中去，但是却并不喜欢我进入的这个世界。我看着我的同事，他们中许多人干这同样的工作已经二十年了，我常常感到自己是用一种监禁换来了另一种监禁。

我给汉雷洛蕾写了回信，大胆地建议圣诞节见面，或者她到我的公寓来，或者我到德国去。我的公寓？什么公寓？我现在住在精神病院楼上的一间病房里。感谢上帝她回信了，建议我到德国去。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我扫地经过每一张车床的时候，工人都得停下活计看她的信，听我讲我的圣诞节之行。

现在使我头昏眼花的不再是安非他明，而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姑娘。在多年生活于贫困之中、在厕所隔间里过夜之后，我正准备着到巴伐利亚的山林中去度寒假！

一天早饭时我遇见了两个为一个大保安公司工作的报警系统工程师。他们在为医院安装防火警报器。现在我在外面世界的人眼里已经挺正常的了，他们中的一个说：“你好像没有多大的病，伙计，不像疯子。”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熟了，我开始吹嘘重新记起来的过去的越轨行为，包括早年的几桩抢劫案。起初他们并不完全相传我的故事，直到我提起了那个主要工程师很熟的一个强盗的名字。他问了几个有关这位人物的问题，对回答很满意，向我眨了眨眼睛。这个人开的汽车比他同事的要大得多，还经常在小隔间里和一个女病人做爱。他可野得很。

有一天我干完活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坐在车子里在外面等我。他带我开车兜风，告诉我在弗吉尼亚水区有一所乡村巨宅，以后我就称之为“乡宅”，说他最近为他的公司在那个宅子里安装一套报警系统对，知道在卧室墙里的保险箱中有一百万英镑的现金。这所宅子的主人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罪犯。工程师详细地告诉我怎样在房顶上开一个洞绕过报警系统进入宅子里。楼上只有窗户上有报警装置。我听到有一百万英镑，激动起来，心想，即使我打不开保险箱，也可以把它整个从房顶上弄出来。那虽然不是贝克街劳埃德银行的保险库，我琢磨道，但无疑足够为我新的爱情生活提供资金了。他接着告诉我那所宅子坐落在很隐蔽的地方。在这种条件下可以把保险箱放在越野自行车的拖斗里运到围栏外，然后装上等在那儿的运货车。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以摘下拖斗，当警察从前面主车道过来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地穿过树林逃走，那里进不去汽车，没法追我。

啊，天哪！我，一个过去的街头流浪汉，现在，在动身到国外度各饭前，在精神病院吃早饭的时候计划着一桩百万英镑抢劫案的细节！我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多年前绅士乔治抛下我的地方。警报系统工程师为提供细节要求百分之二十的回报，我同意了。他让我下车的时候给了我联系电话的号码。“乡宅”窃案就算上马了。感谢上帝这个阶段我没有服用大量的安非他明，不然当天下午我就会坐公共汽车去行窃了。现在我理智得多了，能够考虑后果，我找到了爱情，就不再愿意长期坐牢了。不管我做或不做，一切都得等到圣诞节以后再说。

一个星期后到了放假的时候，我用所有存起来的工资买好了飞机票，感到十分激动。动身的前一晚，戒骄傲地向护士长报告说圣诞节期间我要离开五天，去看我的德国女朋友。我以为她会很高兴，但事实恰恰相反，她冷冷地回答说：“如果你到德国去，你就算离开这个医院

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根本没有和天天见我的其他工作人员商量，就擅自作出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决定。她的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我去过这五天天堂的日子，回来后就要失去安全的住处。不再有按时的三餐、在当地的工作和晚上能够谈谈的护士。“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见你的鬼去吧，我要去！”

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不动声色地答道：“你早上走后就永远不许回来了。”和气的男人，关心人的护士。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的西班牙厨师叫醒了我，给了我许多三明治在路上吃。她吻吻我的面颊，祝我好运，在厨房所有工作人员向我挥手告别后，我穿着从慈善商店买来的新大衣，动身到慕尼黑郊外的一个小村去。

我正要度过地球上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最幸福的五天。

想象一下这景象吧。我，一个毕生吞食安非他明的毫无希望的瘾君子，过去十年一直生活在精神分裂的边缘的人，在十几年中不是街头流浪就是被锁在精神病院，现在居然在飞往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吃早餐。我显然控制了吸毒，一桩百万英镑的窃案胜券在握，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等待着我，在这种情况下，轻说着也是感觉真他妈律。这真像是个神话故事，但是尽管我十分激动，我也觉得紧张。我恋爱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汉雷洛蕾是多年以来真正和我交谈的第一个人。重新进入真实的生活很让人害怕。我们会拉着手、甚至接吻吗？我会脱下衣服，激起性欲，和她做爱吗？我干净吗？我身上有难闻的气味吗？这一切和街头的长凳及纽卡斯尔的活死人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呀。在监狱和精神病院之外的正常人都谈论些什么？谁来说话？也许我得听人讲话并发表意见。妈的，现在我觉得好像自己变成了医生了。我和这个女孩只在公园里度过了短短的二十分钟，一起喂我们的小鸟，可是她对我生活的影响却是无比巨大的。我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爱。

就连痛君子也会坠入爱河。

我必须保持冷静，一定不能把这事搞吹了。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时我心里想道。我本该飞到慕尼黑去的，但是在毒品引起的激动之下飞到了法兰克福，现在发现还得坐上四个小时的火车。至少我没有去诸国家，这在我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一路上展现在眼前的圣诞节景象就仿佛是圣诞老人在火车车厢外翻开着一本真实生活的图画书。火车飞驰在漫天大雪下的德国原野上，经过灯火闪烁像是点燃了许多蜡烛一般的小乡村。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圣诞树上一闪一闪的灯光。那里有互相赠送礼物的正常的家庭。他们属于这个世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属于过任何人了。

我曾经属于过任何人吗？

我两次弄错了换车的地方，旅程像是永无尽头，我开始感到安非他明的作用在消失。我决心不让事情搞砸，没有再吃一粒安非他明，选择了喝一小口买来作为礼物送给汉雷洛蕾父母的白兰地。我小心地打开包装纸，喝了一小口，往瓶子里加了点水，这样她的爸爸妈妈就还能有礼物。火车终于抵达了车站，我又坐了二十分钟的公共汽车，来到了汉雷洛蕾所产的小村子。下车后我按约定给她家打电话，他们让我就在电话亭旁等着。雪又下大了。

五分钟后汉雷洛蕾的妹妹步行到了电话亭，用连不成句的英语说：“你一定就是斯蒂芬，让我给你拿包。跟我来。”走在积着新雪的路上，感到时间仿佛凝固了。街上渺无人迹，我回过头去，看见身后雪地里我们的脚印。过去二十年的折磨和痛苦仿佛在一点点消失。

我怀着疑虑进入的世界，是一个普通人在其中生活和死亡的没有毒品的世界。

几分钟之内我们就来到了一所很大的房子前，在我的眼里这是一所宅第。汉雷洛蕾的妹妹告诉我，汉雷洛蕾正从另一个城市开车回家，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在宽敞的客厅里她把我介绍给了她的父母，这是一对典型的巴伐利亚夫妻。我把那瓶稍稍免洗了的白兰地给了他们，他们把白兰地放在了一个高架子上。“真奇怪，放在这个地方。”我心想，“他们要是不喝，我就喝。”我像个孩子一样坐在那儿，被眼前奇特的景象迷住了。屋子的一角耸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面点着真蜡烛。树下是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礼物。我坐在充满了家庭之爱的彩虹的一端。

原来这就是我在公园里离开了的那个年轻姑娘生长的地方。这就是她的世界，高精神病院、监狱牢房和公园长凳是这样的遥远。对于我，能够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真是不可思议。我

又感觉到安非他明作用的消失，就到厕所去吃了半片温和的安眠药好镇静下来。我感到好了一点，坐在沙发上喝啤酒，在我的要求之下汉雷洛蕾的小妹妹在钢琴上班了莫扎特的曲子。我听着音乐，觉得莫扎特二百年前在萨尔茨堡是专门为我写了这个曲子。喝过两杯啤酒，为谨慎起见没有接受第三杯，我感到晕乎乎的，一时闭上了眼睛。我在增陇中回想起了过去，……纽沃姆大夫，那个同性恋精神病医生和我服用的第一次安非他明。绅士乔治和盗窃珠宝。团伙匪帮，杀人犯，精神病院，监狱。

我最睡着了，在做梦吗？

我是醉倒在街边的长凳上了吗？

我最要在一车凄凉的慈善院里醒来，伴着周围都是孤独的面孔吗？

我能够感到自己在飘去，突然……

有人站在我的身边，握着我的手。

“你睡着了，样子是这样宁静，像个小男孩。”汉雷洛蕾亲吻我的额头，我听见她的温柔的声音在说：“圣诞节快乐，斯蒂芬。欢迎到德国来，欢迎到我家来。”我感到非常安全，那双眼睛又重新说出了一切。海德公园的小鸟又飞回来了，这次吃着整块的面包。我们和她的父母说了一会儿话，但这时已经很晚了，我站起身来和全家人道了晚安。当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汉雷洛蕾的妈妈说：“你刚才睡着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是的，很长的时间，”我答道，“二十多年的时间。”

上楼后汉雷洛蕾把我带到我的房间里，这是一个温馨的带木檐的房间。她笑着问我她应该留下还是离开。“留下，”我答道，“我爱你。我们结婚吧。”“这可有点突然。”她笑道。我重新说道：“我爱你。永远和我在一起。我要给你买一座城堡，用钻石盖满你的全身。”我毫不气馁地不停地说道。“我不需要什么城堡。我在这儿生活，戴钻石看起来会很健。光是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傻孩子。”我们拥抱着躺在床上，两个从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的人。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我们做爱，互相爱得更深了。后来我忘记了吃安眠药，她还在我身边时我就睡着了。

次日我很早就醒了。这天是圣诞日，我从窗子里看出去，外面是一片银白的世界，雪沉甸甸地压在大树上。这不是梦。我是在一个真实世界的幸福故事里醒来，而且我还是里面的主角呢！

我想取用早晨的安非他明，但是不敢在卧室里这样做，怕我的睡美人会醒来。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厕所里，吞下了两粒。回到卧室后我看着这个来自好人家的二十四岁的聪明姑娘，心想不知道她看上了我这么个吉卜赛式的人物的哪一点。她穿着黄色的睡衣躺在那里，看上去像一朵向日葵。我把她吻醒过来，说：“嫁给我吧，我马上要赚大钱了，我们会有一切，‘乡宅’，一百万英镑。”我说了又说。“什么乡宅？什么一百万英镑？我不明白，你说得太快了。”她有点茫然地说，“嫁给你？我们才认识了八个小时，而且多一半时间是在睡觉。我不能考虑到早饭以后，英国先生？”她站起身来，把我带到浴室去，她放了一浴缸热水，就下楼煮咖啡去了。

现在我是上帝的宇宙中最幸福的人。早晨的热水澡，漂亮的姑娘，这是个奇迹。我重又充满了生气。我躺在起着泡沫的热肥皂水中，闭上了眼睛。突然噩梦般的景象出现在脑海。

这一切都是个梦吗？

恐怖电影什么时候又会开始，如同往常一贯的那样？

我是不是又回到了同性恋医生纽沃姆浴室中那金框镜子之间。吸毒过山车之旅多年前开始出发的地方？我惊慌地跳出浴缸，滴得满地是水，打开了浴室的小柜，以为会看到放在一排排药瓶中的毒品。我宽慰地看见那儿只有牙刷和剃须膏，这是一个正常人家的住所。

“你在找什么？”我回过身看见汉雷洛蕾赤裸着站在我身后。她锁上门我们做了爱。她妈妈的巴伐利亚早餐等一等也无妨。我在浴室的地上得到了我渴望的一切。

后来我们下楼去了。在餐桌旁和全家人见面，我感到十分拘束。后面的几天我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过去扮演过几种角色，但正常人却是个新角色。我不知道台词，即使在今天我对于脚本也依然不甚肯定。我就是临时发挥。我很紧张，紧紧抓着汉雷洛蕾桌子下面的手，搞得她有一阵子都没法吃饭。她意识到我的紧张，轻轻对我说不要害怕，我才放开了她的手，共享起家制的混合麦片和面包卷来。

那天上午我们一起到附近一个湖上去玩。天气冰一样冷，我们散着步，看人们一家家在冰封的湖面上滑冰。小孩、爸爸妈妈都一起欢笑，没有人再嘲笑我了。看到孩子们玩耍，我心想不知这个神话故事会如何发展。也许有一天……？我又成了生活中积极的一员了，很紧张，但是我在一步步离开替代生活的公园长凳。那天早上我不必非得最后进球不可，能是球队的一员

就非常高兴了。

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出以后的几天呢？我们参观古老的城堡，在林中散步，逛马路市场，吃美味食物，听教堂钟声。奇迹一个接连一个。

独自和汉雷洛蕾在一起时我感到安全。但是一天晚上，当我们到一个朋友家去喝酒的时候我变得非常不安。我被介绍给了大约十个年轻人，他们都很友好，英语似乎说得也很好。如果我吸足了毒情况就会很不一样。我可以用伦敦的故事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吸足了毒我可以是个英雄，建议大家到城里去，或者来一个放荡的晚会。吸足了毒我就会是个傲慢的聪明先生，但是没有了毕生支持我的大剂量安非他明，我感到自己是这样脆弱，这样暴露无遗。我祈求这个晚上快快过去，我们好离开这里独自相处。每当人们问我，我怎么样，喜不喜欢德国，我总是选择我认为他们想听的来回答。对于我，就像是在接受考验，就连认识汉雷洛蕾也需要他们的同意。

我回伦敦的前一天，汉雷洛蕾曾带我到慕尼黑去，参观了所有的景点，在英国花园里作冬日散步后我们到一家传统的巴伐利亚旅馆去吃饭。这地方看上去很奢华，但汉雷洛蕾坚持要我吃鹿肉。美味上了桌。我实在受不了啦，开始哭起来。“你为什么哭呀？”她问道，把手伸过桌子握住我的手。“因为这一切都是一场美丽的梦，我知道明天一切就要结束了。”“怎么啦，一切不必结束呀，我们可以再见面。”她说。“明天和我一起回去吧，”我求她，“我们可以找个地方住下。”“我怎么能够就这么和你到英国去呢？我不能。我在这里有工作，再说，我们得有地方住，我们不能睡在公园的长凳上。”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我无言以对。

“你先回去，等你把一切安排好以后过一个来月我去找你。”她最后建议道。

当然她对过去的过去一无所知，她看到的只是幻想中的今天。

我想要告诉她我吸毒，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但就是说不出口。进餐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沉默着，无法面对那使人气馁的现实：明天我将要回到伦敦空虚的大街上。我还能有希望再见到她吗？我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希望能彻底戒毒。我仍然是个吸毒成瘾的人。

第二天一早她开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坐火车到法兰克福。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身子探出窗外，早已看不见汉雷洛蕾的身影了，我仍在哭着挥手。

坐在到法兰克福去的火车上，起初一切都还好，但是离汉雷洛蕾越远，我就越感到孤独。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住处好让我们生活在一起？说到住处，没有了医院的铺位和安全的保证，当晚我该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由于我到汉雷洛蕾家对没有什么钱，圣诞节期间神话故事般的娱乐全是她出的钱。我现在又品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我想要重新做个大人物，而不是一个该死的工厂扫地工。

如果我在巴尼特医院仍旧有着床位，我相信那天我会回去把我怎么过的圣诞节全都讲给那些西班牙厨娘们听的。也许该给我一点点时间。要时间去干什么？去乡“宅抢”劫，逃跑。从此和汉雷洛蕾在充满阳光的别墅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去被抓获然后坐十年牢？汉雷洛蕾会等着我出来吗？也许我会理智起来，根本不去抢劫。也许我会找到一个好一些的工作，攒钱买一套小公寓。不去大量吸毒，这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没有地方可去。随着我的恐惧和混乱不断增加，脑袋里酝酿着的风暴也愈加猛烈。我无法面对这可怕的前途未卜的状态。我需要答案，一个能使自己成为过去那样的胜利者、能重获昔日雄风的办法。我必须找到这个答案，而且必须很快找到！

我看着提包里面，答案正在面前直瞪着我——一瓶安非他明药丸。我毒瘤仍然很大，一气就吞下了瓶子里一半的安非他明。二十分钟后当毒效发作时，我所有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大量无比高明的、一个胜过一个的主意在我的脑袋里涌进涌出。当罪恶的疯狂重又发作时，我抬起头，看见在车厢里我的对过坐着刚刚度完冬假的魔鬼。“欢迎归队。”他微笑着说。我被包围在疯狂的兴奋畅快之中，在座位上坐不住了，就在过道里冲来冲去，扯开嗓门喊叫着毫不连贯的胡话，把同车厢的人吓得要死。我一生中可怕的狂乱的五天开始了。我差点死去。

在法兰克福机场我表现得完全没有理智，居然还让我上了飞机，真是难以想象。我用剩下的钱在免税店买了一瓶威士忌，这更是给吞食的安非他明火上加油，活像往碳火上泼汽油。飞机起飞后，威士忌加安非他明这个双料原子弹爆炸了，我开始给汉雷洛蕾写无数情书中的第一

封。在我胸中的激情越来越强烈之际，我设法说服了一个空中小姐，同意让我陪一个小孩去驾驶舱看操纵装置。我把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们气疯了，要他们经过慕尼黑。“只要一个小时，我好见见汉雷洛蕾。”我恳求飞行员，“用无线电给她打个电话，我付钱，我有好几百万块钱藏着呢！”我独自滔滔不绝地说着。起初飞行员们觉得很好玩，笑了起来，但是很快我开始失去控制，被两个乘务员带回到座位上。其中一个一直和我在一起，直到飞行结束。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着陆后，乘务员和乘客们见我离开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钱都花完了，我直接就到了伦敦的红灯区索霍去，二十多年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在最后走钢丝，自找必然不可避免的灭顶之灾。但是现在一切安全网都早已不存在了。我仍然处于兴奋的飘飘欲仙的状态之中，到了过去经常出没的一个同性恋俱乐部去向人乞讨。我的故事使喝酒正在兴头上的客人开怀大笑，我要到了几乎三十英镑。我带着新得来的钱到了莱斯特广场，又买了许多便宜的安非他明。脑袋里毒品喧腾着，我重又回到街头四处乱转。

我在这些熟悉的地方出没，在毒品支配下的脑子一片糊涂，以为自己回到了一九六〇年！许多建筑早已被拆除，在原地已经盖起了新的办公大楼，我却还在找它们里面的俱乐部。一个小时之内我到同一个俱乐部去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找汤米·斯蒂尔曾在里面表演过的“双我咖啡厅”。“我他妈已经告诉过你了，二十年前就倒闭了。滚回家去！”恼火的酒吧男招待说。

家？我没有家。

在酒吧外面我看着一个老流浪汉倒在一家商店的门道里。我年纪再大一点就和他一模一样了。我是不是在看着二十年后的自己？

我被毒品浸透的大脑已经全然失去了控制，现在已经太晚了，无法使正在以光速行驶的大脑停止下来。我脑子里的目标没有变过，当我的狂热整夜继续着的时候，它们在熊熊燃烧着。

农田上午我坐在长凳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各种想法在头脑里旋转。我要不要到纽卡斯尔去，还是去凤凰戒毒所，西格林路？我闹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生活在哪一年。每小时给体内的毒品火山熔岩添一次原料，我这是在要和某个黑驻辍的极坏东西相撞的轨道上运行。这是向着灭顶之灾所作的最后的自杀式俯冲。从十四岁起就已经注定了要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

我那一天精神十分错乱，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跑伦敦各处的银行上，非说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某个时候我用这个或那个名字在这家银行里开过户。“埃里克·谢泼德、约翰·金布尔，必定在什么名下能够找到我的账户！”我尖声叫喊道。“我需要我的钱去把汉雷洛蕾接来！”“没有，先生，没有这些名字。”他们回答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确实找到了许多钱，但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真是到了穷途末路，觉得如果不能在几天之内找到钱，就会永远失去汉雷洛蕾。我决定只有去抢劫乡宅了。在我选票坐火车到弗吉尼亚水区去的路上，想到我没有越野自行车，没有运货车或在房顶上开洞的工具这些事实，但是对于我被毒品浸透了的意识来说这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两旁种着树木的高级街区观察了一阵，看到了一片很大的房产。我相信自己找到乡宅了。对于这个已经连续三天不停大量吸毒的疯子来说，究竟是不是乡老根本没有多大区别。

这大片与子背靠着树林，我从那里爬进了庭院。突然我听见了狗叫声。我刚爬回墙上，一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就在我腿上咬了一口。它的牙齿撕破了我的裤腿，我一面想，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杀了这条狗，一面又吞服了更多的安非他明。我去到村子里找摩托车。在一家超级市场的停车场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没有钥匙，也没有办法启动摩托车，可我还是坐了上去。摩托车马上倒了下来，把我压在地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出来逃之夭夭。

我脑子更加糊涂，回到了伦敦中区，整夜都在寻找十年前我离开的人和地方。

在连续没有睡觉的第五天我回到巴尼特医院，去找我在精神病院时同病房的约翰。约翰的精神崩溃是因他的妻子离开他而引起的，也已经出院了，但是我发现他在医院后面自己的车子里睡觉。约翰挺喜欢我，这时我动员他拿出钱来包一间旅馆房间，这样我们两个人暂时就有地方住了。我想，这能给我时间去找一套公寓，就可把汉雷洛蕾接来了。那天傍晚我们住进了在海格特的一家小旅馆，他们给了我们一间顶层的大房间，上去要走两道长楼梯。

约翰借给我十英镑，我留下他一个人在卧室里，自己出去找多年前一起犯过罪的各种人物。我到了伦敦南部，那儿每家酒吧似乎都仍旧是老样子。连里面的人看上去都没有变。我永远也不会弄明白是在哪个酒吧，反正我和一个大吵起来，跑出去坐出租车回到海格特。在旅馆外我又吵了起来，这回是和出租车司机，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付车费。我们互相叫骂的时候，一辆车窗这黑了的大卧车在对面停了下来。我看不见车子里面，一害怕就跑进了旅馆。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钟。

我把卧室门上了双销，心里有神奇怪的感觉。我的头上悬着不幸。暴雨马上就要倾盆而下。锤子马上就要落下。我吃了一把安眠药，当眩晕感开始扫遍全身时，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总是专心听我讲话的约翰没完地述说起来。

我漫无边际地扯到哈利威克、第一次服用毒品、绅士乔治。珠宝盗窃、有钱的同性恋证券经纪人、大宅子、我的夜总会、克雷兄弟、马耳他、六匹白马、波兰流浪者、粗硬的点心、兰娜、着火的床、藏起来的汽车、克拉拉、和小短腿的打斗、死去的酒鬼玛丽。纽卡斯尔的臭袜子、卑鄙的大个干警察、黑马、“包打听”和老鼠。长鼻子妖怪、自杀、荒原上的小溪、用刀子捐维奥莱特、父亲的遗言、像麻风病人般被人用水龙头冲洗、苏格兰场、马丁、扭动的鱼、和特莎一起时的恐惧，以及和汉雷洛蕾相逢。

在所有这些吸毒的年头里，我都能侥幸逃脱，战胜生活中的不利因素。在注意到约翰已经睡着了以后我才住了嘴，自己最后也睡着了。

突然，一个矮个子黑驻朝的人在对我尖声喊叫。他的脸就在我的面前。他喊道：“我要杀了这个臭东西，让我杀了他！”我能感到有别的人在场，但是我处在吃了巴比上酸盐片后的意识源脱的状态中，一切都十分模糊。他喝醉了，发着狂，嘴吐白沫。他在把我拉起来。我从一长道楼梯上滚了下来。疼痛。更加疼痛。我摔到了楼底，一切都在旋转。在楼梯上面有人在叫喊。”声音越来越近。有人站在我旁边，用一根棒球棒打我。我认识这张脸。

这是……

砰！强烈的光在我的脑袋里闪动。他又打了我一律。

我看见球棒落下。更多的闪光。疼痛，钻心的疼痛。

我拼命想掩护自己，但棍棒仍像雨点般落到我身上。

然后眼前一片漆黑。

终于发生了。

几天后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苏醒过来。我一点也不记得出了什么事，脑子里只有棒球律和世界爆炸的图景。我过去已经有许多许多次过度吸食毒品后在医院中苏醒，但是这次完全不同。我浑身疼痛，非常痛苦。我根本不能动，感到身体瘫痪了，一只眼睛睁不开。用能够睁开的那只眼睛我看见床上有栏杆，就像儿童床上的那样。我活着，但是我在什么地方？眼前又一黑，我仿佛在往下落，落进地心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疼痛又向我袭来。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感觉到房间里有人。我听见有人在说：“你伤得很厉害，我去找护士。”不久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脸。“别动，医生快来了。”她说，但我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了。后来的几天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全都混在了一起。

多年以来我一直忽视生活的决定性要求，侥幸过关。现在我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断了线。几天后我睁开眼睛，看见弟弟保罗站在床边。“请你告诉汉雷洛蕾我爱她。我需要她。”我还是动不了，一个劲求我弟弟。他答应告诉她，拍了拍我的手离开了，这样护士可以让我的老母亲进来看我。

母亲俯身向着我哭泣，眼泪滴到我受伤的脸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她哭。我的母亲，我一直渴望从她那儿得到爱的人，终于来到了。她来看望她那吸毒成痛的孩子，现在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已是一个老妇，现在突然打开心扉，倾泻出了她从未表露过的全部母爱。她弯下身来吻着我的脸。我瘫痪麻木了，感觉不到她吻我的嘴唇。我的身体失去了一切感觉，但是那又怎样，我找到了我的妈妈！

戒毒加上受的伤，我活像在地狱门口转悠的绝望者。一天早上正当我相信自己就要死去之时，有人送来了一大束鲜花。护士给我读了卡片上的话。

“我将永远爱你，汉雷洛蕾。”

后来的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看着和我一样慢慢死去的鲜花的花瓣一片片落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惠廷顿医院对我的病做过什么研究治疗，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宣称根本没有我在那里住过院的记录。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相信他们销毁了病历。

不久，他们要我出院，但是我还不能走路，聋了的耳朵也在往外渗血，看东西都是双影，头痛更是日益加剧。我一直认为他们让我出院是因为我是在自己吸毒过量的情况下被打伤的。瘾君子的恶名几乎要了我的命。

母亲来接我出院，抗议说我病还很重，不能出院。医院简直太不像话了，可是一个老太婆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举起一把枪来说，“让我儿子留在医院里，给他动手术，不然我就开枪！”后来发现，如果我没有做这个费时间的手术，把严重断裂的头骨和耳朵缝合起来，因耳朵引起的脑膜炎或脑脓肿肯定会要了我的命。

我病得很厉害，回到母亲的公寓后躺在了她的床上。我就一直呆在那儿，虚弱得动不了。我所做的事就是每天给德国写信，最多一天写到四封。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我的情况越来越糟，视力退到已经无法写字了。有一天我想起，我扫地的公司还欠我两个星期的工资，我说服妈妈去把钱取了回来。过了一两天，我趁母亲出去买东西，就叫了辆出租车到兰多医生的诊所去。我几乎连路都走不了，但是尽管我明显地有伤，他还是和平时一样，头也不抬地给我开了大量的安非他明。

我没有服用买来的毒品，回到母亲家后我把安非他明藏了起来。这一次是我一生中惟一不是为了追求兴奋畅快而服用安非他明，我只是希望得到足够的力量在我死去之前最后再见到汉雷洛蕾一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在电话上对她撒谎，说我已经好多了，我们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她相信了我，同意到英国来，那个星期六就要乘车船一体服务的火车到达伦敦了。

有地方住？那只是当地的一家供应早餐的小旅馆里的一个房间。我用所有剩下的钱预付了几天的房钱，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汉雷洛蕾不知道的是，我能够给她的一切就是一连串的伤病和满满一口袋的安非他明。

我一直休息到星期六清早。火车还有四个小时就要到达时我吞下了第一把安非他明。一小时后我完全像疯了一样。不是去做急救手术，相反，我像头疯牛一样笔直地冲回到了吸毒岛

我是一个病得绝望的人，等待着在那天早上去接汉雷洛蕾。正如时间将会证明的那样，惠廷顿医院让一个急需手术以挽救生命的病人出了院。如果没有安非他明的作用，我决不可能有足够的力气和足够的疯狂试图行走，更别说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去了。我爱汉雷洛蕾，没有她找活不下去，但是没有毒品我也活不下去。要我从此不再吞食安非他明就像要我停止呼吸一样。

那天早上，我不断摔跤，有脑子大出血而死的危险。起初我在售票处旁边等着火车的到达，后来我站不住了，就背靠着柱子坐在车站冰冷的地面上。一个警察过来让我离开，对于他来说我一定看着像个喝醉了酒的流浪汉。“我只是在这里等汉雷洛蕾。”我求他道。“我们都在等她。”他大笑再度叫我离开车站。幸运的是，在我们争论的时候火车已经进站了，我抬起头来，突然看见汉雷洛蕾就站在我的面前。

当她看到我倒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惊恐和难以置信的神情。我的左脸完全麻木了，被打后大面积的青肿使我的脸至今仍显得发育发黄。在星期六上午迎接她的这个人，和几星期前她曾在德国挥手告别过的那个举止得体的人是多么不一样啊。比起我身上所有的伤来，我的表现更为糟糕。现在她见到的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大脑在毒品之海上漂浮的人。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我扶进了车站的简便餐厅。我们在这里坐了下来，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他们彼此爱上了以后，现在成了现实世界恐怖电影里的主角。

在我挨这场打之前，我是来自大城市的英俊而神秘的男人，与汉雷洛蕾所熟悉的、一起长大的、单调平凡的村子里的小伙子是那样的不同。我是一张能让她脱离那使她厌烦的乏味的乡村生活的通行证。我们推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彼此相爱。

但是爱上一个痛君子，结局只能是灾难性的。”汉雷洛蕾生命中最可怕的十天就要开始了。她放弃了工作到英国来开始新的生活，现在她意识到她爱上的这个男人不仅是个半死的人，而且还是个毫无戒毒希望的瘾君子——一个吸毒吸得迷迷糊糊的鸡蛋样的矮胖子，纵使国王所有的医生来了也无法修复好！

坐在车站的餐厅里，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孤身来到外国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听到了我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你把车子开来了吗？”我问一个刚刚下火车的人。“我们需要车去抢劫‘乡宅’，我现在站不稳，没法骑越野自行车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上午，我浸透了安非他明的脑子和我年轻伴侣的脑子完全木在一个世界里。“你必须得躺下，你病得很厉害，得去看医生。”她不断说道。她递给我一枝玫瑰花，开始哭了起来。我接过花，想象自己在深坑下的棺材里，看着上面穿着黑衣服的她。

我痛得很厉害，我们极困难地用了一小时回到了伦敦北部。我用牙齿咬着那枝玫瑰花，在几乎无法直立行走的情况下，帮着她从芬奇利车站把两只沉重的箱子抱到了几个街区外我们的旅馆里。

春利底是一个小小的、一尘不染的、提供膳食的寄宿屋，约有十个房间。我们陈设得很好的房间在一层的后部。一对上年纪的夫妇把这所私家小旅馆经营得像一部润滑良好的机器，很

快他们便对新来的客人担起心来。我一进房间就倒在了床上，几天都没有离开过那间房子。为了保持平静，我每小时吃一片镇静剂，使自己从早到晚都处于像喝醉了一样的恍惚状态。只要我一醒来，多数时间都坐在桌前看书或写字的汉雷洛蕾就会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要让我去看病，但是当我给她看我的病历卡的时候，她就糊涂了。医院预约我一个月以后去看病。“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不断对她说。汉雷洛蕾出去买过两次食物。除此之外，在后来一个星期中，我们只从俯瞰繁忙的停车场的大窗子里看过外面的世界。陌生人开着汽车来来去去，但是在我们的房间里时间却凝固不动。我的母亲和弟弟不能或不愿再继续帮助我，现在除了汉雷洛蕾，我是全靠自己了。那顿毒打使我成了大脑死亡的僵尸，而且当然啦，吸毒只会使事情更糟。

汉雷洛蕾的钱快花光了，不久我意识到，除非我们一起在公园的长凳上过日子，否则她就不得不回德国去。我们没有多少在一起的时间了，我们俩都知道这一点。第一个星期末，汉雷洛蕾离开了我几个小时，带回来一张未定日期的去德国的火车票。“我必须回家去，”她坚决地说，“但是首先我要把你送进医院去。”她的话对于我是永别的表示。

我无法接受这必然的结果，吞服了巨量安非他明鼓起勇气去乞讨、去借或者去偷得足够的钱，争取时间来恢复我受到伤害的头。我必须把她留在我的身边。

当安非他明引起的兴奋到来之后，我总算使自己下了床。我进入了吸毒后的过度兴奋，宣告说我们要到伦敦中区去找我曾经藏在那儿的钱。“你看呀，”我高声说道，给她看我丢失的财富的文件，“我知道有钱在什么地方。”汉雷洛蕾莫名其妙地跟在我身后，完全糊涂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到了大理石拱形牌楼那儿的一片房子，那是我全盛时期住过的地方。我们虽然不能进到里西去，但是站在外播街上，我开始更多地记起了过去的事和我藏起来的钱。整整一天我拽着汉雷洛蕾到各个地方去找钱，可是，唉，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现在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了。我们长时间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夜里我来到破旧的夜总会的霓虹灯招牌下找寻摩西，多年前这个牙买加人曾经照料过我。付给旅馆的房费只能再住一夜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否则我们就无处栖身了。我们从一个下等酒吧找到又一个下等酒吧，始终也没有找到摩西，当最后有人告诉我们摩西在坐牢时，我在大街上就哭了起来。这时已经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筋疲力尽，坐早班火车回到了旅馆。路上汉雷洛蕾沮丧地低声说，她再采最后一晚，然后回德国去。

回到旅馆后，一夜未睡的汉雷洛蕾，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时，别的客人才刚刚起身。她很快就睡着了。太阳从大窗子里照射进来，他躺在那儿，我想象着她在德国的那个湖边，远离吸毒岛的魔爪。她睡了一整天，我躺在她旁边，完全处于安非他明造成的迷糊状态中。

傍晚时她醒了过来，心情十分激动不安地高声说道：“你的家人为什么不帮助我们？难道就没有关心你的人吗？”她非常难过、但是得不到任何解答，只得又回过头去睡觉。我躺在那里听着她的呼吸声，脑袋里的疼痛一阵阵袭来，更加厉害了。好久以后我起床坐在桌旁，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住宿须知上写着：“上午十点钟前必须退房。”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清晨四点了。

我感到自己像是在死囚牢房中，只能再活六个小时了。

这时我更加不顾一切，决定打碎橱窗进行抢劫。我吞下了更多的安非他明，离开旅馆去找家珠宝店。二十分钟后，在状态并不佳的情况下，我往附近一条高级街道上的一个橱窗里扔了一块砖头。我非常虚弱，根本算不上是扔，只能说是砖头落到了玻璃上，自己也倒在了砖头旁边的地上。我甚至都没有能够把玻璃震裂，只好哭着爬进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棚去休息。我坐在那儿，脑子控制不住地乱转，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老保姆维奥莱特，她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一英里左右。她一定会帮助我的！我对自己这样说着便动身向她的公寓走去。要是她没有在多年前去世的话，也许是会帮助我的。清晨六点钟的时候我绊倒在她家门外。新住户气坏了，威胁说如果我再上门就要叫警察了，说我两年前就去过了。

最后我回到了旅馆，汉雷洛蕾仍在熟睡。我又吃了更多的安非他明好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我想到了一个迄今为止最疯狂的计划，突出表现了我滥用安非他明的真正可怕之处。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我决定把汉雷洛蕾带到爱尔兰南部的科克去。此行目的何在？去把十四岁时和绅士乔治一起盗窃失败的那个案子再做一遍。

我用大堆的谎言叫醒了姑娘，对她说一切顺利，我刚给朋友打了电话，他们买好了船票在爱尔兰等我们。“他们还要帮我们找个医院呢。”我大声说。汉雷洛蕾对我的话非常怀疑，但她对我的爱使她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两个小时后，在两人都不成个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在尤斯顿站上了火车。在开往爱尔兰海峡的途中，安非他明把现实和幻觉整个搅在了一起，使我真

的开始相信自己的故事了。朋友？在爱尔兰等着我们？哪儿有什么见鬼的朋友？过去二十五年来我惟一的朋友是背面刻印着右旋安非他明字样的圆圆的黄色小朋友。

因为没有票，我们多次被送下火车，但每次我们只不过在又一个冰冷的候车室里坐着，等着上下一班经过的列车。通常四个小时的路程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又累又饿地到达霍利黑德渡船码头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已在毒品作用下糊涂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竟然在和别的乘客一同走上渡船的跳板时还半期待着绅士乔治来迎接我们。唉，一位高级船员冷冷地说：“没票不能上船。”此时我那爱尔兰新生活的梦想便突地终止了。尽管我一再保证有朋友在科克拿着钱等我们，他根本拒绝让我们上船，一再重复着“没票不能上船。”

看到一切毫无希望，我开始像小孩一样发疯地大叫：“他们不让我们上船！”就像一个小男孩对妈妈大喊一样。汉雷洛蕾沿码头一面走一面轻声痛哭，她现在明白爱尔兰有朋友的话整个是撒谎，我们现在处在了更为糟糕的境地。

我们像两个地震灾民般站在码头旁，这时一个便衣警官走了过来。他态度很友好，要我们和他到附近的警察局去一趟。我请求他和我单独谈。他让汉雷洛蕾在外面的凳子上等着，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求他不要牵涉到她，解释说她来自德国一个体面的家庭。他询问我，我们一文莫名到霍利黑德来干什么，我把整个悲惨的故事向他和盘托出，只是省掉了打算盗窃的那部分。他满脸困惑，问清了我的名字和出生的年月日。他去核对后回来对我说有三张对我的逮捕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该出庭的时候没有出庭，但是足够逮捕我并把我拘留起来了。

“啊，见鬼，”他说，“我不需要这样的案子。”他说话时我感觉到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他说，“事情真够糟糕的。你们两个是真正相爱。你把她带到多佛去，自己找个医院住进去。别再吸食这些该死的毒品了。”他往我口袋里塞了五个英镑，笑着说：“给你，弄点东西吃，现在赶快滚出去吧，就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下一趟去伦敦的火车要第二天上午才开。候车室的门锁着，我们只好在海边的马路上转。汉雷洛蕾跟在我后面，老是要求我停下来休息。我们走过一条划艇，我神志不清地想把它划出海去，大喊：“我们划到爱尔兰去。上船！”汉雷洛蕾现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开始大声喊妈妈：“妈妈，妈妈，救救我！”感谢上帝我根本弄不动那条船，汉雷洛蕾又拒绝帮我，我只好打消了乘划艇出发的念头。

不久我发现了一个空瓶子，启发我有了一个给大洋彼岸送信的了不起的主意。我打开了箱子——这里曾放过几百万英镑的钱，但如今却不见了——拿出文件塞进瓶子里。我把瓶子扔进海里，海浪打湿了我的脚，我高呼：“他们会知道是我，会给我们送来帮助！”汉雷洛蕾这时正跪在地上祈祷。

一小时后车站的餐厅开门了。汉雷洛蕾饿坏了，当她意识到我把警察给的五英镑弄丢了的时候简直气极了。那钱也许在瓶子里，带着我们早餐的希望漂向大海。我流着眼泪发狂似的独自回到海边去找那只瓶子。过了一会儿汉雷洛蕾来找到了我，奇迹般地使我们上了回伦敦去的早班火车。

在四个小时的回程路上我的表现越来越糟，把我所有不穿的衣服都扔到了车窗外。查票员来后看到我的情况吓坏了，心想让伦敦去对付这种情况要容易一些，就没有管我们。我们到达尤斯顿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几乎是陪着我们过出站口的，只要能避免牵扯到不幸事件中去，他们怎么着都愿意。

这时我们两人都已经非常伤心难过了，决定不了在什么地方最后分手告别。我们只想延迟这不可避免的时刻的到来，在火车站外面的长凳上坐了很久很久。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最终还是——一起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去了，汉雷洛蕾好在那里乘和来时一样的车船连票的火车回德国去。

当天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离开了，下一班车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开。我们非常需要有个睡觉的地方。那时候美国航空公司的候机楼在火车站的后面，在那里我们倒在座位上，避免了在寒夜中受冻之苦。起初没有人来打搅我们，汉雷洛蕾把头枕在我的腿上休息。不久一位保安来对我们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因为他要锁门了。我求他让我们留下，他同意如果我离开，汉雷洛蕾可以在里面睡到早晨。我乞求汉雷洛蕾原谅我把她叫到伦敦来，并且保证明天早上六点回到这儿来和她告别。“我爱你。给你，你留下这几百万英镑把，”我哭着把那只破公文箱给了她。保安检查了箱子看有没有炸弹，满意后让箱子留了下来，我蜷缩着离开了。

到了街上后我想起了艾伦，无论我怎样伤害了他，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他的家离这里只有三英里左右，但是现在这些街道显得非常古怪。我曾在街道上拣烟头，走过不知多少年了，熟悉人行道上的每一条缝，但是现在我的视力减弱了，楼房显得高太多了。它们仿佛一直伸向天空。我跌跌撞撞地转了好几个小时，企图找到艾伦的家，但是结果完全迷了路，连回维多利亚

车站的路都找不到了。我没法子再走下去，就爬进一家商店的门道里躺了下来。十六年以后我发现那晚我就在展览路和瑟洛街的拐角处，离艾伦家只有半英里路。天开始被饶，我躺在那里，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知觉、永远也见不到汉雷洛蕾了。

我见到过她吗？

她存在过吗？

这一切是否仅仅是潦倒的街头醉汉的痴心梦？

突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过来。”我瞪着眼睛，慢慢认出了那个香烟女王，她是个多年在此处露宿的老太婆。许多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她，经常给她送来一包包的香烟或者放在塑料杯里的热饮。

在我自己罗宾汉式济贫的日子里，也曾停下汽车给过她钱。她记得我，当我变成流浪汉以后一直帮助我。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一层层地穿了许多条裙子，很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她总在衬裤里塞上香烟。那晚她给了我一些白兰地，对我似乎有点好处。我躺在她旁边，听她讲了导致她流浪街头的悲惨故事。她二十岁时还是一个处女，在哈罗兹公司工作，和她的领班，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恋爱了。他们在储藏室发生了性关系。他是她惟一的爱，她也相信他爱她。她怀孕了。她心里想着和他结婚，决定在通常下班后一起喝一杯的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那晚商场关门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爸爸，爸爸。”他抱起他们的时候孩子们叫道。她含着眼泪看着他和他们一起走了。跟着是堕胎，伤心，酗酒，导致流浪街头的孤独生活。

好一会儿她两眼凝视着天空，但突然她站了起来，俯身向着我：“回到你所爱的人身边去吧，回到你应去的地方。我可以看得到，只会有好结果，这已经写在你的命运之册里了。”

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来了茶。“雷吉，这孩子迷路了，把他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去吧。”她说。他默默地把我送了去。即使在我向他道谢的时候也没有做声。

我看见汉雷洛蕾在机场候机室里面，就敲敲玻璃，她走了过来。当我们隔着玻璃说话的时候，原来那个保安让我进到里面去。我求汉雷洛蕾让我和她一起到多佛去，在那儿和她告别，答应决不当众惹事，然后就去住院。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为了至少能一直醒着到达多佛，我把剩下的安非他明都吃了。现在我已经没有兴奋剂了。

在火车上我们很少说话，就那么握着手坐在那里。我想起了香烟女王关于新生活的話，我以为她是说和上帝在天堂里的新生活。我闭上了眼睛，心里想，汉雷洛蕾会把我埋葬在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个奇怪的念头，但我内心很平静。

我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准备好了。

火车抵达多佛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别哭，现在别哭，我想道。男子汉是不哭的。他们只高高地抬起头，挥手把船送到远方的地平线上。这是她应该得到的，这是我希望留在她脑海里的样子。

“抓住你的梦。”香烟女王说过，但是现在我的梦正在离我而去！船马上就要开了，船员都在大声喊：“赶快上船！”

汉雷洛蕾捏着票冲上了跳板。

我用最后一口气跟了上去，推开船员，倒在船的甲板上。

“你的票呢？”大吃一惊的船员问道。“这儿有一张，”我一把从汉雷洛蕾手里抓过票来说道，“另外一张在这儿什么地方。”说着我把汉雷洛蕾箱子里的东西倒了一地。“就在这儿什么地方。”我叫喊道，一面在她的衣服间翻来翻去以拖延时间。这时他们已经来不及了，舱口已经关上，好几百个乘客都已上了船，他们才不会为了把一个没买票的人赶下船去而把渡船停下来呢！

时间证明这次航行救了我的命。

如果我独自一人留在多佛我就会死去。

汉雷洛蕾把她家在德国的地址给了他们，此后他们就不再管我们了。看见比利时海岸进入视线时我害怕起来，想他们可能会把我抓起来，就把曾放过百万英镑的箱子拿到甲板上，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进了海里。所有那些年所犯的罪全都理在了深深的海底。

渡船在奥斯坦德靠岸后，只靠命运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没有受到任何质问就下船离开了。我们俩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原先我为什么要来比利时。双雷洛蕾没有考虑过要把这个身体糟得不成样子的人带回父母家里去。她已经受到炮弹爆炸般的震动，这时自己都应该进病人院了。

我正处在一连五天大剂量吞食毒品没有睡觉这一状态的后期。

我被可怕的伤痛搞得无比虚弱，现在无处可去。

汉雷洛蕾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没有听见，我正控制不住地在大哭。好几个人想来帮助我，可是谁也没法使我停止哭泣。我被彻底摧垮了。

我行走在无目的的人生之路上，受到的全是自己对自己造成的打击。

我现在痛苦万状，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痛苦。

我怒气冲天，不停地叫喊。

“这些该死的杂种，下流的臭东西，他们个个都一样！”

我已经把大衣扔掉了，只得把冻得冰冷的手深深地插进裤子口袋里。这时我摸到了最后四片药片——烈性巴比上酸盐片。这能使我逃离使我如此痛苦的生活！我无法把药片囫囵吞下，就把它嚼碎了。外面冷极了，为了躲到暖和一点的地方，我们爬上了一系列停放在那儿的列车。很快我感到白茫茫的昏睡之云像海潮般向残卷了过来。我象个婴儿一样践起身子，在一系列开往俄国的特快列车上睡死了过去。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火车正慢慢离开奥斯坦德开往西伯利亚。我由于服用了巴比上酸盐片仍感到头昏眼花，但模模糊糊看到有别的旅客，听见他们在说外国话。有人把那只曾放过百万英镑的空箱子用绳子捆在了我身上。

我像战争电影里演的那样跳下火车，摔下来打着滚最后停在了月台中央，一动也不能动了。我又把头给撞了，鼻子流血。当我终于坐起来时，看见胸口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过你，但是我不得不回家去了。”

汉雷洛蕾刚刚结束了一门连经过专门训练的突击队员都无法通过的生存课。在过去的四天里她几乎没吃没睡，从精神和身体上都到了能够承受的边缘。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活下去，她不得不跳下这疯狂的螺旋式滑道。

我半瘫痪着、浑身是血、脏兮兮地坐在那儿，旅客们感到难以置信地从我身边迈过去。汉雷洛蕾，我重回人间的入场券，走了。我再一次孤身一人，但是这一回是在一个陌生的比利时城市里，头和心都碎裂了。在人们匆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海鸥在天空中飞翔，看上去就像等着吃我的肉的秃鹫。我用一只眼睛还能看见街对面商店的模糊轮廓。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不行，便只能像只狗一样爬出了车站。雪下得很大，我腰上捆着文件箱，用膝盖和两只手在半融的雪水中爬行，看上去有点像只瑞士的雪山救人犬。

为了避雪我躲进了一家商店的门道里，一辆运啤酒的货车正在我面前卸货。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在那两个卸货的人没在的时候，我偷了一整箱啤酒，拽着拐过了弯。我在尺码以外找到了一个小地下停车场的人口。我坐在啤酒箱上，像坐在平底雪橇上一样滑了下去。在下面我至少不必受冰冷的雪的煎熬。我打开了头几瓶啤酒，大口地喝了下去。酒精为我体内的兴奋剂加了油，尽管我浑身是伤，但很快我就感到畅快起来。我再一次成了国王。

后来的两个小时中，在那个潮湿的比利时停车场里，一切都棒极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天刚破晓。我仰面躺着，又冷又僵，起初一点也动不了，就好像我已经化为了尸僵似的。就连动一动头都会引起眩晕，仿佛有一个巨人便提着我使劲甩动。我推一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打开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空空的胃里。更为可怜又可鄙的是，啤酒瓶破口划破了我的嘴唇，我现在咽下去的是和着血的啤酒。酒精逐渐使我激动起来，我醉醒醒地决定追随汉雷洛蕾到慕尼黑去。不久我就坐在了一列温暖的火车里向德国南部驶去，至少我希望是开往那个方向去的火车。

在德国火车上像我这样旅行的困难是，查票员比英国的要严厉得多。没票，滚下车去！是一条严格执行的规矩。推一好的是每次他们都等到火车停下以后才赶我下车。他们不听你的哭诉，特别是外语的哭诉。我在每一个该死的车站都被赶下车来，随着旅程的无限延长，我越来越虚弱脱水。在每一个车站，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找食物和水，只能坐在那里等着上下一趟车。

终于，铁路警察以典型的德国式效率打电话给前面的车站，警告化们有一个外国吉卜赛正在企图免费穿越德国。我的铁路旅行在科布伦茨结束了，一个头戴大帽子身穿长大衣的严厉的警官在那儿等着我。“你得跟我来。”他说着把我带到了一辆绿色的大汽车前。我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在一间牢房里关了大约五个小时。

在那间牢房里，我奇迹般地发现了十马克硬币整整齐齐地像在一起。门终于开了，询问开始。对比之下，英国警察简直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德国警察十分生气，警告我欺骗国家铁路会受到什么样的严厉惩罚。他们说得就像会判死刑似的。但是他们并不想给自己加上一个负担，

去逮捕我，以及为把我送回到英国公园的长凳上去做所必需的大量旷日持久的文案工作。那个戴着大帽子的警官这时开口了：“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坐船、坐汽车、坐飞机都可以，就是不要，我重复一遍，不要坐火车。你听清楚了吗？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他看上去非常生气。我想回答说：“希特勒万岁。”不过考虑考虑没有说。我点了点头，默默地离开了警察局，走上科布伦茨积雪的大街。

在一个过路人的帮助之下我用硬币给汉雷洛曹家打了个电话。她心烦意乱，就让她的父亲和我说话，现在他已经完全了解了女儿在英国噩梦般的遭遇。他用德语和我讲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关切和同情。他不断提到我的名字，好像在向我表示良好的祝愿和对我的宽恕。我想象他在自己回响着钢琴的乐声和闪烁着圣诞树灯光的温暖的客厅里。硬币用光后我离开了电话亭，发现冬雪下得更大了。

我一定不能放弃，我对自己说着并开始唱起歌来：“也许因为我是个伦敦佬。”歌声似乎激励了我，我向高速公路艰难地走去。我被铁路警察吓坏了，又不知道科布伦茨到慕尼黑之间的距离是四百多公里，就开始在公路边搭便车。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开过去的寥寥几辆汽车上的人可能根本连看都没有看见我，因为我身上盖满了雪，看去就像个活雪人。我意识到不会有人停车，就决定步行。我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迫切需要手术治疗，又加上正处于一生中最严重的毒品突然中断的状态下，这个决定对自己实在是提出了相当大的要求。沿公路走了大约一公里我跌进沟里，陷在了积雪之中。我爬不出来，仰面在那里躺了很久很久，雪不断落在我的脸上。地狱应该是个热的地方，我心里想。最后我终于从沟里爬了上来，但是爬丢了一只鞋。我冷得要命，身体冻木了。我有一只鞋了，便走下了公路回到科布伦茨。我在雪地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火车站附近，就好像有人给我引路似的，我找到了一个干干的地下室。我倒在了里面。但是根本不可能睡在地上，石头地上的冷气钻透了我全身。我解下那只曾经放过找不到的百万英镑的箱子做枕头，准备就这样死去。

当我和上帝说话的时候，我开始又哭又笑。

我既未吸毒又未喝醉。我现在非常平静神志非常正常。我需要帮助，科布伦茨的人仍在梦乡之中，上帝是惟一醒着会听我讲话的人。“啊，上帝，”我呼喊道，“你，现在也只有你能帮助我了。只有你能给我力量，让我停止吸毒！”

我终于承认了失败，承认自己可怕的毒瘤，以及从小的时候起这毒德就是多么的不可控制。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毁掉了，现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腐君子，第一次祈求上帝救救我。我把自己的意志和命运都交给了我的遗物主，躺在那里，上帝来到了地下室和我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宽慰。他并没有在天使的包围下闪着巨光来到。他只是和我在一起而已。

一个疲乏的、厌倦了斗争的、经历了二十年噩梦后的癌君子迫使自己跪在那儿，在漆黑的地下室里一遍遍地祈求上帝的帮助。

上帝真的帮助了我。

我此生再也没有吸过毒。

要想活下去，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地下室的另一头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商家使用的垃圾桶，为了逃避冰冷的地板我爬进了垃圾堆里。我在里面睡着了，生动地梦见了汉雷洛蕾和她的父亲。他们向我把手，让我走进一扇大木门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里。

突然地震把我惊醒了。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随着垃圾一起落进地球的中心。有人正把装着我的那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垃圾车。我大声喊叫着，把头从垃圾下面钻了出来，差一点没能躲过垃圾车嘎嘎作响的铁牙。垃圾工们比我还要惊骇，都大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

“只不过歇了一会儿。”我用英语说，一面从垃圾车上翻了下来。我蹒跚着走到附近的火车站，看见一列停在那儿的火车，爬了上去，希望它开往我要去的地方。谁也别想把我从这列车上赶下去，我向自己保证道，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小厕所里。很快我就在地上睡着了，完全挡住了门，谁也没法推开。我断断续续醒来，听见有人在外面的用外语叫喊，但我一声不响，继续我的旅行，祈求我们是在往南开。开了许多英里后我站了起来，从涂着油漆的窗户上的一条刮痕看见我们是在斯图加特，正是我要去的方向。我又数着过了几个车站后就跳下了火车。我不停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直到我来到安全的大街上。天气非常冷，我脚上只有一只鞋，简直是狼狈不堪，但是我不敢停下来，怕铁路警察会逮捕我。我继续往前走时，发现自己是在奥格斯

堡，正是我要到的地方。上帝在指引着我。

离汉雷洛蕾家所在的村子还有十英里，没有钱根本不可能坐公共汽车，我只能走去。我半走半爬，慢慢挪动，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没有人来帮助我。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对一切毫不关心。

一英里以外我来到了一个厕所。那只没有鞋的脚肿得很厉害，厕所成了个受欢迎的休息的地方。我打开水龙头喝了大量的水，恢复了力气，继续走完最后一段通向自由之路。路上经过一个购物中心时我走了进去，偷了一瓶红葡萄酒。半数的店员眼睁睁地看着，但是都吓得不敢走近我。损失一瓶便宜酒比起面对一个疯子来说麻烦要少得多。

在购物中心外面，我坐在矮墙上几乎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酒给了我力量，我大声哭着前行，但是高高地仰起了头。

我在街上乱走，汽车不得不猛拐以免撞上我。好像奇迹一样，其中一辆汽车停了，开车的人走下车来。是克里斯蒂娜，汉雷洛蕾的妹妹，从大学开车回家。她把剩下的那点我带回父母家中。我站在他们的花园里，不肯进屋，对我让汉雷洛蕾受到的折磨感到无比羞愧。当汉妮出来后我抱着她，哭干了每一滴眼泪。

汉雷洛蕾的母亲惊呆了，给汉雷洛蕾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立刻从上班的地方回到家里。他看见我仍然像死了似地站在他家的花园里，就用胳膊搂着我，把我带进了屋子。他们给我热汤喝，然后让我睡觉。如果他把我赶出家门，我是必死无疑。我能活着永远要感谢他。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才来到了他巴伐利亚家的门口，但是我的命运之册里就是这样写着的。

上帝终于把我带回了家中。

我从吸毒岛上被释放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立即把我送到了慕尼黑的格罗斯汉登医院，在那里几小时后给我做了紧急手术。这个十小时的大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外科医生取出了头骨的碎片，嵌入了一块金属片把我裂开的头骨固定起来。一只内耳已无法修复，结果是我这只耳朵完全丧失了听力。在这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大夫设法把我的脸部神经接了起来，在后来的五年中渐渐恢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功能。这就是说我笑的时候脸是扭曲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人生之后，任何笑容都是个奇迹。我的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但多年来逐渐也有改善。我受的这些伤和后来接受的手术治疗证明，惠廷顿医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我出院，做得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汉雷洛蕾不顾两小时的路程，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她的爱才是治疗我伤病的最主要的药物。我非常虚弱，在医院之外一无所有。

但是汉妮爱我，这就足够了。

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很长一段时间后当我终于出院时，汉雷洛蕾租了一套小公寓，干活挣钱养活我们俩。后来的十二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主要不是从伤病中恢复，而是学会在一个没有毒品的正常世界中生活。克服毕生的毒瘤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比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和人交往是最难的，简直十分可怕。我只有单独和汉妮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安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听见“包打听”，我那只挨饿的狗的凄厉叫声，我会叫醒汉雷洛蕾，问她：“我还会回到公园的长凳上去吗？”她会让我放心，说：“魔鬼已经没有了。你今生不会再贫困潦倒了，这次你会成功的。”我便会在她的怀抱中重新入睡。

许多个早晨，我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救世军的收容所里，醒来时就寻找着那一排排的老头。

没有人，特别是汉雷洛蕾的亲人，相信我们能在一起长久地过下去。作为一个从毒瘤中康复的人，我是很难相处的，对于汉雷洛蕾这样一个独立的年轻女人来说，这是一段十分困难的岁月。我的头脑还远非正常，在大约六个月的时候，我在一阵嫉妒大发作的情况下把公寓里的东西全砸了，还威胁要自杀。救护车上的人员给我穿上了拘束衣，送到德国一家把病人糊起来的疯人院中。汉妮非常伤心，但是当她几天以后来探视我的时候，很明显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她原谅了我，说：“至少你没有吸毒！请你振作起来吧。我仍然爱你，等你出了院我们再重新开始。”

不久他们放我出了院，在我坚决保证不再砸烂新公寓的情况下，我们搬进了新公寓。

现在是三月了，从我挨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月。白天当汉妮去上班的时候我长距离地散步。我看着春天绽开它奇妙的世界。我没有责任，没有工作，没有操心的事。我只需要起床，一天天生活下去，但仅仅这一点已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了。

但我确实是不靠毒品在斗争着。我越来越好转，可是尽管有进步，仍不时会出现这样疯狂的念头，心想有了那些神奇的小药丸，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容易。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一直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许多年以后那些疯狂的念头才最终消失。

汉雷洛营怀孕了，我们俩都很高兴，不久我们在奥格斯堡结了婚。我感到非常骄傲。遗憾的是，汉妮怀孕六个月时流产了，是个小女孩，如果活着现在该十五岁了。我们痛心之极。我到医院探望汉雷洛蕾，出来后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了很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借助毒品来面对自己的痛苦。我在那儿坐了很久才终于起身回家去。在我站起身来之际，我注意到一个老流浪汉在对面一张长凳上睡着了——他回到家了。

第二年初我在慕尼黑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所谓的工作。没有工资，采取利润分成，考虑到火车费，我们实际上还得贴钱。但是这没有关系，工作是为了帮助我重新建立起我那十分脆弱的自尊心。

老板要我到伦敦去和一家英国烟草公司谈判，让他们生产的香烟直接供应土耳其市场，工作使我重入虎口。我提心吊胆地独自飞往英国。谈判没有成功，但是我在伦敦，口袋里装着钱，而要到兰多大夫的毒品厂，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

我充满了不安全感，依然对那神奇的药丸有一定的信任，相信它们会把我从一个小人物带回到重要斗士的角色。我极度渴望得到我毕生那样熟悉的毒品的支持，尽管几乎毁了我，我感到它们仍旧和老朋友一样，很难没有它们而生活下去。这种引诱实在是太强烈了，不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哈利街外。片刻之后，我想，我小心地服用这些药丸，汉妮根本不会知道。我付钱买了处方上开的三百粒药丸。我紧张得发抖，跑进了附近一家三明治快餐店。多年前，每次拿医生的处方买了毒品后，我就是来到这同一家快餐店，吞服下药丸后再回到“包打听”和老鼠身边去。

在餐厅里我神情恍惚地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哭了起来。店主认出了我，问我出了什么事。天已经晚了，快餐店就要关门了，他坐下来听我讲自己的事。当他听明白了以后对我说：“孩子，仔细听我说。”接着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弗兰切斯卡去年因吸食过量海洛因死去了。他讲述时他的妻子在柜台后面哭了起来。他眼中含着泪，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扔掉毒品，回到你女人的身边。”他愤怒地紧咬着牙。“一寸又他妈一寸，一天又他妈一天地奋力爬回生活中去。把那恶毒的鬼东西扔掉，它杀死了弗兰切斯卡，差一点也杀死了你！”他的话使我陷入了思考，最后我彻底明白了。我意识到痛君子回头没有容易的路。我把那三百粒药丸扔进了快餐店的抽水马桶里。我离去时店主和我吻别，笑着说：“现在快滚吧，祝你幸福！”

在回慕尼黑的飞机上我哭了。我终于最后抛开了那个恶毒的杂种，毒品先生，他囚禁了我整整二十六年。

感谢万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

汉雷洛蕾在机场接我，她问：“怎么了？你哭了吗？”“我在伦敦苦斗了一场。”我答道。“和谁斗？”她问。“不是肉体上的苦斗，另一种斗争。”我回答说。

“谁赢了？”她问。“我以后告诉你。”我说，不再提起这事。

第二天在湖边时我采了一把雏菊。我把它们往天上一扔，高声喊道：

“谁赢了？”

谁他妈的赢了？

我赢了。”

九个月后我们开着一辆小的二手车回到英国去生活。在奥斯坦德上渡船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上次在这个比利时海港停留时的可怕情景，感情非常激动。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哈福斯多克山找到了一套小公寓，两个人都找到了很简单的工作。就像快餐店老板所说的那样，我一寸又一寸，一天又一天地奋力爬回到生活中。他妈的，真是困难极了，但是我有一个挚爱的人和我在一起。有了这样的爱是没有爬不上去的高山的。

回到英国两年以后，我见到了女儿特莎和安东尼姬，她们都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们坐火车到伦敦，偏偏在尤斯顿车站下车。我去接她们。这就是那么多年前我告别的宝贝孩子。我们都有点控制不住感情，在车站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们对面有一个流浪汉，宿醉后仍在睡觉。“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特莎说，并不知道曾经发生在她父亲身上的事情。“你应该感激，那时候你很可能成他这个样子的。”她继续说道。

可能？我心里想，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很长的时间都是如此！

流浪汉翻身面向着我们，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孤独的老人。

现在我定期见到两个女儿，我们变得非常亲近。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脑子清楚多了，开始寻找埋藏起来的钱。

我们找到了一些，没有几百万，不过足够了。

在我所有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钱一直部藏在那里，也许是留着为了好时光的到来。

不再有抢劫或犯罪团伙，不再有此需要了。

和毒品一样，犯罪业已成为历史。

我涉足许多经营，在英国房地产业不景气之前，一直投资房地产。我们在西班牙购置了一所豪华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坐在自家的游泳池旁时，我想起了肯尼思和在纽卡斯尔每天下午唱着赞美上帝的老人们。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但可悲的是，这不是梦。那曾经是我生活过的岁月。

四年前母亲去世了，我们埋葬她时我往她的墓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再见妈妈，我真高兴你活着看到了我戒毒，并且分享了看着我的儿子们成长的喜悦。”

我祈祷其他痛苦的痛君子的爸爸妈妈能获得同样的喜悦。

过去十六年的生活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我再也没有吞食过毒品。我设法对付了下来。有时我仍会感到十分紧张，特别是在火车站附近或者见流浪汉的时候。那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实无比。

两年前我们把在英国其他的房地产全卖了。我们带着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朱利安，回到德国南部靠近汉雷洛畜出生地的小村子去生活。她回到了家人之中，在她访问伦敦这一决定她的命运之行前，她一直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现在我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每个周末看儿子们在村队踢足球。和我们的两只狗米基及莫莉一起站在那里，我看上去是个真正的普通人了。

我确实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幸福。

有时候别人的父母问我在德国干些什么。

“就是写本书，”我答道。“写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有勇气告诉他们——

“书里写的是一个终生为毒瘤所害的人的故事。

一个精神失常了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我。”

我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上学去，心中祈祷他们之中不要有人走上我所经历过的、奔向地狱的疯狂过山车之旅。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的红尘世界中，有的孩子会走上这条路。

感谢大家阅读我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接到伦敦电视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邀请我和汉雷洛蕾飞往伦敦去，他们要录制对我们的电视访问。我们感到很紧张，但是同意去。结果证明这是二次感情上十分激动的经历。当我们坐在切尔西酒家面对电视摄像机、重演我第一次遇见汉雷洛蕾那一幕时，突然，时间对我来说凝固了，我回忆起所有那些沦落街头的年代里所受的痛苦，开始哭了起来。

访问播出后，卡尔顿电视台宣布，我计划在节礼日为穷困潦倒的人在圣詹姆斯公园举行一次聚会，这是二十多年前我为流浪者们举行自己的圣诞节晚会的同一个地方。那是我非常孤独的一段时期。现在我下决心要让仍然流落街头的人在这个圣诞节得到一点欢乐。

在一九九六年的节礼日这天，我们把兰厄姆·希尔顿饭店捐献的食品收集在一起，开车到滑铁卢车站附近的斗牛场，会邀请穷困潦倒的人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公园去参加聚会。

那天非常冷，我看见六七个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火堆旁。一开始他们很怀疑，但是当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曾经是个流浪街头的人，他们令人惊奇地请我喝一杯，并邀请我参加到他们中去。

虽然仍然不放心，但其中四个带着他们的小狗坐进了我的车子，我们开到公园，在那儿举行了我们自己的圣诞节聚会，有食物、饮料和彩包爆竹，都是兰厄姆布尔顿饭店赠送的。

那个下午，两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纸访问了我们大家。

正是在这一切活动的过程中我真正了解了雅姬，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无家可归的女子。她为我写了一首诗，后来我在电台上朗读了。和其他三个人一样，她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流浪生活。看着他们，我又看到了自己，孤独地蜷缩在伦敦商店的门道里。不知怎地，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我感到自己已经和他们相识一生了。

那天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聚会以后当我把他们送回滑铁卢寂寞寒冷的街道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我握了手，感谢我使他们过了美好的一天。

那晚我坐在温暖的屋子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心里想着围坐在滑铁卢地下通道火堆旁的雅姬和她的朋友们。

他们的电视机在哪里？

他们的热水澡呢？

他们的干净衣服呢？

雅姬，祝你和你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祝你找到你自己的奇迹，正如多年前我在切尔西酒家找到了我的奇迹。

斯蒂芬，1997年6月